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说明汇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 版 说 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第一卷至第三十九卷，每卷卷首都有一篇《说明》，介绍本卷的内容。第一卷至第四卷《说明》的署名是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第五卷至第三十九卷《说明》的署名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为便利读者参考批判，现将第一卷至第三十九卷全部《说明》汇集在一起，印成单行本，内部发行。

这些《说明》大部分有严重问题，如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为老沙皇辩护，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影射攻击我党等等。这些错误观点，未加删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有些卷，在正文和附录的编排、技术规格等方面与俄文版不完全相同。第一卷至第十五卷印有各卷《说明》，第十六卷以后《说明》就没有收进去。

本《说明》仅供内部参考，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并请标明原文版本。

目 录

第二版说明	1
第 一 卷	6
第 二 卷	12
第 三 卷	17
第 四 卷	25
第 五 卷	35
第 六 卷	45
第 七 卷	62
第 八 卷	75
第 九 卷	92
第 十 卷	111
第 十 一 卷	128
第 十 二 卷	149
第 十 三 卷	169
第 十 四 卷	190
第 十 五 卷	212
第 十 六 卷	228
第 十 七 卷	254
第 十 八 卷	277
第 十 九 卷	302
第 二 十 卷	324
第 二 十 一 卷	342

第二十二卷	365
第二十三卷	394
第二十四卷	395
第二十五卷	397
第二十六卷	3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各卷说明	421
第二十七卷	428
第二十八卷	453
第二十九卷	478
第三十卷	501
第三十一卷	525
第三十二卷	547
第三十三卷	567
第三十四卷	590
第三十五卷	608
第三十六卷	624
第三十七卷	644
第三十八卷	661
第三十九卷	681

第二版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版的。

根据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当时曾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著的最完备的文献。但是该版尚存在着重大的缺点。该版译文有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个别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文章被误编进来，而他们的许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却没有收集进去。第一版的说明、索引和其他参考资料也有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任务就是要消除第一版的这些缺点。

本版编入了第一版所没有的许多著作，其中包括未完成的《资本论》第四卷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当年发表这部手稿时曾加以伪造，在许多地方歪曲了马克思手稿的原文，破坏了它的结构。现在全集发表的全部手稿是遵照马克思关于材料排列顺序的遗旨来编排的。在新版的全集中第一次编进了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大批文章，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中活动的许多材料和文件。

第一次编入全集的大部分著作的俄文译文，以前曾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各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的其他出版物和苏联期刊上发表过，这些著作的原文也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院的出版物上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论文、文件和演说是在本院编辑第二版的过程中发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卷次和卷内的次序，是根据各篇写作或发表的日期排列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各卷，为了保持完整性和彼此间的有机联系，多少离开了按年代排列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信编入全集的最后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全部译文，都经过了审查和校订。

第二版各卷均附有说明和参考资料（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索引）。

本版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并不是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供学术研究用的版本。譬如第二版就没有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恩格斯的小册子《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马克思的《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等等。这些著作将出版单行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共计三十卷。

* * *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是真正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最丰富的宝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奴役制斗争中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精华的合法继承者，它的产生标志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根本变革和真正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科学地证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我们说，只有无产

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将全体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引导他们去冲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的即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使命，就必须有自己的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这样的政党进行了不倦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革命学说，它不断发展，日臻完善。马克思主义是各种教条主义的死敌；它不承认结论和公式是一成不变的，是一切时代都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再三着重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自己学说的基础以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不断地使它发展和更加完善，并在概括革命实践、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用新思想和新结论把它丰富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是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自然不可能给以直接而详尽的回答。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的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它向前推进。然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有的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有的人口头上宣称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则背叛马克思主义，并企图把马克思的创造性学说变成僵死的教条。

在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科学的伟大匠师、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打退了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攻击，并且在概括了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之后，把马克思学说提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用适合新的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

结论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例如，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之后，便重新修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过时的公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垄断前资本主义的条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它只可能同时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的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列宁得出的结论是：在新的条件下，即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是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同时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事业，深刻而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实质，用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现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探讨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论证了工农联盟这个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条件的重大意义。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天才地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新型的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列宁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创立了关于党的学说：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主要武器。

列宁的伟大战友及其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以及现代国际解放运动的经验，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在一系列问题上用新的原理丰富了革命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苏联共产党的历次决议中，表现在党的有科学根据并经过数十年斗争检验的政策中，这些政策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的真正创

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苏联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因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战无不胜的。

苏联共产党的最丰富的历史经验，是鼓舞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革命地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榜样。

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决议和这些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从理论上概括了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概括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经验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从而用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兄弟共产党与工人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它们谨慎地保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创造性地发展它，并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和书呆子气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它们要求共产党员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的真正实质，而不是死背个别的公式和条文。

如果不领会列宁及其学生和战友——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兄弟共产党与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所作的新的贡献，就不能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伟大的创造性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中所掌握的劳动群众越来越多，它已成为千百万人的旗帜，成为加速历史进程的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和民主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胜利，是现代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世界史上的每一个新时代，都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战无不胜的学说带来新的胜利。

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收集了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 1839—1844 年即他们开始创作上的亲密合作之前的著作。本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马克思的 1842—1844 年的著作，第二部分是恩格斯的 1839—1844 年的著作。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从揭露普鲁士出版法和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法，开始进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代表德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思想家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马克思发表于《莱茵报》的一些论文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和全面。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59 页）。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反对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笼罩着普鲁士和整个德国的那种精神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束缚。他在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两篇论文中，揭露了省议会活动的等级局限性和省议会对封建贵族、对贵族的土地占有制的奴颜婢膝的态度。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普鲁士专制国家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作了初步的阐明。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论文中，马克思公开地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辩护

(见本卷第141—142页)。马克思撰写这两篇分析劳动群众的物质困境的论文，对于他的观点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证实的，马克思后来不止一次地向他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代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是由“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无产阶级本身的生活和斗争所提出的。虽然马克思批判地研究了当时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认为他的知识还不允许他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肯定的意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问题，需要加以全面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的论证。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时候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和他整个世界观的已经开始的根本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的著作揭示了他这个时期的观点的形成过程。照列宁的话来说，这时“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5页）

马克思的未完成的篇幅巨大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手稿的导言曾发表在《德法年鉴》上。

马克思后来在谈到他批判地考察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后所做的总结时写道：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

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和书信表明了他最终地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

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拟定了该杂志的计划，认为该杂志的任务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见本卷第416页）。马克思反对以前的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教条主义；他反对宣布一套似乎对将来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现成的办法和一劳永逸的决定。马克思坚决反对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实际斗争的思辨理论，他提出的任务是：要把对旧社会的理论批判同实践、同政治、“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布·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的和神学的提法，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这一深刻的思想；他所说的“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是指必然使人类摆脱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一个卓越的原理：先进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时写道：“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

诉诸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9页)

马克思在和恩格斯合作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文章是《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根据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经验，把他在当时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和解放作用的伟大思想具体化了。

编入第一卷的恩格斯的著作表明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以前就独立地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了。

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的蒙昧和伪善；他指出，工人和手工业者极度贫困，由于遭受残酷的剥削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是年青的恩格斯的文学评论著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拥护文学的思想性，反对企图调和各对立派别的“中庸”派的哲学，并批判了“青年德意志”这个文学团体。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展开了斗争，同时还尖锐地抨击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思想；威廉四世企图在德国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专制的君主国家。

第一卷刊载了恩格斯在旅居英国期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恩格斯后来在谈到他研究英国经济和英国阶级斗争对于他的观点的形成的影响时写道：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

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在《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伦敦来信》和其他许多文章中，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占了主要的地位。恩格斯评述了正在英国展开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彻底揭穿了英国各政党的阶级性。恩格斯分析了英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无产阶级是实现英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的社会力量。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英国的工人斗争以及英国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同时他也阐明了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并且强调人民群众在爱尔兰争取摆脱民族压迫的解放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

发表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亦即罗·欧文的信徒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的两篇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大陆上的运动》，说明了恩格斯很注意法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德国、瑞士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两篇文章中，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有批判性的评价，也有一些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一过程的事实。

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表明恩格斯最终地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著作中，“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9页）。恩格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部最早的还不够成熟的著作，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从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特别注意揭露马尔萨斯的卑鄙的、仇视人类的人口论；恩格斯证明这

种荒谬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同时特别强调科学的进步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恩格斯在评论托·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文章中（这篇书评主要是针对社会问题和英国工人的状况而写的），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批判了卡莱尔的宗教观和他想建立“英雄崇拜”的企图。恩格斯坚决反对“英雄崇拜”，并且指出，只有群众才是能够实现先进思想的力量。

恩格斯在发表于《前进报》上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两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的产业革命，以及由这个革命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英国宪法的虚伪性，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阶级本质和局限性。

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许多著作都包含着天才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然而这些著作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还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成熟作品中所坚持的那些科学观点。只是由于他们后来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由于他们在创作上的亲密合作，他们才创立了引起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根本变革的科学。

* * *

本版第一卷没有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左派分子的观点写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恩格斯针对谢林而写的哲学小册子以及一些政论文章。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也没有收入本卷。为少数专门研究者感兴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将出版单行本。

马克思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照它原来的形式刊印的，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做过相当删节的版本不同。

第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6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次会见奠定了他们在理论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创造性合作的基础。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他们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的东西做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批判了它的神秘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都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得到了阐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接触到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见本卷第152页）。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关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原理有巨大的意

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中发生的变革愈深入愈广泛，完成这一变革的群众也就愈众多。列宁特别强调这个思想的意义，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神圣家族》中还包含着几乎已经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观点；无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地位，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并且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惨无人道的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见本卷第45页）。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概述了西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

《神圣家族》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部著作已经含有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所持的某些论点。后来恩格斯在确定《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史中所占的地位时写道：“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也得到了表述。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根据私有制在其经济运动中必将自行灭亡这一点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

然性。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认为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正如本书作者后来指出的，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它反映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初期的一个阶段。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当时这个最发达的国家为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规律。他揭明了引起工厂无产阶级出现的产业革命的全部奥秘，并且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恩格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用列宁的话来说，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7页）。恩格斯一方面描写了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他批判了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鼓吹博爱，宣扬友好的做法。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进行罢工和成立工会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的有效手段，但是毕竟还不能把他们从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对宪章运动有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但是他又批评了宪章主义者目标狭隘，并且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理论原理：宪章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和《在爱北斐特的演说》这两篇文章也很有意义，虽然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有费尔巴哈哲学伦理学观点的影响的痕迹。这两篇文章包含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迹的一些重要资料，反映恩格斯在1844年至

1845年的冬天在莱茵省进行的巨大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在描述恩格斯这时的活动的环境时写道，同情共产主义思想是当时德国反政府情绪的表现方式，因此，在参加运动的人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些善意的资产者。“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数不胜数的准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0页）

1845年4月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以后，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共同探讨他们的新的观点，同时设法在报刊上加以宣传，并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建立联系。1845年9月恩格斯写《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恩格斯从这篇文章起开始系统地为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夏天旅居英国期间同宪章派中的革命派建立了巩固的联系。

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状况》的论文，他在这些文章中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这里作为一个为争取统一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坚定战士，抨击德意志各邦的、首先是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痛斥军阀官僚的飞扬跋扈，大小王公的专横暴戾。同时恩格斯还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给《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写的前言和结束语中，对傅立叶做了评价，认为他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这篇文章中宣布各国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揭穿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两篇文章以及马克思1846年1月18日的《声明》都很重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报刊上初次发表的反对“真正的社

会主义者”的言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庸俗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观点，是对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发展的严重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于1846年1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先进工人，并且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流派作斗争。

收入全集第二卷的是马克思主义尚未最后形成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用的术语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制定逐渐精确化的。

第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收集了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在1847年1月至4月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它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继续。

第三卷所收集的著作是属于科学共产主义形成时期的，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哲学基础、理论基础的形成过程中构成一个重要阶段。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批完全成熟的著作的直接准备。

恩格斯后来在谈到他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时写道：“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的革命的世界观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形成起来，并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工人群众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核心，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费尔巴哈唯物

主义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新质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1888年说明这一提纲的意义时写道：“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揭露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即它们的消极直观的性质，对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了解。马克思指出革命的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起决定作用。在这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6页）这一条扼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包括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过去的哲学的根本区别，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能动的、改造的性质以及它同革命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费尔巴哈抽象地、非历史地考察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相反，他提出了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见本卷第5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唯物主义应用来理解人类社会了。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当马克思在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他已经在一些主要点上完成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正如后来马克思所回忆的那样，1845年春天，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他们就决定共同制定自己的观点，这一工作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而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次合作的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巨著，但是他们未能把它发表。马克思后来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为创立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真正科学而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占着主要的地位。这一著作的第一章初次详尽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对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作了简短的分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用不太确切的术语来表达的，后来他们用比较确切表达这些新概念的内容的另一些术语代替了这些术语。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所有制形式”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指出，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所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国家的作用，指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最重要的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比较详尽的科学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

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见本卷第 38 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原理中，已包含着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这一结论之后，概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前提，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以前的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首先在于：以前的一切革命都是用一种剥削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与此相反，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无产阶级革命归根到底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消灭这些阶级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写道：“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见本卷第 7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并指出这些对立将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被消灭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经济关系，但是阐明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重要的基本原理。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写的，这一著作应该“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7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而且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济规律和范畴的客观性质有明确的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

畴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经济规律和范畴是受到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见本卷第 25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这个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概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见本卷第 25 页）而如何不断地改变，指出了所有制的各种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使用的术语，这就是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如何相互更替。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这些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差别，同时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承续性，这种承续性表现在新一代继承着先辈遗留下来的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其后又逐渐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生产力发生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见本卷第 81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见本卷第 83 页）。可见，在这里已经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经济规律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一规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应用这一规律来分析资本主义。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时，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上必然的同时也是历史上暂时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

度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会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这种桎梏将必然为共产主义革命所摧毁。这种革命将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轮廓。他们认为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将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从而有能力支配生产，支配交换，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的才能和天资才会得到充分的和全面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许多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对许多社会科学都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在这里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的物质生活、同人们的劳动过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语言和人的思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时，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见本卷第525页），“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见本卷第34页）这一非常重要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美学观点，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指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依赖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人的思维、精神要求、兴趣、爱好和情绪的实质和作用，指出了它们的变化和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定，是和对以前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分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史领域所作的许多探讨，虽然很简短，内容却很丰富，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对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稍后一些的思想家们的观点有重要的评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辩护士的哲学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地分析了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简短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他们所制定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完成了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的观点的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最早的思想家之一、青年黑格尔分子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时，批判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和一般唯心主义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论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揭露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反动本质。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博爱”这种市侩的感伤主义的说教，散布阶级和平的思想。在革命前的德国，当人民的一切民主力量反对专制政体和封建关系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愈来愈明显的时候，这种说教是特别有害和危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妄自尊大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仅仅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第四章。恩格斯去世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首领的手中。他们长期地把它束之高

阁。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样结构的全部著作，曾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于1932年用德文出版，随后于1933年又用俄文出版。

第 四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至1848年8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完成。从此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工人阶级的已经形成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成了工人阶级在争取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正象列宁所说，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

收入本卷的著作，已经在基本方面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也有新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理论概括，愈益明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原理：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缔造者的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他们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理。

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成熟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际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巩固了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联

系，他们对宗派主义和各种幼稚的空想主义的思想影响进行了斗争。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1847年夏天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争取建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本卷开头第一篇文章《反克利盖的通告》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流派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这些流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给自己打开了通向无产阶级群众的道路。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词，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新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嘲笑克利盖这一类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空想和玩弄辞藻的把戏，尤其是嘲笑克利盖想把美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描绘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按照列宁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唯物主义的冷静态度肯定了这类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真正进步内容。“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式的批判，去掉了庸俗学说的外壳，剥露出‘攻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59—26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利盖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批驳，魏特林的观点阻碍了德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这篇不完整的手稿中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正符合反动的封建专制集团的心愿。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根据对德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况的分析，拟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策略。

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中，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学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基础。恩格斯尖锐地指责了在文学中的一切小市民的狭隘性；

多情善感、庸俗、市侩气、小心翼翼地 toward 有产者谄媚的行为。恩格斯认为，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当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见本卷第224页）。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企图用小市民的尺度来衡量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的创作。恩格斯在评述歌德的创作方面，做出了研究文学的复杂现象的范例。他揭示了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家周围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指出了歌德著作中的矛盾方面，以及它们的真正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1847年夏天问世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这部哲学兼经济学的著作里，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在报刊上详细地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础，阐述了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创见。

《哲学的贫困》是为了反对蒲鲁东主义而写的。蒲鲁东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空想，小资产阶级力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马克思证明，要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的任何计划都是站不住脚的，从而痛斥了整个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抱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都企图用细小的改良的纲领来引诱工人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捍卫并发展了新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这部著作比他以前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刻地论证了他的辩证方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真实的现实描写成“绝对观念”的体现，相反地，马克思则把观念、抽象、逻辑范畴看作是现

实世界中所发生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辩证过程的反映。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阐明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在揭示“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内容时，指出它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197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证明，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对抗性矛盾，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使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革命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见本卷第198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后来又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部天才著作中对这门科学做了详细的研究。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经济的现实，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短暂性。

马克思从新的真正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了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阐明了大机器工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方面：竞争、资本主义的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技术方面的每一项巨大的发明都使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加剧。马克思指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危机、群众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免的伴侣；他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实质，大体上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见本卷第155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等学说的一些初步原理。马克思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深刻思想，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提出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原理。五十年代末马克思才使这一理论具有完备的形式。在这以前所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等）中，马克思还使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这样一些概念，正如恩格斯后来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用语“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4—235页）。后来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概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他关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的结论加以具体化，同时指出经济斗争、罢工、工人同盟（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具有阶级觉悟，社会主义的觉悟，应当了解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革命作用，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批人应当由“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见本卷第196页）。马克思表述了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性的重要原理，并且着重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的意义。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发表在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和法国民主主义报纸《改革报》上的一些文章和通讯。在政论性的文章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发表的那些文章，该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战斗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报刊上评论当时的一切巨大事变，对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加以论证，并同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进行斗争。

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打着基督教社会主义旗帜的普鲁士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迷惑人民群众的勾当。在马克思的文章《拉马丁和共产主义》、《驳阿·巴泰尔斯》和恩格斯的文章《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拉马丁先生的宣言》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共产主义的臆想遭到了驳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和《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瑞尔先生的信》、恩格斯在《改革报》上发表的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通讯，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和文献，都包含着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民主主义的力量要实行国际合作和团结一致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同时也批判了后者的落后观点和幻想。在《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中恩格斯写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见本卷第423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坚决地驳斥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小资产阶级活动家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

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狭隘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尤其是他们对德国的集中和统一的重要性的无知。在同海因岑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并论证了

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 11 月 29 日关于波兰的演说和他们 1848 年 2 月 22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发言里，在恩格斯的《奥地利末日的开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以及其他著作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宣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们主张工人阶级要坚决援助波兰、意大利、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表述了一个著名的原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见本卷第 410 页）。

恩格斯的《普鲁士宪法》、《法国的改革运动》、《瑞士的内战》、《1847 年的运动》这几篇文章，分析了革命前夕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况。恩格斯在《巴黎的革命》一文中评论了 18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提出了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

本卷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政党而制定的纲领。恩格斯在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的草稿中，从理论上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某些极重要的纲领性的和策略性的原则。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拟定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实行的措施。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包含着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公式。这个公式对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来说是正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过时了，因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的和跳跃式的发展规律，预先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时间在不同的国家里是各不相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的这个过时的原理，被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国家或大部分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一新的原理所

代替。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是他们在1848—1849年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的全部科学和政治创作的最高成就。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完整而严谨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的基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定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他们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宣言》，列宁称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9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却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的实质。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见本卷第489页）。

《共产党宣言》给国家的实质下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宣言》的作者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见本卷第49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的工具，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应当利用政权为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制服一小撮剥削者的反抗，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阶级指出了—个伟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他们预见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任何剥削和阶级对立，消灭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这一革命将导致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卷第491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有先见之明地预言，工人阶级的胜利不仅会达到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且会使人类摆脱民族间的对抗和敌对关系，摆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民族间的血腥的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得政权和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指出，无产阶级争取最近目的斗争必须服从于它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利益，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必须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任务相结合。他们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确定对各个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并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援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运动，同时对运动的弱点和缺点提出批评。

《宣言》的作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号召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七篇文章。其中恩格斯的三篇文章的俄译文于1940年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上，他的另外三篇在以前历次发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著时都未编入过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上；其余的几篇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

末注中已有说明。

本卷的〈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还有一系列反映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的文献。

第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8月至11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原理，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确定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斗争阶段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反映在本版第五卷和第六卷中。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具体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起草《要求》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这些任务的解决关系到德国人民以后的命运。《要求》中主要的一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当时德国分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才是德国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要求》中，除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任务，还提出了德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消灭封建压迫，废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消灭反动贵族统治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关于这些措施，《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就是：把封建领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土地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同时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要求的力量。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情况的第一个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德国之后所写的发表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构成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反映了他们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页）。报纸的这个方针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革命中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力量薄弱和无组织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祖国之后不能立即着手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起不了什么显著作用的。因此，敌视任何宗派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他们加入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建议拥护他们的人也采取这种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绝不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错误和幻想放

弃批评，相反地，必须以对他们的错误和幻想进行批评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推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坚决地行动，竭力把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同时，他们要自己的拥护者注意工人团体的组织工作，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注意为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先决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个旨在动员一切民主力量的策略，来对抗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和反对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斥责波尔恩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和工会的利益，并使无产阶级脱离德国人民面临的总的政治任务。

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新莱茵报》代表德国人民中一切进步力量的利益，首先是代表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即工人阶级）的利益。由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战斗司令部。

《新莱茵报》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题，巧妙地政治上揭发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教育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这个报纸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并且深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政论性质：它所刊载的文章具有热烈的战斗精神，笔调精辟入微，讽刺敌人尖锐有力。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新莱茵报》理应占一个光荣的地位。

《新莱茵报》对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态度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德国，而且几乎在整个欧洲，《新莱茵报》是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方面的唯一报纸。关于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评，其中有《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也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月

革命》。在战斗的日子里以及在战斗刚结束后所写的这些文章，洋溢着斗争的热情，对六月起义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六月起义的文章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在阐述六月起义的军事问题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街垒斗争的性质、意义和方法的重要结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原理。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有原则上的区别：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独立发动。就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作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要结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能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为解决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即为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霸权之下的资产阶级计划，同时也反对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证：只有建立真正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彻底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国内的一切封建渣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自下而上”地统一德国，也就是要由人民群众对德意志联邦各邦，首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猛烈的革命冲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全欧洲的问题；只有欧洲的革命力量起来向英国的反革命统治阶级以及沙皇俄国这个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进行斗争，德国才能达到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而且也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质是不彻底的，因为人民没有彻底战胜封建制度，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整个官僚机关和警察机关仍然不可侵犯，而人民群众则赤手空拳地面临武装的反革命的威胁（见《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德国革命的这种性质是由获得政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这个资产阶级，如马克思后来所说，“宁可和奴隶制妥协也不愿意看到一点为自由而斗争的前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德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吓坏了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和封建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在几篇阐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以及分析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内阁的政策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为论证他们同封建君主势力妥协而提出的“妥协论”。为了与这种叛卖性的理论相对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人民政权和革命人民的主权的思想（见《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他们认为人民的革命专政是胜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见《危机和反革命》）。列宁分析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在这些原理中含有革命民主专政的概念。

在论述全德国民议会的活动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些代议机关，指责它们不是把实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去消灭反动的德国政府和取缔大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只是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主张在德国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这些机关应当是人民意志的忠实表达者，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依靠人民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人民选出的议员必须向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和实现人民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

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见《柏林的辩论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德国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得出了结论：人民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更换一切旧的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彻底清洗一切国家机构(见《7月4日的妥协会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人民武装起来。在《6月15日的妥协会议》、《6月17日的妥协会议》、《市民自卫团法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们维护了人民的武装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柏林人民群众在1848年6月袭击军械库以夺取武器的尝试。《新莱茵报》指出这次发动是半途而废的革命，斥责了不敢公开站在人民方面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的胆怯行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回击反革命势力的必要条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赞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在1848年9月起来反对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与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指出，过早的和没有准备的起义只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并且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号召科伦工人不要理睬普鲁士政府的挑衅，而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见《科伦在危急中》和《科伦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在科伦的战友们进行了艰巨的解释工作，才使莱茵省的民主力量在九月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摧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扩大和巩固民主阵线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德国封建残余的革命斗争。本卷中载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文章(如《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农民起来为立即彻底地和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而斗争，他们揭露了普鲁士资产

阶级的政策，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即出卖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见本卷第 331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要求抱这种态度，是因为它力图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它害怕废除封建所有制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遭到侵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表，热烈支持农民的革命的反对封建运动，认为他们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们欢呼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认为他们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民族间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同时严厉地斥责德国资产阶级继续实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为德国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证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见本卷第 178 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地、不调和地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文章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因为普鲁士政府挑起了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起义，然后又加以镇压，并且在“改组”的幌子下把波兹南的一大部分土地划归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多数派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热烈支持 1848 年夏天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和《起义的民主性质》这两篇文章中指出：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质；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而且还由于把捷克人推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

马克思写给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编辑部的信以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分析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文章，热烈同情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他们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态度，对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与英国宪章派的团结，都表现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德国反动报纸攻击宪章派，《新莱茵报》就替宪章派辩护（见《新柏林报》论宪章派），对宪章派的革命的机关报《北极星报》也给予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好几篇文章分析了法国革命的进程。这些文章对于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要的作用的新的革命高潮充满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他们认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并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恩格斯后来指出，这说明他们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估价过高，其实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的还远没有达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本卷的结尾部分是有关维也纳十月起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这次起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欧洲革命的命运。马克思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而把维也纳的十月起义称为第二幕（见本卷第542页）。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维也纳革命》、《〈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是论述维也纳起义的经过和分析它失败的原因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背叛。

在《弗·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发表了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恩格斯在这篇随笔中以鲜明和生动的笔调叙述了他游历法国的印象。随笔中有一大部分描写了法国农民和他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法国农民对1848年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同情路易·波拿巴，这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蛊惑性地利用了农民的私有天性，而税收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他们脱离了革命。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根据人民群众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的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作的结论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本卷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一系列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和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直接工作的文件。这里也收集了一些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众大会和民众会议的新闻报道，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有关法院和警察局通缉《新莱茵报》编辑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府的迫害和“善意的”报刊的诽谤下勇敢地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 * *

要确定《新莱茵报》上哪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文章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佐证又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此外，有许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给施留特尔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2页）

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恩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篇末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本卷收入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九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末注中已有说明。《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第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7月这一时期的著作。同第五卷一样，第六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新莱茵报》是在当时民主运动中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唯一报纸。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政治冲突（这是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的实质，判定了政治舞台上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并据此拟定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同阶段上的策略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概括了群众在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的几篇文章是马克思在普鲁士发生尖锐的政治危机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写成的。马克思分析了逐渐低落的欧洲革命的进程，指出了反革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认为普鲁士所策划的政变是欧洲悲剧的第三幕；第一幕是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的日子中的失败，第二幕是1848年11月1日革命维也纳的陷落。

马克思力求通过《新莱茵报》向人民群众预告即将来临的决战，并教导他们准备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在《柏林的危机》、《柏林的反革命》以及其他文章中，马克思阐明了1848年11月普鲁士的政局，并证明王权和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业已成熟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马克思要求普鲁士国民议会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大臣们作为国事犯加以逮捕，凡不服从国民议会决议的官员一律撤职，并依法起诉。他提出拒绝纳税的口号，以便剥夺反革命政府的一种对付人民的手段。马克思认为，由于拒绝纳税而必然展开的运动，是激发群众革命毅力的手段，是革命新阶段的开始，在顺利的情况下这个阶段的结局应当是推翻王权和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

马克思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见本卷第24页）中号召各民主团体举行民众大会来鼓励居民拒绝纳税。在区域委员会的第一个呼吁书中，马克思警告不要用暴力手段抗拒纳税，以免在莱茵省发生孤立的和分散的起义。当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这一运动开始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质的时候，马克思在第二个呼吁书（见本卷第39页）中号召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征税，号召组织武装的民团以反击敌人，并成立安全委员会。马克思认为安全委员会是临时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它所颁布的命令应当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命令。这种革命政权机关应当代替三月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反动官僚机构。同仅仅号召消极反抗征税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完全相反，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号召“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象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见本卷第38页）。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中，为全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拟定了坚决大胆的行动纲领。这些文件对于研究马克思在德国革命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仅限于号召消极反抗；莱茵省所掀起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普鲁士其他省份没有得到积极的支持。结果反革命获得了新的胜利；1848年12月5日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

了。马克思在《反革命政变》一文中写道：“国民议会长期以来软弱怯懦，现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现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见本卷第 117 页）

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康普豪森》等文章，以及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普鲁士反革命获胜的原因；他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它与自己历史上的先驱者——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建立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见本卷第 278 页）。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确实领导了革命运动，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协议的办来取得政权。马克思指出，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场不能用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而应该用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来解释。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觉醒的无产阶级，不惜向旧社会势力作任何妥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要保存“法制基础”，因此拒绝向封建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而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的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下来。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侵害，普鲁士资产阶级力求保存封建所有制，从而抛弃了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它一开始就宣判了自己的失败，而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揭露了声名狼藉的“法制基础”的真实含义，那就是企图把旧法律强加于通过革命来确立自己的权利的新社会。马克思发展了关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学说，他证明说：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见本卷第 292 页）。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就会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解决。

马克思总结了半途而废的三月革命，证明坚持“法制基础”和臭名昭彰的“协商论”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尖锐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果然于 1848 年 11 月在普鲁士爆发，而以 12 月 5 日的政变告终。

马克思把王权同国民议会之间的这个冲突看作是两国政权的斗争，两个元首的斗争。但是，两个独立自主的权力机关不可能同时肩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职权。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用物质力量来解决。马克思揭示了这一斗争的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指出，这并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见本卷第 301 页）。这是王权——旧的封建官僚社会的代表和国民议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驳斥了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控告，证明拒绝纳税是人民自然的和合法的自卫手段，人民有权用暴力还击暴力。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坚决捍卫人民的主权，捍卫人民进行革命的权利以及人民积极干预历史进程的权利：“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见本卷第 305 页）。

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以及他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都是利用法庭来宣传革命观点，控告当局和揭露反革命计划的光辉范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捍卫了革命报刊的权利，他们认为革命报刊的首要任务是破坏现存反动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础。

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欧洲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经济落后的德国，只能决定于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考察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反革命所经历的道路。马克思一再回顾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法国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则引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失败，并使曾经以争取独立的斗争来响应二月革命的各被压迫民族遭到了新的奴役。所以马克思指出，欧洲革命的命运同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时得出结论：“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见本卷第162页）富于遐想、良好愿望和华丽辞藻的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和残酷的反革命无情地践踏了。马克思号召人民要吸取反革命所提供的教训，以便在将来的战斗中及时而大胆地运用这些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写的全部文章，都对胜利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临近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次革命会推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这个新的高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应当导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1848—1849年革命经验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英国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因为资产阶级英国“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当时马克思认为，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

能摧毁，而这次大战会给英国无产阶级政党——宪章派的胜利起义创造条件。总结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的《革命运动》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见本卷第175页）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1848—1849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欧洲革命前景的判断中，对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作了某些过高的估计，由此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即将来临的论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上，同时也密切注意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进程。他们热烈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捍卫波兰的独立，认为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欧洲民主有重大的意义。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切的同情论述了意大利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皮蒙特王权的背叛政策。恩格斯写道：“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见本卷第457页）恩格斯说：意大利人民不应该只用正规军来抵抗奥军和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而应该掀起群众起义，开展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真正的民族战争，以便永远消灭奥地利的压迫。

本卷有许多文章（《匈牙利的斗争》、《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是论述匈牙利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匈牙利人民反对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在分析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进程时，特别指出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善于采取许多措施以保证革命得到农民的支持。他指出了匈牙利战争的人民性质和游击性质，高度评价科苏特政府对敌人采取的坚决的革命的斗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欧洲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依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成为谁的工具，把民族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他们把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归为革命的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斗争削弱了当时欧洲几个主要的反动国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1848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关怀捷克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布拉格的起义。但是，在这次起义被镇压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在属于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中占了上风；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沙皇政府便利用了这些民族来镇压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由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客观性质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民族看作是反革命的民族。

列宁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4页）。

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一方面对属于奥地利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把它看作是违反当时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利益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作了某些错误的论断。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些民族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不能起进步作用，这些民族注定要遭到灭亡，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在这些文章中，还片面地把德国人征服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过程描绘成进步的、传播文

化的、和文明的过程。这种说法是同恩格斯自己在其他文章（见第五卷中《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和本卷《波兹南》）中描绘的德国诸邦对东欧实行抢劫掠夺政策的情景相矛盾的。恩格斯关于曾经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前途的观点，是和他关于小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分不开的。恩格斯认为，以后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这种发展进程会使这些小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被大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的民族所并吞。恩格斯列举了苏格兰的盖尔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作为例子。对于美国侵占墨西哥的部分领土，恩格斯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评价的。但是恩格斯在估计小民族的命运时，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除了集中的趋向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恩格斯关于某些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1848—1849年还处于开始阶段，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经验还比较少。同时应当指出在恩格斯的关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命运还有一些保留意见。“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见本卷第334页）曾经属于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之后的百年来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民族的生命力和坚强性，他们已经争得了自由和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并且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欧洲各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也十分重视对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他们认为德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报刊、人民集会和议会稳步地坚守保留下来的阵地。

《三个新法案》、《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等三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曼托伊费尔政府提出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可以说是补充了1848年12月5日国王钦定的畸形宪法，必然要把国家引回到旧普鲁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

恩格斯的《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柏林第二议院四月十三日会议》、《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等文章，是为了批评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活动而写的。恩格斯分析了第二议院的辩论，愤慨地指出，第二议院的议员们，其中包括极左派的代表，不但没有公开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迎合议会的妥协迁就行为，节节让步。恩格斯谴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这些“初出茅庐的议会讲坛骑士们”（见本卷第448页），他们指望用议会的方法来达到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即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的东西。本卷中收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并拟定了革命的议员在议会中的策略，其主要特点就是要把议会活动同议会外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848—1849年的活动是同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848年春天，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无产阶级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松懈，人数又少。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并站在民主运动的极左翼。根据这一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参加了民主团体，在民主团体中坚决捍卫了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但没有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而且指出了他们的不彻底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场所，除了《新莱茵报》和科伦民主协会，还有科伦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力求通过工人联合会来提高科伦和全莱茵省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

织性。

在革命进程中，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提高了，他们日益深刻地了解到本阶级的目的，并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斗争的经验证明，在同反革命的决战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不可能是可靠的同盟者。由于情况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虽然在许多一般的政治问题（如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选举）上仍旧同民主派一起行动，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组和加强科伦工人联合会。这些措施是在反对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的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激烈斗争中得到贯彻的（见本卷附录《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第699—701页）。

1849年春天，由于德国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匈牙利正在进行革命战争，法国革命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因而更加迫切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1849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在德国工人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支持下，退出了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断绝了关系（见本卷第509页）。接着，他们所领导的科伦工人联合会通过了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以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总会建立联系的决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关系，但是以后在和共同敌人作斗争时并没有拒绝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行动。

三月革命发生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策略，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改变，德国工人的意识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莱茵报》促成的，《新莱茵报》愈来愈明显地表明它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在《资产阶级的文件》、《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科伦日报》论选举》等文章中，马克思用具体事实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待工人

是极端残酷无情的，揭露了他们假意讨好无产阶级的企图，揭露他们在选举前许下的要一举解决“社会问题”的蛊惑性诺言。马克思反对《科伦日报》关于“社会问题”的混乱论点时，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具体的阶级性。他证明，虽然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投票拥护国王钦定的宪法，但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反，这些阶级所关心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这种国家形式能使他们有更大可能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不正是这些阶级吗？特别革命的阶级不正是无产阶级吗？”（见本卷第 25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争取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不仅意味着要消灭腐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要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结束妨碍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的分散状态。

象在以前所写的许多论文中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封建君主国之一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计划（见《法兰克福议会》）。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反对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企图把德国变为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

恩格斯在被迫居留瑞士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昔日的公国》、《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联邦法院的选举》、《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国民院》、《瑞士报刊》）描绘了瑞士政治生活的真实图景，当时瑞士以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的典范闻名，就象比利时以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典范著称一样。恩格斯指出，当时小市民的瑞士的政治生活中有地方的、州的局限性，瑞士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特点是满怀偏见、目光短浅、打小算盘和专重小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批驳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小资产阶级计划，证明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坚决要

求消除国家的分散状态、割据现象和小邦林立的局面，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革命的德国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仅要反对内部敌人，而且还要反对外部敌人，首先是反对欧洲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即资产阶级的英国和封建专制的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俄国沙皇制度，把它看作是欧洲封建君主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不摧毁这个支柱，欧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国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一德国的主要内部障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反动普鲁士君主制度，这是旧的、封建社会腐朽力量的堡垒。《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普鲁士新宪法》、《新的军法宪章》、《告我的人民》以及其他文章，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执政的普鲁士王朝靠掠夺、欺诈、暴力起家的历史，指出这个王朝卑鄙地窒息了人民解放运动。

统一德国的另一个障碍是封建专制的奥地利。只要哈布斯堡帝国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谈不上在整个德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批评了全德国民议会，因为它不仅不坚决消灭反而包庇纵容德国反革命势力。“法兰克福蛤蟆坑”的议员们一味以庸俗教授的腔调空谈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却放弃人民历来的基本权利——起义的权利（见《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维也纳和法兰克福》、《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耳光》）。后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总算制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但这个宪法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德国各邦君主不愿意承认它。

1849年春天，在莱茵省和德国西部其他地区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人民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觉得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局

限性，但还是给以支持。他们说明，这一运动之所以具有群众性，是因为“每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见本卷第 550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欢迎人民群众的日益壮阔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起了显著的作用。恩格斯积极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见《爱北斐特》）。

指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新莱茵报》由于采取刚毅勇敢和毫不调和的立场，一开始就引起普鲁士政府和司法当局的残酷迫害。他们对报纸编辑进行了一连串的审讯。但是，1849 年 2 月 7 日对《新莱茵报》的审讯和 1849 年 2 月 8 日对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讯，结果都违反了普鲁士政府的初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性的发言赢得了旁听的公众的热烈欢迎，陪审法庭只好宣判他们无罪，《新莱茵报》编辑的声誉大大提高了。

普鲁士政府还打算用各种方法迫使《新莱茵报》沉默。1849 年 5 月莱茵省零散的起义失败后，普鲁士当局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普鲁士。警察当局对马克思和该报其他编辑的迫害，使《新莱茵报》在 1849 年 5 月 19 日停刊。在用红色油墨印的最后一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该报为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他们指出了该报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见本卷第 602 页）在《新莱茵报》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保卫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该报编辑部完全有权说：“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见本卷第 603 页）

在《致科伦工人》这份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称：“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本卷第 619 页）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与这一著作有密切关系的手

稿《工资》这两篇经济著作，在本卷中占特殊地位。

《雇佣劳动与资本》以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在1849年4月的《新莱茵报》上，它是根据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写成的。马克思发表这一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论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他力求给无产阶级一个理论武器，使它深刻而科学地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工人的雇佣奴隶地位的基础是什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与《哲学的贫困》一书不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是用系统的、通俗的、每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的形式阐述的。同《哲学的贫困》相比，《雇佣劳动与资本》表明马克思在制定经济学说方面前进了一步。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揭露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马克思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是互相制约的，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两种关系的对抗性。同劳资协调的鼓吹者截然相反，马克思揭示了二者利益的根本对立性。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所有的经济范畴，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见本卷第487页）。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继续发挥了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他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增长、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结果都只会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雇佣工人阶级更加贫困。因此，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已经大体表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本版中，《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是按《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原样刊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当时对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作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批判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完成。因此，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些用语和整个句子，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1891年为广大读者出版这一著作时，恩格斯做了许多更改，这些更改在本版中都以脚注说明。这些更改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凡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原来是说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的地方，都改为出卖劳动力。恩格斯在说明这些更改的意义时写道，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词句，而在于经济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因为不了解这一点而陷入绝境。马克思从这个绝境中找到了出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马克思证明，“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4页）。劳动力这一商品具有一个特性，即它能创造价值，成为价值的泉源，而且是大于本身价值的价值的泉源。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为己有。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制定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并在《资本论》中作了经典性的论证，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同《雇佣劳动与资本》密切相关的手稿《工资》，大概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作的最后几次演讲的提纲。这篇手稿虽然不完整，而且马克思不准备发表，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很多地方补充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内容。同时，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序言中所作的说明，也完全适用于这篇手稿。

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的影响，并且得出结论：资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

生活费的份额的增长快得多。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但已经非常接近他以后所制定的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原理。马克思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成为反对工人的武器。

马克思对改善工人状况的各种方案的批判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方案的目的在于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例如：建立储蓄银行，实行生产教育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等。马尔萨斯硬说，按照自然规律，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得快，因此他主张节制生育，以减少工人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的“十分愚蠢、卑鄙和虚伪的”学说，这种学说把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因此要受到惩罚。

在关于工人联合会这一节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这种联合看作是推翻旧社会、彻底解决其阶级矛盾而训练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揭露了对工人的剥削，同时也指出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这些就不会创造出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也就不会发展到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并使自身革命化的程度。

本卷末尾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于1849年5月到7月所写的一些材料和文件：两篇给报纸编辑部的声明，恩格斯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马克思论述巴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失败的文章《六月十三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除了马克思的手稿《工资》，还刊载了恩格斯当时没有发表的关于法国1848年12月总统选举前夕情况的两篇论文，即《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和《蒲鲁东》。

本卷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许多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革

命活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中的活动的材料，也有关于他们所参加的民主宴会的报道。附录中还包括关于司法当局和警察当局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辑《新莱茵报》的时候，在组织人民群众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处境是艰苦而紧张的。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阐明在1848—1849年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原理提供了大量资料。

* * *

在全集第五卷说明中已经指出，要确定《新莱茵报》上哪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文章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佐证又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此外，有许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篇末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本卷收入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十六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末注中已有说明。《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第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这一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到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50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创办一个承继光荣的《新莱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年1月在汉堡开始发行的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正象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这本书写的导言所指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任务：“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阐述和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加快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理论，他描写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

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104页）马克思的这个经典定义被当作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库。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概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47页）。科学共产主义的这个公式同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同提出“财产公有”这种模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马克思这部著作作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农民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他们的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为“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见本卷第98页）。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载入了史册。但是，正象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指出的，该书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由此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仿佛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资本主义生产那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整个说来还是向上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其他某些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前提也作了这样过高的估计。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革命临近的这类错误时写道:“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法兰西阶级斗争》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以及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列宁认为这个著作“非常有意义和特别富有教益”(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3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证实了。同时在《告同盟书》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告同盟书》中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他

们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贯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规定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完全分立的方针，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有组织地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工人政党组织，使同盟的每一个秘密支部变成公开的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对付反动派，和他们结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刊登在《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收入本卷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说。这个学说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表述得十分详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292页）。为了保证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

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工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曾经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6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有密切的联系，前者也指出了“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组织”（见本卷第359页）。这个文件详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一个故事，是这里描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一篇生动的证词。它既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场，同时也鲜明地描绘了运动的各个情节，对运动的各个活动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用漂亮的空话代替革命行动，批评他们一直优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部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恩格斯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总结了1848—1849年

德国革命的经验。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47 页）恩格斯在分析十六世纪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十六世纪德国市民阶级和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贩卖立场。正如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见《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191 页）。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国人民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的这一段非常突出的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出色地描绘了十六世纪革命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有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这种分析既有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也有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威美尔曼的一部书中引证来的），他在这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

争论”(见本卷第 399 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敌人，揭穿了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胆战心惊而完全丧失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意义及其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 1848 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评托·卡莱尔《当代评论》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迷信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

学家和政论家中也广泛流行，它对卡贝和魏特林的拥护者以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在评论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这两个法国警探的诬蔑性的小册子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见本卷第 313 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密谋活动和宗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密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见本卷第 321 页）。他们是一些革命的炼丹术士，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论，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密谋家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同盟发生分裂；所以对密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说明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并指出批评是巩固革命党的手段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刻，人民应当“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见本卷第 35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根据革命利益来观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列宁特别重视。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评论，揭露了道梅尔把德国庸人们的庸俗格言拼凑起来冒充为“新时代的宗教”的可耻著作的反革命性质。这本用各种作者的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视和对革命的恐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经破产的显著证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后来的造神说；列宁认为造神说是愚蠢的小市民心爱的自我直观，是悲观和疲惫的庸人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的继续。这篇评论对于资产阶级税收制度的本质，对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评论同时对法国和德国当时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评论内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评和对德国这种思想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杂志上刊载的恩格斯的《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在厄·琼斯主编的《寄语人民》杂志上刊载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紧密合作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邀请他们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写成的。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作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可能使工人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意义有些估计不足，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有良好影响也估计不足。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做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的许多预测。例如，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贸易和对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的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蓬勃发展，欧洲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将会日益依赖于美国，这个预言也被证实了。“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见本卷第264页）恩格斯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都抱有这种观点，这一点从他在1892

年所写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一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国际述评(一)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国革命将会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根据 1848 年革命经验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原理,即经济危机是革命危机的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58—259 页)。在头两篇国际述评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期待迅速到来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产生的新的革命高涨,在最后一篇述评(1850 年 5 月至 10 月)中,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见本卷第 514 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这个结论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策略,并且同宗派主义阴谋活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分子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观点代替对历史情况的客观分析,促使同盟为时过早地发动并采取了阴谋骚动的手段。维利希—沙佩尔冒险集团为了网罗同盟者而和小资产阶级首领结成无原则的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个集团的斗争于 1850 年 9 月结束,结果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这个集团被开除出同盟。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便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的多数会员拥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与同情分裂分子的流亡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者(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绝了关系。本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退出伦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的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许多文件,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编入本卷的恩格斯的手稿《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

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自己的一种练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3页）。这篇手稿对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军事经济的潜力作了阐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军事学术的发展，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他指出，这种军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的群众性、机动性和突击力量的不断增强，将导致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许多报刊编辑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和声明，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1851年在团结革命流亡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揭露了欧洲各国反动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谍报制度和对革命流亡者的迫害。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篇文章。其中几篇在第一版第八卷（1930年）的序言中只是引用过。对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著作所作的评论这里发表的是全文，在全集第一版中只是摘要。

本卷《附录》部分中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拟定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第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8月至1853年3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经验，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论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识，并使他们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在1848—1849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则把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马克思希望很快就结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不仅由于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的资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事实和材料。从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研究经济科学，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到兴趣的

其他科学著作。马克思对任何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问题。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系统而认真地研究军事。《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46—577页）一文手稿及本卷刊载的《英国》一文就是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也是促使他研究军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除了研究军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语言和语言学问题。恩格斯精通许多种欧洲语言，1850年12月，他又开始研究俄罗斯语言和其他斯拉夫系语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同时还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恩格斯研究语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以及将要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同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结合起来。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就已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了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间的倾轧以及他们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马

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写政论文章。在好几年中，他们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捍卫无产阶级的观点，评论当时的重大事件。从1851年秋天起，十多年，马克思经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通过为这家报纸撰稿，马克思才能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斗的政论活动，并影响社会舆论（尽管是间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要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他就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所写的许多论文和通讯是马克思要求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在《新莱茵报》这个讲坛上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用革命的方法来统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彻底进行民主改革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描绘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件对运动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1848—1849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历史有决定性作用，要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史必须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指出了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了革命的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

要和要求，而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38页）。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中所贯串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列宁在分析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并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见本卷第106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象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见本卷第82页）列宁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時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见《列宁

全集》第16卷第384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见本卷第102页），并且规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说，他指出，这些原则总结了过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训。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阶级所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拨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责德国资产阶级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叛变立场，并论证了德国民主派中主张民族独立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国际主义立场。

恩格斯的著作也谈到了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问题。在1848—1849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年6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夫人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就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对付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绳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见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4—335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论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207页和第322—342页),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一些错误论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经形成的关于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建立大国,因而一定会导致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领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建立大国这一趋向,但他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和组织性的加强,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历史已经证明,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有力量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部分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论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7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这一著作的继续。如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一样，马克思也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利器来阐明革命时期的法国历史的。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经典性的分析，仔细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阶级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1851年12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页）

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场上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它们的活动的隐蔽的动因。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它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马克思预先警告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象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照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狭隘的生活范围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

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见本卷第152页）。

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释，把整个问题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这样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释相反，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以前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次政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慑于“赤色幽灵”而向波拿巴派阴谋家节节让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怯懦和动摇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纪末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领导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堡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第145—146页）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说明了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挠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稳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质，认为它是虚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说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表扬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见本卷第135页）。

马克思阐明了在法国建立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

层呼吁，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马克思揭露了采取波拿巴独裁形式的资产阶级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统治手段，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剥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给最狂妄无耻的冒险家，听任实行军阀式的血腥镇压，利用罪犯，采取诈骗、贿赂、露骨的煽动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这些令人厌恶的特征，并预言，有深刻内部矛盾的复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灭亡。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很注意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农民中的鼓动是有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充当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所以拥护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落后和闭塞，由于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绝，由于彼此隔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浅。资产阶级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把农民看作不过是勒索捐税的对象，它们的政策，使农民厌弃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农民支持他是因为这些眷恋自己小块土地的农民私有者，把拿破仑王朝当作自己的传统的庇护者。马克思指出了农民的两面性，他写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见本卷第218页）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得出结论说，随着小农经济的破产，随着高利贷资本家对它的盘剥，将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农民的理智，他们的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民同工人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马克思写道：“……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221页）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表述过的

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一思想的发展。从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全部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证。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别这一天才的思想，是马克思这部著作中的重要理论概括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宏伟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摧毁现存制度，把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它经常批评自己，从来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丰富了他的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使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动摇，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见本卷第216页）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

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

列宁指出，1848—1851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结论的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4页）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在内容上是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衔接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驳斥了想把政变的责任推到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去的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记者。恩格斯一方面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1848年6月遭到失败的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他们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这部著作抨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首先是它的德国代表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他们在1848年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派思想和策略。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以免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整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对那些拚命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一个直接反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抨击性著作出色地运用了各种政治讽刺的写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

丑恶面。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也很平庸狭隘，在政治上极端不稳定，具有小资产者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和和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流亡生活的纱幕，描绘了在原则性争论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谓争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无情地斥责了各种泛泛空谈、用革命的词句蛊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争权夺利的场所。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国内进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把伟大的革命事业贬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由于在德国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鲁士政府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在1851—1852年的好几个月中，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许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科伦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细密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阶级的代表，反对它们卑鄙地迫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然是一部巨大的揭发性文献。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伦被告的辩护人，而且是控诉人。他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策划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谴责了整个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鲁士国家体系。

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偏颇不公，资产阶级的“公正裁判”的阶级性。作为被告站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革命无产阶级手无寸铁，被告的罪名是事先就定了的。科伦案件以及其他案件都清楚地说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见本卷第536页）。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驳了加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所谓图谋不轨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险主义的密谋的策略是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任务不相容的。马克思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是脱离群众，给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并为警察当局的奸细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偷换唯物主义世界观，把希望和想象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现实条件。在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发言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以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冒险主义立场，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阶级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见本卷第465页）

在科伦案件以及由此而来对各地无产阶级组织的破坏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存在。1852年11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布解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组织而载入史册的，这个组织的纲领性文献就是不朽的《共产党

宣言》。同盟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许多论文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些论文的主题是论述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英国的经济给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材料。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最初几篇论文中，就已通过英国的例子指出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证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的虚假的乐观主义，他指出，当时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出现的活跃是暂时的现象，它不能阻止劳动群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不能阻止失业和贫困的加剧。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古代人口过剩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而引起的，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见本卷第 619 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劳动者的受难史，要结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着他们的力量。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论文。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大地主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见本卷第 575 页）这篇论文中所收集的关于萨特伦

德家族发财致富的历史材料，以及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其他几篇论文中的材料，后来都被马克思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这篇论文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指出了象犯罪行为增长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惩罚制度的野蛮，并批判了为这种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律理论。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见本卷第579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证明，消灭犯罪行为的根本手段，就是消灭必然产生犯罪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论文中，全面地论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他指出英国议会和剥夺大多数人民选举权的选举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质，清楚地描绘了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在《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内阁的失败》、《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托利党的得比—迪斯累里内阁和1852年底接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土地贵族寡头集团和资产阶级上层独揽政权的意图，他们除了向工业资产阶级作些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外，竭力阻挠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任何进步的改革。马克思在他一系列的通讯中指出了英国教会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等这组论文，戳穿了英国传统的两党制，这个制度不过是由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和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轮流执政。马克思指明托利党是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辉格党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那些旧政党已开始分

解，同时指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贸易派在反对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方面的温和和不彻底性。他揭穿了自由贸易派政策的本质，即“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见本卷第591页）。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害怕工人阶级，随时准备同贵族妥协，他写道：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见本卷第390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是同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相对立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中，对英国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切比较重大的事实都作了仔细的分析，而对英国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每一个表现则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竭力支持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鼓吹宪章运动的活动。在《宪章派》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宪章派提出的使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的中心要点就是要求普选权。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暴力革命是在大陆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认为当时条件下的英国是一个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英国的特点——当时英国不存在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同时英国在欧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取得政权。他们认为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实行普选权和彻底改革议会制度。

马克思在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作了阐明。马克思对1853年2月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所作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即将来临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征兆，对参加起义的无产者的英雄主义给了

应有的评价，同时也斥责了这次“即兴的革命”的鼓动者马志尼及其一伙人的密谋性策略。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见本卷第601页）他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流亡者的领袖，民族运动有被反革命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利用的危险。马克思证明，指望路易·波拿巴帮助被压迫民族是决不可靠的，他忠告意大利爱国的革命者要更密切地联系人民，首先是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因为“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见本卷第625页）。

在本卷附录中有1850年9月15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摘引了这个记录（见本卷第465—466页）。这个记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不遗余力地维护同盟的团结，而同盟之所以分裂，完全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造成的。在附录中还刊载了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两个呼吁书。这两个呼吁书（包括马克思代表科伦案件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写给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简短的呼吁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曾发表在美国民主派的报刊上。

* * *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没有收入全集的第一版，这篇著作于1930年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五卷。《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以及《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第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3年3月至12月这一时期的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发表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端反动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在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全被禁止。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再没有其他的机会来联系群众和影响舆论。马克思从1851年8月起为该报撰稿。从那时起，在《论坛报》上写政论文章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以私人关系请他写文章）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马克思除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还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了一些文章，该报从1852年5月起开始出版，主编是厄·琼斯。此外，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也有个别篇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报》上，还有几篇曾部分转载在德文报纸《改革报》上，该报在约·魏德迈的积极参加下从1853年3月起在美国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是同他们的理论工作和他们的全部党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结合报刊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其中包括各殖民地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恩格斯则继续系统地研究军事科学，研究语言学问题、斯拉夫语言和东方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给报纸写文章。同时，报刊工作也使他们密切注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为科学研究工作搜集事实和积累材料。例如，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方面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后来被用在《资本论》中。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不仅自己特别注意理论研究，而且鼓励他们的拥护者利用革命战斗中的这个间歇时期，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是暂时的，并竭力使无产阶级战士队伍树立这种信心。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已经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继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保持联系，努力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在反动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以前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去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厄·琼斯和革命的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去影响英国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政论文章的机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揭露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论证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地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宣传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要特别灵活，要善于在一定的時候不用直接的方式，而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要在文章中始终贯彻与该报编辑部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路线。早在1853年，该报编辑部不仅在观点上就已经和马克思根本不同，而且还对马克思采取了资产阶级报界常见的不礼貌态度以及报社主人和编辑部对撰稿人惯常采取的剥削者的态度。《论坛报》编辑部不经马克思的同意就把他寄去的文章不署姓名作为社论发表。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根本就

没有发表；编辑部把一些文章任意地分为几部分，随意地涂改，还添上他们自己的往往和马克思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相矛盾的意见。编辑部的这种行为使马克思很恼怒，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当时工人刊物和革命民主主义刊物几乎连一个也没有，马克思不得不珍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他们在文章中阐述了工人运动中一切比较重要的现象，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阐述了各国的经济，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事件作了全面深刻的科学分析，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政治结论。

从本卷所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以下这三类问题：（1）欧洲各国特别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有关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潮的前景；（2）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3）国际关系——与欧洲各国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备战以及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有关的国际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时期的科学工作和政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首先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刊物上系统地发表文章阐述这些国家的情况，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政策。

马克思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在收入本卷的《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说明了

工业生产(首先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农业、国内和国际贸易、市场价格、外汇行市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通过许多实例考察了当时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并且把他早在四十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的原理具体化。马克思在文章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谰言,这些人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能使所有阶级繁荣昌盛并且符合自然规律的制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见本卷第280页)。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见本卷第280页)。

马克思在文章中尖锐地评述了以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论者用关于“自由”、“和谐”、“繁荣”等伪善辞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马克思揭穿了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和工人阶级敌人的自由贸易论者的真面目。他揭穿了自由贸易论者所散播的贸易自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1853年底就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发生危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当时,工商业中的繁荣阶段被停滞阶段所代替,许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危机现象。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危机必然到来、资产阶级想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费气力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同马克思的经济评论有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如《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内阁的成就》、《英

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等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些是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的。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向工人读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阶级性质，揭示了英国政府的财政措施和税收措施的真正本质。马克思认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见本卷第72页），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些文章和阐述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鲜明地描绘了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表现为大规模阶级冲突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马克思在文章中着重阐述了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职业联合组织——工联的活动。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等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引用了关于英国各工业区发生的罢工的消息，同时指出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参加这些罢工这个很有意义的新现象。他分析了罢工者的要求，揭露了工厂主和资产阶级当局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蛮横行动，并且对罢工运动的性质和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作用作了评价。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的鲜明表现。马克思证明，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罢工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横、保障工人的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罢工的意义的结论，他认为罢工是激发劳动者的斗志、团结他们向剥削者作斗争的要素。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和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工人联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学校这一原理的直接发展。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会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见本卷第191页）

马克思在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关于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尽管经济斗争对于团结和教育工人有很大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着重指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并且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革命领袖，因为这些领袖要把英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把争取宪章的斗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这是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杆。马克思在通讯中有时援引琼斯在工人群众大会上

的演说，从这些演说中可以看出科学共产主义对这位杰出的英国无产阶级活动家所起的良好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欧洲大陆各国开始革命行动的迹象。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民群众都怀着隐蔽的不满情绪。

在《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法国的政局在经济困难、物价高涨等等的影晌下日益恶化。马克思着重指出，广大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对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各项措施深为不满，这证明第二帝国的反革命统治是不巩固的。在前面提到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意大利的教皇国、腊万纳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抢粮风潮。马克思在1853年的文章中谈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时，继续对马志尼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评，因为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坚持奉行他们从前的密谋性的策略。

马克思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也是为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密谋性的策略、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两篇文章在内容上是相衔接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继续揭露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和泛泛空谈的作风，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醉心于在革命中玩弄蛊惑人心的把戏和密谋手段。这篇文章是专门揭露奥·维利希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前的宗派主义集团的首脑之一，曾利用流亡者的民主主义刊物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诽谤和攻击。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其中包括恩格斯的一封论维利希的信），以尖锐讽刺的笔法勾画了这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冒险主义策略的卫士的面貌。马克思用维利希的十分可笑的“革命”计划做例子，严厉谴责了密谋性策略的拥护者的通病：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不善于冷静地估计形势，政治

上极端不稳定。这篇文章除了一些揭发性的材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材料。

马克思反对马志尼、维利希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家不顾客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专在“革命的”冒险和密谋上打主意，他认为，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方面，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增长、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马克思写道：“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见本卷第 349 页）

马克思在分析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提和前景的时候，还估计到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他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的亚洲大陆各国的深刻变化对欧洲各国的革命化的影响。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宗法制的封建关系由于这些国家被拖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遭到破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种变革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这些国家中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1853 年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专文，这些文章现在都已收入本卷。这些经过周密研究各种材料而写成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野蛮压迫和剥削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这个亚洲的最大国家的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了英国的商品竞争对中国地方工业的破坏作用。他指出，英国人把鸦片输入中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完全枯竭的灾难；他

指出，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军起义。

马克思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见本卷第109—110页）

马克思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用武装力量直接支持反动的满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他揭露了摧残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欧美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行为。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114页）

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结论，列宁制定了关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后备军的学说。

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印度的一些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这些文章前后呼应，有深刻的科学分析，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作了有力的揭露，是马克思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极为出色

的著作。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通过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和文明悠久的国家被英国统治的例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特征。他探讨了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起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揭露了东印度公司的作用，指出它是征服印度的工具，它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利用当地王公之间的封建内讧，煽动部落的和种姓的纠纷，以实现其对印度领土的侵占。马克思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和侵略使英国本国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财富增加，势力加强。马克思有力地揭露了西蒂的商人、大地主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这一伙强盗怎样靠剥削被殖民主义者弄得贫困不堪的印度人民群众而大发横财。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建立的官僚管理制度的寄生性，在这种制度下，印度人民群众陷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任凭英国殖民主义当局摆布。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统治阶级在印度实行的根本没有印度人民代表参加的所谓行政改革。马克思揭露了这些改革的阶级内容，指出引起这些改革的原因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想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直接进入印度市场，从印度的赋税中取得收入，以便在对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中增加自己的份额。

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盗匪式管理的惊人情景。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从东方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并用这些管理部门来掠夺和压迫人民，却忽视第三个部门——甚至东方专制君主多少还有些重视的公共工程部门。因此，印度的农田水利完全荒废了。英国工业品的竞争迫使当地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手纺业和手织业破产，千百万印度居民束手待毙。田赋、盐税以及殖民主义者施行的一整套横征暴敛的财政制度，沉重

地压在居民身上。英国人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同时把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许多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下来。英国人在孟加拉管区实施了柴明达尔制度，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施了莱特瓦尔制度，这样就使印度土地制度中的各种奴役性租税以及地主、土地中介人、收税人对农民的各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保存下来，甚至加强了。马克思指出，在这两种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见本卷第 244 页）。马克思的结论是：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见本卷第 144 页）。在这方面，马克思表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现得最为露骨。“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见本卷第 251 页）

马克思无情地指出，纯粹为发横财和进行殖民主义掠夺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促使印度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给印度人民群众带来了特别深重的苦难，因为这些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条件下出现的，殖民主义者阻碍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们只容许对自己有利的工业部门产生。但是，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者既然容许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印度萌芽，并且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的封建结构，就在无意中为这样一些力量的成长创造了前提，这些力量将来会打垮他们的统治，消灭他们对印度的殖民压迫。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结果的问题，通过这个例子鲜明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马克思指出，资产

阶级统治的时期应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物质基础。造成这些物质前提的代价，是在资产阶级残酷剥削下的人民群众遭到种种难以置信的牺牲，全国的人民被资产阶级逼迫走着流血、污秽、贫困和屈辱的苦难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252页）。

马克思着重指出：印度的生产力因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减轻印度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要办到这一点，人民必须自己掌握生产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消灭外国殖民统治。马克思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见本卷第250—251页）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印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所作出的革命结论。所有这些文章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相信将来印度总能摆脱殖民奴役，相信“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复兴的一天总会到来。

收入本卷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也是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篇著作。马克思把爱尔兰看作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他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的掠夺性的剥削方式。他着重指出，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和民族奴役使这个国家保留着半封建的关系，这种半封建的关系“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见本卷第179页）。

马克思论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文章，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文章以及马克思和

恩格斯后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信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联系着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前途问题考察了国际关系的问题。本卷有相当大一部分文章都是阐述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熟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及其侵略计划和侵略行为。他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看作是能够积极抵制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力量。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遵循自己的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就是要在欧洲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欧洲革命叫作“第六强国”，他们就是从这个“第六强国”的立场出发来对待任何国际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中严厉抨击了欧洲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个体系阻碍了欧洲的进步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阻碍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民族统一。他们严厉谴责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使用挑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恐吓和诈骗以及粗暴干涉小国内政的方法。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的是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尖锐矛盾和它们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领地、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统治权、争取在巴尔干和前亚细亚各国占优势所进行的斗争。这个所谓东方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很多篇文章中所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东方问题的看法，在恩格斯所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这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头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叙述。恩格斯分析了近东和巴尔干被土耳其征服后在历史上形成的状况，

揭示了欧洲各大国在土耳其领地的命运问题上互相竞争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论证了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民主派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东方问题象对待其他国际问题一样，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西欧的许多外交家和政论家相反，例如，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保存反动的封建的奥斯曼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民族取得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支持让这些民族独立的要求，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巴尔干半岛的被压迫民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东方问题上，西欧各国政府用一种虚假的理论——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现状——来掩盖它们反对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西欧各国政府的政策，痛斥维持现状的人，说他们是“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不愿用进步方法解决东方问题。“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象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见本卷第37—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正如1848—1849年事件所表明的，沙皇专制制度是革命的死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也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些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这个工具来镇压革命运动，

竭力要把它保存下来继续作为反动势力的堡垒。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警察统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以及西欧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他们指出，沙皇政府力图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来达到侵略和反革命的目的。俄国在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但是沙皇的反动政策必然会引起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压迫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列宁在1909年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页）

本卷中有许多文章专门分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是：《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以及其他许多文

章。这些文章都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狭隘私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英国内阁的对外政策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从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战的时候起在欧洲所起的那种反革命作用，这种作用在1848—1849年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同沙皇和其他反动势力结成联盟，极力扼杀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揭发了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同盟国背信弃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用他们反对英国当权的寡头政治的言论来促进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统治和改变大不列颠的对内对外政策而斗争。马克思的一组揭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人民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也发表了一部分。这一组文章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帕麦斯顿勋爵》是马克思仔细研究了許多外交文件、议会辩论记录和报刊以后而写的辉煌的抨击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十分准确和幽默机智的笔法，勾画了寡头政治的最著名的代表、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最突出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帕麦斯顿的肖像。在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评论中，包含着对英国的整个政府制度、对英国官方的整个政治路线的评价。马克思揭露了这一套制度的阶级根源，说明帕麦斯顿式的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关心的是怎样使“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天空”一直晴朗无云。马克思以帕

麦斯顿对爱尔兰问题以及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运动的态度为例，彻底揭露了用蛊惑人心的自由主义词句和对专制制度受害者的虚假同情作掩盖的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帕麦斯顿在口头上拥护“宪制”，而在英国本国则首先倡议施行警察措施，反对任何进步改革，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则支持反动的君主政府，并且讨好法国波拿巴集团。帕麦斯顿政策的特点是：奸诈、圆滑、虚伪和无耻，正如马克思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是极端反人民的。

马克思在这一抨击性著作以及《帕麦斯顿辞职》一文中说明，帕麦斯顿和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也是这种背信弃义和两面三刀的手法，他们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也有反革命的趋向。不过应该看到，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是英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这一评论虽然十分准确，但是却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位英国大臣的活动的某些方面。马克思极力强调俄国沙皇政府和英国寡头政治共同的反革命意图，但是在他的这一抨击性著作中稍许夸大了帕麦斯顿看沙皇专制政府的眼色行事这一点。帕麦斯顿和英国寡头政治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取决于害怕革命，希望利用专制制度来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对近东抱着侵略野心，他们想夺取高加索，想削弱沙皇俄国来加强自己，这种计划在引起克里木战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利用了乌尔卡尔特的材料，当时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和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曾利用这一点来胡说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但是，散见于本卷各篇文章中的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立场的意见，就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同意乌尔卡尔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

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利用乌尔卡尔特言论中所引的某些事实以及乌尔卡尔特派所办的反对党的报刊来揭露英国政府。

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一文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揭示了波拿巴法国在东方危机时期的立场的真正背景。马克思揭露路易·波拿巴在导致克里木战争的东方冲突中追求冒险家的目的和皇帝瘾，并着重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维持反动波拿巴专政的手段，对外冒险可以使当时欧洲各国统治者承认他这个法国王位篡夺者是“可敬的”君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为了侵略把人民拖入战争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使欧洲实现民主改革，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他们指出，这样的战争会使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革命统治崩溃，归根到底会促使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在俄国和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多瑙河战争》、《神圣的战争》）中，恩格斯分析了高加索战场和巴尔干战场上军事行动的条件、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双方军队的最初几次战役。这里应该看到：恩格斯的的文章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写的，没有时间和可能去全面核来自战场的消息。例如，在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中，他对西诺普海战的估计就受了片面的、不客观的消息的影响。由于报道不确切，在恩格斯所写的《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这些文章中，关于多瑙河上的俄军人数就采用了夸大了的数字。恩格斯很快就看出这一点，并且在后几篇文章中（见本卷第530—532、585—587页）对这些数字作了重要的订正，改变了

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某些估计和预测。

在收入本卷以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关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结论；这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对于军事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很有意义。恩格斯在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中进一步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任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概括当代战争的经验。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全集第一版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不是完整的，而是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本卷在编译过程中，发现某些文章中有编辑部添加的文字。本版中已把编辑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的注释中。《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引文、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原始资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材料加以核对和订正。各篇文章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这一时期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曾经在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的文章，有一些是同时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而且为了使英国工人读者易于理解，有时还作些修改。从1855年1月起，马克思也利用他和恩格斯寄给《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上的材料，开始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稿使他有可能向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内部状况的重大问题，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著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个时期的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政治活动中占有很大的部分。马克思认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继续进行研究。恩格斯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军事史和军事理论以及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研究过程中作出的许多结论和总结，都反映在他们为《论坛报》和其他报纸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论述欧洲和亚洲最重要国家中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这些文章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当代主要问题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中论证无产阶级对国际生活的重大问题和欧洲各

国内政问题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超出一一般民主运动的条件下制定了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针对当时的基本任务和各国不同的条件，具体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不能象他们曾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文件中以及在《新莱茵报》上那样全面公开地论证无产阶级的策略，所以只好在偶尔为分析具体事件而写的文章中采用讽喻的笔法来表述自己的策略原理。

1854年至1855年，由于克里木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国际关系和各个战区的军事行动的进程。第十卷的许多文章都是论述这两大问题的。在本卷中，评述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谈1854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马克思叙述十九世纪初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

在研究欧洲各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时，在研究外交谈判各个阶段时，在研究军事行动的进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根据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来分析每一个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象在1848—1849年那样，认为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1848—1849年革命过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必要条件。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英法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保存沙皇制度这支反革命力量，不希望它彻底崩溃，唯恐它的崩溃会给欧洲带来革命的后果，否则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将是一种威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说明，英国寡头政体和法国波拿巴政府的计划，只是想铲除俄国这个争夺近东领导权的对手，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统治，削弱沙皇俄国的军事力量。根据这个计划，英法政府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尽可能防止战争的扩大，使军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作为它们争夺对象的那些地区内。针对这种为英法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局部战争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的根据是：如果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是一次全欧洲性质的战争，那末它一定会在欧洲各国引起新的革命高潮，使这些国家的反人民的专制制度覆灭，使欧洲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在这些条件下，已经开始的战争才会变成各族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也会加速俄国本国革命形势的成熟，促进反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早日到来。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必然会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同那些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原则区别，后者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反革命政府，认为它们同俄国的战争就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见本卷第28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是他们在1848—1849年的策略的继续，那时他们已经在《新莱茵报》上号召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策略是1789—1871年这个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所要求的，因为当时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页）

本卷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的《欧洲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革命地改造欧洲的口号。这篇文章是因1854年1月英法舰队陈兵黑海而写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英法统治阶级想要进行的反对俄国的战争和为了民主改造欧洲所必须进行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革命战争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深信，当第六强国即革命出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条件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革命将使所谓五“大”强国全都附属于它，并使每个强国战栗不已。文章认为，不管英法政府的愿望如何，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推动力。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增长、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已为这一革命准备好基础。在恩格斯的《战争》这篇文章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况的进展》这篇文章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他们论述战争的其他文章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加以发展并使它具体化。他们特别注意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认为英国的革命发展前途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分析了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对克里木战争的态度，同时不断地揭露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英国的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对内政策来阻碍英国人民的进步，在对外政策方面，则遵照自私的阶级利益，只是力图削弱沙皇制度，保存欧洲的这个反动支柱。揭露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尖锐地批判英国外交和作战方法，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论文中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体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的特点是背信弃义，英国在外交上一向如此，这也是英国外

交的传统特色。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这两篇文章中，根据对许多外交文件的详细分析，揭露了英国的一些国家活动家在战前时期多次企图同沙皇政府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保证英国在近东占有决定作用的地位。马克思的结论是：如果沙皇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的行动不会引起必不可免的对法战争，而对法战争又不会引起欧洲的革命，那末英国政府准会以同样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国一起吞掉（见本卷第174页）。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许多军事评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这些文章批评了英国政府的作战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批评是他们揭露英国寡头政体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把一部分评论发表在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报》上，认为这是鼓动英国工人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方法之一。

从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一位大军事专家，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人。他在《战争》、《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装备、军需部等等》、《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等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指出了英国的军事落后于英国的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欧洲战争问题》、《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研究了战局的进程，说明了交战国的实力，分析了个别的战役。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喀琅施塔得要塞》是很值得注意的。恩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战争》、《克里木战局》这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俄国兵士的英勇精神，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地主俄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大部分将官的无能以及在沙皇军队中所采用的“阅兵操练”制度。

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是论述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的，他认为这是战局的新阶段。在1854年10—11月

所写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的薄弱，认为城市可能即将陷落。但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以前在向陆一面没有设防的塞瓦斯托波尔能够长期防守。因此，恩格斯在1854年12月底和1855年1月初就指出：“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见本卷第624页），由于俄军的努力，目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用强攻来占领它已完全不可能了（见本卷第662—663页）。

在本卷以及本版第九卷、第十一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中，有关于军事学术史、军事理论、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性的结论。这些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形成的重要阶段，反映了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当时战争经验方面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必须考虑到：恩格斯当时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西欧资产阶级报刊的故意歪曲的报道，而且军事评论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写成的，所以没有时间和可能去核对这些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因此有时片面地估价了某些战役，例如西诺普会战、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英国寡头政体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揭穿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关于议会辩论的许多文章中，出色地批判了英国现行的两党制。他着重指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斗争，只不过是粉饰门面而已，因为每个政党“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见本卷第62页）。这里所发表的马克思的许多论文，都是针对具体的人即当时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写的。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继续他早就开始的对英国寡头政体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格莱斯顿等人所执行的政策揭露。

至于谈到在战争年代英国议会中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立场，马克思指出，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爱尔兰议员团（所谓爱尔兰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光彩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议员团的代表实质上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旅时而支持英国这个政党，时而支持英国那个政党，从它们那里争得一些让步，满足自己的私利，但决不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的压迫。它“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见本卷第 67 页）。

许多文章如《议会辩论》、《战争。——议会辩论》、《议会的战争辩论》等等都分析了各色各样的议员在议会中就作战、预算、个别改革草案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有几次下院会议是马克思亲自出席旁听的。他用具体事例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它的脓疮，戳穿统治的政治制度，揭示英国议会制的阶级实质和资产阶级议员所固有的虚伪和欺诈。马克思在《不列颠的财政》一文中分析了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他着重指出：最后结果，人民群众只得为战争付出代价。马克思的许多论文也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

马克思在好几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界代表人物的言论。这些代表人物纠集在自称“和平拥护者”、反对同俄国作战的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周围。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的这种立场决不是出于真诚地爱好和平，而是由于他们深信英国通过和平手段，不花作战费用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自由贸易派根据英国商品向俄国市场输出的日益增长，证明资本家英国和地主俄国的利益是一致的。马克思着重指出，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和布莱特作为“和平保卫者”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在保卫 1815 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大国的反动统治集团而违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

度。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尽管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同英国贵族寡头政体一样，是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科布顿和布莱特们表面上装着爱和平，其实他们仇恨革命，企图保存沙皇制度这支反动势力，马克思指出，这正暴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见本卷第44页）。

马克思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以后，又对他们的对内政策、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所发表的装装样子的言论进行了尖锐而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和《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这两篇文章中，揭露自由贸易派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他写道，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假惺惺地抱怨战争使“基督徒互相残杀”，但同时他们又赞成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千方百计地达到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日的那些法律。自由贸易派想用偶然原因，例如用战争的影响来解释在英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这种意图十分恶劣。自由贸易派企图挽救他们的教条，相信废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贸易原则才是医治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

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当时他依据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平时对当前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这也是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的巨大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根据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站不住脚的。他着重指出，在英国出现的危机现象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尽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别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为了战争目的利用一部分游资，但这些危机现象还是出现。马克思指出，当时的英国经济的特点是它同世界市场有紧密联系，由于英国商品向其他国家的输出日益增长，英国工业及其震荡对整个世

界经济的影响就日益增大。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849年开始的英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不可能不间断地继续下去，1853—1854年英国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将发展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18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认为，当前的危机有可能引起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给工人议会的信》、《工人议会》等，在本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多年一直同宪章运动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上半期，他们帮助革命宪章派争取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主义。马克思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叙述宪章派刊物上的材料，宣传革命宪章派的领袖厄·琼斯的演说，帮助宪章派向劳动群众揭露英国议会的阶级性。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中，分析了议会的社会成分和现行的选举制度，并且指出在英国社会中，无产阶级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建立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政党。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贺信中提出了伟大而光荣的目标：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见本卷第134页）。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只有组织全国性的政党，才能获得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为反对“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而斗争（见本卷第126页）。

收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多篇幅论述了法国、法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这种立场所依据的论点是：波拿巴政体这个靠军队支撑的资产阶级专政政体的性质必然使拿破仑第三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马克思写道：

“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见本卷第109页）他屡次指出，波拿巴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扮演了主谋者之一的角色。他认为，“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见本卷第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第三及其党徒们害怕欧洲革命并不亚于英国寡头政体，因此他们也赞成局部战争。法国波拿巴政府正象不列颠联合内阁一样，也想在战争中捞一把，这在法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中已经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在文章中系统地揭露了法国政府的阴谋，抨击了在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狂热的波拿巴主义的骗人口号。他坚决反对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民主的保卫者，当作“自由的代表人物”（见本卷第283页）。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并且痛斥了“十二月政变的文明”的血腥手段（见本卷第559页）。在《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一文中，马克思把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的典型代表圣阿尔诺元帅这个“被托付拯救文明”的人，这个卖身求荣的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恬不知耻的走狗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特别的关切和同情注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命运，首先是法国工人阶级杰出领袖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命运。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一文，其中有一段把奥·布朗基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的阿·巴尔贝斯作了对比。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尖锐地批判分析了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它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这方面的文章有：《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炮击敖德萨。——希腊。——

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等。关于普鲁士在战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马克思的观点是：必须解决1848—1849年革命所没有解决的德意志的主要历史任务——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参加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可能成为德意志民主运动新高潮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将会推翻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各邦的专制政体，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马克思揭穿了反动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为了使人民群众畏惧而制定的政策，统治集团打算逮捕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并把他们押送到东普鲁士要塞，使他们再也不能组织人民运动（见本卷第82—84页）。

马克思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分析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奥地利的参战，认为军事行动移往欧洲中部会在那里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恩格斯写道：“当战争限于以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见本卷第7页）

奥地利的参战可能使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崩溃，使受奥地利奴役的各族人民组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使欧洲许多国家得到民主改造。马克思指出：“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见本卷第2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俄军的撤退》、

《东方战争》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精细分析得出结论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反动制度不稳固，这个帝国内外交困，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才奉行中立政策。奥地利政府好象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不能让沙皇俄国毁灭，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见本卷第313页）。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又不愿俄国强大，它担心俄国军队向巴尔干半岛推进会引起受奥地利帝国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骚动，并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所受的侮辱”（见本卷第36页）。因此，奥地利要求俄国的军队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此外，奥地利政府希望依靠西方强国的帮助摆脱象马克思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非常严重的财政困难。马克思写道，这些原因就使得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摇摆不定的立场。

马克思在分析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时指出，奥地利政府煽动被奥地利压迫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这种政策正适合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意大利自由派的立场。马克思写道：“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见本卷第21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想解决遭受奥地利压迫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以及属于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命运，必须在欧洲进行革命的民主改造，必须进行革命战争，推翻这个帝国并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许多西欧政治活动家包括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毫不触动反动的土耳其国家，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支持在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和其

他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除了论述克里木战争、分析军事行动的进程以及与这场战争有联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文章以外，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述1854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如《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的反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认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热烈欢迎西班牙人民起来对抗专制制度，认为这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以及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置，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过去西班牙革命的历史，阅读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作家的著作。1854年9—12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成果；这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从拿破仑入侵到1820—1823年革命为止的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第一次发表的这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马克思曾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是该报没有刊登）的片断是这一著作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论述西班牙问题的文章，是巨大的科学财富。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总结，不仅阐明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极重要事件——西班牙人同摩尔人的斗争，反对查理五世的专制制度、维护中世纪自由的暴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卡洛斯派战争等等——而且使人更容易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共同问题。

在所有阐述西班牙革命史的文章中，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无论是专制独裁政体、“神圣的宗教裁判所”，

或者是拿破仑的军队，都不能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尽管西班牙国家乍一看来多么死气沉沉，在它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民的活力还沉睡未醒，拿破仑第一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见本卷第463页）。

马克思很高地估计了在西班牙展开的反抗法国干涉者的斗争，同时辩证地揭露了这个斗争的矛盾：人民的目的是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西班牙反动统治集团的意图则是恢复专制制度和维护自己的特权。马克思指出，这是当时所有反抗拿破仑侵犯、争取独立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所固有的现象。因此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必须把民族解放斗争同深刻的内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

马克思拿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作例子，揭示了以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特有的一系列规律性。他指出了人民群众是这些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揭露了领导这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者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具有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使革命斗争的整个发展受到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指出，那些实际上仇视革命、只想把运动局限在立宪范围内的自由派分子，经常利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偏见。马克思在《埃斯帕特罗》这篇论文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见本卷第401页）。马克思对西班牙自由派分子的深刻批判，补充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这个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论断。马克思指出，西班牙革命领导者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沙

文主义立场，力图维持西班牙对拉丁美洲领地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历史时，除了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还阐明了西班牙历史的特殊性，包括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古老传统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马克思以西班牙问题为例指出：在封建制度解体和民族国家产生时期，君主专制并不是到处都起进步的作用。如果说在欧洲的一些大国中，君主专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见本卷第 462 页），那末在西班牙，由于许多历史原因，君主专制不仅不能起集中统一的作用，而且还直接阻碍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见本卷第 462 页）马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纪初西班牙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由于西班牙的传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见本卷第 672 页）。

在马克思所写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过去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片断，包含许多重要的理论结论，这些结论仿佛总结了这组文章的内容，给人提供了理解其中所叙述的事件的钥匙。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1820—1823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了农民群众。马克思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缩小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的市民就依赖军队——军队是“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的工具”（见本卷第 671 页）——这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论西班牙的文章，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个民族

历史的光辉的范例。

* * *

本卷收入了两篇没有发表过的手稿——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论文中的片断和恩格斯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此外，本卷还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五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在发表这些新的文章时，利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所保存的马克思1850—1854年的笔记本，其中除了其他材料，还有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关于寄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的记录。这个笔记本和其他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确定本卷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和写作年月。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编辑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许多通讯，特别是军事评论改成象是在纽约写的，因此常常增添一些字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显然是编辑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在研究本卷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评时所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比利时独立报》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同以后经过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在本版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5年1月底至1856年4月这一时期的论文和通讯。其中大部分曾经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上发表过。马克思从1854年12月底起就是该报的撰稿人。与此同时，他还继续给美国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和前几年一样，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也同时发表在厄·琼斯主编的、1852年5月创刊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

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来联系群众，对社会舆论起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影响，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稿使他有可能与德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有可能向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的重大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几乎要占去他的全部时间并使他中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这项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所以一部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军事评论。马克思也时常把这些军事评论译成德文，送到《新奥得报》去发表。由于考虑到为德国写通讯稿的特殊条件，马克思有时把

恩格斯的军事论文的内容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或者作某些改动和缩减，有时他也补充一些对议会辩论和国际事件的评论。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造性合作的范例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政论文章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五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外，还研究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问题。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科学，首先是军事学术史，研究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反映在他们的论文和通讯中。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写稿过程中收集了新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他们用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例如，在给《新奥得报》写的论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某些材料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后来都被马克思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的政论文章对于五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利用在普鲁士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新奥得报》的篇幅来进行革命宣传有困难，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们有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能够在他们的政论文章中贯彻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他们揭露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脓疮，抨击了被统治阶级用来为这个制度作思想辩护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欧洲各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策略问题。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当时的事件，通过具体的实例说明了他们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他们继续发展了他们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使之具体化。

在本卷文章所谈到的很多问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国际关系和当时快要结束的克里木战争。本卷中有关这些题目的文章，就其内容来说是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论文的继续。本卷中有不少评述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和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也有一些专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分析所有这些问题，评价这些历史事件，他们首先注意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高潮的前景，坚信这种新高潮必然到来。正如列宁指出的，他们在决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时，是从1789—1871年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出发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未结束。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就是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也还未解决，摆在日程上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彻底革命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策略（决定这种策略的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所面临的那些主要任务），基本上是《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所提出的革命策略的继续，不过采取了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的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危机》、《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示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要利用克里木战争这一国际冲突来发展反对现存反革命制度的欧洲革命。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关心的是统治阶级为了对付人民而发动的克里木战争能推动大规模革命事件的爆发。马克思希望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1848年六月战斗中所

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见本卷第 208 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寄予很大的希望。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谈到“法国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这次革命能引起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震荡。“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阵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间进行。”（见本卷第 145 页）

象在 1848—1849 年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了在沙皇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度，揭穿了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和沙皇政府的外交活动，揭示了沙皇政府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在镇压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警察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统治阶级竭力保全和利用沙皇制度作为对付革命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摧毁沙皇制度、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中，揭示了沙皇专制政府想利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这种企图的反革命性质，揭示了沙皇政府力图把斯拉夫联合起来的号召变为实现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之一。恩格斯在说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时指出，散布这些思想的一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君主派分子，在 1848—1849 年在客观上起了支持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他们指出，这种思想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民

族纠纷，是同各个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发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独立要求，但是，并没有把这种要求推广到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谈到这些民族及其前途，是从他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部著作中提出的错误论点出发的，认为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因而注定要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和第八卷的说明)。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趋向是集中、建立大国和大民族吞并小民族，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历史经验表明，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有能力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发展，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能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民族一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者。

为实现欧洲民主改革，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必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战争；他们也揭穿了为巩固欧洲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制度而发动侵略战争的英法统治阶级的政策。

在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尽地分析历史事实、外交文件包括1855年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和议会辩论等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克里木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真正的性质。他们揭穿了国家活动家们和西欧官方报刊的虚伪的声明，这些声明把英法对俄战争描绘成是“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证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参战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

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近东的矛盾，说明这些列强为了分割土耳其帝国、争夺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的霸权而进行斗争，它们在中亚细亚也有竞争。

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待它们的“盟国”土耳其的政策。他揭穿了欧洲列强对落后的土耳其实行殖民奴役的掠夺手段，其中包括在援助的幌子下强迫土耳其接受财政上的奴役。马克思指出，西方列强把土耳其的外交部和内务部置于它们的监督之下，掌握着它的军队并“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见本卷第 425 页）。

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寡头政体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一心想铲除俄国这个在近东和中东的对手，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抢走俄国的高加索，消灭俄国舰队从而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打算摧毁作为反革命势力的沙皇制度。西方列强决不想触动欧洲反动的、旨在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早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就已奠定了，它的支柱之一就是俄国沙皇制度。相反地，西方列强的当权者却要巩固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揭露英法统治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时指出，克里木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 1815 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见本卷第 34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等文

章中证明，英法统治集团害怕东方冲突在大陆上普遍燃起革命烈火，这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军事计划和作战方法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列强的统治集团在法国和英国煽起沙文主义的情绪，同时努力使战争局部化，不让它变成欧洲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地抨击法国政府所提出的并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见本卷第 332 页），指出这一计划反映了波拿巴集团和英国寡头政治害怕全欧洲同沙皇俄国作战所引起的革命的后果，指出这个计划是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反革命的、王朝的以及类似的打算而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是不揭穿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政策，不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不可能使它变成争取民主改造欧洲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力量和革命民主力量积极展开活动。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现另一种力量”（见本卷第 350 页）来代替英法反革命政府。

在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西欧各国对俄国作战的联合是不巩固的，这些盟国之间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暴露出来。在论述英法联盟的几篇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的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的历史根源，这种竞争必然要在它们之间引起一切新的冲突。

马克思把新的革命高潮同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它本来就会引起所有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因此特别注意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英国。

在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统治阶级和执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传统的英国政策》、《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以及《卡尔斯的陷落》等文章中，追溯了英国

数百年来对外政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外交手腕的一贯特点是背信弃义、假仁假义、用各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并且指出英国在许多冲突中，特别是在近东和中东，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马克思以帕麦斯顿、罗素和其他国家活动家对波兰、爱尔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态度为例子，揭露了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指出了英国统治阶级仇视民族解放运动，而往往表面上又假装着同情人民反抗专制制度。

在《金融市场》、《贸易和财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业生产、国内外贸易、市场价格、汇率等情况。他根据具体的实例考察了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的发展，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断时续的性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被英国一些工商业部门、首先是纺织工业部门中出现的萧条时期所代替。马克思在1855年也看出了曾在1853年底和1854年初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现象。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经济衰退现象表现为某些工业品生产缩减、失业现象增长、许多企业实行不完全工作周制、大的贸易公司破产。马克思预言，不久的将来，英国将经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因英国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状况的这种特点而加深。马克思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新的经济危机在1857年发生了。

马克思在文章中分析英国经济状况时，尖锐地批评了以自由贸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贸易派散布关于推行贸易自由原则就会使经济危机消失的幻想，马克思指出这些幻想是要破产的，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他揭穿了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科布顿、布莱特和所谓曼彻斯特学派

的其他代表人物，这些人是资本主义辩护士，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马克思撕下了自由贸易派的“自由的捍卫者”、反对贵族的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的假面具。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但是每当雇佣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公开威胁剥削制度时，他们就要恳求议会和政府进行干涉。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斥责自由贸易派侵犯工厂视察制度，企图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的法律。

为了揭穿自由贸易派关于英国劳动人民是“幸福”的谎言，马克思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材料描述了英国工人群众特别是妇女和童工遭受剥削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他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几乎完全没有，因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经常遭受威胁。马克思写道：“工厂视察员的这份工业通报比关于克里木战役的任何一份通报都更可怕、更吓人。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伤亡者名单提供大量名额。”（见本卷第 427 页）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猛烈谴责曼彻斯特学派的首领们在克里木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揭露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保卫和平”的言论和他们的“付出任何代价以求得和平”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马克思指出，曼彻斯特学派要和平是为了“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见本卷第 317 页）。他指出，自由贸易派的假爱和平的词句掩盖着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企图，掩盖着它的争夺世界市场霸权的斗争。

《上一届英国政府》、《被推翻的内阁》、《论内阁危机》、《两种危机》、《不列颠宪法》、《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等文章，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时写道：“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

(见本卷第 108 页)马克思指出,保持贵族对国家最重要的职位的垄断,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柱石之一,这使贵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给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议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和军事管理的组织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场上。马克思在说明英国政府(阿伯丁联合内阁和 1855 年 2 月上台的帕麦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两届政府的活动中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都是千方百计地阻碍彻底实行对英国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垄断有威胁的进步改革。

马克思在《论内阁的危机》、《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补充了他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官方政党、对于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辉格党自由派轮流执政的传统的两党制所作的经典性的描绘。他指出了托利党落后的保守主义,认为托利党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问题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见的”热烈捍卫者(见本卷第 245 页)。同时他也揭穿了辉格党人这些资产阶级贵族代表的装装样子的自由主义,他们和托利党人一样,竭力巩固寡头政治制度,不过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狡猾,更能随机应变罢了。马克思写道,辉格党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们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袭权利的偏见”,他们“根据不同情况”更换“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见本卷第 245、246 页)。

收入本卷的《约翰·罗素勋爵》这篇抨击文章是为揭穿辉格党的政策而写的,它抨击的是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多次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著名的国家活动家。马克思在这篇抨击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斗争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

吵，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剥削者的各个派别也日益团结起来，因此这两党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就日益消失。在野的政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排挤对手下台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在揭穿英国两党制这种结构时指出，不管是这个政党执政还是那个政党执政，它仍然继续奉行它的前任者的政治方针。这两个政党都同样要保持资产阶级和贵族上层分子对国家政权的垄断。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还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制度所固有的深刻矛盾，说明了陈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的议会政党已经蜕化。马克思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见本卷第51页）马克思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那些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旧贵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它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反映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位日益巩固。

马克思在论英国的那些文章中非常注意英国工人阶级。在《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论鼓动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克里木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马克思在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西蒂区商业金融集团反对派力图影响英国工人阶级时，总是不断地强调宪章派对资产阶级分子类似的企图进行反击的意义。马克思在文章中介绍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活动家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这些活动家不仅指责资产阶级反对派批评寡头政治的言论温和而不彻底，指责他们害怕工人运动并准

备和贵族妥协，而且还揭穿资产阶级领袖们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私的目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要求行政改革，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获取国家职位更方便，相反地，宪章派则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改革。马克思认为宪章派有伟大的功绩，因为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地位，保证工人阶级在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马克思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条件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马克思写道：“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见本卷第301页）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求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政治口号，包括普选权的口号。他们教导说，普选权这个口号的内容和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说在法国以及在大陆，普选权口号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那末在英国的条件下，这个要求和宪章派纲领的其他条目一样，具有另外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们认为英国是例外。他们估计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大部分英国居民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改造议会制度，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们

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可能通过另一种方法，即非和平的方法来夺取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并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重新开展宪章运动能促使这个任务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宪章派在五十年代想掀起群众性的争取宪章的运动，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宪章运动便销声匿迹了。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人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而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则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取得巨大超额利润收买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工人贵族”而造成的。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阐述了法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大冒险家的命运》、《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拿破仑最近的诡计》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恩格斯指出了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木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阴谋，说明了军事冒险是波拿巴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掠夺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团的政治统治和波拿巴王朝执政本身所依据的原则之一。他写道，对路易·波拿巴来说，“不能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见本卷第16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波拿巴政体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军警专政的政体，并且严厉批评了波拿巴法国的头面人物：皇帝拿破仑第三这个无耻的篡夺者和冒险家，他最亲近的喽罗——圣阿尔诺元帅、埃斯潘纳斯将军、福雷将军、康罗贝尔将军和其他贪得无厌出卖灵魂追求名位的人，这些人在战场上表现得庸碌无能而在镇压革命运动时则以野蛮残酷见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法国内部的政治状况。他们在《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新元帅》、《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等文章中指出，法国政局在物价高涨、经济困难、投机成风的影响下日益严重。人民群众有不满的迹象，在工人阶级、大学生、一部分资产阶级中，甚至在作为当时波拿巴政体支柱的军队中出现了革命的情绪，——这一切都表明第二帝国并不巩固，证明马克思所写的“波拿巴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了”（见本卷第664页）。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小波拿巴法国》是一篇明确抨击波拿巴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许多战斗的革命的政论文章中的杰作之一。它准确地和生动地揭穿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反人民本质。马克思向英国工人报纸的读者指出官方的波拿巴法国与人民群众的法国之间的鲜明对照：前者大肆挥霍本国的国民财富，后者只有忍受波拿巴集团的统治所带来的苦痛、贫穷、警察迫害和血腥镇压。马克思指出，在这个人民法国的深处，反对路易·波拿巴制度的革命风潮正在成熟起来，正在出现一些征兆，预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见本卷第6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继续阐明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他们考察了奥地利政府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英法和俄国之间在奥地利立场问题上所展开的外交斗争，分析了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同时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方危机时期执行两面的摇摆的政策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动的奥地利君主国是一个以压迫国内各民族并在它们之间煽起民族纠纷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内部蕴藏着许多易燃物。奥地利统治集团害怕革命，需要沙皇制度作为支柱，以便在新的革命浪潮爆发时向它求助。同时，奥地利想在巴尔干掠夺一番，

觊觎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希望俄国被削弱；因此，奥地利在多瑙河集中了大量军队，同西方列强订立了条约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关于财政援助的谈判。因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意向而苦恼的奥地利采取了与俄国敌对的立场，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前并不敢公开反对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奥地利政府害怕一旦对俄作战，在隶属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中间将展开解放运动，这一点对奥地利政府的摇摆不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分析奥地利的立场时，马克思也考察了普鲁士的政策。他认为，普鲁士统治集团宣布中立也是由于害怕同沙皇俄国作战的战场被移到中欧这一革命后果。因为普鲁士参加战争就可能推动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开展德国民族统一的斗争，这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君主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马克思在《普鲁士》一文中说明了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工商业发展迅速因而普鲁士的有产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就空前富有。至于资产阶级，马克思再一次着重指出他和恩格斯早在1848—1849年就已表明思想：德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不能起领导作用。马克思揭穿了普鲁士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认为这个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官僚政治盛行，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大部分居民处于无权地位。马克思指出了普鲁士农民的困苦状况，他们仍然象过去一样“无论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贵族”（见本卷第717页）。

恩格斯分析克里木和高加索战场的军事行动进程、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某些军事行动的论文，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份量。这些军事评论对于研究军事历史科学是很重要的。这些文章使我们能够考察克里木战争的一切最重要阶段，其中有许多关于军事学术史和军事战略战术问题的宝贵结论和原理，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战争经验。

在许多文章中，恩格斯批评了英法的统帅部，批评了它的战略和西方列强的代表们对军事行动缺乏领导效能。恩格斯指出了联军统帅部的失算和失策，它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以及它所表现的局限性和守旧习气，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错误百出的作战方法，是完全符合英法统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追求的那种极为自私的、反人民的目的的。在《克里木的斗争》、《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不列颠军队》、《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英国军队组织的守旧性，英国军官理论素养和军事素养的水平很低，统帅部和军需部（军需部虽然有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也是不能保证供应英国军队以武器和装备）的领导者庸碌无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揭露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评述了波拿巴集团在法国军队中所推行的反革命制度，以及第二帝国许多军事活动家的丑恶面貌。

恩格斯的绝大部分军事评论都是谈论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情况的。俄国军队保卫这个城市的十一个月的英雄历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自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恩格斯把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看作是克里木战争的新阶段，他详细分析了英法军队所采用的围攻方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防御方法。在研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经验时，恩格斯对于要塞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的作用以及野战军与要塞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重要的总结。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会战》等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联军围攻的方法。他指出：“象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没有系统、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见本卷第217页）恩格斯指出，在筑城工事方面，俄国人大大胜过英国人和法国人。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组织、保卫者的军事工程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

指出了俄国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在《战争的进程》、《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消息》等文章中，恩格斯指出塞瓦斯托波尔尔守备部队的一些军事工程师（其中有工程长官托特列本）的技艺，他们能迅速而正确地了解情况并善于组织火力和防御工作，这都是联军的榜样。按照恩格斯的评论，俄国人在防御过程中修筑新的工事是“被围守军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见本卷第193页）。恩格斯指出，俄国人把火炮层层排列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的优越条件。他指出，俄国人顺利的出击是他们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在出击中，他们“以固有的顽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见本卷第172页）。最后恩格斯得出了结论说：“整个这一防御的组织堪称典范”（见本卷第194页）。

这些评价表明恩格斯充分估计了塞瓦斯托波尔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军事艺术，表明他在评述军事事件时善于找到客观的标准，虽然他掌握的甚至只是英法新闻报道中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片面的、往往大受歪曲的消息，而当时对这些报道，他又往往无法去核实。后来经过更详细更全面的研究，恩格斯又多次谈到英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尔的经验，把这次防御战看作积极防御的杰出榜样，看作保卫者的军事技艺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参看恩格斯专门论述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以及他在普法战争时期所写的《战争短评》）。

反映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军事发展的研究的是收入本卷的一部总结性著作——《欧洲军队》。这一著作，象军事评论一样表明恩格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专家，他精通军事历史和当时各国武装力量的状况。在这一著作中，他详细地评述了欧洲各国的军队，说明了每个国家军队和它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官兵的战斗素质的特点。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对各国军队发展的意义，同时指出，军事技术的普遍进步和军事方面的改善使

每个国家的军队必须考虑并利用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经验。恩格斯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军事历史著作所特有的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中包括流行的关于某国军队永远不可战胜的“理论”。在恩格斯的整部著作中贯串着一条极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即某个国家军队的状况和战斗力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原理，后来他在《反杜林论》一书里作了详尽的发挥。例如，恩格斯在说明普鲁士军队时指出，由于普鲁士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编制原则和对全体能够服兵役的居民进行短期军事训练这个先进的原则没有彻底实行，而且这些原则由于统治集团渴望“有一支驯服可靠的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见本卷第497页）而被歪曲了。恩格斯指出，实行民族压迫和煽动民族仇视是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些现象也反映在奥地利的军队中，并且对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恩格斯在《土耳其军队》一节里指出，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帕沙们的蛮横和贪婪阻碍了必要的军事改革。恩格斯认为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中也有封建残余的影响。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以及在《俄国军队》的专论中，在描述当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时指出，俄国军队技术落后、编制方法和军队训练方法陈旧，实行“阅兵操练制度”和盗窃公款成风，这都是沙皇俄国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占统治地位和政治制度反动的结果。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俄国兵士的高度战斗素质，“射死”他们“比迫使他们退却要容易一些”（见本卷第510页）。

但是应当估计到，恩格斯在描述农奴制俄国的军队的落后状况时有某些夸大的地方。因此，有些说法例如俄国兵士总是消极被动、俄国军队中外国人起了特殊作用、俄军中极少有才能的人、在相同条件下俄国人总是被西欧军队打败等等，都是与历史事实

不符的。恩格斯所以产生这些不准确的说法(他在较后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以及其他著作中作了某些修正)，是因为他根据了西欧军事史学家对俄国过去的军事情况所作的歪曲论述，由于没有别的史料根据，恩格斯当时只能从这些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寻找史实材料。恩格斯在论文中指责俄国沙皇制度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这种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俄国军队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实质上已成定局的时候所写的《英法对俄战争》、《欧洲战争》等文章中，对克里木战争作了一些总结。“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语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规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将军们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现象的交错。而所有这一切是俄军的特点，正象是他们的敌人的特点一样。”(见本卷第5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克里木战争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愿望，即把这一战争变为争取民主的和革命的原则的战争，并没有使欧洲实行根本改革，使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垮台。此外，它也没有解决欧洲各国在东方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在《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是假谈判，巴黎和约是暂时的条约。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指出，克里木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不仅不意味着争端得到调解，而且一开始就表明欧洲列强之间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但是认为这次战争对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包括对俄国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例如，1871年马克思重新评价克里木战争时，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初稿中写了以下这一段话：“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

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59—560页）。马克思看出了沙皇政府本身为了避免来自下面的革命而被迫从上面即从沙皇宝座上实行的改革是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的失败相联系的，列宁后来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这种联系，他写道：“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六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同时在《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收入本卷时，主要是采用较为完整的和报纸编辑部改动较少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在注释中就注明未收入本卷的不同版本。两种版本间有些出入的地方用脚注表明。本版中凡是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文章，在篇末注明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版本变动的地方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文章的两种版本都收入本卷，因为这两种版本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一点是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不同版本的文章共十篇。第一版中发表的《战争的总结》和《欧洲的和平》两篇文章，因为没有充分根据证明其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没有收入本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指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改动他们文章的原稿。编辑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许多通讯，特别是军事评论改成象是在纽约写的，因此常常增添一些字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编辑部所做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在研究本卷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评时所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通常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同后来经过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以及文章的几种版本加以核对和订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这一时期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绝大部分文章和通讯曾发表在美国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伦敦的《自由新闻》，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难忘的十年”即将结束，这个“十年时代”是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赐给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们甚至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弃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念。他们曾指望迫近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的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面分析，使

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见解：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危机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后半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大致制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经确定。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严谨的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揭示把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在两位无产阶级领袖看来，在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因此，经济危机的即将到来促使马克思从1856年10月起更加紧从事他的经济研究工作。

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巨著。马克思进一步充实这些材料，并部分地进行加工，他打算把这部经济著作分六册出版。这部著作开头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篇幅庞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9年以《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的标题用原文出版。这些手稿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中的重要阶段，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进行研究的重要阶段。手稿中已经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它们后来由马克思在所有三卷《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在1857年8—9月为上面提到的那部未能按最初计划完成的经济著作所写的《导言》草稿。这篇《导言》虽

然不是最后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并且具有重要的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问题，同时指出了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导言》中特别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其中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加以发展和具体化，例如，关于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的艺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原理。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利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有关章节，加紧写作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第一分册。他在1859年1月结束了这一分册的付排准备工作，并且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的书名在柏林出版。但是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册。后来他放弃了最初的经济研究计划而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资本论》就是这个新计划的体现。

马克思在为发展他的经济学说而从事紧张理论工作的同时，在这几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分析国际生活和欧洲各国国内政治的一切重大问题。革命的政论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个反动时期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这几年中，两位无产阶级领袖正是利用它作为主要手段来对无产阶级施以革命影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指出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阐明他们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载了马克思于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记录。在这篇篇幅不大但内容非常深刻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是资本主义

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4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讯都是专门分析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的。当危机在信贷和货币流通领域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预兆时，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危机了，他仔细地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经济部门的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况所以特别感到兴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正是在这些国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它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在五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大规模的投机企业和与此有关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投机活动蓬勃发展，相继侵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门：借贷资本、商业、工业和农业，并很快具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不久蔓延到德国。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涡。早在1856年秋天，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马克思正确地预见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现象必然会造成普遍危机（见《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一系列探讨信贷货币关系的文章中，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特别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贷领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

的变动，经常观察作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索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在危机扩张以前就能够完全准确地预见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贸易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预先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来说，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终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在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贸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指出了受危机侵袭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是：危机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业，所以英国的危机具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等文章，尖锐地批判了认为自由贸易原则是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图寻找防治危机的药方是徒劳的，驳斥他们对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庸俗的论断，同时作出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认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象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他指出，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象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见本卷第607页）。

在马克思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银行的投机的交易所伎俩大大加剧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分析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说明这个股份公司不同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重要的理论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们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写道，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见本卷第 609—610 页）。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形式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联系起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 37 页）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资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就能够创办单个资本家办不到的那种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但是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同时，又加速生产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日益加强工业资本家寡头集团的统治。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剥削他们的资本来说，“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见本卷第 38 页），他们将越来越成为可怕的革命力量。在这些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天才地预见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然密切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被压迫民族在五十年代中期广泛开展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他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思想，即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同欧洲革命的前景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

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是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

一，马克思认为这与太平军起义有部分的联系，他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见本卷第76页）马克思指出，牵制英国大量武装力量的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与其他一些决定性因素一样重要，这些因素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见《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这一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后来被创造性地深入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欧洲的工人阶级，主张坚决支持波斯、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关于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两次对华鸦片战争、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鲜明的揭露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愤怒地抨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在印度和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强盗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借以取得殖民垄断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时，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对亚洲大陆各国的侵略。

在《英国—波斯战争》、《英中冲突》、《对波斯的战争》、《英国—

波斯战争的前景》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了英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的侵略性质，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惯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就是给地方当局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它违背了条约的义务或者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规定。这些都被当作武装侵略、强占领土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的借口，通过这种条约使占领合法化，使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一些条件合法化。英国资本家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纠纷，而且还人为地煽起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间的仇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鸦片贸易史》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英国侵略者践踏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戴着基督教伪善的文化传播者的假面具，使他们所垄断的鸦片走私贸易变成他们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反对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在印度实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鸦片生产的垄断，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鸦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纪初便由这种贸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马克思得出结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

马克思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库，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挑起了两次所谓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的兽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残忍的（见《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

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见本卷第 309 页）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中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以残酷袭击广州和平居民开始的第二次战争，也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具有强盗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谈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而积极的斗争。他们驳斥那些诽谤中国人的特殊斗争方式的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辩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在这样悬殊的条件下，这些方式是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见本卷第 232 页）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恩格斯解释道，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见本卷第 232 页）。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以先知之明预言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帝国将得到解放，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将对东方各国的进步发展必然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 234 页）

本卷中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 1857—1859 年的伟大

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败的原因，评述了起义的性质，对起义作了历史评价，阐述了战事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印度的起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论证了印度起义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的相互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波斯签订的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英国一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印度人民增加了不堪忍受的负担，因为这些战争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匆忙同波斯缔结和约，并且把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规模，想把它说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军事叛乱。英印当局费尽心机地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这一事实，企图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的，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虚伪的论调，一开始就认为印度起义是全民族的运动，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见《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瑙的解救》）。他们指出，在起义期间，不仅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仅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门、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锡克人），而且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结在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

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见本卷第 252 页）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印度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马克思说，起义得到极大规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给自己军队保证运输和弹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就已证明了印度农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初起了变化，特别是土著军队的职能有了改变。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度并且占领它一百五十年而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荡，主要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间煽起仇恨。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这个统治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已经完成了领土占领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人民驯服顺从，它不得不依赖它所建立的土著军队，这种军队担负的主要已不是军事职能，而是镇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样，印度人民的驯服就取决于土著军队的忠诚了。但是，印度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见本卷第 251 页）。马克思正是以此说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饥饿的、被抢得精光的印度农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马克思指出，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见《印度问题》）。起义具有无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盗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剥削的

残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满。马克思在《印度刑罚的调查》、《印度的捐税》这两篇文章中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税、敲诈勒索以及在征收国税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中是常见的现象。刑罚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财政政策的公认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税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见本卷第 552 页）。

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没收土著公国的土地来强力扩大英国领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见《奥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这种政策引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在起义时期，印度资产阶级也对英国统治有反对情绪，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发行的公债没有获得成功就是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绝大部分领导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这种共同行动并没有出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起义者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没有总的军事指挥，在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对起义有致命影响的是起义者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不及敌人，缺乏作战经验。这一切使起义者的内部组织不稳定，减少了他们在作战中获胜的机会，削弱了士气，使他们的队伍陷于瓦解并且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见《德里的攻占》、《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勒克瑙的解救》、《勒克瑙的攻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斗争的条件很困难，然而起义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特别是在

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和勒克瑙的防守战斗中。他们在防守德里遭到失败以后，明显地显示了民族起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恩格斯写道，不在于正规战，而在于游击战。

在《印度起义》和《攻占勒克瑙的详情》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的”英国殖民军残酷虐杀被战胜的起义者和肆意抢劫夺取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马克思在评价印度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虽然起义并没有使印度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印度人民对殖民奴役制度的仇恨和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起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略微改变了殖民统治的形式和方法，例如，完全撤销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马克思研究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英国的贸易状况》等文章中指出，起义把印度市场封锁了几个月，使英国的出口瘫痪，加剧了英国在1857年夏季发生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起义对英国工商业的活跃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大大增长了。

恩格斯在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山地战的今昔》这篇文章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了军事科学问题。恩格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各种历史事例，在这里发展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是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

在本卷所载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根据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欧洲革命的前景对这种政策作了评价。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阶级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了

危机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进程，确定了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力量的分布、各党和各政府的立场和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他们也密切注意国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新的步骤。

1856年7月间，马克思对1854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涨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一革命是欧洲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复苏的最初征候之一。马克思就西班牙的七月事件写了两篇文章，它们以《西班牙的革命》为题收入本卷，这是马克思在1854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文章的直接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马克思在确定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特点时，特别强调这次革命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认为这次革命已完全失去西班牙以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所固有的王朝性质和军队性质。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一个新的特点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从而改变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分布：一方面是宫廷和军队，另一方面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1856年革命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反映西班牙“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的事实，是西班牙农民热烈支持革命。马克思写道，在1856年的革命中，如果运动的领袖们愿意并且善于利用西班牙农民的力量，西班牙农民就可能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思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几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关于工农联盟的天才原理，认为农民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起重要的作用。

在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中，马克思又一次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背叛人民群众的反革命作用。西班牙资产阶级在1856年革命中的行为，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确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性；西班牙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共和民

主要求，担心君主制被摧毁，唯恐发生内战，在最紧要关头背叛了在反抗反动势力时支援过他们的工人。由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农民运动的孤立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1856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展望革命的前景，分析了主要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内状况，认为在危机时期这些国家中已经有了革命形势的征兆。并且，据他们看来，法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那里危机使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普遍恶化，波拿巴政府也在摇摇欲坠。马克思写道，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和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见本卷第427页）。

在《对波拿巴的谋杀》、《御用军人的统治》、《波拿巴的目前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等文章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几篇关于Crédit Mobilier的文章中，马克思对第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军阀的把持、大规模的政治恐怖、普遍的贪污腐化、盗窃国库、骇人听闻的投机勾当和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转移劳动人民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注意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冒险行径。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提出的那个经典论点，即波拿巴专政是靠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同时与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凶狠、贪婪和无耻的成分保存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投机成了第二帝国的“根本原则”，而政府在政变以后不久建立的公司Crédit Mobilier是波拿巴制度的支柱（见《Crédit Mobilier》、《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Crédit Mobilier和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滥设企业和投机活动被波

拿巴政府广泛利用来满足资产阶级获得巨额利润的企图，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们离开政治斗争，最后，保证波拿巴集团的个人需要。

马克思指出，法国社会所有各阶层对波拿巴制度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他说，“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见本卷第703页），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受到沙皇俄国支持的法国和撒丁必然联合起来反对奥地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在1859年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细研究了英国的国内状况。

在《法国财政状况》、《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等文章中，马克思还相信危机的发展使英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一方面，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迅速增长，旧的执政党趋于瓦解。另一方面，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与拿破仑第三结成联盟，并且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又受到印度起义和中国战争的牵制。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它不可能占据“它在184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也不可能“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见本卷第255、539页）。

马克思探讨了五十年代后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等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就在于“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么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责移交

给托利党，要么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见本卷第659页）。马克思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英国传统的执政党正在继续瓦解。马克思指出这两个旧政党有可能变成一个贵族政党，他认为托利党和辉格党除非把它们的共同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益，它们才能继续存在。同时他也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可能与贵族妥协。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英国两党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发展过程后来使托利和辉格这两个旧贵族政党变成了两个轮流执政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马克思指出，因取得贸易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感到心满意足的英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为了避免对它让步，在五十年代公开与贵族结成了联盟。在《选举的结果》和《英国工厂制度》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争取对英国国家制度进行民主改造了。他写道，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1857年选举中的失败，是英国资产阶级放弃它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对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的明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曼彻斯特工业资产阶级的领袖的失败必然会促进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宣传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推动大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写道，旧贵族政党的瓦解和软弱无力以及资产阶级的缺少革命力量，给帕麦斯顿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政权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说明，这个执政的贵族寡头政治集团的典型代表在对内政策方面反对任何改革，鼓吹殖民扩张，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而英国资产阶级就是想用这种政策来转移无产阶级对国内问题的注意。马克思指出，获得“真正英国大臣”荣誉的帕麦斯顿所以具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是因为他的政策代表了渴望扩大销售市场和加强英国工业和殖民垄断的英国资产阶级的

利益。

在《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这些阐述普鲁士状况的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评了普鲁士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的基础，批评了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的普鲁士宪法。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官僚制度的专横。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怯懦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心里所想的只是高官厚禄。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俄国的文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始终反对沙皇制度，那末，他们对于另外一个俄国，即非官方的俄国，对于在这个国家中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抗的力量，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充分暴露沙皇军事官僚机器的腐朽性的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民骚动急剧增长的影响下，对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表现了愈益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前景还相当遥远，那末这时他们得出了俄国革命正日趋成熟的明确结论。

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八五八年的欧洲》、《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俄国看作孕育着反农奴制的人民革命的国家，他们指出，俄国人民群众的运动正在威胁着专制制度，农民起义可能成为“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见本卷第725页）。马克思在研究1858年下半年的欧洲国际形势时，认为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运动的潜在的同盟军。他写道，这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还“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见本卷第539—540

页)。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欧洲各国政治运动有重新兴起的征兆，他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活跃，这就是农民准备摆脱农奴依附地位。

马克思在评述 1858 年底欧洲的国际形势时，得出一个意义深刻的结论：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中只可能有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战争。马克思着重指出，正是在目前，欧洲“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见本卷第 703 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末注中已有说明。

除了四篇文章，本卷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根据马克思 1857 年和 1858 年的笔记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来确定。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地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显然是编辑部所做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日期和引文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通讯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和马克思在笔记本中的标题如果不一致，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所加的文章标题，也在

注释中加以说明。如果在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的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异文都放在当页脚注中。

第十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1月至1860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1859年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一些征兆，预示革命高潮即将来临；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工人阶级面临着新的革命前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1857—1858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1859年。

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迎接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经济学问题，恩格斯则继续钻研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紧张地写作政论文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论文，而且还继续从事自1857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马克思就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确定了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研究了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年中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根据大量文献和资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领域的资料更详尽地阐明了许多经济学问题。在完成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马克思就于1857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们搜集到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总结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工作，表述了许多重要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有所发展。1857—1858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已经大体上制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原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一部分原始材料是马克思打算在写作那部经济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1859年1月脱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出版。

本卷的第一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是马克思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明确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见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理论，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问题。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以

及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前面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下了经典性的定义。用列宁的话来说，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7页）。

马克思把经济领域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来，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认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马克思就指出了以科学态度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阐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另一种比较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见本卷第8—9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未来

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摆脱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研究他在该书中阐明的经济学问题，分析商品、劳动、价值、货币。他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展到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上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价值是永恒的自然范畴，相反地，马克思证明了商品和价值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马克思分析了商品，认为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它在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克思把商品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其中包含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首先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反映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矛盾。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时，进一步阐明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明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个发现是阐明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价值的交换中只看到物的交换，而马克思则在这种交换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限于问题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规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详尽地阐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评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

的抽象劳动；他从理论上论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马克思依据他的价值理论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理论出发，对货币问题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在经济科学中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作用，科学地确定并阐明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属货币和纸币流通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货币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所创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理论，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马克思以他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地、全面地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马克思计划写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分册出版以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在这一册中他打算阐述资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对自己最初的写作计划作了很大的改变，决定暂时不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而对许多他认为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的问题继续作了研究。马克思的新的想法在《资本论》（该书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中得到了体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中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是必要的。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研究上的更加连贯和完整，而且是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只作了初步阐述

的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学说的个别原理，需要在《资本论》中加以进一步发展（例如关于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学说，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原理等）。同时，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详细探讨过的某些原理，在《资本论》中可以只作比较简略的阐述。所以，在《资本论》出版以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没有失去其独立的科学意义，而且有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一个卓越的地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商品分析史、价值理论史和流通手段学说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讨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文献中一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最优秀的专题学术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篇幅，这就是他们在当时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那时他们继续为该报撰稿）和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以单行本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萨瓦、尼斯与莱茵》。革命政论的写作在这个时期仍旧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欧洲政治局势日益尖锐，新的革命事件已经成熟。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意大利反对专制奥地利和国内反动派（它们妨碍国内政治上分裂状态的消除，阻碍国家的民族统一）的压迫的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国内外日益加强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各国革命民主力量的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切看作是预示欧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孕育着国际关系新危机和新战争的国际冲突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各种事件时，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

级都必须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必须解决在1848—1849年未能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象德国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这样一些任务，以便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这篇文章中清楚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明确必须通过群众革命斗争来达到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的各次人民骚动，他特别注意意大利民族运动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反对统治集团的政策“民族派”；当时意大利的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利益，为了在皮蒙特霸权下统一意大利，曾力图利用国内的局势。马克思认为，统治集团请求外国“援助”，同谋求私利的路易·波拿巴结成同盟，这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是一种威胁。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人民起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见本卷第184页）。

在《欧洲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统治集团企图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8页）。同时，他们推测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广泛开展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的革命战争。

尽管战争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预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

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向《论坛报》的读者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及其仆从们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真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文章中，恩格斯从战略观点分析了未来战场的特点和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大体上预言了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发表政论性言论的机会和对社会舆论起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只在《论坛报》上撰稿显然不能达到这些目的。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因为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直接联系欧洲大陆读者群众的方法。1859年3月，马克思同意给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该报编辑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谈判没有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立场。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资产

阶级读者阅读的，因此他把军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的中心思想是根据无产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意大利和德国，这本小册子也证明了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论”侵占莱茵河左岸的野心，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经常被用来为侵略政策辩护。恩格斯坚决反对德国资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当时宣扬的沙文主义思想，即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其他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的统治。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建立以容克地主的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具有反革命的性质。恩格斯热烈地主张把伦巴第和威尼斯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让意大利独立，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对德国有利的。“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见本卷第 281 页）

由于有必要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关报，把它作为党宣传革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它为核心团结和组织在反动时期彼此失去联系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马克思在 1859 年 5 月初召集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战友——李卜克内西、普芬德、罗赫纳等人开了一次会，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马克思就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答应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为该报提供他在《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向该报提建议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马克思希望在关键时刻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的机关报。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第 6 号正式声明马克

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不久，马克思便担任该报的编辑，实际上也是该报的行政负责人。

虽然《人民报》在1859年8月20日出版了第16号以后就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的宣传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宣传了许多重要的革命理论原理。该报转载了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8月《人民报》有两号连续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恩格斯在这篇评论中阐明了马克思由于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现而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落后性作了鲜明的阐述，他用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反驳那些庸俗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评论的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报》捍卫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声援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特别是详细地阐述了1859年7月爆发的著名的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政治评论》一文中论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弃有组织的斗争，这只会加深“劳资之间本来就深深的鸿沟”，只会加深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保证的阶级仇恨（见本卷第5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比在《论坛报》上可以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论坛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妨碍他们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结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内

政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阐述无产阶级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派，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1859年4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始以前所发表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发动的，他们想用轻易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他们想获得声望，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等口号来投机取巧，他们利用这个口号，想靠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来使法国的版图完整并巩固他们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这场战争比作1849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教皇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马克思指出，对

路易-拿破仑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致”(见本卷第541页)。其实,拿破仑第三的真正目的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热烈地同情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想在国内为反革命的王朝卖力,但是意大利有力量通过革命民主的道路实现国家的统一。马克思赞同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那篇揭穿路易-拿破仑骗人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译文(见本卷第406—41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志愿部队反抗奥军的行动看作是人民反抗外国统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见本卷第413页)。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第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革命的统帅。

在《战争》、《会战终于发生了!》、《军事行动的经过》、《军事事件》、《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章中,恩格斯从军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军事历史性的简评,是对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恩格斯作为军事问题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1859年的军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他多次研究了军事学术史方面的问题并且作出了深刻的军事理论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的变化,这是因为掩护国界的营垒和要塞的构筑技术及其体系有了发展,运输业随着铁路和轮船航线

的开辟有了很大的改进。从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军事评论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要塞战、要塞和野战军相互配合的问题以及山地战的特点等等。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部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军队及其领导人时，揭示了武装力量的编制、战略和战术是由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了奥地利军事制度的保守主义，这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在经济上落后，国内还保存半封建制度。恩格斯对奥地利士兵的勇敢精神给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严厉地抨击了奥军指挥部的重大错误和失策，指出了由于宫廷权奸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干预战争进程而造成的悲惨后果。例如，谈到权奸的走卒，奥军总司令居莱时，恩格斯写道，他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愤”（见本卷第433页）。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对法军指挥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恩格斯指出，法军指挥部没有远大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不会利用敌人的失策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良机。恩格斯认为，波拿巴法国的作战方法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两面三刀的反动政治战略和他的意图，即“进行局部战争”，以免造成严重的军事纠纷并带来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特别是在《人民报》上对第二帝国头目们的对意大利政策的揭露，同时也是对整个波拿巴制度的一次广泛的揭发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读者要深刻地憎恨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专政，这个专政是建立在警察恐怖、大量的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波拿巴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是革命运

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扼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回击民主主义者当中尤其是德国流亡者当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正是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密切注视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言论，开始收集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拿破仑第三的雇佣走狗的材料。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于1860年写成了抨击性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马克思在《入侵！》、《法国在裁军》、《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等文章中指出，第二帝国的头目们所执行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一切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也痛斥欧洲一些反动势力在策划意大利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外交上支持法国。马克思特别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帕麦斯顿相勾结的反革命性质，由于这种勾结，拿破仑第三才能放手去进行意大利冒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1859年3月波拿巴法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协定也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问题同德国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马克思为《人民报》和《论坛报》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无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或者波拿巴在欧洲的霸权都妨碍德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将使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将使欧洲的反人民的制度彻底崩溃，将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中欧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的斗争。在德国，这种形势将使主张通过革命民主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人获得优势，这条道路就是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并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

志共和国。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德意志联邦的各邦都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并且谴责那些“中立”分子。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谴责了普鲁士统治集团以及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战争的态度。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以及那组没有写完的文章《Quid pro Quo》中，马克思痛斥普鲁士宣布的“调停国”这种中立政策是直接为波拿巴主义充当帮凶。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统治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之所以采取可鄙的、胆怯的投机取巧手法，对路易-拿破仑和俄国沙皇阿谀逢迎，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德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他们想削弱在争夺德国霸权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马克思指出，普鲁士采取投机取巧的手法，避免参加战争，是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见本卷第510页）。普鲁士容克地主想在自己的霸权下统一德国，这就是普鲁士政策的基础。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谓哥达党的代表人物，早在1850年在普鲁士倡议召开爱尔福特议会时就企图使德国普鲁士化——是这个反革命计划的热烈拥护者。马克思指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证实它已经抛弃了任何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传统，已经向反动派屈膝投降。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最反动的势力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以歪曲的形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特别是国家的民族统一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见本卷第4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论战中，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拉萨尔在《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

本小册子中为普鲁士的中立辩护，他实质上赞同亲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见；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受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的拉萨尔的立场，反映他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拉萨尔在他当时所写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企图从历史上论证他为什么要否定农民和平民大众的革命作用，并号召同贵族君主集团结成同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1—575、581—587页）。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通过革命来摆脱意大利危机，他们强调，这就是加强意大利和德国的人民群众反抗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动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波拿巴主义、反抗支持它的各种反革命势力。针对波拿巴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战争，他们认为必须为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进行反对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革命解放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是依靠奋起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列宁说：“……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象在1848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6—127页）

在马克思的《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等文章中以及在恩格斯的《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指出，维拉弗兰卡和约（它的条款稍后在苏黎世基本上被批准了）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的，这

些目的和解放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拿破仑第三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心想侵占萨瓦和尼斯，后来便吞并了这两个省，他力图让意大利反动势力的主要鼓舞者罗马教皇成为当时策划中的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各公爵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协定，过了若干时候，只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恩典”，皮蒙特统治集团才被允许参加了这项协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一的积极结果，是拿破仑第三的自我揭露，是他冒充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捍卫者这个角色的彻底破产。这个和约签订得很仓卒，这也说明了第二帝国内部不稳定，这个制度已无力经受孕育着革命爆发的长期战争考验。尽管意大利革命者在1859年没有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但是这一年的事变促进了下一年即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依据对军事历史和语言学的分析，驳斥了第二帝国的领土野心。恩格斯从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情况出发，在这里重新考察了早在意大利战争以前就已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在上述两国国内所形成的力量配置情况。他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同以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君主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方针，是战后彻底解决意大利和德国重新恢复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恩格斯也估计了1861年俄国改革前夕的革命局势，把这种局势看作是加速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因素，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看作是欧洲无

产阶级的同盟军。

对英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评述以及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露在本卷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不列颠的贸易》、《工厂工业和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英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许多重要的规律性的作用——生产积聚的加强和生产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资料，指出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见本卷第 557 页）。

马克思列举许多实例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他引用许多事实和数字，证明英国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在日益恶化，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技术设备，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赤贫现象和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切事实，得出了下述结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见本卷第 551 页）

马克思批评了当时英国的工厂立法，这种立法使工厂主可以任意破坏它。他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方面的奴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用自己的理论替统治阶级的任何犯罪行为辩护。

马克思引用的许多材料，特别是英国工厂视察员的那些揭露英国工厂主营私舞弊、关于英国工人受残酷剥削的报告书，后来都被他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英国的贿选活动》等文章中，揭穿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

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见本卷第586页）在《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1859年2月提出的对英国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议，他指出，这个法案的基本目的是要保存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保存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马克思写道：“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的地位。”（见本卷第237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首先是英国奴役和剥削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丑恶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政策，指出英国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所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他特别指出，英国棉织品和棉纱的大量输入破坏了印度的地方工业。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后果时指出，由此造成的巨大开支，以及必须在印度经常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首先给英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新的对华战争》这组文章中，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他们在1859年力图对中国再发动一场象1838—1842年和1856—1858年的鸦片战争那样的掠夺战争。马克思揭穿了英国人的挑衅行为，强调指出，不是中国当局，而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破坏了现有的各项条约，尤其是1858年天津条约的条款，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有权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不管这种侵略的借口是什么。

马克思在揭穿英国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的同时，还揭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它们故意激发“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捏造事实

来为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政策的眼光短浅，他们不了解经济的规律性，他们指责中国政府在国内对英国贸易制造人为的障碍，要求通过掠夺性的军事冒险来清除这些障碍。马克思指出，贸易规模比较狭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在于只允许进行有限的对外交换的那种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马克思表示坚信，无论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他们永远也不能征服中国。

恩格斯有三篇文章——其中两篇的标题是《对摩尔人的战争》，另一篇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论述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8月西班牙在摩洛哥挑起的殖民战争。恩格斯指出了摩洛哥人对西班牙侵略者的顽强反抗。尽管西班牙正规军在军队的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战争进程中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西班牙政府被迫于1860年3月签订了和约。

《附录》部分收入了前面提到过的由马克思同比斯康普为《人民报》合写的题为《报刊述评》的材料，以及该报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式撰稿人的编辑部声明。这个文件说明了马克思为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斗争的历史。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这就是：《欧洲的金 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德国的兵力》、《和平还是战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维也纳要闻》、《意大利战争》、《马志尼宣言》、《索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法国在裁军》、《政治评论》、《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篇是作为

社论发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给它们增补文句,甚至加添整段的文字,竭力把这些文章改成象是在纽约写的。在本版中已把编辑部所作的修改或补充放在有关的注释中。这个时期所写的某些文章保存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德文的,载于《人民报》,另一种是英文的,载于《论坛报》,这也相应地加注说明。

在研究本卷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资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评时所能够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维也纳日报》、《总汇报》、《军事总汇报》和《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同后来经过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各篇文章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资产阶级的进步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和马克思的论战性巨著《福格特先生》。从写作时间(1857年7月至1860年11月)来看,这些著作同编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衔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时期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57—1858年)为已开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高潮,为一系列国家的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准备了基础。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消灭民族压迫、统一政治上分裂的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任务又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反革命力量,欧洲无产阶级就成了革命地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力量。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完成由于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实现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造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步骤。

革命事变的临近以及孕育着大规模军事冲突(如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所表明的)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促使工人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紧工作,准备使国际无产阶级迎接新的阶级搏斗。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的制定,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对无产阶级在各

个不同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上的策略的论证，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的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规律性的揭示，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敌人的猛烈驳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十四卷发表的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捍卫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营垒中的诽谤者和诬蔑者的卓越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这在当时对马克思来说是维持生活的一个来源，而对恩格斯来说则是帮助伟大战友的一种手段）就象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一样，是利用它们作为宣传（往往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合法机会。既然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的，他们也就竭力选择那些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给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美国新百科全书》上的条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这些条目时曾经不断地同百科全书的编辑（查·德纳等）的阶级局限性发生冲突，因为后者要求作者按照虚伪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精神写作，不要表现党派倾向。尽管任意删改作者原文的编辑部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参考性质对革命的政论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仍然善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和体裁的文章中发挥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

给百科全书写得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执笔的，虽然马克思被认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担了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马克思腾出时间去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领袖当时的主要理论任务。许多条目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合作写成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就是直接的合作。

恩格斯所写的条目,主要是有关军事问题的,如《军队》、《步兵》、《骑兵》、《炮兵》、《筑城》、《海军》。恩格斯的这些深刻概括自古以来的战争史、军队的产生和发展史的文章,分析当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的文章,同恩格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产生战争和武装力量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总结性文章完全说明他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军事学术史学家,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恩格斯对许多知识部门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他还“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2页)。列宁把恩格斯称为伟大的军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绩在于他首先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分析当时的军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作是规律性的过程,相反地,恩格斯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马克思读了恩格斯的《军队》一文后,在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页)

恩格斯首先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

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最初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以来的军队的阶级性。恩格斯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古希腊的军队及其方阵战术、古罗马的军队及其较进步的军团制度的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促使社会崩溃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结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军事体系解体，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骑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军队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编成的群众性军队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代替的时期，用革命手段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于军事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别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揭示了这一规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些较短的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都谈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斥了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的军事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布伦海姆》这一条目中,恩格斯分析了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他认为,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原因的那些情况,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可能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257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指出了不同兵种的历史发展是相互制约的。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和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弹药》、《艾雷》),部队的宿营(《露营》、《野营》)等许多问题,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则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视军事技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军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细节在论述各种武器(《弹射器》、《刺刀》、《明火枪》、《马枪》、《卡伦炮》、《爆炸弹》、《霰弹》),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弹工事》)和辅助的技术手段(《军用桥》)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阐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

蒸汽机在海军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军事技术的从属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规模武器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军事的作用的规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规律仅仅归结为军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组成,军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训练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谈到骑兵会战时强调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见本卷第319页)。恩格斯还指出了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预备队的存在,指挥的灵活性,统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评价了卓越的统帅、军事改革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评价中对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认为,杰出的统帅的活动决不取决于他们的任意幻想,而首先取决于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前提;统帅的作用在于善于运用武装力量的客观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进行战争和战斗的方式和方法,并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利用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的军队的组成和战斗素质方面的变化。例如,恩格斯认为拿破仑的功绩就是他把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变为“一套正规的制度”(见本卷第39页)。同时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编纂历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统帅并把他们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统帅的活动都具有本人阶级根源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点。例如,弗里

德里希二世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见本卷第376页）。恩格斯指出，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冒险主义成分，片面决定和失策，如庞大的纵队队形“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见本卷第323页）。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论述军事的短条目使他的长条目的内容得到充实和具体化。其中某些条目如《阿尔马》、《阿斯佩恩》、《比达索阿》、《博罗迪诺》等，分析了个别会战。一部分条目是恩格斯为了解释一系列军事术语和军事技术用语而写的。在恩格斯写的《战局》、《会战》和《攻击》等条目中，包含有关作战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战斗队形和预备队的运用的重要的军事理论结论。其中有许多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许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把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作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作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以及由于军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他在著作中只能对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经验进行总结。恩格斯的某些原理和论断反映了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因

此不能把这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看到，当时许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恩格斯考虑许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才多少涉及到一些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由于恩格斯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他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有时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有不确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诺会战的结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象《巴克莱-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贬低了伟大的俄国统帅米·伊·库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许多发明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历史科学的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军事学术的贡献。

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许多文章都是谈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谴责了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亚非各国人民实行奴役和剥削的掠夺制度，以及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险者的政策。这些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这些国家变成了殖民掠夺的场所。恩格斯写道，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1852年）的结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缅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占领了它的出海口（见本卷第287页）。恩格斯揭露了在阿

富汗的英国派驻官吏的阴谋诡计，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作是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别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谈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见本卷第104页）

恩格斯十分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民，在他写的条目中认为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具有解放性质和广泛规模。他满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险行为的可耻失败，详细地谈到了1840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根据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评价，“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见本卷第78页）给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训，消灭了他们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国境。恩格斯阐述了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统治，他指出，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从1830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军队、花了大量金钱去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法国的制度”（见本卷第109页）。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这两个条目充满了作者对反抗殖民

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挡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条目虽然是供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用的，但是，它们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写成的，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对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们教导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争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愿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还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许多条目，主要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其中许多条目，如《巴克莱-德-托利》、《卜尼格先》、《贝姆》、《波斯凯》、《布吕歇尔》、《贝雷斯福德》等，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库裘》（后一个条目论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传记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评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传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绘历史肖像的巨匠。

在马克思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贝西埃耳》、《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绘了拿破仑法国的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参加1789—1794年革命而后来变成反革命波拿巴政体支柱的法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靠“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见本卷第95页）的革命，而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飞黄腾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成了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

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贝尔纳多特),成了愿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贝尔蒂埃)。马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仑的元帅的传记,清楚地描绘了拿破仑第一帝国的资产阶级上层的习气。

在《毕若》这一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残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仆——的嘴脸,此人以血腥镇压法国工人、用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险而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人物就是领导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镇压巴西和葡萄牙革命运动的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吕歇尔元帅传记是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在传记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统帅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布吕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见本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写的《勃鲁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等条目,都是描述革命活动家的传略的。关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的叙述,说明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同时也高度地评价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约瑟夫·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统帅艺术,他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统帅”(见本卷第134页)。在《玻利瓦尔-伊-庞特》中,马克思指出了人民群众在拉丁美洲各国反

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810—1826)中的作用,并且指出了这次解放斗争的革命性质。但是,马克思由于受到当时流行的有偏见的错误材料的影响,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本人及其活动作了片面的评价。马克思对这位政治家所以采取否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的政论文章主要是反波拿巴的,他们力求揭穿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马克思根据资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也把玻利瓦尔列为拿破仑第一的仿效者。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竭力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马克思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这部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初期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工作,为的是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他们依靠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找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找适应党在情况改变后进行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这个政党应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马克思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这几年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他认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8页）。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但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诽谤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领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的崇高动机。

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拼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谣中伤，同普鲁士警探在1852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是相互呼应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传播了福格特造的谣言。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也广泛地利用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场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本卷第453页）福格特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险性，还在于

这本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间有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间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争取全国革命民主统一的尖锐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别重要。马克思在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9页）。可见，在驳斥福格特的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不仅维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来。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说的都是谎言，揭露了这个处心积虑的捏造者和诽谤者的嘴脸。针对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这部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中，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作了简短的但内容非常充实的介绍。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风》、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说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马克思谈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非组织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指出了这个宗派集团的冒险密谋策略的危害性，并且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以陷害《新莱茵报》编辑的科伦审判案，和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许多法令做例子，揭露了普鲁士警察国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的卑鄙手段。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

这是一部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奠定基础的著作。这本书同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的文章《最近的科伦案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当马克思揭露福格特这个恶毒的诽谤者和居心险恶的人时，也把这个受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民崇敬的英雄的可憎面目揭露无遗。他揭穿了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指出福格特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以及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间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在揭露福格特的时候，马克思巧妙地嘲笑他作为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小资产阶级党团的典型的怯懦而狭隘的领袖之一，作为在革命后期由“残阙”议会搞的那个短命政府（“帝国摄政政府”）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1848—1849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许多章节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证明：诬蔑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本人，多次为反革命的瑞士当局效劳，象警探那样对付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马克思这部充满尖锐讽刺的著作，鞭笞了福格特的世界观，即贯穿在他的自然科学著作中的肤浅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讽刺不仅击中了福格特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德国庸俗唯物主义者整个流派（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的要害。

马克思这部著作的重点是揭露福格特在五十年代就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这本书第八、九、十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庇护人和同谋者》）就是阐述这一问题的。马克思根据福格特在1859年3月，即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前夜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及他的一些口头的和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密切联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证明，福格特的《研究》不过是用德文转述第二帝国官方

报纸《通报》上的文章和巴黎丹屠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正好被他的主子们用来从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使拿破仑第三更容易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按照马克思的精确说法，“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第二帝国的头目们在国外分设的代理机构有联系。福格特扮演着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的角色，他把“法国食槽”放到招募来的人的面前。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讽刺笔触勾画了福格特的“庇护人和同谋者”的嘴脸，其中也有象日内瓦政府首脑詹姆斯·法济这类人物，他直接同拿破仑第三进行勾结，出卖瑞士的民族利益。马克思揭露福格特及其同伙是执行拿破仑第三阴谋诡计的鹰犬，指出福格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民主派人士中间充当执行波拿巴阴谋诡计的工具；同时，马克思提出警告，要防止波拿巴代理人钻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队伍。执政的资产阶级如今正在广泛收买雇用代理人、无耻文人和记者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而马克思抨击波拿巴代理机构的这部作品，在揭露这些手法方面，至今仍是一个典范。

马克思在写这部著作时并不知道的、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证实了他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法国政府在第二帝国崩溃以后公布的关于路易-拿破仑的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福格特在1859年8月从这笔秘密费用中得到了四万法郎。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从揭露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的联系进而广泛地全面地揭露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

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页），当时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帝国在全欧洲都布下了罗网，有一系列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许多国家——撒丁、普鲁士等——的统治阶级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倾向，有意摹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几乎是对自己的许多反对拿破仑第三制度的政论文章作了总结。马克思发挥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曾作过的对于波拿巴主义实质的深刻的分析，指出波拿巴制度的特征是：在各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利益，利用军队中最反动的分子做主要支柱。马克思揭露反革命大资产阶级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进行统治的各种方法，指出第二帝国制度是警察恐怖、投机倒把、军阀和无耻的冒险分子横行的王国，指出这一制度所使用的大量政治手段中包括讹诈、收买、露骨的煽惑、对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采用表面讨好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腐蚀某些社会阶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波拿巴制度的腐朽和脆弱，同时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已经走上绝路，第二帝国的统治集团想利用对奥地利发动“局部”战争来寻找出路。同福格特和其他波拿巴主义宣传者的一切论断相反，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使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团伪善地用这面旗帜掩饰他们作战的目的，实际上是想用廉价买得的胜利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侵占意大利的土地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并阻挠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彻底揭穿了波拿巴集团玩弄的声名

狼藉的“民族原则”这一骗人把戏的实质。路易·波拿巴冒充“民族的保卫者”，用民族利益进行投机，想把民族运动引上反革命的轨道并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和扩大它的疆界。事实上，路易·波拿巴对意大利的政策已经表明，第二帝国是真正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马克思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领袖听信了波拿巴的欺骗宣传，是对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利益的严重威胁。

马克思也痛斥了对世界政治有影响的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别是，他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代表帕麦斯顿的勾结，后者帮助拿破仑第三放手进行对意大利的冒险。马克思也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同样目的所签订的协议。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有关揭露波拿巴主义的篇章，是对付反动势力任何企图恢复和利用已遭历史谴责的波拿巴主义传统、波拿巴主义政治反人民的各种手段的犀利战斗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的抨击，同他们主张用革命民主方法解决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的斗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权，妨碍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妨碍在国内实施必要的革命民主改革。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福格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亲波拿巴的立场。马克思还指出，这种立场同受到自由资产阶级支持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所执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一致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一心想削弱奥地利，通过容克普鲁士领导下的王朝道路来统一德国。马克思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抨击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言论，也是对向普鲁士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方面摇摆的“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答复。拉萨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实质上是为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政策进行辩护，并对普鲁士主

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统一德国的王朝道路表示支持。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94页）。马克思在书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拉萨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同拉萨尔的反无产阶级观点相对立的计划，这就是通过人民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度的途径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拉萨尔指望普鲁士胜利而不相信德国的革命民主力量，针对拉萨尔的策略，马克思“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0页）。

马克思驳斥了福格特的准波拿巴主义对外政策的观念，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第八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里，用了大量篇幅揭示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这样才能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和掠夺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积极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即争取完全实现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中，也正是从这种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阐明各种国际问题的。他坚决谴责掠夺和吞并的政策，揭露统治阶级外交所采用的恫吓和讹诈、粗暴地干涉小国内政、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的手法。

在《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中（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性质：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宣扬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传播和制造关于革命运动活动家的谣言。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指出波拿巴派报刊卖身投靠，毫无原则

和卑鄙下流；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见本卷第 619 页）。马克思也揭露了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认为英国“自由派的”报刊《每日电讯》是集社会脏物之大成的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见本卷第 656 页），他指出对于这家典型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估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许多其他报刊。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下流作风，并刻画了那些下流文人、老奸巨猾的政客和支配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狡猾的企业主的嘴脸。这一切构成了《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有力的十分尖锐准确的揭露面之一。

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揭露，马克思把这些人划为庸俗民主派（见马克思 1860 年 1 月 28 日和 2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说，他所以要驳斥福格特的原因之一，就是用这种方法才能把福格特所属的整个政治流派都揭穿。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就是德国的庸俗民主派。马克思认为必须驳斥庸俗民主派，因为当时特别重要的是捍卫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使它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德国民主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右转的趋势。从 1848—1849 年革命时起，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人物中有许多当时实质上已经干着叛卖的勾当）经历着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民主派以及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相当大一部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附属物。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象福格特一样充当波拿巴集团和德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应声虫。马克思过去同恩格斯在一起揭露过德国小资产阶级许多领袖们的庸俗民主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中《流亡中的大人物》），现在认为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再进行一次严厉的批判是自己对党的责任。马克思看得很清楚，在

诽谤家福格特的背后，除自由派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庸俗民主主义者。

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泰霍夫的信》、《附录》）里，马克思以非常幽默的笔触嘲笑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嘲笑了这些德国小市民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的狭隘、鄙陋、庸俗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谈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戈克、卢格等人的“革命公债”的投机冒险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那种离不开无谓的琐碎争吵的冒牌革命活动，实质上正好迎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味。

《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部著作可以列入世界讽刺文学的优秀典范。这部著作所引用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文艺作品中的警句和艺术形象，使马克思对福格特以及其他工人运动敌人的批判更加尖锐和准确。《福格特先生》证明了马克思在文艺方面的高深造诣。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部著作：“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9页）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是充满了党性和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的作品。这就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们为什么要那样贬低这部著作的主要原因。《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所以有巨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波拿巴主义以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各种言论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热烈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和坚决回击共产主义的凶恶敌人的典范。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四十二个条目以及马克思针对福格特的诽谤而写的四篇声明。这些条目中，《军用桥》以及《阿尔及利亚》这一条目的片断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而这几篇声明曾作为附录收入1936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其余各条目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第一版所刊载的《奥斯特利茨》是他人写的，《奥热罗》和《巴达霍斯》这两个条目也没有充分根据证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因此本版都没有收入。1940年的《军事历史杂志》第11期上刊载的《武器》这一条目，由于不能确证是恩格斯写的，也不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条目，除了总论性的条目《军队》排在卷首，都按写作日期顺序排列，而不是象百科全书上那样按标题字母的顺序排列。本版已把《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对恩格斯的某些条目所做的增补放在有关的注释中。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百科全书的条目原文，在个别场合下也附有增补的段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援引的非德文的文献，也同全文一样以俄译文刊印，原文在脚注中注出。如马克思引用文献时既用德文又用原文，原文则予以保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各个条目中和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印错了的人地名、日期和引文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 and 实际材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关于会战和条约，重复出现时不再加注，有关的页码在地名索引中注明。

第十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跃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它代替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在欧洲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到六十年代初，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的迹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解决的德国和意大利，重新展开了民族统一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在波拿巴法国，革命风潮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政治形势的活跃，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无产阶级运动脱离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1857—1858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罢工斗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看到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运动，愈来愈坚决地力求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他们的群众性的斗争，特别是他们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的大会，都证明这一点。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坚决地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德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力求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1863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在进步刊物上就国际生活的一切基本问题发表言论，不懈地宣

传革命的科学的 worldview,教育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促进国际团结精神。由于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增多和加强,终于在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在1860—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本卷中很多文章就是阐述这些问题的。论述美国内战这一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策略,是由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基本客观任务决定的。这就是完成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主张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革命的统一,主张尽快采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并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是欧洲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障碍,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国家中的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危机的成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扩大和加强自己与许多国家的革命家的联系,而且还给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有效的实际援助。他们在进步刊物上进行反对干涉美国的积极斗争,把反对美国黑奴制度的斗争看作是欧洲和美洲工人阶级的切身的事业。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的阵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各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且加紧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了继续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击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诽谤性攻击和恐怖手段,马克思于1861年在报刊上组织了一次争取释放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广泛运动。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许多步骤给波兰起义以实

际援助，同时还开展广泛的运动抗议欧洲列强支持俄国沙皇政府镇压这次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针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与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得到某些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为了训练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非常重视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打算在这一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详尽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61年，马克思着手撰写巨大篇幅的经济学手稿，这是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初稿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恩格斯在1860—1864年间继续深入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明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目的，对于揭示武装斗争的规律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六十年代初民主运动活跃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政论活动具有特别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时必须更加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对社会舆论起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影响，为了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利用了一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手段，包括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除了继续为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年10月开始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流行的德文报纸之一。在这几年中，恩格斯也为英国的《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德国的《军事总汇报》撰稿。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问题的政论文章占了很大篇幅。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消灭这两国的封建关系残余和变意大利为独立的国家。进步力量争取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斗争，遭到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反抗，也遭到支持它们的欧洲强国政府首先是沙皇俄国、波拿巴法国和英国的政府的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力图使这两国的民族保持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坚持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全民运动才能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才能使皮蒙特保皇势力的王朝阴谋破产。他们指出，只有把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消灭干净，才能为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写道，德国“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见本卷第195页）。

马克思在《普鲁士备战》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士的腐朽的反动制度、它的反民主的制度以及容克地主和军阀的横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密切注意德国的活跃的政治生活和蓬勃兴起的民主力量。1860年初，马克思在《柏林的情绪》一文中指出普鲁士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这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坚持通过革命来统一德国，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尖锐地批判了主张在普鲁士王朝领导下统一德国的那些普鲁士自由派的政治纲领。马克思嘲笑普鲁士自由派幻想“新时代”随着威廉亲王的摄政而到来，他指出，反动势力的阵地因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奸党投降而巩固了。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法国的政策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之一。他揭露了第二帝国所采取的笼络手段，为了使莱茵河左岸归并于法国，第二帝国向德国北部各邦许愿，保证支持由普鲁士来领导德

国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赞同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对法国作战，认为这场战争会加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发展。

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考察了由内部矛盾造成的奥地利帝国的瓦解过程，叙述了奥地利帝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并且说明了奥地利政府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向匈牙利民族运动作出某些让步。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注意意大利人民在六十年代反对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本卷中有不少文章论述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革命的方法统一意大利。他们认为，从无产阶级和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非常关心团结意大利真正爱国者的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欢庆加里波第的军队的每一个成就。恩格斯有几篇文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加里波第的进军》）就是专门阐述加里波第的军队的英勇斗争的。恩格斯对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对坚决维护意大利人民利益的加里波第的军队的战斗精神、自我牺牲和勇敢无畏，作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加里波第是卓越的勇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

为了揭露意大利革命的内外敌人的阴谋，马克思在《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等文章中，痛斥背着加里波第与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所奉行的反人民政策。他指出，卡富尔强迫意大利人民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只会使意大利人民陷入新的奴役，使意大利受制于波拿巴法国。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的国内状况，认为俄国

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他在《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阐明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对当时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态度，同时着重指出沙皇政府为了同地主妥协准备牺牲被压迫阶级——农民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欧洲各国经济生活的深刻研究分析了国际形势。马克思评述法国的经济状况（《法国的状况》、《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法国的财政状况》），揭示法国的农业和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他指出，尽管拿破仑第三政府许下了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骗人诺言，波拿巴制度还是把国家财政和经济弄得一团糟。

马克思分析英国的工业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揭示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及其子女的情景。他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中描述了非人的劳动条件。他写道，在英国这个机器和蒸汽的国家里，还有些工业部门全部保存着手工劳动。这首先是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人干活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见本卷第58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民族解放运动，密切注视波兰人民的斗争。他们认为，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是摧毁沙皇制度这个当时欧洲的反动堡垒的基本前提，也是通过民主方法统一德国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为1863—1864年波兰起义而写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阐明了波兰问题对德国命运的意义，指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职责就是努力促进波兰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全部活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美洲大陆各国首先是美国的经济、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本卷中有一

大组论文论述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 1861—1865 年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在他们的著作中第一次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关的问题，并且指明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曾刊登在 1861—1862 年的《新闻报》上。在《美国问题在英国》、《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等论文中，马克思根据对美国资料和文献的研究，全面探讨了内战发生的原因，剖析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动力。他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使它具体化了。马克思用大量的具体历史材料说明，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场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见本卷第 32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北部和南部战争的真正原因，认为这次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在文章中阐明了美国种植场奴隶制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说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和剥削方法还保留的情况下这种制度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紧密的联系。马克思表明，尽管北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的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希望保留奴隶制，但奴隶制的继续保存与北部各州的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不能相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 2 000 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 30 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

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见本卷第 356 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时，是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运动的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景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如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揭开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一样，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纪元，因此，美国革命战争可以促进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问题的论文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之一，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黑奴制的斗争看作是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他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的存在阻碍美国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他们认为，只要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的奴隶制烙印，白人的劳动也不可能自由，因为，一部分劳动者同另一部分劳动者对立，美国资产阶级就能使美国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瘫痪。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又指出，在美国南部保存黑奴制，成了加强剥削北部“自由”工人的理由，而奴隶主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如果他们对整个联邦建立了统治，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贬低到无权奴隶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奴隶主寡头集团极端仇视美国的工人运动，他写道，就在这一时期，奴隶制的思想家“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见本卷第 363 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解决奴隶制问题同自由垦殖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地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

要求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美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一切希望彻底消灭奴隶制的进步力量。他们通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发表言论，努力帮助北部革命民主力量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

马克思指出，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性质，在论述美国内战的头几篇文章中他已经指出，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北部各州必将胜利。同时，他无情地揭露了领导反奴隶制的联合但迟迟不敢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北美资产阶级的懦弱政策。马克思在《弗里芒特的免职》、《评美国局势》等文章中央锐地批评北方政府，因为它害怕使战争成为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的斗争。马克思在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北部的作战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能采取的方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7页）。马克思认为北部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力求在与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只有革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各州的胜利。

关于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他们特别重视北部和西北部各州，重视这些地方的坚决反对对奴隶制的工人和农民。马克思认为，战争进程中发生必然的转折，是由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被奴役的黑人群众的斗争，认为在与南部奴隶主的斗争中他们是北部的天然同盟者。早在186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美国的奴隶运动是世界上最

大的事件之一。马克思特别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不让黑人有加入北军与奴隶主作战的权利。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2页）恩格斯说，更坚决的作战方法还会使南部的白种贫民行动起来，这些人是破产的、备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仇视奴隶主寡头，但是还受着种族偏见的影响。

马克思在1862年写的许多文章中，指出了执政的共和党在主张立即消灭奴隶制的力量日益增强和团结的影响下逐渐分化的过程（《美国废奴派的示威》、《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第一次收入全集的文章《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明显地阐述了共和党内部的变化，该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在解放奴隶问题上采取较为坚决的立场。马克思根据对各州投票结果的分析，说明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失败首先是由于西北部农民对旧的作战方法不满。马克思在总结战争的第一阶段时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在第一次收入全集的《北美事件》一文中，热烈欢迎林肯关于解放属于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的宣言。这一文件“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标志着向战争新阶段即用革命方法作战的过渡。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评定了林肯这个来自人民的平民。马克思指出，在林肯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姿态、漂亮的词句和虚假的激情。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林肯的某些法令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并常常批判林肯的动摇和犹豫。尽管如此，马克思对林肯的活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见本卷第586页）。

在论述美国内战的最后几篇文章（《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中，马克思根据对阶级

力量的对比和交战双方的能力的深刻分析，指明各蓄奴州物质后备和人员后备不足，离心力量增长，因而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马克思认为北部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了美国资产阶级纲领的温和性，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保存奴隶占有制残余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马克思在《北部各州选举结果》一文中写道，纽约市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见本卷第600页），正是这个城市在美国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成为力求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柱，这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对于理解美国事件的以后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国黑奴制虽然消灭，北部各州虽然取得胜利，但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却保存下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美国内战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阐述战争进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美国内战》和《美国战场的形势》等文章中，揭示了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这条对于军事科学十分重要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北军总司令麦克累伦提出的军事战略计划（“大蛇”计划），认为这是一个与革命战争性质背道而驰、在军事方面漏洞百出的计划。针对这一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这是在考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集中力量给敌人心脏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规定首先占领乔治亚州，这样南部同盟的领土将被切成两部分（见本卷第521—52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清除北部军队中同情南军的反动军官是一项首要的军事措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1年和1862年指出的革命措施在内战第二阶段的实行，保证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变和北部的最后胜利。

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阐述了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对欧美各国内部状况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资产阶级外交的阴谋，揭露统治阶级对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美国军舰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爆发可能的时候，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英国执政寡头的对外政策，这些寡头们不顾英国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在马克思的《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等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欧洲大陆上的应声虫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论据，都是荒诞的、虚假的。关于英美冲突的文章，对于培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文章也教导了无产阶级怎样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积极影响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们高度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干涉斗争。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虽然英国工人阶级处在卖身投靠的帕麦斯顿报纸所散布的沙文主义的乌烟瘴气中，但始终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马克思指出，即使是由于南部各州被封锁而停止输送棉花，从而引起英国工人阶级物质上的极大的困苦，也没有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马克思在评述英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立场时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见本卷第 615 页）

马克思在《英国工人的贫困》、《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两篇文章中，描绘了由于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工厂关门而流落街头的失业的郎卡郡织工的惊人的贫困。马克思指出，“棉荒”对英国工厂主有利，因为它帮助他们出清生产过剩时期积存的货物，同时，马克思揭露了统治阶级企图把英国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仅仅是受了美国内战影响，并且痛斥资产阶级的一套可怜的慈善设施，这种设施只能使工人及其家庭饥饿而死。马克思愤怒地写到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之间的“不寻常的吵闹”，指出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见本卷第 57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从宪章运动低落时起一直处在工联主义强烈影响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觉醒。除了工人阶级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反干涉斗争，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英国人民声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对外冒险的示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关于英法西三国干涉墨西哥的一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论述了国际关系和欧洲列强殖民主义政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各种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参加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揭穿了这次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马克思把对墨西哥的干涉称为“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见本卷第 386 页）。马克思强调，干涉者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对付当时已为全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马克思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结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重新挑起已经平息的内战，而且情况必然如此。马克思的文章充满着对墨西哥人民及其解放斗争的深刻同情，他严厉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地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论述干涉

墨西哥的各篇文章，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反对较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奴役经济落后的附属国。

马克思还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英法西三国的干涉所造成的另一种危险。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武装的最高法庭”对美洲国家内政的干涉，是帕麦斯顿和波拿巴为了挑起同美国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一种“下策”。在《墨西哥的混乱》、《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英国统治集团想利用墨西哥的事件作为借口，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英国和法国站在南部各蓄奴州方面干涉美国内战的进攻基地。

马克思揭露了参加墨西哥远征的拿破仑第三的冒险阴谋，认为他想利用对外冒险来保存第二帝国反动的波拿巴制度，想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获取某些领土。此外，马克思指出，策动拿破仑第三对墨西哥冒险，是第二帝国金融界的直接需要，冒险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马克思特别指出了英国这个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发起者的反动作用，揭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外交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英国统治集团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看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很久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反动作用显然加强了。英国到十九世纪中叶变成了“世界工厂”，它力求保持自己的工业垄断和殖民垄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统治阶级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的所有反动运动的堡垒。

马克思揭露了欧洲列强——英国、俄国、法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严厉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这些国家中所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马克思用数字和事实表明：1860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侵

略战争，同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背着本国人民干的，是具有掠夺性质的。

本卷中还有一系列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总结美国内战的经验而写的。恩格斯在发展关于战争的学说时，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阐明了精神因素在军事行动中的意义。恩格斯密切注视军事技术的发展，认为美国内战在这方面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指出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认为军备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本卷中有一些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是他在1857—1860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的重要补充，这些条目已收入本版第十四卷。在《步枪史》、《论线膛炮》、《法国轻步兵》等条目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各种武器的改进过程，各个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发表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的一组文章，深刻分析并批评了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事训练的组织和制度。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专门论述了志愿兵部队阶级成分的问题。恩格斯未写完的手稿《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戳破了英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所制造的关于英军无往不胜、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大建奇功的神话。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利用了许多俄国材料，对俄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英勇抵抗作了应有的评价。

本卷中恩格斯的军事历史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的重要文献。这些著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科学地论述军事学术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五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法国的状况》、《柏林的情绪》、《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不列

颠的贸易》、《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富尔德先生》、《美国近况》、《铁路统计资料》、《英国记事》、《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以及马克思的《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一文的第二部分和《附录》中的一些文件，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根据发表他们文章的某些报纸的编辑部的特殊记号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来确定。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以及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原始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通讯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9月至1870年7月，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至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著作。

由于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活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革命高潮的逼近，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广泛展开革命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训练国际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为完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经济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也进行了不倦的、非常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他的全部党和政治的活动的顶峰”。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国际的活动，经常协助马克思领导这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他的理论工作的课题是研究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和军事问题，探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从1869年起，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爱尔兰的历史，为的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对当时非常尖锐并具有政治意义的爱尔兰问题的国际主义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的活动是科学共产主义所特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相结合、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多方面的科学活动 and 政治活动。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国际

中的活动，同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本卷有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见本版第23—26卷）的材料。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以后，间隔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所写的大量手稿，是他准备写的著作各个部分的最初的系统纲要，诚然这只是草稿，并且还没有完成。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以他所固有的高度的科学责任心不断吸收了新的材料，使这一科学著作的布局 and 结构更加严密完整，添写了一些章节，并对已写成的章节一再进行修改。

1863—1865年，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的三卷新稿本。1866年1月，马克思着手《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的最后准备工作，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洗净这孩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1页）。《资本论》的写作耗费了马克思的大量精力，与此同时，他还得用很多时间从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还要克服贫困和疾病的折磨。1867年4月，马克思把准备好的第一卷手稿带给汉堡的一位出版商。同年8月16日最后一个印张签字付印。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见本卷第263页）

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奠定基础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资本论》中表述得最完备、最严整、最经典。

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了根本的变革、真正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摆脱了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和

自私偏见的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规律，并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科学共产主义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这一不朽的创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中的强大和不可摧毁的理论武器。

收入本卷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有一些是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的：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以及他为《资本论》的出版而写的书评等等。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两年，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扼要地和通俗地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说的原理。同时这部著作也是利用革命理论的结论来确定工人运动的实践任务的卓越典范。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直接针对国际会员韦斯顿的错误观点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所作的一篇报告，同时它也打击了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根据拉萨尔关于工资的“铁的规律”的教条，否定工人的经济斗争，否定工会。马克思在报告里坚决驳斥了这种要无产者在剥削他们的资本面前消极和温顺的反动说教。他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经济实质，证明资本贪求最大限度的暴利，如果工人对它不进行反抗，“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见本卷第168页）。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根据自己的经济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并且指出，必须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工资、价格和利润》这部著作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把工资、劳动力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即降低到等于维持工人和他的家庭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是注定的和连续不断的，它不断遭到工人的抵抗和坚决反对。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工业周期的不同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时强时弱。

本卷发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给工人报刊、民主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写的许多书评，这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界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蓄意保持的沉默，同时也是为了在群众中普及这一著作。恩格斯给资产阶级报刊撰写匿名书评，“从资产阶级观点”评论这本书，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这种“作战方法”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恩格斯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写到第十三节《机器和大工业》（第一版是第四章第四节）为止。这篇著作有助于了解《资本论》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揭露了拉萨尔派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庸俗化。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资本论》中的个别原理，歪曲这些原理，不提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为了贬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这部伟大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后来一再企图把《资本论》的这些或那些原理说成是马克思的前辈或同代人原来已经有的。

本卷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反映他们在国际中的活动的文章和文件。

六十年代中的历史形势，有利于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和战斗团结这个伟大思想。1857—1858年

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随之而展开的欧洲各国的罢工斗争，使工人清楚地懂得，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的各民族队伍必须兄弟般地团结起来。随着经济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也提高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法兰西第二帝国危机的逼近，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统治阶级准备干涉美国援助奴隶制的南部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在英国的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欧洲无产阶级深切同情的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所有这一切有助于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使各国无产者要求一致行动的愿望日益迫切。

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取得成就，不仅仅是由于当时所形成的历史形势，而且也由于马克思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上成立了国际；恩格斯说，在出席大会的人们当中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98 页）。

马克思是国际的真正组织者、领袖和灵魂。他起草了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它的许多呼吁书、声明、决议、报告和其他文件，这都是国际的光荣历史的重要记录。马克思是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司令部的实际领导人。马克思依靠恩格斯的帮助，亲自或通过自己的战友（当情况不允许他亲自出席时）来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工作，制定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为争取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中的胜利而进行斗争。

在创建国际的时候，马克思不得不考虑到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同条件、各个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理论水平。他认为国际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人运动的各个支流纳入同一的轨

道，促使无产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确立国际无产阶级各个队伍的行动一致。马克思把国际建立在当时的各种工人组织的广泛基础上，他根据工人群众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逐步把他们导向统一的理论纲领，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当马克思制定国际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时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灵活而又彻底革命的策略。马克思在制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时曾遇到了一些困难。关于这一点，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根据对经济发展以及对1848年至1864年工人群众状况的变化的具体分析，得出非常重要的理论结论：“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见本卷第10页）

马克思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两项重大胜利：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开展了合作运动。但他认为，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生产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时，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但是，享有政权的统治阶级总要阻碍它的实现。“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接着，马克思论证了这样的思想：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及各国工人之间的兄弟般联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

这样，马克思依靠工人群众的实际经验，引导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从理论上作了

论证。

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提出了这样的原理，按列宁的话说，这一原理是国际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本卷第15页）在已成为全世界工人的战斗口号的这个十分简要的提法中，表达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它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条件。

在制定《临时章程》时，马克思也仔细地考虑了各国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形式。国际并不排斥当时已经存在的工人组织，而是极力依靠它们，并将它们的活动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国际的这种灵活的组织结构，是符合于它的任务的：“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4页）。

马克思为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是对国际第一批纲领性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在这篇《指示》中只谈到同工人群众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一些问题，并把这些同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这里遵循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基本的策略原则：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在《指示》中指出，国际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

同样，马克思所写的呼吁书和文章，如《警告》、《比利时的屠杀》、《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以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也都说明马克思坚决主张国际应该援助1866年危机以来特别加剧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并认为在这种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团

结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和《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也用了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国际这方面的活动。国际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罢工工人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的经常支持，提高了它的威信，并扩大了它在各国工人中的影响。

《指示》特别重视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恢复体力、发展智力、以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重要的要求，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人，他在后来写的一系列文件中也解释了这项要求的意义（见《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和《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本卷第359、643页）。《指示》中提出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

马克思认为，关怀儿童和少年的劳动保护以及工人子女的教育也是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见本卷第217页）。马克思认为，把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和他们的智育、体育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协调地结合起来，是使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获得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的发言也谈到了教育问题（见本卷第654—656页）。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在《指示》中关于合作劳动的一节里证明，合作运动本身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见本卷第219页）。

《指示》中关于工会，关于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节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发展了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以及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进一步发展的原理，他认为，工会不仅是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是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中心。列宁在谈到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指示》而通过的有关工会和经济斗争的决议时写道：“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肉之中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53、154页）

为了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不主张政治斗争的人，《指示》提出了两项具体任务：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反对掠夺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

马克思所写的《指示》是根据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而制定的国际的具体行动纲领。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必须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则，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派别，这些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国际工人协会。尽管1848—1849年的革命给了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人们忘记了革命年代的传统，工人运动又吸收了新的群众，再加上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断影响（特别是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中）——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各色各样的派别暂时活跃起来。随着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派别愈来愈反动。

本卷中有一些文章和文件，是专门反对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很大影响的蒲鲁东主义思想的。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里，可以说是总结了他在《哲学的贫

因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主义思想的极端荒谬。在谈到蒲鲁东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方案时，马克思狠狠地批驳了他所提出的“无息信贷”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民银行”的主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东主义者极力宣扬的这种主张“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马克思对蒲鲁东作了总的评价，指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蒲鲁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并力图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限制在“纯粹工人的”问题的范围内，相反地，马克思认为，各国的国际支部的任务“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见本卷第483页）。马克思竭力使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运动中起先锋队的光荣作用，使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

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给美国总统阿·林肯和安·约翰逊的公开信。在这些公开信中，马克思指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有巨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进步的、民主的运动，教育无产阶级和它在国际中的先进活动家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反对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和德国拉萨尔派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忽视民族问题，特别是他们否定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独立的民主的波兰，使它成为欧洲民主派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影响斗争中的同盟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

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33页）

本卷发表的短文《更正》和《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表明了马克思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中扼要地表达了这种立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见本卷第224页）

恩格斯为反对蒲鲁东主义者而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论证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压迫政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无产阶级站在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的必要性。同时，恩格斯要人们警惕反动势力利用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他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真正实质，第二帝国的头目、俄国沙皇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就在利用这种“民族原则”，使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斗争服从于反动强国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波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是争取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革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改革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收入本卷的还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声明《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等文件。这些文件证明马克思曾直接领导过加入国际的法国工人。马克思一方面强烈谴责费·皮阿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倾空谈和冒险主义策略，同时极力使法国工人摆脱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吸引他们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一般民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德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和文件，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未能解决的问

题,首先是关于统一的问题,到六十年代更加尖锐了。拉萨尔主张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象在1848—1849年时一样,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实现德国的统一。他们认为,德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团结一致和政治觉悟,是用革命民主方法来统一德国的最重要的条件。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尽管也有助于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但是不能完成历史赋予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因为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的全部事实(他们之间往来的信件直到1928年才发表),然而他们却清楚地看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是在向“铁血宰相”献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萨尔死后才知道:拉萨尔为了要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曾向俾斯麦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拉萨尔死后采取了严肃的步骤,清除了拉萨尔的极端错误和有害的策略所招致的后果,并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无法批判拉萨尔主义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因而同意为施韦泽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他们同意为该报撰稿,因为在他们接到的办报纲领中,“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的名字”(见本卷第96页),况且,他们的老战友、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李卜克内西将是报纸的非正式的编辑。

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以上所提到的《论蒲鲁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正如他在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里所说的,他给予蒲鲁东的十分无情的打击,同时也击中了拉萨尔。马克思指的是他在文章中谈到小资产者在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同时,恩格斯在评述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他把

这首民歌寄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指出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巨大的革命意义。这样，恩格斯也就驳斥了拉萨尔派，因为他们根据拉萨尔的“都是反动的一帮”的理论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施韦泽不顾他们的一切警告，跟着拉萨尔亦步亦趋，把报纸引上与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妥协的道路，于是他们公开声明和该报断绝关系。在本卷所刊载的声明中，他们把拉萨尔主义称作“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 88 页）。

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也是批判拉萨尔派的政治立场的。这一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各个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立场，那次宪制冲突是普鲁士政府和自由资产阶级由于改组军队问题而引起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军事条件和政治条件，对政府改组军队的方案作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恩格斯在分析进步党对宪制冲突的立场时，严厉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怯懦的和动摇的政策，他们由于害怕人民，正准备与反动势力妥协。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工人阶级在国内革命局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的策略。恩格斯证明，指望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让步是完全徒劳的。恩格斯根据法国的经验，根据波拿巴主义的类似政策，尤其是根据路易·波拿巴实行普选制的结果，揭露了俾斯麦政府对社会的蛊惑宣传。这样，恩格斯就告诫工人，不要象拉萨尔派那样把普选权理想化，以为普选权就是万应灵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无产阶级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个党既要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也要摆脱更为有害的普鲁士反动派的影响。工人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政策应当是，支持资产阶级进步党争取普选权和政治自由，同时又要无情地押

击它的每一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一个软弱的表现，“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见本卷第 8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为在德国深入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扩大国际的影响扫清了道路。这一斗争所以获得成功，还因为工人群众根据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已经认识到拉萨尔的教条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和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这篇文章中满意地指出，在生活本身的影响下，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联合会不得不提出一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见本卷第 358 页）的问题：争取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同情和支持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在德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活动。尽管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有某些错误和失策的地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但是他们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上与拉萨尔派不同，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立场。“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做任何微小的让步。”（见《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92—293 页）

马克思在《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中对 1868 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各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作了很高的评价，那次代表大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举行的，它主张加入国际。

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这对后来德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有巨大的意义。尽管爱森纳赫派在理论上还相当不成熟，特别是在制定他们的理论纲领时表明了这一点，因为纲领中还有一些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仍然成功地做到了“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社会民主工党（它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标志着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胜利。

本卷所发表的许多著作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极力帮助创立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提高德国工人的理论水平。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反驳了这样一种神话，说什么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和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恩格斯追述了1848—1849年的革命传统、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上的各个重要阶段，并指出，拉萨尔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第408页）。恩格斯在这篇简短而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传记中，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对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党政活动，一直到他在国际这个“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见本卷第413页）的组织中的领导作用都作了评价。

为了恢复1848—1849年的革命传统，为了使德国工人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版了自己的两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农民战争》。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又一次谈到波拿巴主义的实质问题，他反对对历史事件不进行具体

的阶级分析而只作肤浅的历史对比。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观点的，因为他们无批判地接受关于凯撒主义的流行用语。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1848年以来德国经济生活 and 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各个阶级和党派在德国历史的这一时期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评价1866年普奥战争——他在《德国战争短评》（见本卷第187—212页）中阐明了这次战争的进程——的结果时，清楚地说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立场，并指出这个阶级所以软弱和准备与反动派勾结的原因。恩格斯分析了德国工人运动二十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和这一运动的前途，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即关于工人阶级必须取得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一极重要的理论结论和政治结论，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恩格斯指明了对农民分别对待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哪些阶层、根据哪些原因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同盟军。

恩格斯认为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决议十分重要，他帮助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而该党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一重要决议对于德国的意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必须消灭土地私有制并把它变为公有制的决议对整个国际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直接参加制定的这项决议（见《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本卷第648—649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维护者——蒲鲁东主义者的思想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

从国际工人协会开始活动的最初阶段起，为了通过工联这个英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组织吸引英国无产阶级参加协会，马克思花了不少精力（见《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决议草案》，本卷第19页）。1868年10月马克思在《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这篇短评中指出：“……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见本卷第375页）

马克思希望通过国际的思想影响（它由于工人运动本身的经验而不断加强），能够使工联克服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不再把斗争目的只局限为维护工人直接的经济需要，不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由于这种否定态度，英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已经变成了自由党的附属品。马克思极力使英国工人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监护，使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孤立，从而帮助英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英国在这期间所展开的争取新的选举改革运动，有利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国际根据马克思的倡议，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建立改革同盟，它应当成为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核心。马克思认为，英国与法国、德国不同，在法国和德国，占优势的是农民，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在英国，占人口多数的是无产阶级，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还不起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普选权使自己获得解放。

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们被选举改革运动的规模吓破了胆，他们竭力限制运动的范围，阉割运动的口号，力图与政府取得妥协。本卷发表的一系列材料（《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说明马克思坚决反对工联首领们——这批靠资产阶级从英国的工业垄断和殖民地垄断中取得的超额利润喂养起来的“工人贵族”的代表们——在若干最重大的问题上的妥协主张。由于工联的机会主

义领袖们的妥协政策，广泛开展的运动以残缺不全的选举改革而告终，英国大多数劳动居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

马克思认为，改革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改革同盟没有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加深了对工人运动极为有害的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分裂。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的蓬勃高涨，促使马克思认真研究他认为具有巨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爱尔兰问题。马克思考虑到英国本身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爱尔兰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也就改变了他过去对爱尔兰问题的看法。从前马克思曾经认为，压迫民族即英国民族的工人运动将给爱尔兰带来自由，现在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和“绿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的实现必将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见本卷第441页）。马克思对于要求容许爱尔兰民族独立、直到与英国分离这一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所作的论证，是对制定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原则的新贡献。马克思根据爱尔兰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必须把英国的这个第一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这个理论原理，教育英国工人和他们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人坚决而有效地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的解放运动。同时他也揭露了沾染上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英国工联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马克思是维护和支持斗争中的爱尔兰的那些运动、群众集会和辩论的灵魂和鼓舞者，是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报告人和许多决议的起草人。

马克思坚决维护受英国政府残酷迫害的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员，虽然他也批判过他们的密谋策略。他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决议《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1867年11月20日），指出了对四个芬尼亚社社员判

处死刑是英国政府的政治报复行为，并揭穿了法庭据以判刑的伪造证据。《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1869年11月16日）是马克思在他发起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在辩论过程中他两次发言（见本卷第664—669页）。在这个决议中马克思揭露了自由党政府的伪善的和反人民的政策，他指出：尽管格莱斯顿许下一些蛊惑性的诺言并进行一些可恨的改革，但这一政策实质上与保守党人的殖民政策没有丝毫区别。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以及他的女儿燕妮在他影响下为法国报纸《马赛曲报》写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在欧洲舆论面前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疯狂迫害，揭露了格莱斯顿的“人道的”英国对囚禁在牢狱里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野蛮的虐待。

马克思在国际的文件《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月）和《机密通知》（1870年3月）中论述了爱尔兰问题的国际意义，指出解决爱尔兰问题对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英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一就是爱尔兰的殖民剥削，这种剥削已成为“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见本卷第439页）。马克思在这些文件中充分揭示了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见本卷第440页）马克思号召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为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尽管英国工人运动是有组织的，但是英国工人运动还是软弱无力，英国资产阶级在英国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间竭力煽起的民族纠纷，是英国工人运动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强调说，对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的压迫是英国本身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这样表述了

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见本卷第474页)。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1867年11月)、《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恩格斯的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的手稿以及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若干片断。这些第一次收入全集的手稿清楚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结论是建立在全面研究爱尔兰历史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的基础上的。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爱尔兰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描绘了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人民群众所受的骇人听闻的灾难,并根据这一分析对芬尼亚运动——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作了经典的评论。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上述的提纲是这篇手稿的基础)中,马克思说明了爱尔兰受英国殖民奴役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他指出英国的统治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结果,爱尔兰的工业在萌芽阶段就被消灭,这个国家变成了宗主国的农业附庸。马克思的这两篇手稿清楚地揭发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他们统治被奴役国家的方法,特别明显而有力地揭示了爱尔兰土地关系变革的掠夺性实质。这一变革是为了英国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为的是剥夺爱尔兰农民,把他们大批地从土地上赶走。

本卷发表的手稿《爱尔兰史》反映了恩格斯花了不少劳动准备写一部包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1870年的历史著作。从我们所得到的残章断片来看,恩格斯打算在这本书中描绘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奴役和爱尔兰人民许多世纪以来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广阔图景,同时给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反动的种族主义和

殖民主义思想的卫道者以打击。恩格斯在《自然条件》一章里，坚决驳斥了英国的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企图把地理环境强调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企图借助伪科学的地理考察来证明征服爱尔兰是英国的天职（见本卷第526页）。恩格斯详尽地描述了爱尔兰的气候和土壤，目的在于揭穿资产阶级作者们的谎言，他们认为应该把爱尔兰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还说什么“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见本卷第542页）。在《古代的爱尔兰》一章里，恩格斯反对无批判地对待爱尔兰的早期历史，反对对它进行民族主义的粉饰，同时他把批判的主要火力针对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高德文·斯密斯等人）的沙文主义，他们企图把古代爱尔兰人描写成落后的民族，这种民族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只能从外来的诺曼人和英格兰人那里承受文化和文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以及和这一著作有关的片断中说明，古代爱尔兰的历史证明了爱尔兰人民的独立性和天赋。正象恩格斯指出的，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充满了与外来侵略者斗争的英勇史实。恩格斯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爱尔兰的著作时，揭示了整个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某些特点。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指出他们鼓吹的“客观态度”只不过是一副用来掩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作的辩护性质的假面具，这些历史学家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甘愿伪造历史事实，把历史科学变成可以出卖和得利的商品。

恩格斯对中世纪前期欧洲一系列国家遭到所谓诺曼人征服的性质所作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驳斥把诺曼人说成是欧洲许多国家的缔造者的反动的诺曼主义理论，并且指出了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真实后果。恩格斯把这些入侵称之为“强盗式的侵袭”，他说，“诺曼人的侵袭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

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入侵本身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见本卷第 564 页）。

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残酷剥削政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归根到底这种强制的同化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恩格斯指出，尽管英国统治阶级竭尽一切力量，但过去没有能够、将来也不能消灭爱尔兰人民的民族传统，使他们屈从于英国的统治。恩格斯的著作对被压迫人民充满热烈的同情，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充满强烈的憎恨。他的著作补充了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意见，是捍卫民族问题上的无产阶级原则的范例。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44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引起了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工联领袖以及国际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敌人——巴枯宁主义的激烈反抗。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和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理论观点和他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

马克思起草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揭发了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的阴谋，他们企图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自己的领导机关的特殊国际组织加入国际，以便依靠这一组织来控制国际，使它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总委员会 1869 年 3 月 9 日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中，批判了巴枯宁分子的纲领的主要点，要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马克思认为这种要求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鼓吹的“劳动和资本的协调”，他写道：“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伟大目标。”(见本卷第 394 页)

巴枯宁分子要求按照他们所提的条件接受同盟，在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又声称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让它的成员加入国际的地方支部。但是，事实上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仍然把同盟当作反对总委员会及其领袖马克思的秘密组织保存下来。

巴枯宁分子图谋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展开这场斗争，由于他们的坚持，关于废除继承权的问题列入了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

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巴枯宁从西门那儿搬来的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改革的起点，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见本卷第 415 页)。马克思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考察继承权的问题，证明继承权依存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并随着这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写道：“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见本卷第 414 页)马克思认为，废除继承权的要求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有害，因为这种要求只能使无产阶级丢开自己的实际任务，与自己的同盟者——农民疏远。巴枯宁的这种要求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遭殃。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企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是巴枯宁分子同总委员会和所有驳斥巴枯宁观点、特别是驳斥他的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说教的国际支部进行公开的和不间断的斗争的信号。瑞士成了巴枯宁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他们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平等报》暂时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机密通知》中彻底考察了国际与同盟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在谈到那些被巴枯宁分子用来作为攻击总委员会的借口的的问题时，马克思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国际领导机关的政策，特别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马克思揭发了巴枯宁的破坏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证实他尽管正式声明解散同盟，却把它当作秘密组织保存下来。

马克思在反对巴枯宁分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暴动主义的典型代表的斗争中得到了国际俄国支部的支持。俄国支部是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学生们——于1870年春在日内瓦建立的。俄国支部把纲领和章程寄给马克思，同时还附有一封信，请求马克思担任俄国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认为它是反对欧洲民主派的共同敌人——俄国沙皇制度的力量。马克思写信给俄国支部，表示同意担任它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信中写道：“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见本卷第464页）

列宁认为俄国支部的活动是企图“把‘欧洲制度’的一个最先进最大的特点——‘国际’搬到俄国来”（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56页）。

虽然俄国支部的成员按其世界观说来一般还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他们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坚决反对巴枯宁鼓吹的放弃政治斗争的说教，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动策略。

放弃政治斗争的要求是巴枯宁分子当时力图用来纠合国际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要求。因此，马克思在应当于1870年夏天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议程中增加了一条：“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见本卷第495页）。

但是代表大会由于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争而未能举行。

国际工人协会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它“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和巩固国际而进行的活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而斗争的重要阶段。正如本卷的材料所表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在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占领了巩固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对形形色色的、同无产阶级不相容的和敌对的流派的重重大胜利。本卷所涉及的国际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各流派斗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无产阶级对为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的必然胜利打下了基础。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三十六篇文章。其中有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和《爱尔兰史》、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和报告、国际的一些文件和马克思的一些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十六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其中有十四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写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过程中所写的一些文章。恩格斯为《莱茵报》和《双周评论》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和《〈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的手稿,以及马克思的《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的手稿,因为同两位作者生前发表的为普及《资本论》而写的同类著作有密切联系,所以同曾发表过的著作编在一起。

《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参加起草或校阅的文件,以及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和关于发言的报道,这些发言记录和

报道由于记录简略和不全，无法收入本卷正文。《附录》部分还收入了马克思的夫人和他的女儿燕妮在马克思的直接参加下写的文章。所有这些文件对于展示马克思领导国际的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用各种文字草拟国际的文件，并常常一份文件同时用好几国文字，这也表明了马克思的活动的国际性。在准备俄文版时，参考了这些文件的各种文字的许多不同版本和手稿，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文章标题从原文。

第十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2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这段时期的主要事件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导致建立巴黎公社的1871年3月18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公社是一条历史分界线，它揭开了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这就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和趋于衰落、无产阶级逐渐聚集力量和准备进行决定性的阶级搏斗的时代。

收入本卷的著作所属的时期，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及其革命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国际组织，它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拥有许多支部。它七年来的活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宗派的胜利。巴黎公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生命力，使国际的原则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它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中。马克思根据这种经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出发，对他们的著作中初具轮廓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补充了一些新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对国

际工人运动以后的全部发展具有无法估价的意义。

本卷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声明和寄给报社的信件，大部分是跟他们领导国际的活动直接有关的。1870—1872年对于国际工人协会说来，是为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进行顽强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是在工人组织受到警察迫害和国际受到反动报刊百般攻击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这个历史时期时说道：“自从我们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43页）

鉴于1870年7月在欧洲发生了对国际说来是严重考验的战争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情况下的策略。他们帮助德法两国工人根据战争的性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来确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进程中保持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宣传所迷惑。

本卷第一篇文章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这篇宣言以及本卷所收的马克思在1870年9月写的第二篇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最重要文件。这两篇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侵略战争、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斗争的有力证明。

在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统治阶级谋取私利是掠夺战争的社会原因这一重要原理。马克思证明，发动侵略战争也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首先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他揭示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这场战争归根到

底是从事军事冒险的波拿巴法国和支持波拿巴独裁的欧洲各国的反动剥削制度的产物。马克思写道：“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 coup d'état〔政变〕的修正版。”（见本卷第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德国方面说来，战争在第一个阶段是防御性的，因为它在客观上是反对拿破仑第三企图阻止德国完成统一。他们首先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评价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波拿巴主义一旦获得胜利，就会给德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造成莫大的危险。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1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指出俾斯麦政府的反动性质，说明普鲁士统治集团的政策也是要挑起军事冲突，战争从一开始就可能变为从德国方面说来是侵略性的战争。在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并号召他们为反对两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而共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详尽地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策略路线；他们指出，必须把德国统一的民族任务与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在战争中追求的王朝目的区分开来（见本卷第282—284页）。

在法国正规军被击溃、第二帝国被摧毁、1870年9月4日在法国建立了共和国以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政府也公开走上了兼并和掠夺的道路。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就是侵略性的战争。由于条件改变了，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确定了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在战争第二个阶段的任务。

在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主要打击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侵略意图。马克思揭露普鲁士政府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虚伪借口。他指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

企图千方百计援引历史来论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也是荒唐的。

以后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在第二篇宣言中的深刻预言：由于德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普法战争将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欧洲战争，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对法国的劫掠以及他们对法国领土的兼并，必然会使法国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德国。

第二篇宣言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争取与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警告德国工人，德国的统治阶级想把对路易·波拿巴军队的胜利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利用这个胜利来巩固自己国内的统治。在谈到法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时，马克思号召他们利用在推翻第二帝国后所造成的条件来巩固自己阶级的组织，以便进一步展开争取劳动者解放的斗争。

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也和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一样，是马克思深刻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对当前事变作天才的创造性分析的杰出典范，根据这种分析做出的结论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其重要。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在这几部著作中表现了作者的这样一种惊人的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变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6页）。

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中，马克思表明，军国主义和掠夺战争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矛盾的。反对这种由剥削制度产生的战争，就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基础。马克思在这两篇历史性文件的第一篇中，以他对未来的非凡的洞察力论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将导致消灭任何战争，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将成为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国际主义原则之一。马克思写道：“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愤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见本卷第7—8页）

伦敦《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文章，在本卷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散篇军事评论形式写成的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彼此有密切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所以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在本卷中作为一部单独的著作来刊载，以作者本人给这一系列文章中的大多数文章所起的篇名《战争短评》作为总标题。

《战争短评》是恩格斯的杰出的军事著作之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军事事变的光辉范例。尽管按照《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所规定的条件，《战争短评》的内容应该仅仅限于军事问题，然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越出了这个范围。恩格斯在考察有关普法战争的军事问题时，使许多篇文章充满了尖锐的阶级政治内容。《战争短评》按其政治倾向性是与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有密切联系的，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中实质上宣传了国际在战争的不同阶段上的策略。

恩格斯细心地注视战事的发展，善于以惊人的洞察力通过枯燥简短的战报看出真实的情况。他能精确地测定军队运动的方向，确定正在进行的战斗行动的性质及其对以后战争进程的影响。恩格斯在军事科学各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并能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在许多场合他能科学地精确地预言军事事变的发展及其结局。例如，根据关于法国和普鲁士军队集结的初

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政府由于害怕巴黎的人民群众，不肯把前线急需的军队派往前线，这些军队留驻首都以防革命危险（见本卷第60页）。

在分析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时，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支按照在军事上比法军较有效的编制制度组成的军队，也是寡头政治的工具。恩格斯指出，被人虚伪地描绘成“武装人民”的普鲁士军队，实际上带有反人民的性质；它的组织反映了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政府想掌握一支驯服的武装力量，对内镇压起义，对外实行掠夺。

恩格斯的许多言论涉及军事上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十分重视大量军队机动作战的优点，防御工事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首都设防的意义。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中，从普法战争以前的战争经验中援引事例，作了广泛的历史对比。在考察1870年的巴黎防御战时，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回溯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的历史，称赞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顽强精神和建造防御工事的工程师们的高度技巧（见本卷第153、233—234页）。

在法国正规军被击溃、第二帝国垮台以后，普鲁士的掠夺意图完全表现出来，这时恩格斯特别关心的是加强法国国防，建立新的军队和组织游击斗争抵抗侵略者。恩格斯深刻同情法国人民反对普鲁士侵略者的斗争，批评国防政府和它委派的军事将领（其中有不少波拿巴派将军）不善于组织有效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敌人，批评他们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而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投降意图。恩格斯认为，带有消极性质的巴黎防御战之所以屡战不捷，法国军队在帝国垮台后之所以遭到其他许多失败，是由于法兰西共和国未能利用法国的一切可能条件和资源来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尽管统治阶级的冒险政策使法国濒于民族毁灭，但是恩格斯指出，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法国人民仍然应该继续斗争，如果能把

一切潜力动员起来，如果对普鲁士人的抵抗带有真正人民的、全民族的性质，这种斗争是会得到胜利的。恩格斯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支持法国人民抵抗侵略者，他为重新组成的法国军队拟定了抗击普鲁士军队的具体计划、战略和策略，并指出他们的军事行动必须配合游击队的斗争。

恩格斯阐述了在法国开始的游击斗争的特征，指出真正的人民抵抗的威力是不可摧毁的。他揭露普鲁士指挥部采取野蛮的作战方法，疯狂袭击斯特拉斯堡，放火烧毁法国乡村以及其他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他特别愤怒地抗议普鲁士人残酷迫害法国游击队员（自由射手）。在《战争短评》中，恩格斯认为应当承认游击队员有权利作为交战的一方，应当承认采取游击战形式的人民抵抗是正当的作战方法。

在《战争短评》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及其阶级原因、目的和性质的学说，作了重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普法战争作例子，教导无产阶级把民族解放战争，为抗击外国入侵而进行的防御战争同掠夺的、侵略的战争区分开来。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他提出并解决了关于全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关于人民战争、关于游击运动、关于动员人民力量对付侵略者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法国在战争过程中的情况。他们要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帝国崩溃后出现的一切机会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看到法国的阶级斗争必然进一步尖锐化，群众可能进行革命的发动。他们对法国无产阶级提出警告：只要是普鲁士军队还驻在巴黎城下，起义必定要失败。但是，当巴黎工人在首都用无产阶级起义来回答梯也尔政府想解除他们武装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欢欣鼓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

“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巴黎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捍卫公社是各国工人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从巴黎爆发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通过国际动员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来支援公社。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公社看作是国际的精神产儿，是国际的原则的实际实现，认为公社的建立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成果。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中，经常报道公社社员对勾结在一起的凡尔赛人和普鲁士军队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见本卷第667—668、671—678页）。马克思给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写了几百封信，向他们解释公社的历史意义。他利用一切机会同困守巴黎的公社社员建立联系，给他们以帮助。马克思从巴黎公社一产生起，就细心搜集有关它的活动的一切材料——报纸上的报道和文章、自己的战友们从巴黎寄出的信件，并且在巴黎革命还在进行时就着手分析和总结它的教训。

在本卷占主要地位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法兰西内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根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作为总委员会致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全体会员的宣言，是直接在巴黎革命事件发展时期写的，目的在于使各国工人阶级了解公社社员英勇斗争的本质和意义，使这一斗争的经验成为全体无产阶级的财富。

《法兰西内战》对产生巴黎公社的历史条件作了天才的分析，

充分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活动的本质。马克思无情地描绘了敌视公社的资产阶级法国的情景，勾画了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嘴脸，这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因出卖民族、可耻地与外敌勾结、用野蛮手段血腥地镇压工人阶级而臭名远扬。马克思阐明了资产者的“爱国主义”的真实价值，并且指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思想总是要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总是要和征服者一同镇压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在描绘凡尔赛反革命政府的头目们——梯也尔、法夫尔、皮卡尔、杜弗尔和其他主张疯狂镇压的人们，在描绘消灭法国无产阶级精华的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方面，马克思达到了现实主义技巧的真正高峰。这位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刚劲有力的笔写出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把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革命激情与最精确和深刻的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典范。

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证实了他最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所做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正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继续发展这一原理，考察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和“阶级统治机器”的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巴黎无产者只有走上了消灭压迫者的国家机器的道路，才能够取得政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本卷第356、35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即历史上没有试图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实例时所写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无产阶级应当以什么来代替被革命打碎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的答案。巴黎公社的

经验使马克思对革命学说作了新的贡献。他丰富了这个学说，具体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才能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及其作为建设新社会工具的历史使命。关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列宁写道：“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1—412页）

尽管巴黎公社存在的时期很短，马克思从中发现了历史上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的、刚刚萌芽的但是已经相当清楚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了公社的阶级性质及其国家形式的实质。他写道：“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本卷第361页）新型的国家，巴黎公社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就是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革命理论所作的新贡献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巴黎公社中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织原则。他指出，废除作为压迫者国家的工具的警察和旧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即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这种措施对建设新国家具有重要作用。他阐述了公社的这样一些特点：公社的全部公务人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以作为公社公务人员的、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来代替先前为剥削者利益服务的旧法庭。马克思也谈到了公社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实行的社会措施，以及公社在剥夺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所有制方面所采取的初步措施。他指出公社想方设法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以剥削为目的的教会

财产。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与压迫者的国家作了对比，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作了经典的阐述。他不仅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较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而且还指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不能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公社型的国家比议会制共和国更优越，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见本卷第 358 页）。他指出，只有这种政权组织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那些改造社会的革命任务。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结论有巨大的意义，他指出：“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见《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411 页）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继续研究和探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马克思用巴黎公社作例子来说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完全符合劳动农民的利益，他坚决相信，如果没有凡尔赛人在巴黎和外省之间建立的藩篱，法国农民无疑会站到公社方面，因为公社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迫切需要的。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有一些重要原理涉及到无产阶级制度下的国家集权制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中央政府的职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十分重要的，他坚决驳斥企图把公社反对压迫者国家的斗争看作是什么地方分权和分立主义倾向的表现的那些谎言。他表明，在全法国建立公社制度，将意味着以真正的民族统一来代替那种借助剥削者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虚假的国家统一（见本卷第 359—360 页）。

在《法兰西内战》中论述公社活动的篇章，充满着对人民群众革命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对工人阶级英雄气概的高度赞赏。马克思把公社的巴黎同“麋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的凡尔赛的旧世界作了对比，从而表明了使法国首都面貌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改造力量。《法兰西内战》歌颂了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的巴黎工人阶级。“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见本卷第369页）

除了《法兰西内战》，本卷还刊载了这部著作的两种草稿——《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这两种稿本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其中有些材料补充并解释了《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竭力使这部著作的定稿简短明了，具有宣言的形式，草稿中的许多地方在定稿中只作了简略的叙述，有时甚至完全删去了。

虽然初稿和二稿中的个别段落是提纲式的札记，其中大部分都具有完整的文字形式，其语言与《法兰西内战》一样鲜明有力。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中利用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活动的实际材料，这两种稿本证明马克思进行了庞大的工作，证明他对公社社员的革命创造的研究抱有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这些草稿中，论述巴黎公社社会经济措施的一些原理，比《法兰西内战》中相应的地方更详细一些。这些草稿对公社之前那段时期的革命运动作了说明，更详细地考察了关于国家集权制问题和公社对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对它的一切行动作了不附带任何理想化色彩的确切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评价。在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详尽地分析批判了巴黎革命政府所犯的加速公社失败的错误，并要求无产阶级今后的革命斗争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批评了公社社员对反革命分子疏忽大意和缺乏应有的坚定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有组织的和强有力的，应该拥有为镇压反革命所必需的手段。马克思警告说，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还可能遇到“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他强调指出，必须竭力巩固无产阶级国家。这样，反革命势力的图谋就注定要破产；这种图谋“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见本卷第594页）。

在初稿和二稿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剥削者的国家机器的原理有较详细的论述，这是对《法兰西内战》的宝贵补充。马克思在初稿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写道，“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见本卷第593页）。马克思发挥了这个原理，天才地描述了在实现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所要进行的大量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质。他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见本卷第594页）接着马克思又指出，通过公社的组织，即巴黎公社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立即沿着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在这个思想丰富的理论概括中，已经包含一系列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学说的基本因素。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一学说。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型这一天才结论，被列宁全面地采用了，他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发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苏维埃形式，并创造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严密而完整的学说。列宁捍卫了马克思关于必须打碎压迫者的国家机器并以巴黎公社型的国家取而代之的原理，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企图歪曲、伪造或者干脆抹杀这些原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表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拚命攻击这些原理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正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的本质。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对这一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所抱的态度，从以下这件事实可以看出来：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掌握这部著作的草稿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发表它。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政府组织了反对国际和工人组织的总进军。所有各国都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加强了警察迫害。反动报刊企图损毁国际的名誉，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它们刊载各种各样的伪造文件，散布捏造的谎言。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揭露反动派的阴谋，继续为团结和巩固无产阶级组织而斗争，把新的劳动者队伍吸引到国际方面来。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若干文件，说明他们为领导各国的国际支部进行了顽强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指导总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又花费许多时间帮助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新成立的国际支部，在各支部和总委员会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组织无产阶级的互助（见本卷第320、506—509页及以下各页）。

本卷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照例作为总委员会正式文件发表的给各家报纸的许多声明（《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

的声明》，《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给〈工人报〉、〈舆论〉、〈高卢人报〉、〈真理报〉等报的声明)。这些文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陷害，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的并在劳动人民中破坏它的威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各报编辑部的一系列声明和信件中，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在与工人运动进行斗争中所采取的伪造手段。马克思起草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见本卷第411—415页)就是专门揭露资产阶级外交在巴黎公社时期的阴险的挑拨作用的。这个文件撕破了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的外交代表的假面具，戳穿了他反对公社的卑鄙阴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卡尔·布林德》一文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也是为揭露工人运动的敌人而写的。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的斗争，这些人是反动集团的应声虫，卡尔·福格特就是反动集团的直接代理人。

恩格斯在《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和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见本卷第418—420、687—689页)中，批评了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他企图用攻击公社和国际的方法来阻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巴黎公社是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巴黎公社加速了工人运动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宗派主义改良主义流派之间的分野。公社证明了宗派主义的教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并且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性质。巴黎公社成了考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投入资产阶级阵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无情地鞭挞了工人运动

的各种叛徒。在恩格斯所写的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以及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中（见本卷第 398—399、403—404 页），揭露了工联机会主义领袖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立场，他们同统治阶级一样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充满恐惧，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本卷发表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决议（见本卷第 321 页），也可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纯洁无产阶级组织的队伍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托伦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宁愿在凡尔赛议会中保有议员席位，而不愿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

1871 年 9 月 17—23 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文件，在本卷占有主要的地位，这次代表会议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团结和组织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而斗争的重要阶段，载入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

伦敦代表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及其活动，都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会议草拟一系列决议案（见本卷第 438—439 页），制定代表会议的工作纲领，确定它的主要任务并指导主要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中说道，代表会议将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在组织上巩固国际，这种巩固是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情况下所必需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巴枯宁主义者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统一（见本卷第 693 页）。

伦敦代表会议自始至终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所有遭到破产和被粉碎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派的突击队（这些流派的残余当时仍继续攻击总委员会）。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破坏性的典型代表，对一系列罗曼语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罗曼语区）有重大的影响。

他们在巴黎公社以后拚命攻击国际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的队伍中进行分裂活动。

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的发言，说明总委员会为制止同盟的破坏活动曾采取了措施。这个同盟的领导人虽然声明解散同盟，但实际上在国际内部保存了这个秘密的巴枯宁组织。巴枯宁派由于不敢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公开反对总委员会，就宣布这次代表会议“没有资格”审查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各支部中所引起的分裂问题。马克思在报告中和在他起草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中驳斥了巴枯宁派的这种企图，并且指出，伦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禁止在国际内部建立分立主义的宗派团体的决议与巴枯宁的同盟有直接的关系（见本卷第458—4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巴枯宁派实际上反对建立这种政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及其形式和策略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论证了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政党的思想。后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有条件实际实现这一任务，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由他们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进行了大量活动，正如马克思在1871年11月23日给波尔特的信中所说的，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2页）。巴黎公社（它的错误和弱点首先是由于法国工人没有战斗先锋队，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效卓著的活动，在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成功。

由于这些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伦敦代表会议上

作出决议，承认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政党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中，规定了建立这种政党的任务，这项决议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见本卷第454—456页）。这项决议（它的基本部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列入国际的共同章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原理之一已被接受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原则。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关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打击了各种宗派，反映了工人运动的客观要求，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规定了方向。1871年以后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是循着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发言，证明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恩格斯在一篇他本人亲笔记录的发言摘要中指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见本卷第449—450页）

在马克思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方式的重要思想。马克思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见本卷第700页）马克思指出必须利用资产阶级议会作为进行无产阶级鼓动的讲坛，他要求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现有的一切可能

条件,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既要抛弃密谋式的冒险策略,也要防止无产阶级的斗争迁就机会主义,防止改良主义。

在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的会议记录中,英国的工联主义受到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批评工联主义的行会局限性和闭关自守,批评只代表工人阶级贵族上层的所谓旧工联脱离工人阶级群众。同时,马克思又警告不要对工联采取宗派主义的忽视态度,并且提出了通过加强工会与国际工人协会联系的方法把工会变成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强大斗争中心。马克思非常重视那些与群众保持联系的工会组织,并要它们把争取工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低级的阶级斗争形式提高到积极参加争取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斗争。

收入本卷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他代表所提出的决议案在许多场合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言中所提出的原理作为依据的;伦敦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负责的对决议案的最后定稿工作,也是由他们进行的。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是针对宗派主义的,目的在于加强国际的队伍的内部团结和纪律,保证它的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做到既要有集中的领导,又要发挥各支部和联合会的主动性。这些决议深刻地表述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思想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由马克思起草并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具有巨大的意义。根据农民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工人阶级同盟者的作用这个论点,马克思建议在农民当中展开革命宣传,制定具体措施,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见本卷第454页)。

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出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新的标准版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拟定的新版章程和条例是以马克思 1864 年写的临时章程文本为基础的，包括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对章程和条例所做的修正和补充。这样，过去所通过的反映国际组织原则的发展的全部决议和决定，第一次被纳入一个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准备了这一文件的英文版、德文版和法文版，于是，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巴枯宁主义者就不能利用蒲鲁东派刊印的被歪曲的章程（它把关于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这个最重要的原理加以曲解）来进行宣传了。

本卷中有一系列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同巴枯宁主义进行的斗争。巴枯宁派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公开反对代表会议的决议。1871 年 11 月瑞士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所通过并发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所谓桑维耳耶通告，完全反映了巴枯宁派所宣传的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教条，反映了他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巴枯宁派在桑维耳耶通告中再一次企图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他们号召废除一切纪律、成立“自治的支部的自由联盟”、把总委员会降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在国际遭到诽谤性攻击时期发表的巴枯宁派的桑维耳耶通告，受到反动刊物的热烈欢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枯宁派的破坏组织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的宣传严重地阻碍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国际提出了一项任务：彻底揭露和粉碎工人运动中的巴枯宁主义。

恩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表明，巴枯宁派的分裂策略、关于放弃政治的说教、关于建立一个作为“未来社会的原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空想宗派主义理论，给工人阶级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巴枯宁主义的教条旨在取消

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武器——组织。针对这些教条，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实现这些原则，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一致行动就有了保证。

在国际和巴黎公社时期，在资本主义反动派和内部敌人——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攻击国际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组织进行了斗争，这个斗争的丰富的经验对国际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可估价的财富。列宁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完整学说。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见《马克思的遗稿》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卡尔·布林德》这篇文章的草稿，恩格斯的《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以及许多新闻简讯、国际的文件、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十一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其中有四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一些发言的报道、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于这些发言记录和报道不完整，这些文件没有收入本卷正文。以恩格斯的记录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正文。《附录》部分还收入了马克思与纽约《世界报》记者的谈话记录、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部的信、马克思参加起草的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文件都是说明国际的领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

动的补充材料。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和文件时，参考了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手稿以及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和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核对，并加以更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3月至1875年4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巴黎公社成了世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引起的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各种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日趋没落和转向反动，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新的形势，向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任务。公社以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发展、无产阶级力量日益纯洁和团结的时期，即“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七十年代初期，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特点已经显露出来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规模扩大了。几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在北美和南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都有了第一国际的组织，它们促进了这个理论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传播；在许多国家中已经有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在德国，领导斗争的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各国的年青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政治舞台，说明工人阶级在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参加国际的先进工人有组织地反击了巴黎公社失败后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有天才的洞察力，他们在这个急剧的历

史转变刚刚开始时善于正确地估计客观形势，在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派别首先是同无政府主义的顽强斗争中，根据七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具体条件，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细致地培养工人群众去迎接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他们继续不懈地致力于把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教育工人实行自己独立的、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中对许多有关纲领、策略和组织的极重要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把国际工人运动提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为以后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继续为完成《资本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学说付出巨大的劳动。同时，马克思还不断地努力使《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学说尽快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财富。1872年3月底，《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它是这部科学共产主义奠基著作第一个外文译本。1872年夏天，《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在汉堡出版，法译本也从1872年到1875年陆续分册出版。德国、英国、西班牙的工人报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的章节。马克思为了用欧洲许多语言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而付出的巨大劳动，对于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教育欧洲的革命无产阶级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这几年中写了许多著作，论述有关国家和革命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以后他就写了两部杰出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十分注意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他们广泛地宣传这些经验，并力求使它成为劳动群众的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斗争的经验中吸取最主要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摧毁

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型的——巴黎公社型的国家来代替它。公社社员们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公社不仅是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而且它还指出可以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已被打碎的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历史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在1872年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他们在新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本卷第10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作了深刻的科学评价，这是他们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中去的手段。他们坚持不懈地向工人阶级阐明巴黎公社的历史实质。在这方面，马克思为国际会员和流亡的公社社员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的群众大会所写的那些简短的决议是很值得注意的。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将把巴黎公社看作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见本卷第61页）。

在这几年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思想经常集中于国家学说，集中于研究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关于夺取政权的条件、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的问题。工人运动的政策、策略和组织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都与这些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成了检验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阶级本质，辨明其真正性质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些决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命运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在理论上战胜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在日益尖锐的反对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宗派分

子的斗争中，继续捍卫并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这是消灭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合乎历史规律的途径。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这部用生动的论战形式写成的著作，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派的，他们企图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溃疡随便涂上一一点药膏，同时把它的资本主义基础当作圣物一样来保护。针对蒲鲁东分子米尔柏格和资产阶级慈善家扎克斯的空想的、反动的计划，恩格斯提出了以集体所有制原则根本改造社会为自己目的的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恩格斯说，住宅缺乏现象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现象必然会愈来愈尖锐，只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解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时，才能解决住宅问题。

住宅缺乏现象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的表现之一。但是，正是因为剥削实质在这里是最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因为深受住宅缺乏之苦的不仅有工人，而且还有其他各阶层的居民，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住宅问题提到首位，力图用这种办法引诱无产阶级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揭示了住宅承租人和房主之间的一种平常的商品交易的性质，他指出，这种交易根本不同于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同时，恩格斯用工人读者容易了解的形式阐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极其重要的原理，在这里也象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一样，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恩格斯为了反对企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培植蒲鲁东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用革命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彻底批判了米尔柏格

的文章，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从理论上粉碎蒲鲁东主义的工作。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这一著作中所表述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米尔柏格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似乎是“自然的”，要想消灭这种对立是一种“空想”。恩格斯在反驳他的这个论点时证明：随着剥削阶级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被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也将永远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生产的密切的内在联系，将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所处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相关联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也得到了阐述，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文献之一。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重大的问题）的解决，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自然要求将来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只有在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但是，马克思指出：“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见本卷第65页）

马克思根据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土地制度的特点的分析，指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历史意义。对于英国来说，由于没有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存在着大土地占有制，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土地国有化已成为“社会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也揭穿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可能通过土地国有化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

间的残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见本卷第 66 页）

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土地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那时“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见本卷第 67 页）。

马克思在发挥他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制度的特点、农民的状况、历史的传统等等。对于象法国这样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国家说来，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有另一种道路。马克思在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语中指出，为了保证工人革命得到劳动农民群众的支持，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见本卷第 695 页）

马克思不倦地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在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根据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创造性地解决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问题方面，树立了榜样。马克思根据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作了重要贡献。他在 1872 年 9 月 8 日阿姆斯特丹国际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见本卷第 178—180 页）中提出并论证了下述论点：除了革命的暴力（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是确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的手段），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美国、荷兰，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形成的一定的历史条件（当时没有发达的官僚和军阀机构），无产阶级可

能“用和平手段”取得自己的统治。这一思想马克思早在五十年代就针对英国提出了，在这里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原理也是用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和改良主义者的，前者鼓吹用“革命爆发”的方法立即“废除国家”，后者则硬说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只有通过议会斗争。

列宁揭穿了机会主义者，他们企图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的这一结论解释为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220页）。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暴力手段还可能有“和平手段”的结论，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不同于一切教条主义，它不仅要求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且还要求估计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治条件所产生的特殊的、独特的情况。

马克思在他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语中，表述了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实现工农联盟的途径这些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在1874年摘录这部巴枯宁主义的圣经时，做了许多详细的批语，这些批语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在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巴枯宁认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社会革命”，而且革命必须从“废除国家”开始。针对巴枯宁的这些主观主义的和唯意志论的论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同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定历史条件有直接联系。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这是消除或改造“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所必需的（见本卷第694页）。但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革命暴力的临时的、短暂的性质：“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表面上维护“民主”，实际上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

评。他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才能为绝大多数居民实现真正的民主。

本卷有不少文章和文件直接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后期的活动。这些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的各个方面的日常领导，说明他们坚决反对仇视科学共产主义的派别和集团，首先是反对那些图谋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的文件表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在巴黎公社全面提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上进行的。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这一斗争特别尖锐。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为了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夺取政权以及为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宗派分子，划清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的界限，同无政府主义原则也划清了界限。1871年11月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通告，提出了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的巴枯宁主义学说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提出了否定纪律的主张和“自治”原则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党性。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工人团体就要崩溃和瓦解，工人阶级就会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武装，就会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巴枯宁的思想和国际的目的是毫不相容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开始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聚集力量的时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就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是对巴枯宁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著作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揭露巴枯宁主义是敌视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揭示一切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工人运动诞生和形成时期，宗派的产生有其历史的规律性；但是，随着

工人运动的成长，随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自己的特殊任务，宗派及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离奇方案就变成了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象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见本卷第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巴枯宁宗派主义的特点：理论上的落后性和脱离群众性革命运动，教条主义和“革命的”冒险主义。和宗派集团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有自己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这样的组织就是国际，它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见本卷第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国际同巴枯宁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斗争的历史，并且指出，同盟企图强加于协会的纲领“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见本卷第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同盟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指出了同盟为什么要攻击协会的总委员会——保证国际在各国的组织的统一行动的领导机关。如果实现巴枯宁主义者的要求，把总委员会的职能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无产阶级就要放弃建立自己的有纪律的、思想上统一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总委员会的职能问题方面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斗争。

在一系列和〈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有关的文件中，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紧张斗争。1872年夏天，国际内部的这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对无产阶级党性的比利时蒲鲁东主义者、美国资产阶级改革派、英国

工联主义者，同盘踞在国际的意大利、瑞士、尤其是西班牙组织中的巴枯宁分子串通一气；拉萨尔派也同巴枯宁分子结成同盟，一道攻击国际。

1872年夏天，西班牙成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的斗争舞台。巴枯宁的秘密同盟在西班牙根子最深。由于西班牙经济发展落后，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还不能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决裂。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词句在正在破产并补充西班牙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共鸣。恩格斯在《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巴枯宁分子建立的支部里，“同盟的各种特殊理论——立即废除国家、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放弃一切政治行动，等等——在西班牙都被当做国际的学说来宣传”（见本卷第203页）。恩格斯是总委员会西班牙通讯书记，他把西班牙国际会员中的优秀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在他们的帮助下揭穿了巴枯宁分子的两面手法。他写道：“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见本卷第129页）在国际内部有一个秘密团体，它有自己的特殊的、敌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的纲领，这一事实在国际的全体会员面前被揭露出来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恩格斯写道：“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

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见本卷第 133 页）

恩格斯为了团结西班牙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并对他们进行教育，为了揭穿无政府主义的实质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以后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奠定了基础。

在揭露巴枯宁分子攻击无产阶级的花招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还不得不进行清除国际各组织中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达到自己目的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改革派分子的斗争。在马克思起草的 1872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各项决议（见本卷第 56—59 页）、恩格斯的文章《国际在美国》，以及针对一批英国活动家和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企图利用总委员会的名义和威信来达到自己目的而写的总委员会的一个文件（见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中，反映了这场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必须进行国际内部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资产阶级政客和卖身求荣的记者等等不断地从外面策划的进攻，这伙人企图歪曲和曲解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意义，破坏它的领导人的威信。这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在报刊上宣传了国际的思想及其意义。为了驳斥议员柯克伦在下院的诽谤性演说，马克思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声明，以辛辣的讽刺笔触揭露了各国反动分子狼狈为奸，为消灭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不择任何手段。马克思指出，法国和西班牙的反动派的“功绩”“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见本卷第 71 页）。马克思在意大利民主报纸《玫瑰小报》上发表的《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中，揭露了资产

阶级记者不惜用一切肮脏手段来诽谤无产阶级的领导人。

马克思愤怒地驳斥庸俗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这个人企图“揭发”马克思伪造资料，并在起草《成立宣言》时使用这种资料。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和《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中，揭穿了一连串诽谤谰言的真正意图。

收入本卷的一批文件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的各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巨大的、系统的和日常的工作。作为总委员会的好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致国际各支部和国际个别活动家的正式信件和文件。在许多正式信件（见马克思《致鲁尔罢工的矿工》和恩格斯《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致费拉拉工人协会》、《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国际的组织结构，宣传了它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教育和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这是他们在国际中所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极重要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出的文件和文章分别发表在德文的《人民国家报》和在美国用德文出版的《工人报》、英文的《东郎报》和《国际先驱报》、西班牙文的《解放报》、葡萄牙文的《社会思想报》、意大利文的《人民报》和《玫瑰小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恩格斯在1872年经常为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撰稿，这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罢工的文章（见本卷第81—83页）、关于爱尔兰国际会员声援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文章（见本卷第210—212页）、关于西班牙状况的文章（见本卷第213—215页），和其他以《伦敦来信》为总标题发表的文章，使意大利工人了解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促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巩固国际联系和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

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有关的文件和文章在本卷中占有很重要

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夏天为筹备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彻底解决同巴枯宁分子斗争的问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通过了议程，确定了代表大会召开的期限（见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1872年9月2日至7日举行的海牙代表大会同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一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下进行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巨大胜利。这次代表大会的注意中心是两个彼此紧密联系的问题：公开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武器和手段——是国际的纲领性原理；宣布发展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原则是建立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的工作报告（见本卷第143—152页），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在巴黎公社以后所处的局势和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本质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力求团结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孤立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几乎对所有讨论的问题都发表了意见。收集在《附录》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发言的记录，反映他们为巩固国际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为清除国际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进行了顽强斗争。

本卷发表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余的也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在总委员会各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审订了全部决议，并安排发表。在国际的共同章程中加进了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见本卷第 165—166 页）的基本内容，在组织条例中也加进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条文，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关于把巴枯宁派的首脑们开除出国际的决议，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七十年代初在欧洲形成的实际历史形势出发提出的建议，通过了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决议（见本卷第 175—177 页）。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发言论述了这一建议的理由（见本卷第 730—731 页）。

代表大会及其全部决议确定了工人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和前景。这些决议为最近的将来在各个民族国家中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工人运动中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各项极重要决定而写的大批文章同代表大会的文件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包括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会员大会上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演说（《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演说的通讯记录稿》）、在意大利文的《人民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伦敦来信。二》）。新马德里联合会机关报《解放报》发表了《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一文，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巴枯宁派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指出，空谈自治、各支部自由联合等假革命词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各个工人组织的瓦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大会的委托为国际全体会员而写的报告（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题于 1873 年公布），总结了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根据大量具体历史事实写成的这部著作负有在国际内彻底粉碎巴枯宁派的任务。这部著作根据大量文

件，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出自巴枯宁派之手的文件，完全证实在国际内部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揭露这个同盟的组织原则和思想原则是同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任务直接对立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陈述了巴枯宁派在欧洲各国所进行的分裂活动，说明他们在协会内部的破坏活动同反动派从外部对协会的进攻是有直接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同盟在俄国》这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枯宁的代理人在俄国进行的活动公诸于世并严加谴责，揭穿了同巴枯宁关系密切的涅恰也夫在活动中所使用的欺骗和造谣的手法，指出了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冒险主义活动给俄国革命运动所造成的危害。

在揭穿了巴枯宁分子的破坏活动并把巴枯宁派首脑开除出国际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上，继续进行反对巴枯宁分子的理论斗争。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揭露巴枯宁分子所鼓吹的关于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理论和立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理论上是毫无根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要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面前解除武装，使他们注定要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顺从奴仆。在批判这些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同时，马克思论证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

列宁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研究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揭露修正主义者伪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行径时，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论战的理论内容和历史意义。列宁写道：“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3页）

恩格斯的著作《论权威》对所谓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论证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广泛地利用了这个著作。恩格斯揭穿了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废除国家”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科学和反革命的实质。他无情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消灭任何权威的这种糊涂落后的观点。恩格斯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见本卷第344页）

列宁在分析恩格斯的这个著作时，着重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之间的全部原则性区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用这种批判掩盖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掩盖他们抹煞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并使之万世长存的意图。列宁写道：“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5页）

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篇重要著作中，通过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冒险主义策略的深刻批判，进一步批判地分析了他们的错误的理论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是由于巴枯宁主义者想在187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实际实现自己的学说的

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而写的。确定工人阶级的任务必须依据一国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依据一国已有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无产阶级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这篇文章就是以严格科学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典范。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关于作为艺术的武装起义、关于无产阶级利用革命政权、关于以革命政府“自上而下”的行动补充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的学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恩格斯指出，在象西班牙这样一个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首先取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枯宁主义者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他们策略中最糟糕的方面之一。恩格斯指出，当时还左右着相当大一部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巴枯宁主义者力图实现他们的理论，虽然高谈“革命的漂亮词句”，但在实践上必然要听命于资产阶级。恩格斯最后写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见本卷第540页）

收入本卷的一部分文件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直接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公开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的立场以及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使国际总委员会同各大工联组织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彻底决裂。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定于1871年10月成立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在1871—1873年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而斗争的据点。反对机会主义者、支持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斗争，就是他们壮大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反对自由派的工联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不列颠委员会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通过委员会的委员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领导了对混入委员会内部的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力吸引年青的爱尔兰工人运动参加国际。他们主张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国际爱尔兰组织，认为这种组织就是在将来建立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独立的爱尔兰工人政党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决地为克服英国资产阶级故意煽动的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仇视、为反对英国改良派首领所鼓吹的沙文主义观点而斗争。从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1872年5月14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英国工人。恩格斯在讨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的相互关系时所作的发言，是揭露大国沙文主义和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光辉榜样。恩格斯断言：“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在象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见本卷第87页）恩格斯在发言中所依据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极重要的原理，即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不倦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英国和爱尔兰工人，这项工作已收到了效果。在1872年11月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的关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国际会员联合大会要求释放爱尔兰政治犯的那篇文章中，恩格斯已经能够宣称：“这是我们居民中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第一次友好团结。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部分的互相敌视曾为政府和富裕阶级的利益很好地效过劳，现在它们互相伸出了手；这件令人可喜的事情首先是由于国际前总委员会的影响造成的，前总委员会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见本卷第212页）

列入国际章程的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给了机会主义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些改良主义分子于1872年12月分裂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许多文件，反映他们为团结不列颠联合会中的革命力量进行了斗争。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所写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和《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以及出自恩格斯手笔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都揭露了被赶出国际的那些改良主义者的阴谋诡计。1873年6月召开的英国各支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获得了对改良主义者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它们巩固了这一胜利。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英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赢得了进一步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而斗争的阵地（见本卷第516—5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成就做了应有的评价，同时也揭示了由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运动发展的一般倾向。恩格斯在1874年2月写的《英国的选举》一文对于暂时盘踞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中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做了深刻的分析。恩格斯写道：“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见本卷第543页）恩格斯指出，近来英国工人大批参加政治斗争，“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强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各国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特点，要求工人阶级的组织具有新的形式。第一

国际作为联合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在横的方面不断扩展的国际工人运动了。生活提出了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在每个国家里成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国际已经为这些政党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欧洲各国反动派的继续进攻、英国工人运动暂时屈从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使国际的一部分组织脱离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巴枯宁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这一切也使国际无法以原来的形式积极进行活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形式的问题。他们很清楚，国际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它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对当时的条件所作的这种深刻而清醒的分析，也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3—1874 年写给他们的战友的书信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书信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还指出了怎样建立与工人运动在新发展阶段上的任务相符合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 1873 年 9 月 27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出关于必须抛弃国际已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思想，他在这封信中着重指出，放弃象国际这样的组织形式并不是要停止国际无产阶级的合作。恩格斯在 1874 年 9 月 12—17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总结了国际的活动，他写道：“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643—644 页）；恩格斯预言，未来的国际将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恩格斯坚信，建立无条件地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际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第一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了非常巨大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在历史上能够第一次体验到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的有组织的行动的力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顽

强的斗争中，第一国际给马克思以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学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学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培养了为将来建立各国工人政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干部。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奠定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的基础。列宁指出，“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6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所进行的不倦的活动中，特别注意德国工人阶级，他们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将起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的作用。这首先是由于德国有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接触，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社会民主工党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斗争的支柱。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专门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而写的许多文章。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愈来愈明确了，关于这种分工恩格斯自己写道：“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论住宅问题》1887年版序言）恩格斯在1872—1875年写的许多光辉的政论性著作（如《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等等）最初都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

本卷收入了1874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其中有恩格斯关于理论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意义的重要的意见。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

338页)。恩格斯在这里表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他认为，经常学习理论，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的领导人的义务。恩格斯写道：“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见本卷第567页）恩格斯特别指出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在对序言的补充中还有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性质、任务和斗争形式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指示。恩格斯确定了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必须包括的三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见本卷第5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因此必须彻底克服拉萨尔的宗派主义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克服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分裂并把社会主义者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同时不断地强调指出，应该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不能对拉萨尔主义（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做任何思想上的让步。恩格斯的两个文件《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和《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批判了拉萨尔派对国际的态度，揭露了他们攻击海牙代表大会和新的总委员会的诬蔑性言论。

恩格斯的《帝国军事法》、《半官方的战争叫嚣》等文章对于使德国工人认清1871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的反动实质有很大意义。恩格斯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不倦战士，揭穿了“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军国主义的真正代表，揭露德国资产阶级对俾斯麦政府采取怯懦的奴颜婢膝的行为（见《普鲁士“危机”》）。恩格斯说，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是资产阶级政策的

主导原则。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和《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主义性质，指出了德国的历史发展向德国提出的特殊任务：“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见本卷第563页）。恩格斯以普鲁士俾斯麦式的波拿巴主义作为例证，揭示了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一系列特点。

在遗稿部分发表的《关于德国的札记》也是恩格斯的这一类著作。《关于德国的札记》扼要地叙述了关于从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恩格斯揭示了德国历史上的分裂的原因、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原因。由于德国各邦特别是容克地主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采取冒险主义的反人民的政策，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问题，所以德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完成各项资产阶级的改革。

收入本卷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十分关注俄国和俄国革命运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密切注意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关心它的每一个步骤，高瞻远瞩地预言俄国革命的伟大未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很多时间研究了改革后的俄国的经济、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以及在俄国新形成的各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研究俄国的文化，学习俄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见本卷第598页）。

在阐明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新趋向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恩格斯指出，使俄国革命形势必然高涨的决定性因素是：工

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群众性农民运动必然壮大，这是农奴制垮台后对掠夺农民的报答。恩格斯着重指出，标志着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力量的是“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革命俄国的卓越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些文章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俄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流亡者文献》这一著作的第三、四篇，特别是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批判了以彼·拉甫罗夫和彼·特卡乔夫这些思想家为代表的七十年代初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派别。恩格斯揭露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历史观，认为他们根本不懂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原理。恩格斯对1861年以后的俄国社会关系作了总的分析，从而得出了结论：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在日益发展，因此农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必然瓦解。他激烈地批判民粹派把农民公社理想化，讥笑他们忽视沙皇专制制度同地主、资本家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恩格斯的这些批评意见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全面地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打下了基础，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这种全面的批判，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

恩格斯认为，关于波兰的未来这个问题也与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有直接的联系。《流亡者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本卷第628—631页），都提出了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再次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见本卷第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波兰人民反抗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同俄国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

收入本卷的著作、文件和材料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从1872年初到1875年4月这段时期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基本方

面，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过程。在反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但要有革命的原则性，而且还要清醒地估计现有的历史条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使迅速成长的工人运动认清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和前途。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二十九篇文章和文件。其中有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许多国际的文件、恩格斯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所写的文章、他的发言《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帝国军事法》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二十七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其中有六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恩格斯的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起草或审订的文件、他们在总委员会各次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的活动的总委员会的文件。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和文件时，参考了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手稿以及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加以核对和订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十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3月至1883年5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列宁指出，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世界历史时期“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正确地“了解了当时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64页）。

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作用而停止活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当时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建立和巩固欧美第一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依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经常总结和宣传这一斗争的经验，从一切卓越的运动中吸取具体教训，突出最重要最迫切的东西。他们根据民族发展的具体特点，帮助每个国家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正确地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进行独立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的。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科学理论工作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十分紧张地继续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从事研究工作，他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最新的现象，分析了俄国有关土地问题的大量资料和美国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丰富材

料，阅读了很多有关金融市场和银行的专门著作。此外，农业化学、地质学、生理学、物理学尤其是数学，也是他经常研究的对象。他还用很多时间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停止《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因为各国的一些社会党人在翻印这部著作，并对它的内容进行通俗的叙述。马克思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在理论和政治方面提出的问题给以有充分根据的答复，在紧急关头支持这一或那一社会党同阶级敌人以及同党内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

在这几年，恩格斯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继续撰写从1873年开始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这部著作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的那些唯心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在1876—187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加下创作了优秀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天才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恩格斯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从他写给欧美各国社会党领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作了非常伟大的贡献。他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通俗地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本卷一开始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革命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有重大的原则意义的两篇著作：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于1875年3月18—28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给倍倍尔的信。这两篇纲领性著作列宁在许多著作中深刻地说明了它们的意义的基本思想，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即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正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

义。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不断地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在实践中指导自己的活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标题是《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表述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

这部经典著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方面，比《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更进了一步。马克思根据各次革命的经验，根据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的经验总结了的国家学说，确定了一条重要原理：在历史上必然要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3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国家一定要消亡。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指的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即“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见本卷第31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分析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的原理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原理意味着将来国家消亡过程的长期性，它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消亡的期限和具体形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

予以解决,因为当时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列宁在论述国家的著作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胜利的时代的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苏联共产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国家、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各主要阶段的任务和职能的学说。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科学的分析,确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初级阶段(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充分发展阶段(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两个阶段的原理是马克思的天才预见。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他的再生产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分配的重要特点。他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获得“不折不扣的”即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一部分用作社会基金,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用来扩大生产、用作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等。

马克思指出,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并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他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实现的人们的平等,是指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相同的,即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人们以同等的劳动得到同等的报酬。马克思揭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实行社会产品分配的平均主义原则。马克思在批判这种观念时,从分析社会生产出发,认为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规律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它在

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降生时忍受种种痛苦而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马克思估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还不能够废除按照每个社会成员所耗费的劳动量而不是按照人们的需要来分配社会产品的原则。“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以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同时考虑到人们还没有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

接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天才的说明。他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22—23页）

《哥达纲领批判》虽然是直接写给德国工人党的，但实际上它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斗争纲领。列宁谈到《哥达纲领批判》时说：“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7页）

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同《哥达纲领批判》有直接的联系，这封信是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领导者写的，它表达了两位无产阶级领袖对德国当时存在的工人组织（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的共同观点，他们都反对爱森纳赫

派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向自己的思想敌人拉萨尔派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统一的工人党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实行合并，这就是说，拉萨尔派必须放弃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教条，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合并后的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后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个主要条件没有被遵守，并且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竟拟定了一个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时，他们就对这个草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了详尽的科学的剖析。

恩格斯的这封信有很大一部分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一些论点，批判了从拉萨尔那里抄来的词句：所谓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因而也包括农民在内只是“反动的一帮”，批判了拉萨尔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得出的“铁的工资规律”。纲领提出的唯一社会要求就是拉萨尔所主张的要“国家帮助”“生产合作社”。这就使人幻想无产阶级不必通过阶级斗争只要依靠德国反动的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就能获得解放。为哥达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这个纲领，根本无视对无产阶级斗争胜利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以及保持和发展这种团结的方式问题，组织工会以及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联系问题，对待罢工斗争的态度以及其他问题。

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所谓“自由国家”这种庸俗唯心主义的论点，所谓国家有超阶级性质的思想。因此他指出：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需要利用它所建立的国家，“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就是说当共产主义社会获得胜利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7页）。

恩格斯认为，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为公社所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占

少数的剥削者，因为全体居民代替了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对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就国家问题所表述的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6—429页）。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因为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德国。他们经常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给该党的领导人的信件中不断提出重要的实际的劝告和指示，要他们提防有碍党的健康发展的各种危险。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所进行的斗争有关的又一篇重要著作。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机会主义采取不调和的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的迅速增长以及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成了德国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严重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得到地主和资产阶级支持的俾斯麦，于1878年底在帝国国会中通过了一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党受到这一打击，一切合法活动都被迫停止了，实际上党本身已被宣布为非法。对于这个打击，党的领导是没有准备的。它惊慌失措，自己就通过了解散党组织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马上进行改组，转入秘密状态，着手秘密斗争来回击非常法。政府进行种种迫害而党的领导又没有立即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和革命性，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便很快地滋长起来。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另一部分在党内，特别是在国会党团内占据要位的党员，竟发表了露骨的取消主义的纲领，捧出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作为自己的思想家。

在《通告信》中，两位无产阶级领袖首先揭露了右翼首领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的言论的投降主义实质，这些

人在这份年鉴上宣扬露骨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见本卷第187页）两位无产阶级领袖尖锐地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这样的观点和行为是决不能容许的。为了尽力把机会主义者排除于党的领导之外，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宣称：“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见本卷第18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的调和主义立场，以无比的说服力揭穿了已经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通告信》非常有力而明确地论证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的立场以及他们的革命信念。他们写道：“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见本卷第189页）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态度坚决，机会主义者退却了。工人群众真正的阶级本能，两位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批评、劝告和帮助，纠正了德国党内的状况，使它在非常法实行期间，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条件下，能够加强自己的队伍，整顿党的组织，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了深入群众的正确道路。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通俗地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恩格斯这篇介绍马克思的文章有助于在德国

工人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恩格斯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他的忠实战友和朋友威廉·沃尔弗的这篇著作中，有一系列关于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总结。他写这篇著作，是为了使德国工人和农民记住1848—1849年斗争的革命传统，是为了介绍《新莱茵报》怎样把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光荣经验。

恩格斯写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也从思想上武装了年青的德国工人党。当时德国刚刚恢复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它不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那条道路，不是自下而上地通过顺利开展的民主革命来实现的，而是自上而下地在普鲁士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即军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下用“铁和血”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德国工人说明德意志帝国及其政府的阶级性和反动本性，说明这个政府的主子是“烧酒业的掌柜”这些容克们，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和大企业家。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为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派报纸《人民报》而作）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载于英国的《劳动旗帜报》）表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竭力向工人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实质及其统治者对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仇视态度，竭力向工人宣传这个政党的胜利斗争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竭力争取其他国家的工人给以同情和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育德国工人和各国无产者忠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经常把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告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特地亲自收集材料，撰写有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党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恩格斯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

进报》上发表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见本卷第110页)。这篇文章叙述在意大利工人中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在此以前,他曾向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报道德国党的胜利。本卷中恩格斯就1877年德国选举问题写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恩·比尼亚米的信,曾在上意大利联合会工人代表大会上宣读,随后又在《人民报》上发表。1878年1月,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

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无神论的立场出发,科学地解决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

恩格斯的《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和马克思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都是在1878年写的,这两篇文章评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分析了欧美建立工人党的斗争过程,宣传了第一国际的传统。

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到一些说明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基本事实,并指出,各地工人运动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尤其重要的是,运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工人们已经有了建立自己政党的愿望。无政府主义者连同他们宣扬的关于工人放弃政治斗争和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教条都遭到了失败。各国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已经找到保持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他们在国家的共同命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积极捍卫共和国不受君主势力侵害方面所表现的高度政治觉悟,给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法国农民的政治情绪开始转变,丢掉对波拿巴的幻想,奋起捍卫共和国,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号召法国工人尽快建立自己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号召法国农民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

恩格斯精辟地评述了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状况,认为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见本卷第155页)。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欧洲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必然改变的前景是同推翻俄国专制制度以及俄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号召各国工人欢迎俄国人民未来的胜利,“把它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见本卷第158页)。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其建立的地方,在自己的活动中,一般都遵循第一国际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需要所制定的伟大斗争计划。恩格斯写道,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见本卷第144页)。

马克思在《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中首先指出,七十年代后半期欧美工人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而且工人自己迅速建立了社会党。马克思认为,法国工人阶级在1871年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极端残酷的反动统治之后,又重新积极参加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一件大事就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捷克和俄国的斯拉夫人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可贵的特点,就是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经常地、有效地直接来往,交流经验和思想,这是第一国际多年活动的结果,它使各国无产者懂得在斗争中互相援助和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这位“岛国庸人”乔治·豪威耳(他是英国工联主义的活动家之一,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叛徒)看来,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失败了,国际已经“过时了”。马克思彻底粉碎了豪威耳这种伪造的论断,他在文章最后写道:“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

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见本卷第1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法国工人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们直接参加制定纲领性的文件，为正在创建的党规定政治路线。当刚刚成立的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于1880年到伦敦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他们起草纲领时，就已经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地讨论纲领的一切问题了，并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纲领的理论部分（见本卷第264页），或者象恩格斯所说的，得到了纲领的“共产主义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页）。法国工人党的纲领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弊病，它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促进法国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的建立和巩固，帮助它从思想上同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堕落为宗派主义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恩格斯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0年）。这部光辉的著作叙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恩格斯追溯了哲学发展的基本阶段，表明了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备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如何因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制定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而成为科学。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弱点，并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中证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有充分发展的自由，使社会生产有

可能按照预定的计划发展。人们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及其全体成员谋福利，这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说道：“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见本卷第 247 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恩格斯在向工人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曾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版专门写了导言。马克思在导言中称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及革命活动的主要事迹。马克思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 259、263 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为法国社会党人草拟的《工人调查表》，共有一百个问题。这许多问题有助于全面地弄清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济条件、体力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就能够确切地查明和揭露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式和方法，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领导工人运动。

《平等报》（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编辑部请求马克思允许刊登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马克思同意转载，并且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他指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的入门”（见本卷第 248 页）。

恩格斯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刊物上、特别是在法国工人中威信很高的对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起很大作用的《平等报》上发表文章，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平等报》上发表的一篇论述德国的著作（《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撕下了俾斯麦的假面具。俾斯麦把他所推行的、只有利于统

治阶级的措施——如实施关税率，把最重要的铁路变成帝国政府的财产——叫做“社会措施”。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揭穿了俾斯麦的蛊惑宣传，使年青的法国工人党受了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这篇著作驳斥了某些人认为在保持家本资和地主的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也可以前进到社会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作斗争，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工人阶级直接影响的结果。他们激烈反对歪曲无产阶级学说的革命原则的种种企图，同时还经常注意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另一种危险——宗派主义以及同它相联系的、信奉脱离生活的教条和只需死记的教条的学理主义。教条主义总是妨碍创造性地运用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理论，阻碍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得最多的是英美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表现。他们坚持不懈地号召英美社会党人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根除自己组织中的宗派主义情绪。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联刊物《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一十一篇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工人党》等）是无产阶级领袖越过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首领而直接面向工人群众的光辉范例。

这些文章的理论内容极其丰富，文体也十分明白易懂。恩格斯向英国工人说明，单有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组织的任务只是进行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斗争。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证明必须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他号召把工会变成群众的战斗组织，此外，还要建立领导这种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恩格斯号召英国工人要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准备成为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主

人，要亲自管理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整个过程。他写道：“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成为一种祸害了。”（见本卷第318页）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心美国的发展。马克思特别注意美国经济异常迅速的发展，资本的空前积聚过程，以及掌握了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的大公司日益增长的力量。恩格斯也要欧洲社会党人注意美国资本空前迅速积聚的过程，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见本卷第337页）。

极其迅速进行的资本积聚过程，日益增长的“垄断势力”以及大公司的影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美国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必然要同这个强大而无情的势力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要想不消灭大资本的权力而能改善自己的状况，那是一种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了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种种原因，并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未来也将属于与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现象同时增长的、人数众多的美国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积极地帮助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同时还继续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辞句来投机的瓦格纳实际上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效劳的学者。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的论断和结论时，在这篇评论中表述了价值理论的极重要的原理，解释并发展了《资

本论》第一卷所阐述的有关部分。

马克思在这篇评论中作了一系列的概括，概括了他对商品、对商品“二重存在”的基础即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所作的分析，这种劳动是一种“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见本卷第414页）。马克思对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谈到使用价值在他的分析中起什么作用，他指出，在他的分析中，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见本卷第414页）。

马克思以上这些话有力地回答了伪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顽固地重复自己的老“调”，硬说马克思创立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现实相矛盾的“抽象”体系。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书》一文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所研究的并不是某种纯粹抽象的、纯粹逻辑上的过程，而是现实经济情况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

本卷载有恩格斯的三篇手稿。其中一篇（《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论述了巴黎公社前夕的法国历史，十分有根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中的军事事变和梯也尔于1870年秋天同普鲁士人缔结贩卖性的停战协定的谈判。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篇手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恩格斯在研究问题时对研究对象了解得多么全面，对历史材料分析得多么深刻。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明了产生土地私有制的条件是怎样造成的，地产的集中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农民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权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法兰克人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恩格斯非常注意语言学 and 语文学。他深邃地研究了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对当时各语言学流派的情况十分了解，他仔细研究了这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有关日耳曼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问题的书籍，并对语言学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恩格斯论述法兰克方言的著作，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典范。

恩格斯于1862年发表的《马尔克》一文是同他研究古日耳曼人的历史有直接联系。关于这篇著作，恩格斯写信告诉倍倍尔：“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16页）恩格斯在《马尔克》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里，分析了日耳曼的土地关系发展的一般道路和农民的命运。

恩格斯在论述马尔克的这篇著作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和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要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就必须实现工农联盟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在这篇著作中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都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指出，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保证农业生产者（农民）能够组织并顺利发展大经济，利用大经济的一切优越性（使用机器，采用科学上和技术上的成就等），从而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收入本卷的许多著作都以不同方式提到了俄国，估计到俄国的状况和作用，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俄国成了日益发展的全欧事件的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它正处在伟大的革命转变的前夜。1878年1月，恩格斯在《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对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写道：“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见本卷第133页）一年以后，

他又指出：“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见本卷第171页）

在专门论述俄国和写给俄国读者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般理论见解和政治见解，是惊人的丰富，这是他们清楚了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结果。

七十年代的俄国正处在由落后的半封建制度向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过渡的转变时期，这是社会对抗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增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俄国当时处在极其伟大的革命的前夜，这个革命的结果必定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这首先意味着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从七十年代最初时起，马克思就着手对有关俄国土地占有制和整个土地关系的原始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俄国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材料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页）

马克思通过他和俄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们在社会、文学和友谊方面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俄文书籍、各种文件和杂志论文。很多极其宝贵的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同俄国革命者、同俄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的直接来往得到的。同俄国新闻记者的广泛通信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了解俄国。从洛帕廷、拉甫罗夫、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丹尼尔逊、卡布鲁柯娃、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的信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很多极宝贵的资料。

马克思根据俄国的材料研究了俄国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随即又进一步熟悉有关俄国和俄国人民的生活和发展的种种材

料。通过俄国优秀的社会经济著作和卓越的文学艺术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一生中对俄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能看到，俄国人民的革命自觉性是怎样提高的，对剥削者的反抗是怎样不断增长的，反对沙皇制度、反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人民斗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不知道有哪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16页）。

在本卷发表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中，马克思谈到俄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趋势，谈到俄国在1861年以后的时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同时他驳斥了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中所强加给他的观点，说什么他和俄国自由派一样，也认为俄国必须立即消灭农村公社，以便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理论变成“万能钥匙”，似乎用它可以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而不问其历史环境如何。为了回答俄国是否要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问题，马克思要求人们首先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估计到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在1877年曾设想，推翻沙皇制度已为时不远。俄国革命会给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有利的环境，而西欧的无产阶级又会帮助俄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的不发展大工业而只依靠公社就能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幻想，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81年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另一封信也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俄国的人民革命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才能肃清从各方面排挤俄国农村公社的“破

坏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情况下，某些民族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上述两个文件中提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已为实际生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资本论》在俄国社会党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代表自己的同志即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请求马克思谈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公社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在接到这封信（以及“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从彼得堡寄来的另一封同样的请求信）之前，曾下很大功夫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俄国农村公社和内部制度的状况。在接到这些请求以后，他又进行了大量工作来综合以前研究过的材料。

从《遗稿》部分所载的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的几个初稿可以看出，他在作出最后的比较简明的回答之前，对于每一个说法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他在事先拟好的几种复信中表述了一系列的原理，涉及的问题有：原始形式的集体生产的性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条件，农村公社解体的根源及其在俄国“得救”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农民受剥削的各种形式，土壤贫瘠和土地肥力递减的种种原因，“农业中大规模组织合作劳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有利于在俄国实行土地“机器耕种”和合作劳动形式的各种情况。

对于广大读者和各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几个复信初稿中所包含的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卷发表的《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在现有的马克思论述俄国的大量手稿材料中占特殊的地位。从札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写这篇《札记》（1881—1882

年)之前,就已经着手对他所研究的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对他所积累的材料进行分类和综合。《关于改革的札记》一文与马克思笔记中其他有关俄国的材料不同,这篇札记整个说来,是马克思自己对问题的叙述,而其他一些材料大部分是他所研究过的资料的摘录以及对这些摘录的评语,也有些材料是他的读书提要和自己的见解。

《关于改革的札记》一文是马克思对我国进行深入研究的确切结论,它体现了作者晚年的创作活动,表明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对俄国人民及其状况和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1881年8月举行的斯拉夫人大会的信中指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是日益迫近的俄国革命的征兆之一。那时他们已经预见,不断发展的俄国革命一定会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因此他们欢迎即将到来的“俄国公社”(见本卷第270页)。

两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1882年1月21日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中称俄国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观点,对波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卷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几个文件,特别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都是谈论波兰问题的。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了。本卷所发表的恩格斯的几篇文章——《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都是为纪念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而写的。这些文章对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做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些文章还包括各国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以及恩格斯对他的伟大战友和朋友死后

遗留下的遗稿的初次报道。

马克思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见本卷第3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且把它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把理论变成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大武器。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七篇文章。其中有马克思的《关于〈哲学的贫困〉》和《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恩格斯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以及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三篇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篇文章的标题从原文或生前发表时所用的标题，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收集了恩格斯的两部主要著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这两部著作是1873年至1883年这一时期写成的。恩格斯对它们的某些补充，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即1883年以后才作的；其中最重要的是1885年写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

1873—1883年这十年是资本主义迅速地但是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欧洲先进的工业国家来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正如列宁指出的，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了垄断组织的急剧增长。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它完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

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的最重大的全世界历史事件是巴黎公社（1871年）。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初次实践经验证明：没有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之上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一些国家建立这样的政党的任务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

巴黎公社使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未来统治害怕得要命。随着开始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同时发生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反动派日益穷凶极恶。由于工人运动变成一支实际的力量，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掌握了先进工人的头脑，马克

思主义受它的思想敌人的攻击也加强了。

资本主义的特别迅速的发展和这种发展所引起的特别尖锐的矛盾，在德国也出现了，当时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并且后来随之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因此，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了。在这里产生了第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当时在德国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中最危险的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欧·杜林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形形色色的庸俗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庸俗经济学和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折衷主义混合物。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而杜林却与众不同，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组成部分，妄图建立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体系。

还在1875年以前，杜林体系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部分成员中散布开来。从1875年起，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以后，杜林体系的危险性就变得特别显著了。

甚至党的一些有影响的活动家也愿意接受这种新生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党还没有完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就成了实际的威胁。问题涉及到德国工人党的理论原理，涉及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先进队伍的命运。因此必须捍卫、发展和广泛宣传马克思的学说。

恩格斯认为他的党内义务就是把在年青的党的队伍中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工作承担起来。恩格斯在两年当中（1876—1878年）写了一部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反杜林论》的巨著，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作了完整的阐述。从1877年初到1878年中，这部著作曾在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刊载。后来，恩格斯本人也说明了为什么同杜林进行斗争的任务正是落在他的肩上：“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5页）

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反杜林论》的写作。他不仅积极促使恩格斯下决心对杜林体系进行反击和完全赞同恩格斯拟定的整个著作的计划，而且还大力帮助恩格斯搜集必要的资料，了解全部手稿工作，而批判杜林的政治经济学史观点的那一章，就是他亲自写的。因此，《反杜林论》自始至终都反映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的观点。

虽然杜林体系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本身未必值得恩格斯在书中对它做那样严正的批判。促使恩格斯做这样详细批判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杜林是当时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特别是在对工人有影响的具有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的那种假科学和庸俗民主主义的典型代表。必须使工人运动摆脱这种“幼稚病”。第二，批判杜林在三大卷书中表述的“体系”，可以使恩格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问题的理论，从而与杜林“体系”相对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导言中写道：“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7页）对杜林体系的否定的批判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阐述。这样，《反

杜林论》的读者就能够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掌握它。

后来，恩格斯在谈到《反杜林论》的这个特点时指出：“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9页）

《反杜林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百科全书。书中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9页）

恩格斯的这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三十年发展的独特总结（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产生到七十年代中）。这本书集中地叙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成果。恩格斯在书中出色地运用了马克思和他制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恩格斯广泛地利用了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全部渊博的知识，多年来在自然科学和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合写《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就日臻完善的卓越的论战技巧。恩格斯在书中广泛地利用并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材料和当时还没有发表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原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它作了重要的发展。他在这本书中对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表述，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

《反杜林论》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恩格斯的这本书是在哲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的典范。“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7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并论证了唯物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论点——“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见本卷第48页）。恩格斯在阐述关于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离性这一辩证学说时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见本卷第65页）这本书也发展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唯物主义解释：“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见本卷第56页）

同时，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门科学的对象：“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54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引论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史的几个主要时期的看法，指出了在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几种方法交替的规律性：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从原则上解决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发展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研究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这个认识论中极重要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映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后来列宁把它们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

恩格斯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指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能使我们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恩格斯考察了这样一些问题，如生命的本质，它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阶级的产生；社会平等问题；自由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法；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军事的物质基础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从而大大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恩格斯在该书的经济学部分详细地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区分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这门科学的历史性；他在强调生产的首要地位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交

换和分配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概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观点。在马克思写的一章中，阐明了政治经济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详尽地说明了弗·魁奈的《经济表》的意义。

通过对杜林的假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全面破产。他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简直使生产力无法进一步发展，同时揭穿了把国家资本主义现象美化为社会主义现象的企图。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特别提出了它的计划性。他表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分配……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见本卷第218页）他揭示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他认为，通过价值间接调节生产和分配必然要过渡到通过计算生产某种产品所必需的时间来直接调节生产和分配。恩格斯指出了合理配置生产力和消灭城乡对立的必要性。最后他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的性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是考察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在该书的第三部分透彻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恩格斯在书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这一原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对立的研究成果，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恩格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每一单

个企业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它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得到解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

恩格斯在揭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时，科学地预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点。他指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手中，随着新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确立，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就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生产力开始不断地经常地迅速发展。在这一基础上，使人片面发展的分工逐渐消失。社会全体成员都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将由沉重的负担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阶级差别将被消除，国家将消亡。对人的支配将由对物的支配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家庭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宗教将消失。人们成为社会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因而也成为自然的主宰。人类将完成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飞跃。恩格斯预见未来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方面的空前进步。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发挥这一思想时写道：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见本卷第 375 页）。

恩格斯这本书中所包含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无比丰富的思想，对于现时代，即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为内容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实际重要的意义。

《反社林论》的思想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反社林论》成了“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见《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 页）。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作为连载论文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中央机

关报《前进报》上的。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从报纸上阅读了这部著作。许多人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反杜林论》的发表在这时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杜林论》在报上全文发表以后，立即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在恩格斯生前又再版了两次。恩格斯把该书的三章作了修订，以单独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3页）——还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翻译成欧洲的所有主要的语言，因此，《反杜林论》的思想内容成了广大群众的财富。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1877年，杜林分子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企图禁止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以后，恩格斯的这本书在德国被查禁。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碍，恩格斯的这本书完成了它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上的胜利。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列宁在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的斗争中充分地利用了这本书。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中，不仅恩格斯这本书的理论内容，而且连它的论战技巧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恩格斯的这部天才著作具有永不磨灭的意义，因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之不尽的宝库，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敌人——各种修正主义者、折衷主义者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击破的观点多少相似）的思想武器。

还在开始写作《反杜林论》的前几年，恩格斯就已着手写作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的巨著。在1873—1876年这三年中，恩格斯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写了这一著作的导言。恩格斯结束了对社

林体系的批判以后，又重新回过来写作《自然辩证法》。这就开始了制定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工作的决定性阶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多年的研究进行总结的阶段。

在十九世纪的几十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同生产的需要多少有直接联系的那些自然科学部门的蓬勃发展。

十九世纪初叶，特别是中叶，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领域中都获得了一系列卓越的发现和成果。查明了新的事实和规律，建立了新的假说和理论，产生了新的科学部门。

自然科学的这种胜利进军的最光辉的标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三个伟大的发现：细胞理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学说。1838—1839年，马·雅·施莱登和泰·施旺确定了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同一性，证明细胞是有机体的基本结构单位，并创立了各种有机体结构的完整的细胞理论；这就证明了整个有机界的统一性。1842—1847年，罗·迈尔、詹·普·焦耳、威·罗·格罗夫、路·奥·柯尔丁和海·赫尔姆霍茨发现并论证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因此整个自然界表现为普遍的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1859年，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问世了，它发展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进化思想，成了整个现代生物学的基础。这些发现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们以最集中的形式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但是，由于新的自然科学材料的辩证本性和自然科学家中间流行的形而上学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发展遇到了阻碍。

必须从哲学上概括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必须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由于当时马克思全神贯注地写作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所

以恩格斯就承担了解决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进程所提出的新的理论的任务。在恩格斯摆脱了曼彻斯特公司的工作并迁居伦敦以后，才有承担这项工作的实际可能性。但是，由于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国际的活动，恩格斯只是从1873年初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问题的兴趣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从马克思年轻时写信给父亲谈到自己学习自然科学的情况开始，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几年独立写作有关数学的著作为止，都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如何不断扩大和深入的。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建立完整的世界观的过程中，不仅批判地改造了他们以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成果，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总结了他们当代的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否则就不可能赋予唯物主义以新的辩证的形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见本卷第13页）

马克思在1863年写的有关《资本论》的准备著作中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自然科学“构成一切知识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有独特的分工。马克思对数学以及技术史和农业化学颇有研究；同时他也研究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和恩格斯不同，他更多地研究了数学和实用自然科学。恩格斯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有研究；同时他还研究了数学、天文学、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和马克思不同，他更多地研究了理论自然科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以前的即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写的著作中有许多事实，说明他们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最初开始这种研究是在 1851 年，当他恢复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后，他为了深入研究工艺学和农艺学，就开始专门研究技术史和农业化学。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机器的一章中，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制定地租理论时就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在五十年代，恩格斯也开始对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马克思直接开始写作未来的《资本论》的初稿以后，在这个工作进程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必须专门研究数学。他从 1858 年开始研究代数，然后是解析几何，微积分。后来，这些研究具有了独立的意义。这时恩格斯也开始研究物理学和生理学，以便利用这两门科学的成就（其中包括细胞理论和能量转化学说）来进一步发展辩证法。1859 年底达尔文的主要著作的问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达尔文的书出版后，恩格斯没用几天就把它读完了。马克思在 1860 年底读到这本书时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关于达尔文的伟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作了经典的说明：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31 页）。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更加广泛了。他们研究了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其他各种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阶段是从 1873 年开始，一直继续到 1883 年马克思逝世以前。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继续扩大和深入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时着手写作独立的著作。马克思写了数学手稿的最重要的部分，辩证地

论证了微分学。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已经不可能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了。但是，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写作的许多著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和自然科学的新材料。

因此，在1878年，即恩格斯清算了杜林并着手写作《自然辩证法》中的几章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对全部自然科学的多年的研究经验了。

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见本卷第13、15页）。因此，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中的客观辩证法，从而论证自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必要性；从自然科学中排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可知论和庸俗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提供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从而论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普遍性。

为此目的，恩格斯运用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他利用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一百部著述：在数学方面有沙·波绪的书，在天文学方面有约·亨·梅特勒和安·赛奇的著作，在物理学方面有罗·迈尔、海·赫尔姆霍茨、威·罗·格罗夫、威·汤姆生、鲁·克劳胥斯、克·麦克斯韦、古·维德曼和托·汤姆生的书，在化学方面有亚·诺曼、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的书，在生物学方面有查·达尔文、恩·海克尔和亨·阿·尼科尔森的书；他还充分利

用了《自然界》杂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情况，恩格斯没有能够利用当时不太闻名但是历史上却很重要的学术著作，例如罗蒙诺索夫、洛巴切夫斯基、里曼、布特列罗夫的著作，以及麦克斯韦关于电磁场理论的著述。

尽管《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其中有些部分还是草稿和片断的札记，但是这部著作是由一般的基本思想和统一的严整计划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史（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广泛材料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结蒂是由实践的需要，即生产的需要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全面地考察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揭示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证明：“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回复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摆脱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见本卷第357、546页）。同时恩格斯也向自然科学家们提出了任务：必须自觉地掌握辩证方法。

恩格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运动、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原理，具体地说明了辩证法的定义，表述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同时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见本卷第402页）。

《自然辩证法》的中心思想是物质运动形式的分类，和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的相应的分类。低级的运动形式是简单的位置移动，高级的运动形式是思维。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形式是：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运动。每一种低级的运动形式通过辩证的飞跃转变为高级的形式。每一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本身包含作为从属环节的低级形式，但是并不转化为它。根据这种关于

物质运动形式的学说，恩格斯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分类法，其中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见本卷第593页）。

依据这一中心思想，恩格斯彻底地考察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辩证内容。同时，他在数学中特别提出数学抽象的表面的先验性问题，在天文学中提出太阳系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在物理学中提出能量转化的学说，在化学中提出原子论问题，在生物学中提出生命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细胞理论、达尔文主义。恩格斯在这里制定的人类起源于劳动的理论构成由自然科学向社会史的过渡。

恩格斯在考察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只是简单地说明这个或那个自然科学的发现，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阐明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就。譬如，在谈到罗·迈尔以及确立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其他一些学者的发现时，恩格斯指出，在这一发现中特别新的东西就是对自然界的绝对规律的表述：任何一种运动形式能够而且必定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恩格斯认为：能量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是不可消灭的，在无限的宇宙中，任何一种运动形式在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时本身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他以这个原理丰富了对能量守恒定律的理解。又如，在谈到达尔文的发现对全世界的历史意义时，恩格斯指出，达尔文不注意有机体改变的原因，同时恩格斯也批判了把“生存斗争”绝对化的片面观念，强调环境对有机体发展的作用以及作为有机体的决定性职能的新陈代谢的作用。

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拟定了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途径，预先料到了以后的一些科学成果。例如，恩格斯解决了运动的两个量度的问题；在分析当时关于电的学说中的矛盾时，他就预先料到了电解的理论。

和当时大多数的学者不同，恩格斯捍卫并发展了关于原子的复杂性的思想：“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见本卷第 614 页）恩格斯天才地预见作为数学上的各次的无限小的类似物的粒子的存在。现代的物质结构学说证实了并且还继续证实恩格斯关于原子的复杂性和无穷尽性的观点。同样，在阐述把物质看作吸引和排斥的统一体这个观点时，恩格斯指出了在原则上可能存在一种物质，这种物质，用现代物理学的语言来说，没有静止质量。这同样也被二十世纪的发现证实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最先表述了生命的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见本卷第 646 页）这个定义是研究生命的起源和本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恩格斯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制定人类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卓越的论文中，恩格斯以非凡的技巧阐明了劳动、工具的生产对人体的形成和人类社会的建立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由于漫长的历史过程，猿类祖先怎样发展成为与它本质上不同的生物——人。

在所有科学部门中，恩格斯支持先进的观点和理论，对它们十分重视并加以发展。例如，他对创造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伟大的俄国学者德·伊·门得列耶夫的科学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恩格斯也坚决反对那些已经不适合科学的最新成就并阻碍研究工作向前进展的观点。例如，他深刻地批判了鲁·克劳胥斯、威·汤姆生、约·劳施米特关于所谓宇宙“热寂”的假说。恩格斯指出：这个流行的假说是同正确理解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相抵触的。恩格斯关于运动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是不可消灭的和宇宙“热寂”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一原则性论点，指出了先进的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的辩证法，在这部著作的整个写作进程中，

对科学家的各种反科学的倾向——庸俗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及片面的经验论、机械论、降神术和其他宗教思想的各种影响，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不言而喻，由于几十年来所有自然科学部门的蓬勃的革命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中的某些部分，首先是恩格斯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材料，不可能不显得过时了。例如，恩格斯所依据的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假说就已经过时了。机械的以太假说已被彻底推翻。据查明，电流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的速度。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涉及〈自然辩证法〉的实质。这本书的总的方法论和总的观点现在和将来都有永不磨灭的意义。

〈自然辩证法〉中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恩格斯在书中以非凡的力量表明了理论思维和方法对认识世界的作用。“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因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不解”，而辩证法恰恰“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见本卷第399、555页）。

〈自然辩证法〉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更充分地研究了辩证法的这样一些问题和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判断形式的分类、归纳和演绎的相互关系、作为自然科学发展形式的假说的作用，等等。

这部天才的著作尽管没有完成，但是它的理论内容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自然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恩格斯在书中发展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指出了解决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方法。

恩格斯没有能够写完〈自然辩证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又承担了出版马克思的手稿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责任。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

库中藏了三十年之久。它于1925年在苏联第一次出版。

《自然辩证法》中的某些原理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已为读者所知悉，因为恩格斯在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首先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都利用了这些原理。

《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在列宁的天才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的这部著作对二十世纪初期积累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作了哲学上的概括。这些思想又在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纲领性论文中得到了发展。列宁生前没有看到《自然辩证法》，但是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在所有的原则性问题上都得出并向前发展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表述的那些结论和原理。

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并且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普兰克、波尔、德布洛伊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统一的原理在自然科学上的证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恩格斯关于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的原理具体化了。现代的元粒子理论出色地证明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原子和电子的无穷尽性的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学方面的结论也同样得到了证实。控制论和许多新产生的自然科学部门，象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学、宇宙生物学等等实例，都完全证实了并且还在证实着恩格斯的这一预言：正是在各门科学的交接点上可以指望获得最大的成果。

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经过历史检验而获得的结果。过去几十年的事例表明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必须相结合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个要求将来还会显出更大的意义。

《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已由近百年来的全部历史进程所证实；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全部实践也使它们不断地丰富。恩格斯的这两部天才著作的不朽思想今后将照耀着原子能、控制论和征服宇宙时代的科学发展的道路，照耀着社会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时代发展的道路。

* * *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两部著作基本上是按照《反杜林论》（1945—1957年版）和《自然辩证法》（1941—1955年版）的单行本刊印的。在《反杜林论》的旧俄文版本中，恩格斯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所做的补充是用方括弧括起来的，而且没有附入《反杜林论》正文的相应部分，而在本版中，这些补充则被放到卷末的《〈反杜林论〉材料》这一部分中。从《反杜林论》的《附录》中去掉了恩格斯本人把它们列入《自然辩证法》的那些材料——它们只编排在《自然辩证法》的正文中。《附录》的所有其余部分都列入了《〈反杜林论〉材料》这一部分。

在《自然辩证法》的末尾，载入了我们得到的这部著作手稿上的由恩格斯草拟的各束名称和目录。

在校订《反杜林论》的正文的过程中，发现并改正了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三版中的一些刊误。本书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

在校订《自然辩证法》的正文的过程中，对恩格斯手稿的某些地方辨认得更准确了，而在一个地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得到的“地球中心的观点……”这一片断的完整而准确的原稿照相，恢复了旧原稿照相中缺少的这一片断的最后两行字。在《自然辩证法》的译文中，有个别地方做了修改。

本卷的参考资料，比《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两个单行本，有很大的充实。

第二十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收集了恩格斯在1883年5月至1889年1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相对的“和平”发展的时期，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前提开始形成、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积聚力量的时期。列宁在论述这一时期时指出：“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页）

八十年代，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参加运动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有增无已，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的财富。在两个最大的西欧国家——德国和法国，已经出现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一些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等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起来，或者正在巩固。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开展了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的提高，为解决经过第一国际的活动而提出的一项基本任务，即在各国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指南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这项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斗争；必须彻底在思想上粉碎工人运动内部继续存在的、在各国因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的特点不同而具有不同形式和色彩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流派。对年青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来说，愈来愈大的危险是，资产阶级通过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和利用工人阶级队伍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等手段，企图分裂和瓦解工人运动。同这种企图进行斗争就成为工人运动的迫切任务。

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在进一步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所进行的活动，为纯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反对非无产阶级的影响和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承担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使命。为了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和实际需要，恩格斯认为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的脱稿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花费了许多精力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问题，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歪曲，根据无产阶级的总任务结合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制定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路线，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了先进工人。

收入本卷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是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列宁曾指出，这部著作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对早期阶段的人类历史作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阐述，论证了家庭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私有制的发生、社会分为各对抗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的国家出现的原因，最后，论证了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胜利时国家必将逐渐消亡。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使工人运动活动家掌握了深刻的科学论据去揭露那些力图证明私有制、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制度不可动摇的资本主义辩护士、讲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

义的其他敌人。

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用他本人的话说，可以说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马克思从他们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起就十分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采用了马克思在美国进步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这本书提供的材料证实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许多结论）的笔记中所写的意见，同时也依据了自己研究古代凯尔特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的社会制度的材料。恩格斯的这部经典著作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年来形成的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分析了这些社会经济形态，并且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社会的深刻阐述，补充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科学描述。这样，对世界史的整个发展过程的真正科学的解释便有了进一步的具体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阐明了家庭的演变。恩格斯把家庭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加以考察，从而揭示了家庭形式——从古代的群婚制到私有制确立后形成的对偶家庭——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有机联系、家庭形式对生产方式的改变的从属性。他证明，生产力越发展，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就越小；随着私有制的胜利，出现了“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的社会（见本卷第30页）。

恩格斯对现代资产阶级家庭作了尖锐的批判。他揭露在私有制统治下妇女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并说明，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与男子完全平等，摆脱家务的重担，社会逐渐把这一重担承担起来，这时才能建立以两性的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新型

的高级家庭。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考察了所有制的各种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各种形式对它们的从属关系。同一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反，恩格斯无可置辩地证明，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历史的漫长的时期中生产资料是共有的。当时的社会以氏族和部落（它们在某个阶段代替了原始群）为基本单位，这样的社会没有阶级分化，没有由此而产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没有同人民分离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因而出现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样，社会便分裂为各对抗阶级。其直接的结果是国家的出现。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是恩格斯著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基本要点。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考察是制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方面，他的著作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以及他本人的著作《反杜林论》是相衔接的。

恩格斯的著作直接驳斥了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竭力把国家说成是一种一视同仁地保卫一切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恩格斯通过古雅典、古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实例，透彻地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国家从它产生时起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统治工具。恩格斯写道，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机关，“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196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考察了各种具体的国家形式，包括被资本主义辩护士吹捧为最高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恩格斯揭穿这种共和国的阶级本质，认为这种共和国是披着民主外衣

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恩格斯以非凡的洞察力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当时已经有了进一步演变的趋向。这种趋向后来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更加明显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是国家机器同垄断组织结合的过程，是国家变成金融寡头的工具的过程。恩格斯当时已经发现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他指出，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份公司愈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实现”（见本卷第197页）。

针对当时一部分工人运动活动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中流行的对议会的幻想，恩格斯警告说，当存在资本的权力的时候，任何民主自由本身都不能导致劳动者的解放。同时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关心保持和扩大民主自由，因为它能够为无产阶级开展争取革命地改造社会的解放斗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恩格斯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在一定阶段上出现私有制和社会分裂为各对立阶级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也必然使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变为生产发展的直接障碍。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只有打碎旧的、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新型国家——即作为最高的民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它。只有在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各对抗阶级的基础上，国家才有消亡的可能。“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本卷第198页）

后来，列宁适应新的历史时代全面地发展了恩格斯精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又继续发展了这个学说。

列宁在天才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及其阶级本质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提和歪曲这一学说的偷天换日手法给以反击，揭露他们故意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论点曲解为不要用革命的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指出，这个论点不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说的，随着国家履行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职能，国家才将消亡。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了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的原理，并把这个问题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联系起来。他宣称，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于企图复活关于国家是超阶级的虚伪“理论”、故意把现代帝国主义国家描绘成“全民福利国家”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致命的打击。这个学说正在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劳动人民顺利地建设新的无阶级社会。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根据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志学等方面的大量实际材料写成的。他充分利用了自发唯物主义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也同意摩尔根把原始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并根据劳动工具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水平把这两个时期各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划分方法。恩格斯认为，这种历史分期的原则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它不是以各种生产关系的更替，而是以原始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的。他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新的实际材料的积累，摩尔根的分期法必将得到订正。正象恩格斯所预见的，现代科学的资料为建立原始社会制度

的更完善的历史分期法和对摩尔根关于某些原始家庭形式的个别论点进行一系列订正(恩格斯本人在1891年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四版时已经部分地进行了这一工作)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对恩格斯在七十五年前关于原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具体描述所能作的修改和订正,只牵涉个别的细节,而丝毫不涉及基本结论。这些结论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现在仍被新科学材料证明是正确的。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用列宁的话来说,“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另一部卓越的理论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非常透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并揭示了它的本质。这部著作也是为适应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而写的。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能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有强有力的武器来对付作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一切唯心主义理论。必须反对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消极方面并用它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必须反对散布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学说的反动因素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其他哲学流派。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待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前的一切哲学体系的原则性的和本质的区别,揭露它们的弱点和内部的矛盾,同时必须指出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并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的那些积极的和合理的部分。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全部哲学史的最重要的特点。恩格斯最先给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下了精辟的定义,同时强调说,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世界的可知性、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属于哲学的两个阵营中的哪一个阵营，就看他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怎样的回答。

恩格斯指出，用建立中间哲学（二元论、不可知论）的办法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行不通的。恩格斯在证明世界的可知性时，驳斥了不可知论的一切表现。他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见本卷第 317 页）

恩格斯的最大的功绩在于：他通过各哲学派别斗争的全部历史，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哲学派别的斗争，正如他所指出的，是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反映。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哲学中无产阶级党性和原则性的典范，是热忱捍卫先进的世界观、坚决驳斥反动的唯心主义流派的榜样。

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并指出辩证方法是它的进步的一面；同时他认为，这一方法被黑格尔神秘化了，被唯心主义外壳弄得面目全非了。恩格斯揭露这一方法同教条的和形而上学的整个黑格尔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他说明，马克思如何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利用它的合理的内核，即辩证的发展理论并把它同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

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之一，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它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性质。他指出，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其它代表一样，虽然承认自然对精神的第一性，但是不能克服对人类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看法上的唯心主义。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见本卷第 335 页）。

恩格斯揭示了由于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而在哲学上完成

的革命转变的实质。他写道：“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337页）他详尽地分析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它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一切形式和类型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和哲学在内。同时他强调意识形态这一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它的独立发展的能力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恩格斯指出，决不容许以忽视和贬低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的态度来庸俗地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从唯物主义立场阐明了宗教的产生、社会根源和反动本质。恩格斯关于先进哲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成就是不可分割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着重指出，反映先进阶级改造社会的愿望的革命世界观也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找到根据。

恩格斯指出，以反动资产阶级的明目张胆的思想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在科学上破产和没落了。只有工人阶级思想家才能够继续发展并向前推进理论。恩格斯最后说，他们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继承者。

收入本卷的许多著作反映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活动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要完成和准备出版《资本论》，还要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恩格斯认为，出版《资本论》是他在马克思逝世后对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一项重大的义务。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论》各卷问世后，科学共产主义便有了不可摧毁的基础，一切官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将被击溃。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问世，恩格斯又为第三卷工作了将近十年。1894年第三卷问世。

与此同时，恩格斯先后为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4年）和第四版（1890年）进行了工作，仔细地校订了《资本论》

的英译本(1887年出版)。恩格斯根据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本人的意见对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作了许多修改和更正,并给这两版分别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32、38—44页)。他给英文版另写了一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7页)。1885年第二卷出版时,恩格斯写了长篇的序言,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为了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威信和阻挠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传播,不惜采用一切卑鄙的手段,直到进行下流的诽谤,他们诬蔑马克思剽窃了德国资产阶级容克地主的经济学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之父之一的卡·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0—25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这是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并经过他校订于1885年出版的)的序言同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是直接相衔接的。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给予洛贝尔图斯的辩护者——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集团的代表以歼灭性的打击。在这里,恩格斯揭露洛贝尔图斯观点中的反动的空想,认为他的“劳动货币”论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理论完全不懂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价值规律是通过竞争起作用的,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商品的价格经常背离它的价值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情况,才能显现出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批判地接受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作了严格的科学的阐明并根据经济事实,而不是道德的要求,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恩格斯揭露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的反动观点,他们说什么普鲁士国家是超阶级的,它能够完成改善劳动者的处境这种特殊的社会使命。“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力图用这种观点来为他们向俾斯麦政府献媚、向它实行的骗人的“社会改革”喝采作辩护。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同恩格斯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篇文章对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首领、机会主义者海德门(笔名为约·布罗德豪斯)翻译的第一卷第一章前几节的译文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证明,恩格斯毫不容忍对马克思著作有任何的歪曲,他十分重视正确翻译《资本论》的工作。恩格斯对《资本论》的俄译文特别关切,他经常同第二卷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保持联系并帮助他快点出版俄译本。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工作的同时,继续注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现象。在为马克思的演说《关于自由贸易》美国版写的一篇序言《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中,恩格斯说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关税制度逐渐会由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变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同时,恩格斯指出了成立大股份公司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变成垄断组织‘美孚油公司’,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见本卷第427页)他认为,这些垄断组织是反人民的,它的矛头不仅指向外国的竞争,而且指向本国消费者的生活利益。

恩格斯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这一时期还实际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写道:“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0页)他时刻注视无产阶级的斗争,亲自同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美国、荷兰、奥地利、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领袖们联系,仔细地研究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报刊。他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的作用,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丰富的书信遗产中,反映在他同欧美工人运动活动家来往的大批书信中。恩格斯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有关各国历史和经济的渊博知识,因而他的建议和指示总是具体的。他根据

各国发展的历史特点，帮助解决工人阶级的最复杂的策略问题。他时刻关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上的建设和思想上的巩固，帮助它们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并且向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这个时期，恩格斯特别注意德国工人运动。收入本卷的许多文章指出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统一是以容克普鲁士为首“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资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软弱性和怯懦性，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残存着大量半封建关系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这一切使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德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德国是第一个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1878年俾斯麦政府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党不得不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进行工作。恩格斯给予德国党很多帮助，向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批评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并帮助他们克服错误。八十年代，恩格斯帮助社会民主党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大胆地把合法工作和非法活动结合起来；党在工人中间的威信和影响日益增长，1890年终于使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

恩格斯认为，用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党和工人群众，彻底战胜拉萨尔主义的改良主义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流派，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恩格斯在他的《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这些反无产阶级流派在德国尚有许多代表，他们是讲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他说，在德国“这个市侩气占优势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见本卷第376页），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此，恩格斯认为深入研究被讲坛社会主义者歪曲了

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恩格斯没有可能完全实现他写作上述历史的计划，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革命斗争各个时期的历史的许多文章，组织再版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和革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并为它们写了序言。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时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阐明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特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起的作用说明了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正确的策略领导的历史意义。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把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他以马克思在1848—1849年采取的策略为例，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夺取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而斗争，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并坚决揭露统治阶级用虚伪的诺言欺骗无产阶级的手法。

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恩格斯阐明了这个最先宣布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他指出，建立这个组织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包括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的重要阶段，他揭穿了拉萨尔分子散布的所谓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渊源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种奇谈。恩格斯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宗派主义派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开始就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同这一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非常法的年代里，对德国工人阶级来说，充分利用1849—1852年反动派猖狂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再版马克思在1849年审判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科伦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和马克思的抨击性的小册子《揭

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的发言是共产党人利用资产阶级法庭公开捍卫革命观点的典范。恩格斯激愤地揭露德意志帝国政府迫害社会党人所依据的资产阶级“法制”。恩格斯的这篇序言还直接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准备放弃基本革命原则，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德国小市民阶级政党来换取废除非常法的保证。

收入本卷的《1889年鲁尔矿工的罢工》一文，说明恩格斯对德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极为重视。他经常要求党的领导人这样做，并且认为吸引工人阶级新队伍参加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用一切方法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对农民的正确策略。他经常设法使它重视农民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准备以通俗的小册子的形式再版他的著作《马尔克》，并着手修订《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以便重新出版。这两部著作，象其他一些著作一样，论证了工人阶级必须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这是农民摆脱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唯一现实的道路。

恩格斯在这方面写的《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揭示了普鲁士农民农奴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说明，地主被迫——由于反拿破仑战争，以及后来1848年的农民革命运动——废除封建义务时对农民是怎样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被地主掠夺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同盟者。

上面提到的《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也同这个问题有密切联系。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分析德国家庭工业状况时指出，家庭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非常低；由于这些工人还继续同农业保持联系，资本家有可能不仅只给他们几个小钱，而且还有可能压低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同时，恩格斯还指出，这种家庭工业的盛行

是由于小农破产和他们变为无产者而造成的。因此，劳动人民的广大阶层拥入无产阶级队伍，这就为革命运动席卷德国最落后的角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一旦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见本卷第382页）。

为了从思想上教育德国工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使他们正确了解本国的历史和现状；恩格斯不顾自己工作繁忙，还打算出版分析德国历史方面的许多著作。他想在这些著作中揭露统治德意志帝国的反动制度的历史根源。恩格斯在准备出版《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新版本时曾计划增加它的篇幅，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国家的那一阶段的历史，揭示十六世纪前二十五年的事件——第一次、但没有成功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这种事件，用他的话说，已成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

本卷刊载了保存下来的这部未完成的著作的片断（它的引言部分的前一部分，以《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为题刊载在《遗稿》部分）和手稿《关于〈农民战争〉》（这个引言部分的提纲）。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揭示了西欧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解体中逐渐发生的过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在这方面，恩格斯指出“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的王权（见本卷第453页）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了进步的集权作用。恩格斯使我们能了解和正确评价十五至十六世纪在包括意大利和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里形成集权的专制王朝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揭示了欧洲民族形成的特点并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作了重大的贡献。

《遗稿》部分还刊载了恩格斯的另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恩格斯打算把这部著作作为同名小册子的第四章，这本小册子的前三章应当是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的几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从恩格斯本人的话中可以看出，他

打算通过德国历史的具体实例证明《反杜林论》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历史上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结论的正确性。

恩格斯想在这一著作中批驳德国统治阶级的恶毒手法，德国统治阶级在以“血和铁”统一国家的政策中采取野蛮的暴力，反而把无产阶级的代表说成是在一切情况下采用暴力行动的鼓吹者。俾斯麦政府正是以这种虚伪的借口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采用警察高压手段。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了1848年后德国发展的特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新版的片断中揭示了德国到十九世纪中叶还保持封建割据局面的原因，他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著作中又阐明了后来国家统一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恩格斯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统一德国的方法，并且指出了造成以普鲁士为首、“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局面的原因。恩格斯指出，统一这个事实本身是进步的，尽管它是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同时他又揭露了俾斯麦政策的整个历史局限性和波拿巴主义的性质。俾斯麦的政策终于使德国建立了警察国家，使容克地主这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化的阶级越来越横行霸道，使军国主义发展了。恩格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是动摇的、怯懦的，不能把本阶级的利益捍卫到底，不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恩格斯对德国统治阶级的黩武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个政策的最明显的表现是1871年掠夺法国和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恩格斯分析德意志帝国的内部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揭露从帝国建立时起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它的军国主义的和侵略的野心，由此作出了关于它必然崩溃的结论。从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中可以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在德国，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才有权成为真正民族的全民的利益的代表者。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著作（《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资产阶级让位了》等）深刻地阐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特点。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他得出结论说，英国将来丧失它对世界工业的垄断和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地位的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恩格斯指出，然而随着这种垄断的必然丧失，英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将消逝，这将会推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开展。

恩格斯认为，吸收广大非熟练工人参加阶级斗争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他们处于旧的保守的工联之外，享受不到加入工联的“工人贵族”所享受的一定的福利。恩格斯对这部分人数最多和最受压迫的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十分高兴的。恩格斯积极支持八十年代末在英国成立的吸收了以前无组织的非熟练工人阶层的所谓新工联，同时他也斥责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宗派主义地脱离这个运动。恩格斯认为，正是这些阶层的工人阶级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日益高涨的积极性为工人阶级摆脱工联主义思想和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展示了前景。

恩格斯非常注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无产阶级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他坚决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特殊论的理论家，当时他们企图证明美国没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恩格斯强调说，在美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高涨的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必然会被工人群众所接受，传播这种思想将成为一种迫切的必要。恩格斯着手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认为这部著作对于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政治发展水平方面大体相当于四十年前英国工人的政治水平的美国无产者来说是最能理解的和最感亲切的。在该书美国版的序言（它还用《美国工人运动》的标题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中，恩格斯说明，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他指出，美国无产阶级象它的欧洲弟兄一

样，迟早会走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批判地分析了美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空想主义。亨利·乔治的思想一度在美国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乔治及其拥护者要求土地国有化，这是进步的，同时他也指出，宣布这个要求是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唯一万应灵药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指出，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同乔治的论断相反，土地国有化不可能使劳动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见本卷第388页）

象在其他著作中一样，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也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独立的政党才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和掌握政权，同时指出，这样的党还必须有一个彻底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这样的纲领，“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 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见本卷第385页）。同时恩格斯指出，只是在纲领中宣布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够的。宣布这些原则的党，如果脱离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必然会成为宗派主义集团。恩格斯批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立场，它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但是不采取认真的步骤同国内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因此美国独立的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就取决于美国无产阶级能否建立一个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本阶级的政党。

收入本卷的《当前的形势》、《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等等著作表明，恩格斯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多么关心，他帮助法国无产者尽快地从巴黎公社的覆灭而遭到的失败中站立起来。恩格斯认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 的变

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表现得最为鲜明”(《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见本卷第291页)，他祝贺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成就，特别是工人议员在议会中的有成效的活动。他写道，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一出现，“就足以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造成混乱”(见本卷第300页)。恩格斯始终不渝地支持法国马克思派同脱离工人党的机会主义可能派的斗争。收入本卷〈附录〉部分的恩格斯校订的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指出，“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见本卷第585页)。恩格斯全力帮助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工人党变成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

恩格斯也密切注意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八十年代俄国国内的政治反动加强了，但是恩格斯仍然深信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必然发生。他仍然认为这个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指出它将加速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恩格斯在对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的谈话中说，俄国革命会“在欧洲整个政治局势中引起一场变革”(见本卷第572页)。

恩格斯坚信，不管沙皇制度怎样实行迫害和警察恐怖，俄国革命力量将会不断地成长并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格·亚·洛帕廷转述他的话说：“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见本卷第540页)恩格斯同俄国革命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并祝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立。他认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训练革命无产阶级具有特殊的意义。恩格斯赞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民粹派观点的第一批著作，他写信给维·伊·查苏利奇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们参加维护社会主义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团结的斗争表示高兴。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的著作和文件反映了恩格斯在巩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的革命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尽力保持这种不同形式的联系：个别会晤、彼此在社会主义报刊上撰文，发起关于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国际运动，到其他国家进行鼓动，最后，必要时组织物质支援。恩格斯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报刊。他直接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工作，为法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英国社会主义报刊《公益》和《工人选民》、德国理论杂志《新时代》写过文章。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各国社会主义报刊都转载过。不仅《资本论》，而且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翻译和用各种文字的出版都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而在多数情况下是经过他的校订完成的：他亲自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大利文本、波兰文本和丹麦文本等等。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共产党宣言》的新的德文版（1883年）是在恩格斯的参加下完成的，他又校订了英文版（1888年）。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满意地指出，《宣言》已经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见本卷第407页）。

当主要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组织上还不巩固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恢复国际为时尚早。但是，八十年代末，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和巩固，为建立新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恩格斯积极参加了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的筹备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参加，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的领袖们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恩格斯的这方面的活动从《可能派的代表资

格证》一文以及载入《附录》部分的一些文件(即恩格斯以法国社会主义者博尼埃的名义写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他校订的《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两篇抨击性文章和在他参加下草拟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

收入本卷的还有恩格斯写的关于反对战争威胁、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的几篇文章。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政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分析了1886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当时所谓巴尔干危机和德法两国沙文主义的抬头使战争危机变得特别尖锐。他指出,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正在准备战争并把战争看作是镇压革命运动的手段之一。“**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见本卷第363页)。恩格斯提醒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直接责任就是进行反对爆发战争的斗争。他写道:“……社会主义者……关心维护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战费。”(见本卷第364页)

恩格斯为西·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写的引言,是在揭露黠武的侵略政策方面的一个卓越贡献。这篇著作根据对欧洲列强之间的深刻矛盾的细致的分析,对统治阶级策划的未来战争的规模和后果作了光辉的预测。他预言:“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

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见本卷第401—402页）

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预言是“天才的预言”。1918年，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写道：“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是发生得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以疯狂速度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有某些变迁。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事情发生得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之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又仍然同以前一样。”（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3—464页）在恩格斯关于未来战争的这些论断中，列宁特别赞扬他对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乐观的坚定的信念。恩格斯大声疾呼，愤怒地揭发和抗议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那种罪恶的、仇视人类的政策，并且预言这场战争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恩格斯的五篇文章：《1889年鲁尔矿工的罢工》、短文《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后者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提纲《关于〈农民战争〉》、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提纲和这一章结尾部分的提纲。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并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著作，刊载在《恩格斯的遗稿》部分。

收入《附录》部分的著作和文件是恩格斯参加写作的和有关他在这个时期的理论和实际活动的补充材料。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发表过的恩格斯同《纽约人民报》的谈话、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稿、他校订的《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抨击性文章、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声明，《附录》部分还收入了一系列其他文件。保·拉法格根据

恩格斯的材料写的《1849年的五月起义》和恩格斯以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的名义草拟的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附录》部分还收入了格·亚·洛帕廷和玛·尼·奥沙尼娜叙述他们和恩格斯的谈话的信以及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写成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相当一部分是恩格斯本人写的全文。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时，参考了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和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加以核对和订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第二十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收集了恩格斯在 1890 年至 1895 年这一时期，即在他的晚年所写的著作。

这几年属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后十年。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一世纪最后十年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的垄断迅速发展，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加剧，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日益恶化。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加深，阶级斗争也普遍尖锐化了。无产阶级加紧集聚力量，全面地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搏斗。

九十年代前半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胜利及其更广泛的传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到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大体上已经完成了”（见《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4 页）。愈来愈多新的队伍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的行列。相继产生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等等。俄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时期，当时在俄国，正在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创造基础，这个党的建立是和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这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流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有了相当的增长。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首先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即第二国际的最有

影响的政党中，有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积极活动起来，这就是“左的”、宗派主义的派别和公开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派别，后者在十九世纪末具有修正主义形式——公然煽动修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它不遭到歪曲和庸俗化，反对统治阶级利用机会主义分子分裂和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这一切就显得特别重要，成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可估计的意义。虽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还是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进行了紧张的和有成效的工作。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了巨大的贡献。

在恩格斯一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科学活动的最重要部分，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再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同时，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年），接着又准备了《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1893年）。恩格斯专门给《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了序言，对那些企图破坏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诽谤马克思对科学不诚实并蓄意伪造文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了应有的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44页）。恩格斯为揭露这类捏造写了一部专门的著作，即收入本卷的《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这部著作揭露了攻击诽谤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的实质，替资产阶级辩护。这部著作表明，恩格斯多么热情地捍卫和爱护自己伟大朋友的名字和遗著。

恩格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一卷在1894年底出版。恩格斯认为这一卷是社会主义政党手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第三卷是“卓

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93页）。恩格斯在为这卷书写的序言中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原理，胡说什么在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诸规律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26页）。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增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这部著作包括两部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

从收入本卷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打算把《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作为马克思基本著作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出版。但是，恩格斯的逝世，使这一想法，也象其他庞大的创作计划一样没有实现。

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证明，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细心地观察了当时发生的经济过程，并且力求用某种形式加以概括。他非常敏锐地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本质的变化。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意见。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保持和加强剥削实质的同时改变了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他注意到股份公司，特别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的发展（见本卷第270页）。列宁强调指出，这个意见指出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变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些指示非常宝贵，可以驳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的论断（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9页）。

恩格斯的《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指出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美

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使小生产者破产并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特别是美英之间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空前尖锐化是同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加强有关的。恩格斯预言美国和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将趋于尖锐，对于德国说起来，美国的竞争“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见本卷第 390 页）。

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英国版序言和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美国和德国这些年青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竭力想把英国从世界市场排挤出去。他认为美国和德国是英国的可怕的敌手，这些敌手“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见本卷第 315 页）。恩格斯在这两篇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各国对“自由的”销售市场的攫取已接近完成，并且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的增长。恩格斯写道：“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见本卷第 322 页）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些新的现象是使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尖锐化的源泉之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势必遭受新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震荡的原因。因此，在《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这篇短文中，恩格斯预言资本主义世界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在二十世纪初的发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言。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著作表明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热情宣传者。为《资本论》第三卷工作的完成和该书的出版，恩格斯给党报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两篇文章，向广大读者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

各卷的意义。为了向工人阶级传播经济学知识，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通俗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的德文版（1891年出版）。在校订这个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版本时，恩格斯对正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使1849年发表的该著的内容更符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说的发展。

本卷刊载的恩格斯为该版写的导言是供工人们阅读的严格科学的、同时又是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典范。恩格斯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全部奥秘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引导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的对抗性质，阐明马克思所发现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和相对贫困化的规律的作用。恩格斯强调指出，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制度所代替，“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暂短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无论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见本卷第243页）。

在1890—1895年这一时期，恩格斯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问题。在一系列的著作和书信中，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庸俗化，同时他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原理：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关于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国家等等。恩格斯整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版（1894年出版），对该书作了重要的补充，并写了序言，他满意地指出，《反杜林论》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到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页）。

恩格斯为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

文第四版(1891年出版),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总结了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大量新材料,以及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的资料。恩格斯专门为第四版写了序言,这篇序言还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单独发表。恩格斯在这里对原始社会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几个重要派别作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并且特别指出了杰出的美国学者、自发唯物主义者摩尔根的学术著作的科学价值。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说明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科学界在研究原始社会历史方面的成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俄国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人类学家列·雅·施特恩堡根据对库页岛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关系的研究所做的发现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位俄国民族志学家的新资料光辉地证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叙述的关于有阶级以前的原始社会、关于氏族制度、关于群婚是氏族制度所固有的家庭关系形式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恩格斯为了保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出版的基本理论著作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这本书的德文第四版(1891年),并且校阅了该书的英译文,专门给英文版(1892年)写了导言。

恩格斯在导言中继续反对那些仇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他指出,以不可知论形式出现的妄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资料证明了世界的可知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即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说明了由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并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 346 页）。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宗教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他指出，摇摇欲坠的剥削阶级把宗教首先当作一种制止人民群众的革命志向并诱使他们离开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手段。恩格斯写道：“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见本卷第 359 页）

恩格斯认为，宗教的、法律的和哲学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反映，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同时恩格斯指出，宗教的偏见是很顽固的，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相容的，是阻碍历史的发展，必须巧妙而坚决地予以反对的传统。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用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阐述了基督教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实质。恩格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深刻分析，说明了基督教在产生三百年之后怎样从奴隶的和被释放的奴隶的宗教、从奴隶占有制社会危机下参加运动的被压迫群众的思想体系变成了剥削者的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和社会上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恩格斯做出的结论是对古代历史、首先是基督教起源的许多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基本出发点。

恩格斯总是把从事理论研究，同实际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能出色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决定工人阶级的策略，具体地考察工人运动的问题，揭示个别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民族任务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国际目标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恩格斯仍然非常注意德国工人运动。他经常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积极地为它的刊物撰稿。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意见和指示，在很多方面也是给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提出

的，它们涉及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共同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因此，登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的他的许多著作和论文也转载在其他国家社会党的刊物上。

恩格斯在《德国 1890 年的选举》和《今后怎样呢？》这两篇文章中评价了 1890 年 2 月 20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结果，认为这是德国民主力量对俾斯麦所领导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执政集团的一次巨大胜利。俾斯麦政府在选举失败后不久，俾斯麦就辞职了，然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就废除了。

恩格斯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意义，他在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以及《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这些成就是非常法时期德国工人同反动派进行十二年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党运用了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活动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的灵活策略的结果。恩格斯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马克思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创办的《新莱茵报》所留下来的革命传统。恩格斯警告党防止对议会的幻想，他指出，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手中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武器。正如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指出的，议会斗争的意义在于，它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检阅自己的力量，有可能利用议会作为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讲坛。同时，恩格斯不断地提醒党的领导人必须注意议会外的活动，必须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在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中、在农民、军队中加强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给德国党提出了是否应当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斗争方式的选择，要依具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统治阶级行动的性质而定。恩格斯就这一点指示说：“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 91 页）

但是在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活动的道路，即“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见本卷第 91 页）。这些宝贵的指示证明：恩格斯坚决反对以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工人阶级的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绝对化，他认为无产阶级可以按具体历史条件运用各种不同的夺取政权的方式和方法。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反映了他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由于党在新的斗争条件下重新审查纲领和策略，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就大肆活动了。

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和〈答保尔·恩斯特先生〉等文章中，恩格斯坚决反对“青年派”的“左的”、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因为它不考虑已经改变了的情况，否认识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给党。恩格斯认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杜林学说庸俗地结合起来的“青年派”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了“青年派”首领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窍不通以及他们的教条主义。他写道：“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见本卷第 94 页）恩格斯认为忽视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是危险的，并警告说，这样的策略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 81 页）。恩格斯辛辣地痛斥反对派分子沽名钓誉和骄傲自大。这个反对派基本上是由不久前入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嘲笑他们妄图在党内取得特殊地位，并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

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见本卷第82页）。这段话证明恩格斯对党的活动家提出了多么高的要求。

恩格斯的战斗性的论文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反对“青年派”的坚决言论，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制服了这次“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

在这一时期，改良主义分子，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各社会党和工人党的主要危险。用列宁的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决心“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在德国，这些分子中为首的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福尔马尔。机会主义者们所攻击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福尔马尔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谬论，为九十年代末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准备了基地。

为了回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行以及威·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对他们的调和主义倾向，1891年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文件对拉萨尔的改良主义教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极重要原理。恩格斯在序言中叙述了促使他坚持发表这篇著作的原因（见本卷第105—106页）。原因之一是他想对机会主义分子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长期培养的拉萨尔个人迷信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恩格斯在决定发表这篇手稿时，知道他必须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某种抵抗，马克思的批判当时是冲着他们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哥达通过了妥协性的纲领。但是恩格斯对党本身的力量充满了信心，相信党很巩固，能够经受住马克思对党的错误所进行的坦率批评。在恩格斯看来，原

则上的考虑、党的利益、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高于一切。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思想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也有巨大的意义。收入本卷的恩格斯为这一版所写的导言，揭示了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从理论上总结公社经验从而对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意义巨大的贡献。在导言中，恩格斯补充了马克思对公社的活动的经典式的论述。他以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为例，强调指出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由一个理论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按照列宁的说法，他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总结”，并以对公社以后二十年的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补充了这些教训。恩格斯坚决反对当时不仅在德国资产阶级中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坚定分子中颇为流行的“对国家的迷信”。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质和必须把它打碎这个结论的重要性，他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见本卷第228页）为了论证这个原理，恩格斯举出了美国的共和制的国家制度和两党制例子，在那里，有“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见本卷第227页）。

针对所谓利用资产阶级国家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恩格斯捍卫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建立新的、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恩格斯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篇导言直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而写的最后一段中：“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

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229 页）。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的命运问题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恩格斯继续发展了马克思和他提出的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原理，他指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不是永久的，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仅仅存在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见本卷第 228—229 页）。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和他把自己称做共产主义者，而不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写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个词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见本卷第 490 页），在科学上不很确切。由此可见，依照恩格斯的思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沿着愈来愈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归根结蒂要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完全消亡，而代之以非国家的社会自治形式。

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思想在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又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是一个极重要的文献，它反映了恩格斯为争取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为反对机会主义对这些原则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草案初稿。这是党的执行委员会为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要通过新的纲领以代替 1875 年的哥达纲领）起草的。在批判草案的缺点时，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经济的

和政治的任务与目标，关于为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地方自治)的民主改造而斗争的意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道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以大量的篇幅来“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9页)。他坚决反对机会主义者散布的幻想：似乎在德国现存的半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274页)。草案中没有要求推翻德国反动的君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要前提；恩格斯认为这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认为个别国家也可能通过和平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使这种道路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恩格斯也提出了许多原则上很重要的想法。“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273页)但是，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和实行警察专制制度的其他国家，要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社会就必须用暴力“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见本卷第273页)。

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是可以使德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形式，它“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274页)。按照恩格斯的理解，“民主共和国”这一口号就是争取占领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通道，争取创造一些有利条件，利用民主制度来确立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正如后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在一定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完全现实的。与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相对立，列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恩格

斯的这句话的。列宁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2页）

恩格斯的著作《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定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没有考虑恩格斯几个极重要的意见。纲领中没有谈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要求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说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没有完全克服机会主义的影响。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篇导言，还在恩格斯在世时，特别是在他逝世后，就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按照机会主义精神进行的别有用心解释。这个文件表明，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卓越的战略家和策略家。

恩格斯在导言中首先指出在马克思那篇著作中对1848—1849年革命的进程和经验所做的分析十分重要，然后就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总结后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首先是德国的经验。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必须革命地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训练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必须使前一任务服从后一任务。恩格斯在导言中又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策略方法和斗争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反动的统治阶级使用暴力，那就必须用非和平的革命活动形式代替无产阶级本来宁愿采用的和平的革命活动形式。恩格斯指出，如果反动的统治阶级自己破坏“致命的合法性”而使用暴力，那末社会民主党就应当

利用“革命权”。那时它就会把自己的活动“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见本卷第327页)。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成功的主要保证，是把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劳动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恩格斯认为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写道：“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见本卷第607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为了反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其他党内产生的修正主义而写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企图利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讨论土地纲领草案的机会偷运一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所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经济稳定发展，剥削雇工雇佣劳动的农村富农分子渐渐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促使恩格斯在报刊上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另一原因，是他想纠正法国社会党人的错误，因为法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土地纲领(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通过，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作了补充)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

在《法德农民问题》和直接与这一著作有关的《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详细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法国社会党人的错误。他指出，法国社会党人为了迎合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幻想而答应保存他们的所有制，这在实质上 and 客观上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见本卷第561页)。恩格斯在批判分析南特纲领时，总结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关于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的观点，在论证社会主义政党对各个农民阶层的策略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初步地拟定了未来无产阶级国家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恩格斯认为，必须分别对待农民，必须把广大劳动农民阶层，首先是农村无产者和小农——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军——吸引到社会主义政党方面来。他指出，为了夺取政权，社会党人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在那里成为一种力量（见本卷第566页）。社会主义政党在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必须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小农经济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真正处境，必须经常强调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给农村的劳动者展示摆脱贫困和剥削的前景。

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恩格斯写道：“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见本卷第580—581页）至于剥夺大土地所有者问题，恩格斯指出，如何剥夺，用不用赎买办法，这个问题“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见本卷第585页）。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著作之一。列宁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英明的合作计划时，全面发展了这篇著作中的深刻思想。

恩格斯很注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党。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著作外，本卷中的其他许多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全力促进工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巩固，帮助它的领导人盖得和拉法格在重要的问题上制定策略路线，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克服党的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恩格斯把法国看作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579页），因此，他认为，法国工人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农村中加强社会主义宣传。恩格斯指出社会党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就是一件好事，同时他也批评了党的某些领导人想把重心转移到议会活动中去。恩格斯很重视在法国工人中宣传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为此，他每年8月18日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给法国工人的贺词，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恩格斯在《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一文以及和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法国正在加强政治反动。他揭露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警察迫害的组织者，坚决斥责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被反动集团和警察用来挑衅的恐怖行为。恩格斯指出，这种行为的真正意义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见本卷第617页）。

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序言、《伦敦的5月4日》等等），表明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迫切任务是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他并且还揭示了阻碍这一任务实现的原因。他指出了旧工联的帮会式的关门主义。这些工联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的传播工人贵族的影响，因此，使工人对社会主义有极深的偏见，使资产阶级传统得以流行。其中有这样一种偏见，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见本卷第360页）。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组织所特有的教条主义，是英国以及美国工人运动的弱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消除英国工人运动分裂状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克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克服以费边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的首领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正统教义”。而费边社，照恩格斯的评价，“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见本卷第633页）。

恩格斯相信，“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并使英国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工人党。因此，他认为在广大的工人阶层中，特别是在伦敦东头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组织社会主义宣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欢迎八十年代末展开的非熟练工人的运动和新的工联的组成。1890年5月4日伦敦举行的“五一”群众游行，证明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恩格斯指出，当英国建立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它就能“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见本卷第383页）。恩格斯欢迎1893年独立工党的组成，希望它能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大党。但是，改良主义分子很快就在这个党内占了上风。

收入本卷的给工人政党和组织的领导机关的信，给工人和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部的信，以及他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反映了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年青队伍——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无限宝贵的帮助。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给许多党代表大会的贺信，〈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等），指出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对一系列策略问题提出了忠告，并表示支持奥地利无产阶级为扩大民主自由、为争取普选权的英勇斗争。恩格斯认为，奥地利—匈牙利各民族工人投入无产阶级运动，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形成和发展。在〈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指出了工人政党在大国和小国产生的规律性。“匈

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见本卷第103—104页）

在保加利亚、波兰、捷克这些中欧和南欧的斯拉夫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恩格斯甚为满意；收入本卷的一些文章，如《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看到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他强调指出，必须以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团结来反对资产阶级挑起民族仇恨和纠纷的政策。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的序言（1892年）中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波兰工人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年青的波兰无产阶级在争取波兰的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斗争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和其他的一些著作（《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论反犹太主义》）中，阐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说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指出了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一切表现对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危害。

本卷刊载了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意大利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文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致意大利读者》（《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这些文章证明了恩格斯十分关心意大利状况和意大利劳动者反对政治经济压迫的斗争，也证明了恩格斯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和决定它当前的任务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写的序言、《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这封贺信、《致英国各社会主义

和工人组织》，都表明他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的联系。

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活动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而大大地增加了。收入本卷的许多著作都说明了他为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国际联合，为扩大科学共产主义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影响进行了斗争。

恩格斯认为，根据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的决定庆祝五一节，对于动员群众和巩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具有巨大的意义。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1890年）序言中以自豪的心情指出，马克思和他在1848年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已为工人所理解，1890年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就是证明。恩格斯为庆祝这个无产阶级节日而发表的文章中（《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等），号召国际无产阶级把每年5月1日的无产阶级力量的战斗检阅作为传统保留下来。他强调指出，这些检阅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任务和国内任务的一致。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等著作，表明了恩格斯在筹备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了他反对机会主义分子，即法国的可能派、保守的英国工联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企图攫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恩格斯十分高兴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反击各种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恩格斯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同时认为对无政府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斗争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倾向表现为假革命的高谈阔论、教条主义以及对实际情况采取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不愿考虑的态度。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

政党(见本卷第281页)。恩格斯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见本卷第488页),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最终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于欧美各国的政府。

恩格斯在他的发言中经常指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制定共同协议的路线、进行个人接触、在社会主义报刊上互相撰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强调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的决议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说:“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见本卷第480页)恩格斯不倦地号召加入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继承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他要求社会主义者研究和运用第一国际的革命经验,并且希望第二国际更加丰富这一经验。

但是第二国际辜负了恩格斯对它的期望。如果说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在恩格斯的忠告和批评的帮助下,它曾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那末在恩格斯逝世后,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以及隐藏的机会主义者(中派)就开始日益得势,终于在1914年把第二国际导致可耻的破产。然而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头几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动还是有成果的。这有助于在第二国际各个党的队伍中培养真正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以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为首,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本卷中有许多著作是研究俄国,分析它的国内外政策,探讨它的革命运动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严酷的政治反动未能动摇恩格斯的信心,他相信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必然到来。这种信心进而变成了坚定的信念,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见本卷第52页)。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革命者的马

克思主义的新一代。恩格斯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维·伊·查苏利奇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十分赞赏地注视这些“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深刻地研究了“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7页）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在俄国酝酿着巨大的革命事件这一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对法国报纸《闪电报》记者的谈话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认为改革后的俄国发展的特点是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他指出，在俄国，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而来的，是农民的大规模的破产、他们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瓦解、农业生产的萎缩以及连年歉收等。恩格斯在揭示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的原因时写道：“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深刻的危机。”（见本卷第302—303页）恩格斯分析了俄国的现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见本卷第299—300页）

恩格斯在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的跋中，更充分地阐述了他对俄国的观点。这篇跋深刻地分析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恩格斯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反科学的观点和幻想，同时也对俄国先进的社会思想，首先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应有的评价，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俄国有很多的贡献。恩格斯对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家，对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勇敢战士深表敬意。他满意地指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已经有抛弃民粹主义观点并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物。

恩格斯对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企图引证马克思的话(例如,引证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来论证他们的关于俄国特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关于俄国农民公社是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层组织的观点。恩格斯探讨了俄国从克里木战争以来的经济发展,并指出,与民粹派的理论相反,“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见本卷第509—510页)。恩格斯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和他(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论点:俄国已经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准备了土壤,这次革命将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他指出,俄国的革命将带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见本卷第510页)。

恩格斯紧密结合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景以及“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1页)提供的条件,来考察沙皇俄国和其他强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问题。

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反映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欧洲能否裁军?》、《德国的社会主义》这些著作中。他在这些著作中愤怒地揭露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宣布对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他竭力主张各社会主义政党制定防止侵略战争的共同的国际政策,反对侵略势力的阴谋(参看恩格斯1888年1月4日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若·纳杰日杰的信)。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益增长,它成了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见本卷第481页),同时他也常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抵制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侵略政策的力量。恩格斯从保卫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立场分析了对外政策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忧虑地指出了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增

长,常备军人数的增加,空前的军备竞赛,三国同盟(德、奥、意)和法俄同盟这两个军事政治侵略集团的形成。恩格斯分析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得出结论说,事件的进程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中就预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德国对法国的掠夺将造成欧洲新的军事冲突,带来极有害的后果。恩格斯愤怒地揭发了德国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行为,他指出,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的一些统治者奉行兼并、军备竞赛、煽动沙文主义宣传以及迫害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使它受到了“全世界的憎恨”(见本卷第464页)。他也同样坚决地揭露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复仇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国家集团,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错综交织并日趋尖锐(恩格斯认为,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所有这一切,根据他的意见,造成了爆发空前的世界规模战争的危險,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将这样或那样地卷入这场战争。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将利用这场战争来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还要把它作为巩固反动制度、镇压革命运动、首先是粉碎社会主义政党的手段。

恩格斯关于未来战争将具有世界规模和巨大的破坏性的论断,是科学预见的真正典范。恩格斯关于英国必将参加未来战争的预言也是十分精辟的,他认为英国的参加甚至能够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有利于哪一方(见本卷第49—50、466页)。这里应当考虑到,在恩格斯生前,英德的矛盾并没有发展到象后来那样尖锐。当时在国际政治中居于首位的是法德的矛盾和俄德的矛盾。英国和俄国在近东和中亚的竞争,以及英国和法国在中非及其他地区的竞争,起着巨大的作用。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才形成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的帝国主义性质,才形成了它们在已经展

开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斗争造成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

恩格斯认为俄国的沙皇制度和它的外交是造成欧洲战争危险的主要侵略势力之一。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篇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请求为他们的杂志撰稿而写的战斗的揭发性的文章里，恩格斯指出，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反对俄国和欧洲革命的这个最凶恶敌人，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恩格斯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来的对外政策，揭示了这种政策的反动趋向，证明沙皇制度是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扼杀者之一。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制度的侵略意图，它在合并于帝国的地区实行殖民者和压迫者的统治方法，在外交中施展阴谋诡计，而西欧反动势力却对沙皇制度采取纵容的态度。恩格斯揭示了沙皇的对外政策的阶级本质，认为这种政策是同反人民的反动的对内政策有联系的。

恩格斯指出，不仅俄国的地主和商人，而且西欧的资产者也都关心维护沙皇制度这个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所以他认为，一旦俄国发生革命，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甚至准备用武力来支持这个专制制度。他预言：“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见本卷第56页）

恩格斯明白而准确地揭露了沙皇的外交和它的西欧伙伴们，但是他为了促使社会主义者重视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这一任务，有些地方不免过于夸大。例如，他有些过高地估计了外交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影响，西欧各国政府对沙皇制度的“妥协退让”，也过高地估计了在俄国外交界服务的外国人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俄国沙皇政府在九十年代仍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同时他也指出，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专制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地位已有所

削弱，它对世界的影响已经缩小了。恩格斯认为，在克里木战争中沙皇政府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所遭到的失败，严重打击了它的外政策和外交，加速了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危机。在俄国国内，威胁沙皇制度及其外交的革命力量已成长起来。“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见本卷第52页）

恩格斯号召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加强争取和平的鼓动，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用这些行动来回答战争危险。恩格斯认为，为裁军而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而这就是“保障和平”（见本卷第437页）。他相信，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协同一致的积极行动，甚至在现存制度下也有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限制军备和撤销战争计划。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这一组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缩减，然后废除常备军的建议，办法是普遍缩短服兵役的期限，随后则过渡到民兵制度。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发挥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理论原理：关于急剧发展军事技术以及这种发展对战略和战术的革命化的影响，关于体育在军事训练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战争中重要因素的军队的士气的意义，等等。

恩格斯坚决维护和平事业，一贯为反对战争威胁而斗争，同时他也主张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九十年代初应当采取这种立场，如果德国的民族生存由于法国和沙皇俄国的进攻而遭到威胁的话。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1891年秋）中分析了这个前景。恩格斯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了德国，这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丧失它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占据的先进阵地，这样就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

就是“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是捍卫“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见本卷第296—297页）。同时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想方设法使这场战争具有真正民族解放的性质，应当象1793年法国雅各宾党人那样用革命方法来进行这场战争，抛开反动的统治集团，不仅要宣布放弃兼并，而且还要宣布解放被德意志帝国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等等。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必须区别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根据这种或那种战争的性质和类型来规定工人政党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深刻地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对外政策的见解。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制定了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对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说它是“反动势力的经常可靠的支柱”（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39页），他对恩格斯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著作评价很高，认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写成的重要的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9页）。

列宁也赞同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和俄国1891年进攻德国时应采取什么策略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能够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9页）列宁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使之免遭机会主义的歪曲和捏造，同时他也坚决反击了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企图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尤其是恩格斯在1891年的立场来替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向帝国主义政府的变节行为辩护。列宁写道：“这一切引证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8页）列宁认为“把1891年的国际形势同

1914年的国际形势”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是非常不合历史观点的。他写道：“1891年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我在我的小册子里竭力证明，它是在1898—1900年产生的，不是在这之前），也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不可能是这样。（顺便提一下，当时也不存在革命的俄国；这一点很重要。）”“法国的凯撒制度+俄国的沙皇制度反对非帝国主义的德国——这就是1891年的历史情况。”（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257、263页）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斯大林在《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这封著名的信中，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斯大林在评价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时，是从较晚时期的国际形势出发的，从而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形势和在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形势混为一谈了。

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著作充满了这位马克思的伟大战友所固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必胜、国际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定信心。恩格斯强调指出，即使欧洲的反动统治阶级使人类卷入毁灭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灭亡。这场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见本卷第298页）。

恩格斯对俄国人民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解放使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实现本国全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恩格斯的预见完全实现了。恩格斯逝世后不到七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列宁在确定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在世界革命发展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

全，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40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三篇恩格斯的文章：《德国1890年的选举》，《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和短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有两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在《附录》部分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恩格斯的三篇谈话：对法国《闪电报》和《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第一次发表了恩格斯亲自编写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目录的真迹复制品。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时，参考了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和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加以核对和订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至第二十二卷中，凡是不同于全集第一版的著作标题已列表附于卷末。

第二十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收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恩格斯为《资本论》各个版本所写的序言和跋。

在本版中，《资本论》第一卷的译文是根据1890年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第四版翻译的。和1937年的俄文版相同，也是以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校订的译文为基础的。

在本版准备过程中，对上述译文（1937年版）作了大量的订正和修改，同时也发现和消除了德文第四版中的一些错字和刊误，并根据原文重新核对了所有引文和摘录，一些数字和事实资料。

在向读者提供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中，有编者注释和索引：人名索引、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引用和提到的现有俄译本书目索引和名目索引。

编者注释放在卷末，用不带括号的数字表示。作者脚注用带圆括号的数字表示。少数编者注放在页末，用星花表示，并注明“编者注”。恩格斯加脚注，署上他的姓名的缩写，括上了花括号。

由编者翻译的外文用语按惯例放在外文后面，加上四角括号。编者认为有必要用注释来解释的一些外文用语，则不在此例。在这种场合，外文用语的译文有相应的注释。

少数难译的德文单词，则把原文加上四角括号同译文并排在一起。

第二十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收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写的序言。

在本版中，《资本论》第二卷的译文是根据1893年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第二版翻译的，和1939年的俄文版相同，也是以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校订的译文为基础的。

在本版准备过程中，对上述译文（1939年版）作了大量的订正和修改，其中有些是重要的订正。我们把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正文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和恩格斯校阅付排的定稿作了校对，这样才发现并消除了德文第二版中的一些错字和刊误。同时对所有的引文和摘录也根据原文重新做了校订，核对了事实资料 and 统计数字，纠正了某些不准确的地方。凡是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摘自《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版的片断引文的翻译，在本版中均予以考虑，某些用语和术语就采用了列宁的译文。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新版本中，有编者注释和索引：人名索引、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引用和提到的现有俄译本书目索引和名目索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脚注，和1893年的德文版一样，用带圆括号的数字表示。恩格斯加的脚注，署他的姓名的缩写。和作者注不同，编者注放在页末，用星花表示，并注明“编者注”。编者注释放在卷末，用不带括号的数字表示。

引文中加圆括号的个别地方，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在付排

马克思的手稿时所加的文字，都括上了花括号。

少数难译的德文单词或者专门术语，则把原文加上四角括号同译文并排在一起。

第二十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和恩格斯为《资本论》德文第三卷所写的序言和增补。

在本版中，《资本论》第三卷的译文是根据1894年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第一版翻译的。和前一个俄文版（第一册1939年版，第二册1947年版）相同，也是以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校订的译文为基础的。

在本版准备过程中，对译文作了大量订正和修改。由于把德文第一版同马克思的手稿作了校对，这才发现和消除了德文第一版中的一些错字和刊误。马克思从各个作者的著作中援引的引文的译文，也重新作了校阅和订正。凡是马克思以删节的形式援引的或者用自己的话转述作者意思的那些引文，在本版中这种引文的译文则按照德文版的原文确定。同时对一些数字和其他事实资料也作了核对和必要的订正。凡是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摘自《资本论》第三卷德文版的片断引文的译文，在本版中均予以考虑，某些用语和术语就采用了列宁的译文。

和1894年的德文版一样，《资本论》第三卷的新版本由于篇幅多，也分两册出版。每册都有编者注释和索引：人名索引、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引用和提到的现有俄译本书目索引。《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还附有全卷的名目索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脚注，和1894年德文版一样，用带圆括号的数字表示。恩格斯加的脚注，署上他的姓名缩写。编者注放在

页末,用星花表示,并注明“**编者注**”。编者注释放在卷末,用不带括号的数字表示。编者对某些作者注所加的图书出处方面的增补,放在四角括号中。恩格斯在作者原文和引文中所加的文字,都括上了花括号。

少数难译的德文单词或专门术语,则把原文加上四角括号同译文并排在一起。

第二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收集了马克思在1862年1月至1863年7月这一时期写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

《剩余价值理论》这部著作是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这部手稿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直接继续。1861—1863年手稿共二十三本（编有通贯全稿的页码：1—1472），全稿篇幅约二百个印张。这是整个四卷《资本论》的第一个经过比较系统整理的稿本，虽然只是草稿，而不是完成稿。《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部手稿中占的篇幅最大（约一百一十个印张），整理得最细致，是《资本论》最后一卷即第四卷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草稿。这一卷不同于三卷理论著作，马克思把这一卷称作自己著作的**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

马克思开始是按照他在1858—1862年拟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提纲来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1858—1862年的许多书信和1861—1863年手稿中已经谈到他的这部著作的结构，根据他的阐述，这个提纲可以列表如下：

I. 资本

[导言, 商品和
货币]

(a) 资本一般

(b) 资本的竞争

(c) 信用

(d) 股份资本

II. 地产

III. 雇佣劳动

IV. 国家

V. 对外贸易

VI. 世界市场

- | | | |
|------------------|---|------------|
| 1. 资本的生产过程 | } |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
| | | 2. 绝对剩余价值 |
| | | 3. 相对剩余价值 |
| 4. 两者的结合 | | |
| 5. 剩余价值理论 | | |
| 2. 资本的流通过程 | | |
| 3. 两者的统一, 或资本和利润 | | |

这个表说明, 马克思最初想把《剩余价值理论》当作历史附论, 放在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理论研究部分中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问题的那一篇里。这个历史附论应当成为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一篇的结尾,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论商品的一章用历史附论《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来结束, 论货币的一章用历史附论《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来结束一样。

马克思最初的意图就是这样。但是在实现这个意图的过程中, 关于马克思以前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附论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意图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 而是就利润、地租和利息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所以马克思所研究和批判的理论的材料本身就要求扩大研究范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对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的剩余价值观点的批判，必然要同对他们的利润、地租、利息等等概念的分析交错在一起。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全面而彻底地批判这些错误理论，针对这些理论，他还正面详细地论述了他自己创立的、引起全部经济科学的伟大革命变革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

为了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和结构的全部特点，还必须注意以下情况。当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在《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中，以书面形式多少经过整理的只有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且连这一部分也很不完整（1861—1863年手稿的头五本笔记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至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确切些说，这两部分的若干篇——还只是1857—1858年手稿中的初步的、片断的草稿。这份手稿已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年用原文发表，由编者加了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entwurf)》（《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因此，马克思在整理他的著作的历史部分时，不能简单地引用理论部分某某页，而必须立即正面研究由于批判分析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理论问题。

所有这一切，就使历史附论《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增加了许多。在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手稿中，属于历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的是第VI—XV本和第XVIII本，以及在第XX—XXIII本中的一些历史性评论和札记。

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正文，写于1862年1月到1863年1月。在第VI—XV本的封面上，马克思还为正文编写了目录。这个目录对于了解马克思这部著作的总的结构、内容和计划，有巨大的意义。本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册一开始（见本卷第1册第3—6页）就是这个目录。1863年春夏写的最后几本手稿中的历史批判性的评论和札记都是正文的补充。

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于是马克思就想把全部历史批判材料分出来作为《资本论》的专门一册，即第四册。最初，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那一篇的范围较窄的提纲中拟出了三个部分：1. 资本的生产过程，2. 资本的流通过程，3. 两者的统一（见前面所列的马克思著作的最初提纲），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这种分三个部分来分析的方法越来越显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分法是如此重要和深刻，以致按照最初提纲，有些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一般》这一篇中论述的论题（如资本的竞争、信用、地租），也逐步包括到这里来了。在《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它们逐步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问题）形成的同时，马克思越来越确信，历史批判的研究应该单独出一册，即《资本论》第四册。

在写完1861—1863年手稿大约一个月以后，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手稿：“……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这里所说的“历史部分”就是指《剩余价值理论》，可见，当时马克思已经把它当作自己著作的一个专门部分即历史部分来考虑了。可是，从他制定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见本卷第1册第446—448页）中可以看出，在1863年1月，马克思还打算把这个历史批判材料分别归入他关于《资本一般》的各个理论研究部分。

在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在1863年5月写的第XXII本里，有一个关于配第的详细的历史批判性的提要，附有说明性的标题：《历史方面：配第》，这个提要证明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彻底弄清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这个提要，同它的前文或者后文都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显然，这是马克思为他的著作

的历史批判部分准备的。在这个论配第的提要中分析了配第在价值、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利息等等方面的观点。对配第的经济观点作如此广泛的概括，表明马克思在1863年5月就已经有一种想法，四年以后他在1867年4月30日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中谈到他的《资本论》的结构时才明确说出这种想法：“**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4页）马克思当时打算把《资本论》第二、三册作一卷出版。

我们在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见到他第一次直接提到《资本论》的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马克思在谈到他写作《资本论》的进程时对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第四册还要“写”呢，上面引用的他在1863年8月15日写的信中不是说“历史部分”已经写好了么。1863年和1865年的说法不同，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内即1863—1865年重新加工和改写了所有三册理论部分，而第四册——“历史文献”部分——仍保持1862—1863年所写成的那种最初的形式，因此需要重新加工，以便与《资本论》前三册的新的文稿相适应。

从马克思1877年11月3日给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后来也认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写好了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他写作《资本论》的情况时说：“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

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5页）这里把历史部分称作第三部分，是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本来想把《资本论》的第二、三册合成一卷作为第二卷出版，而把研究“理论史”的第四册作为第三卷出版。

马克思在信里说他“最后着手”第一卷，他所指的是在1866年和1867年上半年写成的这一卷的最后的、准备付印的稿本。1861—1863年手稿头五本中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草稿，后来他又进行了十分认真的改写，作了许多增补。1861—1863年手稿中包含《资本论》未来第二、三卷草稿的那些篇章也进行了加工。这样一来，在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才是最重要的，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分析也最透彻。因此马克思在给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说，他写作《资本论》是从最后部分即历史部分开始的，因为马克思认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不过是关于资本的学术著作的一个绪论，而在1866—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写成之后，作为初稿的1861—1863年手稿头五本的内容，他就不再考虑了。

马克思写他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从最后部分开始，这是有深刻原因的。六十年代初，马克思已经在原则上制定了他的经济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当时经过系统整理而定稿和发表的，只有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内容的最初绪论性的两章：即论商品的一章和论货币的一章。马克思称作整个著作的“基本的一章”，即关于资本的研究，仍然是1857—1858年的初稿，完全没有划分章节，没有整理。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给拉萨尔的信里写道：“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5页）但是，对马克思说来，要想完成

他的经济学说并给积累起来的大量材料一个合适的科学形式，就必须同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全面地划清界限。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所写的一切东西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全面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当马克思在1861年8月着手写作他的著作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一篇——论资本的一篇的时候，他很快就停止阐述他的剩余价值的学说（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而开始精心写作与此有关的历史附论《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历史附论扩展到这样的规模，竟成为1861—1863年全部手稿的基本部分。

在1861—1863年手稿中，这个历史部分，对经济科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进行历史的批判研究，而且还进行了理论分析。历史的批判研究揭示了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衰退过程。马克思曾对他的亲近的朋友说过：“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见本卷第1册第367页）。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功绩，同时也对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具体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非常巧妙地揭露了错误的经济学概念的方法论根源和阶级根源，为我们树立了应该如何同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进行斗争的卓越范例。

在对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批判的分析的同时，从理论上研究并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怎样得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这个或那个组成部分，第二，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在这里往往比后来写的前三卷《资本论》发挥得更详细（例如关于生产劳动、关于资本主

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关于绝对地租和土地国有化、关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市场的关系等等)。

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对于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而且对于创造性地研究许多现实经济问题，同现代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都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庸俗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一系列反科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受到毁灭性批判的那些反科学观点的翻版。例如：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所谓资本主义可以没有危机地发展、非生产消费能起拯救作用这些反科学的理论，所谓人民群众无法免于贫困、地球上人口数量同自然资源不相适应的状态无从消除这种仇恨人类的理论以及各种各样庸俗的价值理论等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中用简练而概括的形式表述了他全面深刻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够是科学。”马克思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自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蒙养的文巧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页）。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衰退时期，经济学家中出现个别人物，他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

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十九世纪中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这种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框框里的企图是白费心机的，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因此，马克思特别着重指出了“俄国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绩，认为他在《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已作了出色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评论，写于1860—1861年，就是说，同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时间大致相同。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经济著作中贯串着一个思想，就是必须创立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他把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称为“资本家的理论”，与此相反，把新的政治经济学极其明确地称作“劳动者的理论”。

只有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才能创立标志着经济科学根本革命变革的新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有马克思才能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资本论》这座宏伟大厦的同时，写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历史，写出他的天才著作的历史批判部分《剩余价值理论》。

* * *

马克思没有能够把《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整理好付印。马克思逝世后，这部手稿，同他的其他所有遗稿一样，转到他的忠实朋友和伟大战友恩格斯的手中。于是，恩格斯把整理付印和出版马克思的遗稿，首先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的后三册，当作他终生最主要的事业。

恩格斯最初在1883年5月22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1884年2月16日和8月24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剩余价值

理论》手稿。恩格斯在上述的最后一封信中谈到他同《资本论》出版者迈斯纳达成了协议，将顺序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册、第三册和作为全书最后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

恩格斯在1884年8月2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资本论》的这个结束部分。在这里我们读到：“……《理论史》也基本上写完了，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在1860—1862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里，正如我好象在这里告诉过你的那样，《剩余价值理论》约占四开纸五百页，其中确实有很多要删去，因为这些后来改写了，但剩下来的还是不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4页）

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序言（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85年5月5日）中，详细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情况以及恩格斯准备用什么形式把它出版。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理论》是1861—1863年写成的巨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主要部分，然后接着说：“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恩格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写的许多信中，多次提到他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就着手准备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这时他已经完全不再坚持表示要删除《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包含的理论附论了。

恩格斯最后一次是在他1895年4月10日写给斯蒂凡·鲍威尔的信中提到《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恩格

斯在 1895 年还以为他能够出版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但是，恩格斯未能把《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准备好付印，他在写了这封信以后不到四个月就逝世了。恩格斯只是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纠正了作者的几处他所看到的笔误。

从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具有重大意义，认为它就是《资本论》的第四册或第四卷。但是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 1884—1885 年曾经想从这部手稿原文中删去“已经在第二、三册中详尽阐明了的许多地方”。

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对待恩格斯的上述想法呢？

要从《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删去许多地方，只有马克思的伟大战友和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资本论》的合著者恩格斯才有这种权利。为了使手稿在删去这些地方以后余下的部分不致于成为彼此不相联系的片断，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写，并且还要另外补写一些新的段落把它们联结起来。要对马克思的原文作这样的改写，也只有恩格斯才有这种权利。

还有一个理由说明必须把上述的“许多地方”保留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恩格斯要删除这些地方的想法仅仅是他最初的、在他还没有详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之前的想法。从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可以知道，恩格斯在直接准备付印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有时重新考虑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和打算。例如，恩格斯最初想自己来改写《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因为在马克思手稿中这一篇是尚未完成的。恩格斯在他写的序言中说，他至少有三次试图根本改写这一篇，但是，最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决定“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 页）。由此类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恩格斯认真地着手直接准备付印《剩余价值理论》的话，他也会把

手稿中的理论附论保留下来的。尤其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的一些附论中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例如《资本论》第三卷——特别是地租一篇——所阐述的理论是重要的补充，所以上述的设想更是合乎情理的。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所包含的理论研究，受到列宁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剩余价值理论》，并且对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的历史批判内容和纯粹理论内容都给予同样高的评价。列宁特别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发挥的关于地租性质的观点的那些篇章（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04页，第13卷第165—166、253、275—276、277—278页）。列宁指出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93页，并参看第13卷第278、297—298页，第15卷第145页，第16卷第117页等等）。列宁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基本原理，并且指出这些原理证明在《剩余价值理论》出版前几年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说明是正确的（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04页）。

* * *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在1905—1910年由考茨基分三卷第一次出版，其中第二卷又分成两册。这个版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这部精彩的著作；这部著作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其中包括俄文。但是，考茨基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质量上有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某些地方简直是严重错误的。

考茨基根本不考虑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应当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也就是说，他没有遵照恩格斯本来的想法，也不考虑手稿的内容和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直接说过他是从历史部分开始写

作《资本论》的。考茨基宣称，《剩余价值理论》不是《资本论》的第四卷，而是同《资本论》“平行”的著作，还说什么这部著作缺乏任何内在的计划和条理。考茨基根据这个极端错误的立场，随心所欲地对待马克思的手稿。他不懂马克思著作的独特结构，也不懂为什么这部著作要把历史批判研究同对经济问题本身的正面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写在自己稿本封面上的这部著作的目录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各个章节的外部的和内在的次序，考茨基对这一切一概置之不理，随心所欲地改变马克思著作的结构，把原文的各部分毫无根据地重新编排，把这个版本的第一卷、特别是第二卷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剪裁。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开头有一个简短的总的评论，批评以往所有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同它的特殊形式即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还有短短的一章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后者最早意识到不可能从交换中得出利润。这一章是研究重农学派学说的一个导论，重农学派最早尝试通过分析生产过程来说明剩余价值。然后，马克思便转而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说，以后又回到重农学派，对他们的学说中证明他们是比后来的亚当·斯密更深刻的研究者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对魁奈的著名的《经济表》进行了考察。《剩余价值理论》最初几章的这种次序，是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曲折的发展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前进一步，在另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却倒退一步。

考茨基粗暴地破坏了马克思给各章编排的这种次序。考茨基在他的版本的开头安排了取自1861—1863年手稿最后几本中的四个片断；他把马克思在手稿第VI—XVIII本中所作的连贯的阐述，同取自第XX—XXIII本中的补充草稿混在一起；他从正文中删掉了与批判分析斯密和魁奈的观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把它们作为特别附录，不作为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研究而单独加

以编排。

考茨基在他的版本的第二卷中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原文作了重新安排。这一卷被考茨基任意分割成单独的两册，并且，〈李嘉图的利润理论〉这一章，在马克思手稿中包含着对李嘉图平均利润率及其下降原因的观点的结构严整、次序严密的批判，而考茨基把这一章分成两半，一半放在上半卷而另一半放在下半卷，彼此相隔三百五十页正文。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上的错误给李嘉图的利润学说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因此，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把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分析放在〈李嘉图的利润理论〉这一章之前不是偶然的。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把正文任意重新剪裁，想使它依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用的说明次序；而〈资本论〉第三卷不是对李嘉图的观点进行历史批判的研究，而是系统地阐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

考茨基在许多场合把手稿正文任意划分章节，而不充分注意马克思的论证进程。编辑加上的标题往往限于简单列举名目，或带有非常一般的、抽象的性质，一点也表示不出某一问题是从什么方面来考察的，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某一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揭露某一观点的什么错误。有时，考茨基加的标题可以使读者产生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象理查·琼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似乎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要素。而考茨基在给〈剩余价值理论〉各卷所写的序言中，则根本模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区别，只字不提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中完成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而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恰好为此提供了许多鲜明而具体的资料。

在考茨基的版本中有许多毫无道理的删节。被删去的部分，有的篇幅不大，也有的篇幅相当大。总计被考茨基删去的篇幅不下于五、六个印张。有些被他删去的部分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例如

论拉姆赛的一章中关于工人阶级状况随着资本的积累不可避免地要恶化的那一段(马克思手稿第1098页)和论舍尔比利埃一章中关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中可变资本绝对减少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手稿第1112—1113页)。

对马克思手稿的笔迹的辨认,考茨基也是非常粗心大意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考茨基身上尤其不能原谅,因为当时恩格斯曾教过他怎样辨认马克思的一些难认的笔迹。甚至在马克思手稿写得相当清楚的地方,考茨基由于粗心大意,在抄写马克思原稿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和歪曲。例如,在论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一章中,对«Prozess»〔“过程”〕一词(马克思手稿第703页)的辨认就是一个重大错误。马克思是说:“……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就会明白,如果用于补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资料生产者购买他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因而,如果这个流通过程实质上不是生活资料 and 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那末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就不能购买机器或原料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手稿中明明写着:«Den allgemeinen Prozess betrachtet…»〔“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可是,考茨基在自己的版本中,用«Profit»〔“利润”〕一词代替了«Prozess»〔“过程”〕一词,从而就使马克思的很清楚的思想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

考茨基不仅在辨认手稿笔迹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而且他把手稿中的一些英文和法文译成德文时也有许多地方译得不确切,此外,他还加进了某些不正确的编辑插话,对马克思原文作了没有根据的、错误的“更正”。

为了说明考茨基作的“更正”,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论李嘉图利润理论这一章的末尾,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关于从殖民地贸易中所取得的高于宗主国的利润对平均利润率、并相应地对生产价格发生影响这一问题的观点,他写道,“……由于高额利润……

会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平均利润水平低时更高于这些商品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比利润低时低于它们的价值的程度要小些。”(马克思手稿第 694 页)考茨基不懂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他把马克思的这句话“更正”如下：“…… 由于高额利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平均利润低时更加超过它们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降得更加低于它们的价值。”这里，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下述重要思想：从掠夺殖民地而得来的高额利润使宗主国的平均利润率提高，从而在宗主国引起生产价格的普遍上涨。

考茨基除了在抄写手稿原文时犯有不能原谅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还自作主张地用另一些术语代替马克思的一些术语。例如，考茨基用«Produktionsmittel»〔“生产资料”〕代替«Arbeitsbedingungen»〔“劳动条件”〕，用«Arbeitsmittel»〔“劳动手段”〕代替«Arbeitsinstrument»〔“劳动工具”〕，用«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代替«Kostenpreis»〔“费用价格”〕和«Durchschnittspreis»〔“平均价格”〕等等。

* * *

考茨基的版本有这样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需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的崭新版本，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了这样一个版本(第1册1954年出版，1955年再版，第2册1957年出版，第3册1961年初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的新版以马克思的原稿为基础，详细核对了手稿中的字迹，许多地方作了重要的订正。为了确定正文的内容、编排和章节划分，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草拟的目录。

新版分三册，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很大，同时也是根据它的内容分的：第一册主要说明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第二册论李嘉图，第三册论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主要是对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两大功绩：（1）他们最早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2）他们最早试图描写在全国范围内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马克思研究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时，揭露了他们所固有的也是后来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形式。他还揭露了他们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中的两重性，在他们的著作里，剩余价值有时表现为纯粹的自然赐予，有时表现为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产品。

马克思也揭露了亚当·斯密学说对重要的经济范畴——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等等——的解释中的矛盾和两重性，亚当·斯密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看法有时是正确的、科学的，虽然他不能在他的理论中彻底贯彻这条科学的路线。马克思批判分析了斯密的理论，十分巧妙地揭露了其中包含的庸俗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发展成为追随斯密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辩护性理论。为了批判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的所谓斯密教条，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特别是详细研究了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马克思分析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同时也仔细考察了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庸俗化的过程。此外，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这种或那种概念的方法论根源，而且也揭示了它们的阶级根源。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主要是对李嘉图经济理论的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顶点。李嘉图竭力根据劳动价值论来理解和说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在李嘉图的观点中，地租理论起很大的作用，而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李嘉图错误地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或者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费用价

格”)等同起来。李嘉图体系的这些特点,使马克思在分析这个体系时只好先阐述为什么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马克思先写了《插入部分》,批判分析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后者企图(虽然没有成功)论证被李嘉图所否认的绝对地租的存在。

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在理论上的巨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李嘉图方法的原则性缺点。李嘉图没有能把平均利润率规律同价值规律联系起来,在他的利润理论中存在着庸俗因素,他把某一生产部门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为一谈,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了。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理论错误,揭露了他的观点的阶级局限性,发挥了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观点,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变化原因的观点,关于资本积累过程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关于危机问题的观点等等。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研究了从左右两方对李嘉图体系的批判,右方是代表土地贵族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益的马尔萨斯,左方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学派。马克思叙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过程;并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本身、它的根本原理和它的基本范畴都被庸俗化了。

在论马尔萨斯的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了马尔萨斯为非生产阶级的挥霍辩护,把挥霍看成防止生产过剩的手段言论是荒谬的、极端反动的。在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衰退过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拒绝李嘉图体系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陷入毫无结果的烦琐议论,无耻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得出十分庸俗的理论和观念。在论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功劳的,同时也指出,他们不能克服李嘉图理论的资产阶级前提,他

们企图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没有根据的。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的最后三章是对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的观点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批判了他们关于资本和利润源泉的庸俗观点，并且指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具有暂时性质的观点的某些萌芽。第三册的最后是一个长篇的补充附论《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作了精彩的分析。

前面已经说过，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研究大大超过了最初设想的范围，并且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几个稿本中，关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又写了许多补充的评论和札记，因此，这些评论和札记自然收入第一册的附录，作为对最初按范围较窄的提纲所写的正文的补充。在第一册的附录中，还列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研究（取自1861—1863年手稿第XXI本），这是对《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个历史批判性的一章的重要补充，此外还有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的札记（取自1861—1863年手稿第V本），186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取自手稿第XVIII本）。

在第二册的附录中，有马克思写在手稿第XI、XII和XIII本封面上的几段简短的补充札记，它们是同第二册所考察的许多问题有关的。

作为第三册附录的是上面提到的长篇附论《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这个附录基本上是理论性质的，但是在历史批判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把它作为附录是因为马克思在第XIV本封面上写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目录提纲中，对《理查·琼斯》一章加了一个注，“这第五部分结束”，即论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篇的最后的、历史批判部分（《剩余价值理论》最初是作为这一篇的

最后部分，即第五部分来写的)结束。在目录提纲中紧接着还写了“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这几个字，在第XV本的目录中又补写了：“庸俗政治经济学”(见本卷第1册第6页)。马克思用“补充部分”这个词意思是指正文的插话或正文的补充。因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就是死抓住收入及其源泉的拜物教形式的外观，所以这个“补充部分”就成为全卷最后对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研究的补充。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全文是照马克思稿本中的次序排列的。个别地方根据作者本人的指示作了必要的次序更动。例如在第VII本中，马克思在论述斯密的生产劳动的观点，并提到斯密观点的庸俗化者热尔门·加尔涅的时候，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插入部分。插入部分开头这样说：“在分析加尔涅的观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即以补充部分的形式]就前面引证过的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地方去谈，而不在这里谈，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当·斯密。”依照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和马克思后来编的第XIV本的目录，本版把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那一章，马克思在那里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辟了专门的一节。另一个更动次序的例子是：在第X本中有一章论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手稿第441—444页)，篇幅不大，没有写完；可是，在后来编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目录提纲中(在第XIV本封面上)，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这一节移到《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一章；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指示，手稿第441—444页论布雷那一段就移到论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的一章。

全文章节是依照马克思编的目录和手稿中几个地方的指示划分的。至于各个标题，本版利用了，(1)马克思编的目录中的标题；(2)马克思所编《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计划草稿中同《剩

余价值理论》手稿的某些部分有关的标题，(3)《剩余价值理论》原文中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标题。但是，这一切合在一起，也只在手稿各篇各章必须加上的全部标题中占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标题，是由编者根据手稿有关部分的全文，尽量利用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和说法加上的。编者加的标题——同一切由编者加上的文字一样——用四角括号标出，以便同马克思本人加的标题相区别。因此马克思手稿中有时使用的四角括号则改用大括号。

四角括号中的罗马数码是指马克思手稿稿本的编号，阿拉伯数码是指手稿页码。此外，如果原文没有任何移动，那末手稿页码只在手稿每页开头出现一次。如果原文不是连续印出，次序有某些更动，那末手稿页码在该片段的开头和结尾同时标出（如果从一个稿本转到另一稿本，则标出稿本编号）。

在准备新版时，为了提供一个既确切同时又好读的《剩余价值理论》译本，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手稿原文有许多地方在文字上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思想往往表述得非常简略，它们还只是草稿。为了找出确切的词句来表达手稿的本来思想而又不掺杂任何其他意思，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虽然马克思的大部分手稿是用德文写的，但是他往往有时也利用英文和法文的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则完全改用英文或法文。把手稿译成俄文时，必须把这一切统一起来，使马克思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思想在俄文译本的文字中得到同义的、尽可能确切的表现。

在翻译手稿的过程中，发现并校正了各种笔误，以及不确切的数字和引文。核实了实际材料、资料来源，订正了术语。

《剩余价值理论》新版的这三册都附有全部索引资料，包括注释、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马克思引用的著作俄译本索引和人名索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 1954—1961 年俄文版的编排出版了

《剩余价值理论》的原文版(1956—1962年柏林版)。

* * *

第二十六卷分三册出版。它本质上和基本上是翻印1954—1961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单行本的全文和索引资料。本卷和单行本不同的地方是在文中仅仅对某些细节作了更动。

在某些地方，对编者加的标题作了订正。对译文作了某些订正和修辞方面的改进。补充了一些新的注释，有些原来的注释作了改写和补充。

对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作了补充。人名索引中，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他各卷一样，在每个人名之后附有简介。

在本卷第三册末尾附有全卷(三册)的名目索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各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各卷从第二十七卷开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谈到了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工人运动的一般特点，列宁在阐述这些特点时指出，这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独立工人运动突起的时代，确定无产阶级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357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极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各个重要阶段。这些书信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它的创造性，革命理论同革命政策的结合，科学共产主义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信构成了他们遗著的重要部分，并清楚地说明了国际无产阶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这些书信表明他们为建立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和为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正确策略（既考虑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性，又考虑到这一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中的特殊性）进行了多年斗争。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进行尖锐的原则性的批判，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的特点。深刻的党性，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各国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热情关怀是这些书信的首要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是巨大的思想财富。其中许多书信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重要补充，它们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要的理论和策略原理的独创而深刻的阐述，以及后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的许多问题的初步探讨。这些书信说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怎样发展了他们的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学说。有些书信具有特殊的科学价值，因为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发挥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对各种事件和人物所作的政治上的估价和评论往往比在发表的某些著作中要尖锐，因为在通信中他们不受书报检查和其他条件的约束，能够更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是研究他们生活和活动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历史和传记资料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信有助于深入研究他们的著作的创作过程，这些书信阐明了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时评活动中许多为人们很少研究的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交流思想，在创作上进行合作，他们之间的通信也表明了这两位革命思想的巨人兴趣广泛，知识渊博。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信非常重视，他细心写成的《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就说明了这一点。列宁为马克思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书信俄文版，校订作序，还给《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写了序言。列宁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末尾的马克思主义书目中也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列宁还专门写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作了深刻的评述。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各种不同的书信作了全面分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根据共产党和苏维埃

国家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列宁的倡议，在1922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并着手搜集散失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书信。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珍贵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工人在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的思想内容时写道：“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书信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到1913年才用原文出版了书信集的第一版；这一版由倍倍尔和伯恩斯坦共同编辑，共四卷。但是，这一版的编者实际上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家阉割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伯恩斯坦既已臭名昭著地‘演化’到极端机会主义的观点，本来也就不能担负编辑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工作。”（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6页）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内容所做的篡改性“加工”是从几方面进行的。首先，他所发表的书信远不是全部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约二百封信被漏掉了。至于对所发表的书信的内容，则用删去某些原理和别有用心地“磨去其棱角”的办法蓄意加以歪曲。他粗暴地破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书信的内容，从通信集

中抽掉一些政治方面的重要地方，使它不能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反无产阶级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的各种代表人物（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到拉萨尔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删去的多少很不一致，从几个字、几句话到整页。伯恩施坦发表的部分书信往往只是原稿的片断。因此，1913年版中的这些书信很多都不能看作是第一次发表的（凡是这样的书信，在本版中均作为第一次发表，在信尾注明第一次全文发表）。伯恩施坦给通信集写的序言和编者注同样是别有用心的，这些序言和编者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进行直接攻击，而对机会主义加以掩盖和粉饰。

除了这个通信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只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的很少一部分，这部分信有的单独在杂志上发表，有的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他们的某些通信人（库格曼、弗莱里格拉特、左尔格、丹尼尔逊）的书信集的形式发表。有些书信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等致左尔格的书信集，其内容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样也遭到了肆无忌惮和别有用心的篡改。对书信的删改在这里也主要是为了隐瞒和缓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批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版和广泛传播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有了新的条件。如上所述，就在苏维埃国家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就特别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的出版，认为这对广大读者是很必要的。列宁在同负责出版这本书信选集的弗·维·阿多拉茨基的谈话和通信中，对出版书信集的基本原则作了全面的论述，并且不止一次地指出，发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事业。列宁关于必须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加上详细的注释使广大读者易于了解书信的内容的指示，具有很大的意义。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29—193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XXI—XXIV卷)以及用原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三部分第1—4卷中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在1934—194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XXV—XXIX卷中第一次收入并用俄文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当时所掌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从那时起,研究院所收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大量增加。这就有可能把没有收入全集俄文第一版的许多书信补充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去。其中许多书信在本版中第一次发表;一些新收入的书信是在全集俄文第一版出版后曾经在国外和苏联发表过。

到目前为止,尽管已经发现和收集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但是,查找他们的全部遗留下的书信的任务还不能认为是完成了。许多已有一些明确线索的书信,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本版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的完整的供学术研究的版本;本版的任务不仅是改正在第一版所发表的书信的译文中的不确切的地方,而且还要利用和收集全集第一版出版后所发现的重要的书信资料。

本版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是按照材料的编年体原则发表的。第一版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信分两组编卷,第二版则不同,它们都编在一卷里,每卷的第一部分是某一段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第二部分是他们同时期给其他人的信。这样就便于系统地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应历史时期的书信。书信各卷的排列次序尽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的分期原则编排。书信的某些卷的编年期限也还以所收藏的某一时期书信数量来确定。

书信的第一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包括了欧洲各国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以前时期以及进行革命和革命失败后最初几年这一时期（从 1842 年到 1851 年）的书信。

收入第二十八卷和第二十九卷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主要是欧洲反动时期所写的书信。

第三十卷所包括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直到第一国际建立（1864 年 9 月 28 日）这一时期的书信。

第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卷中的书信反映了作为第一国际领导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

收入第三十四卷的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停止活动直到 1883 年马克思逝世这一时期的书信。

收入最后几卷的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活动时期的书信。

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各卷的附录中发表了根据他们的委托由别人写的书信，以及马克思的夫人和女儿们所写的一些信，在这些信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思想。在附录中还包括其他一些与他们的书信有关的传记性文件。

与全集第一版不同，本版书信都加了注释，注释的内容包括必要的对正文考定的说明、历史的和传记的考证材料；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期刊索引和人名索引也是用于这一目的的。在全集的最后一卷里将刊登全部书信的名目索引。

书信的译文按照原文重新作了校订。第一版书信中夹杂的各种文字的语句都保留了原文，本版则不同，都译成了俄文。信尾指出写该信所用的主要文字。

在准备书信付印过程中，对写信日期又一次作了审定。凡是作者在世时发表的书信，书信的手稿则按照作者生前发表的原文

文字校对。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掌握的只是翻译所依据的书信复本或发表书信的刊物，这一点也在信尾作了说明。

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 1842 年至 1851 年所写的书信。

本卷的编年期限包括马克思主义史的几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1844 年），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1844—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的活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经验所做的理论总结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策略的进一步研究（1849—1851 年）。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2—1844 年写给其他人的信说明了他们在世界观方面所发生的根本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在 1842 年马克思给《莱茵报》撰稿并担任编辑工作时期所写的书信中，就已经表现出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学派，特别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态度。

这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对那些只批判宗教并自称为“自由人”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严厉批判。年青的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否定的评论，批判他们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回避迫切的政治问题，蛊惑人心地炫耀那种只不过是发表不着边际的空论和唱唱高调的政治激进主义（见马克思 1842 年 11 月 30 日给卢格的信）。马克思在信中提出了与“自由人”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纲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

坚持这一纲领：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在人民当中进行进步哲学的宣传是必要的，但在政治方面，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刻的和具体的批判，也是必要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见本卷第 433 页）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是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他无情地批判反动哲学，特别是当时已经成为保守的君主制思想和宗教黑暗势力的代言人之一的谢林的观点。在本卷第一次全文发表的 1843 年 10 月 3 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年青的马克思指出，同谢林及其受到普鲁士政府官方庇护的哲学学派进行斗争，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见本卷第 445 页）。列宁对这封信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在当时马克思“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见《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55、356 页）。列宁认为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马克思一经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就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坚决批驳一切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掩盖两个哲学阵营矛盾的伎俩。

四十年代初期，马克思虽然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很大影响，但同时却在自己的一些信中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点，以及它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例如，他在 1842 年 3 月 20 日给卢格的信中说，他计划要写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同费尔巴哈发生矛盾，而在 1843 年 3 月 13 日给卢格的信中则说得更明确了：“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见本卷第 442—443 页）。马克思关于哲学同生活、同政治斗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两年以后即在 1845 年秋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思想。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书信同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这些书信表明年青的马克思是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是用革命斗争方法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是人民群众利益的热情捍卫者。马克思没有德国激进主义者对君主立宪所抱的幻想，他对莱茵省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见马克思1842年3月5日和20日、7月9日给卢格的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显然同情被他称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见马克思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

因此，1842—1844年的书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

年青的恩格斯的观点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例如，恩格斯1842年6—7月给卢格的信就说明他是反对谢林及其信徒的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的。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进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会见时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完全一致。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创作上的合作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共同的革命斗争。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黎会见，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大量通信，这些书信反映了他们怎样共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怎样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在五十年代，当时马克思在伦敦，而恩格斯则被迫迁居曼彻斯特，他们的书信来往特别频繁。在这段时期，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几乎每天都通信，经常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最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保存下来的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书信大都是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从他们巴黎会见后不久写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

在德国参加了革命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在这些信里，对国内状况作了清晰的评述。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中反对派情绪的增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首先指出的就是这些。

四十年代德国的情况是，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还在自发地发展，一些观点极其混乱的人——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庸俗社会主义的体系和理论的创造者——打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在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认为必须尽快地全面制定革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并在报刊上加以阐述和宣传。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见本卷第6页）

在1844—1848年的通信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创作计划的讨论占有显著的地位。通过恩格斯的书信可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如《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历史。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紧张的理论活动，他们当时在基本方面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其他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这封信同此后不久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之一——有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非常清楚地叙述了他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信中深刻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物质基础和政治、

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作用，以及作为历史的推动力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问题的发展同他们对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进行的思想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检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的试金石就是看它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对革命地改造世界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全世界的历史作用。“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蒲鲁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蒲鲁东的观点不仅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半无产阶级分子中，特别是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观点的体系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小资产者……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见本卷第488页）。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认为他完全不了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在他们1851年所写的书信中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见马克思1851年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中指出了蒲鲁东的哲学和经济学观点的空

想性质和贫乏，严厉批评了他针对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所提出的关于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按照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怜计划。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在1851年8—10月写了一篇对蒲鲁东的书的批判性评论，马克思打算利用它写一部驳斥这个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的长篇论战性巨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1848年的书信还反映了他们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其他派别的斗争。恩格斯寄往布鲁塞尔给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说明恩格斯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解释工作。他日复一日地在长期的争论中，驳倒了对手的论据，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批驳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观点、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在1848年1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些思想之所以传播，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发达和落后，当时的无产者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还保持着联系。在一次以格律恩的支持者完全失败而告终的争论中，恩格斯简要地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立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见本卷第71页）列宁在1913年根据这些信说明恩格斯的活动时，写道：“这样，还在六十七年以前，就在巴黎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2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形成，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同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各

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建立和加强了联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46—1847年所写的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欧洲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使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互相接近,对不成熟的、乌托邦的和宗派的观点进行斗争,为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自然地成了各通讯委员会的中心。恩格斯从巴黎寄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连串报告工作的信(1846年8月19日、9月16日和10月23日)以及马克思1846年5月5日给蒲鲁东的信都专门报告了这些委员会的建立和活动计划。

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表明,在组织通讯委员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他们1847年8月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参加这个协会的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同无产阶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具有何等的意义。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协会里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名讲演。

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的影响日益加强。1847年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参加下,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民主协会。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0月26日给海尔维格的信,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这个很快就成为团结民主力量的国际中心之一的组织的活动中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哈尼以及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民主团体“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由这个协会组织的伦敦国际大会(见恩格斯1847年11月14—1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2月9日给安年柯夫

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捍卫以及他们同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都对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中期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盟员的观点的进步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3—1844年起就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保持联系。同时,恩格斯在1846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的混乱的观点和动摇的立场也作了批判(见恩格斯1846年9月18日和12月底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效仿法国布朗基派的密谋团体建立起来的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抱否定态度(见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确认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正确性的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同意加入同盟,同意在他们两人所宣布的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同盟改组工作和制定同盟纲领。1847年的书信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关于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了正义者同盟,新的同盟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建立新的同盟支部的资料(见马克思1847年5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和10月25—26日给马克思的信)。

恩格斯在1847年底写的有关筹备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书信有很大的意义。恩格斯在10月2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起草了一份应当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纲领草案。这就是《共产主义原理》,即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的初稿。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的信中把写作《共产主义原理》的计划告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封

信里不满意起草这个文件所采用的教义问答形式，建议马克思选择另外的叙述形式：“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见本卷第123页）。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封信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正当的”（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2页）。恩格斯的这封信说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提出多么高的要求，在纲领里，要扼要而清楚地表述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要宣布和科学地论证工人阶级的伟大的目标并且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阐述）的写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革命前的全部创作活动的顶峰。这一著作在1848年初出版标志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书信在本卷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如果说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了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原理，那么在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的策略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这几年通信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我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就提供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活动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1848年3月（当时马克思住在巴黎，恩格斯住在布鲁塞尔）的信表明，他们两人非常注意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发展和欧洲其他国

家对革命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各主要阶级在革命事件进程中的立场时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情绪日益增长，无产阶级新的革命发动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1848年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里资产阶级又极端无耻和反动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见本卷第137页）恩格斯在1848年3月28日给他的妹夫艾·布兰克的信中也说，“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见本卷第501页）。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期间，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进行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斗争，这两个人在巴黎组织了德国流亡者的武装军团，企图率领武装军团攻入德国，从外面把革命输入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这种冒险策略（见恩格斯1848年3月26日给艾·布兰克的信），提出了自己的与此完全相反的计划，他们主张先进的德国工人，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单个地回到德国去参加革命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上述计划的不妥协的立场（在马克思1848年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3月18日的回信以及其他的信中也表现了这种立场）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反对任何关于革命能够“输出”的思想。

恩格斯回到德国后，在1848年4—5月写的信中估计了德国当时的形势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状况，根据恩格斯后来的论证，这些因素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制定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有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在1848年4月25日和5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同年4月15日和5月24日给艾·布兰克的信中，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及其首领——领导普鲁士政府的自由派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的反革命立场，他还指出了组成普鲁士和全德立宪会议左派党团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他们被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吓破了胆。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的

政治积极性激发起来了，但是德国工人运动还是自发的，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封建君主制的反革命势力逐渐活跃，没有遇到革命力量方面的有力反击。1848年5月底，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形势做了准确的评述：“在柏林，康普豪森无所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见本卷第508页）

由于德国社会经济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力量薄弱和无组织性所造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个国家当时还不具备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首先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即真正无产阶级一翼。直到1849年春天，由于德国和欧洲的情况改变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列宁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同孟什维克论战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规定了所有进步的德国民主派的行动纲领，同时又不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混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战友出版的《新莱茵报》在宣传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争取彻底解决德国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认为这个报纸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60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反映了他们在战友和朋友的支持下为保证报纸的出版所进行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从马克思1848年11月中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49年2月3日给该报编辑之一恩·德朗克的信中可以看出，作为报纸主编的马克思不得不为报纸的出版进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经常遭到资产阶级股东对报纸的革命方针的不满，不得不克服巨大的物质困难和普鲁士当局

的阻挠。马克思在书信中指出了出版报纸的巨大的政治意义，认为它是党的事业：“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见本卷第147页）。

《新莱茵报》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巨大的声望远远超出了莱茵省和德国的范围。马克思1848年11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49年1月7—8日从瑞士寄给马克思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捍卫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英勇参加者，表现了《新莱茵报》战斗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马克思本人在本卷第一次发表的文件中，即1850年6月30日给为纪念这次起义两周年而召开的伦敦流亡者会议的主席的信中，就是坚持了《新莱茵报》的这种国际主义。“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见本卷第561页）

本卷发表的、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恩格斯的书信和文件，向研究者提供了有关恩格斯1848年10月底到1849年1月中在瑞士的活动的有价值的和相当新的材料。恩格斯由于警察的迫害不得离开德国，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在洛桑和伯尔尼居留期间，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1848年12月25日左右以中央委员会（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领导机关）名义给斐维联合会的信表明，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先进分子反对地方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斗争。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委托由他起草的告三月同盟理事会书，反映了恩格斯为实现一切民主力量的行动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对这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及其动摇和怯懦的政策作了尖

锐批判。这个文件中表现的思想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三月同盟》和《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是一致的。

1849年6月初，由于德国反革命的进攻，《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之后，马克思前往即将爆发革命事变的法国。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从巴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同法国的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经常的联系。恩格斯在1849年7—8月所写的一批信中谈到他加入一支志愿部队，积极地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同年8月24日给沙贝利茨的信和8月25日给魏德迈的信）。恩格斯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认为，特别有意义的是在他经过整个战役和参加四次战斗之后，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都不能再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编辑们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战斗了。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期间的通信反映了他们作为革命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的活动，表明他们总是站在人民群众斗争的中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活动，和以往的时代一样，经常遭到警察迫害，遭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诬蔑和诽谤。收入本卷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书信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

还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封建专制的普鲁士当局就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不让他留居德国。普鲁士的警探和暗探严密地监视他流亡中的活动，普鲁士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阻挠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在欧洲任何国家留居。由于普鲁士当局和法国反动分子的勾结，马克思在1845年1月被逐出法国。1848年3月初，马克思（以及他的妻子）在遭到非法逮捕之后，又被逐出暂时栖身的比利时。从恩格斯1848年3月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到比利时激进的民主界由于比利时当局的这种专横行为而掀起的愤怒浪潮。

恩格斯的革命活动也遭到警察的监视和迫害。1846年底,内务大臣命令巴黎警察局长驱逐恩格斯,因为他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见恩格斯1846年12月给马克思的信)。1848年1月底,根据基佐政府的命令,恩格斯被逐出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留居科伦期间,他们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不断遭到警察和法院的迫害。结果恩格斯不得不在1848年9月离开德国,流亡国外,而为了继续出版报纸留在科伦的马克思则经常有遭到逮捕的危险(见马克思1848年11月中和11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48年12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

1849年8月,在马克思留居法国期间,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个沼地去。马克思在1849年8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把这个手段叫做“变相的谋杀”。

1849年8月底,马克思不得不移居伦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逝世。然而马克思住在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1850年5月,由于在德国逮捕共产主义者,由于普鲁士政府策划对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审判,普鲁士当局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把马克思逐出英国(见马克思1850年6月8日和6月27日给魏德迈的信)。恩格斯也不得不流亡英国,因为在德国他将由于积极参加德国西南部的武装起义而受到普鲁士当局的惩治(见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国际反动势力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迫害一直继续到以后的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1851年期间所写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在反动时期的活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保存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教育和在政治上锻炼他们,捍卫正在形成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使它不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改组了同盟和他所领导的同盟中央委员会。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正如本卷发表的书信所表明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恢复业已失掉的联系方面，在把革命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849—1850年的书信，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给魏德迈的信，提供了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活动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曾积极促进工人运动的真正革命者的联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在这个时期对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一翼——宪章派之间的联系予以极大的重视。这个时期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支持革命的宪章派活动家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这个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帮助他们出版机关刊物、支持他们对阻碍宪章派进一步发展的内部的改良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派别作斗争。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对宪章派先进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对哈尼和琼斯的影响日益加强。1850—185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卓越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和诗人厄内斯特·琼斯的友谊更加巩固了，在哈尼于1851年初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之后，琼斯成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恩格斯在1851年7月9日给德朗克的信中指出：“同哈尼相比，琼斯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见本卷第584页）

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1849—1850年的书信中，为创办机关刊物而进行的斗争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刊物将继承《新莱茵报》的

战斗传统，将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马克思还在1849年8月23日，即他从巴黎动身去伦敦的前夕寄给在瑞士的恩格斯的信中邀请自己的朋友去英国，以便共同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1850年1—11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就是这样的刊物。这个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事件，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并发展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出版杂志花费了多少精力。他们要求在德国和瑞士的战友和朋友们协助推销杂志。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要求他在《新德意志报》上刊登关于杂志出版的广告。马克思在1850年1月10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谈到关于逐渐把杂志变成双周刊和日报的计划，并请他尽快地筹集继续出版这个刊物所需的款项。

无产阶级政党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占有很大的篇幅。

1850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在欧洲各国，由于经济的高涨和反动制度的加强，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发生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修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改变斗争的方式。新的情况要求在集聚力量方面，在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方面进行细致和耐心的工作。但是，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不顾客观的历史条件，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由于这些分歧，在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分裂，其中大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

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斗争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揭露工人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 1851 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派别活动曾使无产阶级离开它所面临的任务——为未来的斗争集聚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激烈反对维利希的假革命计划，维利希在 1850 年秋季提出了利用普奥冲突动员后备军的机会，立即在德国西部发动革命的冒险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玩弄革命的阴谋，辛辣地嘲笑了维利希的徒劳而有害的计谋（见恩格斯 1851 年 7 月 9 日给德朗克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写的书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说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接近起来并且实际上变成他们的附庸。马克思在 1851 年 2 月 28 日给海尔曼·贝克尔的信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信中通过这个集团的政治演变的例子指出，派别性和宗派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滚到反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并导致在思想上依附于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当时这种影响的传播者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的通信中才尖锐批判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集团——卢格、金克尔、海因岑、司徒卢威、路易·勃朗等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这些集团的无谓的辩论和争吵、用革命的词句进行蛊惑人心的投机等假革命活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的活动使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的危害，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只能导致无产阶级组织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图谋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消除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在本卷中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 1851 年 8 月和 12 月给法兰克福的出版商艾布纳尔的两封信，对流亡者集团的活动及其冒险勾

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时部分地利用了这两封信中的材料。

马克思在批判流亡者首领之一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时，发展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理。他在1851年9月11日给魏德迈的信和9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坚决地谴责了马志尼忽视受地主剥削的意大利农民的利益和拒绝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有全体劳动人民广泛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够使这个斗争具有真正的力量和规模并保证它取得胜利。马克思在上述给魏德迈的信中指出，“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见本卷第604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下半年所写的许多书信中讨论了来自德国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捕的同志的命运表示担心，他们看到，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和其他流亡者集团的冒险计划容易使警察当局实现各种挑衅和捏造所谓“共产主义者的阴谋”案件（见马克思1851年5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步骤在报刊上组织文章，揭露普鲁士当局的所作所为和维护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见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49—1851年的通信表明，他们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把这种发展看作是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1848年以前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1848—1849年是确立政治思想和确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在五十年代则把发展经济学说提到了首位。马克思一面研究经济文献，一面继续创立他在四十年代

就开始的经济理论，在四十年代他就曾经打算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他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马克思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说明了马克思在为他的科学著作收集和整理材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如在通信中所看到的，他深入地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的历史以及当时各国特别是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个时期，使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和理论，以及经济危机。例如，马克思在1851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首次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作了批判，提出地租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而在2月3日的信中则向恩格斯详细地叙述了有关货币流通理论的思想。恩格斯同样也研究了经济问题，竭力帮助马克思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他在1851年2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克思告诉他的那些有关货币流通问题的新见解使他非常感兴趣，他准备认真考虑。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经常同恩格斯就英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现象交换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革命后在工业中出现的“繁荣”是暂时性的；他们还预见经济危机的到来。

1851年，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的策略问题。1850年底，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系统而认真地研究军事。恩格斯在1851年6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促使他研究军事的原因作了如下说明：“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

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见本卷第576页）恩格斯的信表明，为了研究军事学术的历史和理论，他搜集了多么广泛的文献资料。

从军事观点来看，恩格斯1851年9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封信里他批判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霍夫的文章《未来战争概论》。这封信里分析了在发生新的革命事件时欧洲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大致对比。恩格斯在信中还提出了关于革命军队的组成特点及其战斗行动的性质的重要思想。

在恩格斯的一系列信中对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军事著作家（纳皮尔、萨瓦里）的著作和许多统帅（如威灵顿）的活动作了评价。

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通信中反映出他们多年来创作上的合作。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出题目，要他写新著作。在这方面，恩格斯写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过程是很好的例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出这些特写的。马克思在1849年8月1日左右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见本卷第156—157页）恩格斯立刻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并且在1849年8月24日就通知出版商雅科布·沙贝利茨说，他在写关于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回忆录。

恩格斯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合作的另一个光辉例证。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当时忙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于是在1851年8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给这家报纸写一篇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年底前恩格斯为《论坛报》写了这组文章的前三篇文章，署名马

思,在该报上发表(其余几篇文章是在1852年写的)。恩格斯在写这部著作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此外,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同样,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构思也无疑是受恩格斯1851年12月3日的信的影响而产生的。这封信对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们的科学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不可分开的联系,他们每个人对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本卷中的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袖和导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表明,他们认为对党的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培养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认为必须利用暂时的革命低潮来进行这项工作(见恩格斯1851年7月9日给德朗克的信)。恩格斯在1851年7月20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来自德国的关于成立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消息表示高兴,因为在这些同盟支部中成长着党的新干部,即党的未来的“总参谋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从他们开始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时起,他们的周围就有一批朋友、战友和同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在革命的年代和在反动统治的艰苦岁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活动都是同他们一道齐心协力进行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中,威廉·沃尔弗(鲁普斯)占有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他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友谊。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威廉·沃尔弗作了高度评价:“必须使鲁普斯抛弃过分谦逊。这个出色的人是必须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见本卷第124页)。在革命的年代里,威·沃尔弗是《新莱茵报》的编辑

部成员并且是这个革命机关报的最杰出的撰稿人之一。威·沃尔弗在1851年夏季来到伦敦以后，坚决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宗派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的阴谋的斗争（见马克思1851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流亡国外期间同在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马克思1847年3月7日给丹尼尔斯的信以及其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同马克思有多年旧交的丹尼尔斯在科伦共产主义者当中起了领导作用。马克思同这个革命家和卓越的学者就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作用问题交换意见。马克思在1851年5月给丹尼尔斯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见本卷第575页）。1851年6月，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丹尼尔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颇为不安（见马克思1851年6月16日和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51年10月4日和8日之间给丹尼尔斯的妻子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提供了关于他们的朋友和同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参加《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斐迪南·沃尔弗、恩·德朗克、格·维尔特和斐·弗莱里格拉特的重要材料。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1850—1851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在划清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之间的界限的时刻，德国的革命诗人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支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见马克思1850年1月1日给弥勒-捷列林格的信和马克思1851年5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1848—1851年的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约·魏德迈的通信占有很大的篇幅。魏德迈在四十年代中期一度醉心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到1848—1849年革命前，

已经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战友。恩格斯在1851年8月1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魏德迈是最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党内同志之一。“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上就能回来。”（见本卷第313页）马克思对魏德迈同样也作了高度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支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教育和训练他们，同时也象他们的书信所表明的，对他们当中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进行严肃批评。

马克思1850—1851年的书信以及在附录中发表的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描绘了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在伦敦流亡期间所遇到的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和种种苦难的情景。经常的物质生活困难，因欠房租可能被赶出门外，流落街头，债主逼债，孩子生病和夭亡——所有这一切有时使马克思的生活十分窘迫并妨碍了他的科学研究。另外还有来自周围的许多敌对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诽谤和中伤，这些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势不两立的（见马克思1851年8月2日给魏德迈的信，燕妮·马克思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

书信中的材料清楚地表明，在艰难困苦流亡条件下，恩格斯多年来久经考验的友谊在马克思和他家庭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马克思贫困交加时，恩格斯表现了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马克思能够继续进行经济研究，他又回到了父亲的办事处，又应付了好多年“该死的生意经”。列宁指出：“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全部通信是这两位革命思想巨人在几十年中结成的深厚友谊的极好的证明。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见《列宁全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一封信；其中有些寄给各种组织的信按其性质应当发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应年代写的著作的全集中；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得到和发现这些材料时有关的全集已经出版，所以编入本卷。许多新收入全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另有一些书信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编者在这些信的末尾都作了说明。

一些新收入本版的文件是1843—1844年期间的。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马克思就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一事给弗吕贝尔的信和给《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以及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信中有关于马克思1844年夏季同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联系的重要内容。恩格斯1848年12月底以瑞士德国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两封信，提供了有关恩格斯生平中很少有人研究过的时期的新材料。马克思1850年7月17日给布林德的信很有价值，这封信提供了关于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新资料。

收入《附录》部分的材料，是对本卷中发表的书信的补充，具有革命历史和传记资料价值。在这些信件中，有一些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委托写给恩格斯和魏德迈的信。《附录》部分还收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施拉姆受马克思的委托1850年1月8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以及马克思1845年留居比利时期所写的呈文。其中一些材料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和部分编入全集第一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7—1841年青年时代所写的信，没有收入本卷。这些信的大部分在

1956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信按其性质和内容来说,同收在《早期著作选》中的著作有直接关系。

第二十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55年所写的书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相当于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开始并延续到五十年代末的欧洲政治反动时期。这时警察专横制度统治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残酷的镇压。资本主义经济总的来说处于高涨的时期。但是，经济繁荣具有不稳定的性质。1853年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在英国，生产有所下降。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逐渐临近的、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迹象。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此起彼伏，通过罢工、闹风潮，有时也通过起义的形式迸发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发展自己的学说，耐心和坚持不懈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揭露欧洲反动派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几年坚定不移地相信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和信件中揭露欧洲各国统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指出它们内部虚弱和必然崩溃。他们对于准备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的形成过程有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向读者表明，他们在这些年代的活动是广泛而多样的。他们在书信中对种种事件和活动家的态度往往比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表现得更充分、更尖锐。

在书信中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表明：两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怎样通过生动地、创造性地交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极重要的原理，怎样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把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一思想武器磨炼得更锐利和更完善。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特别是1852年的书信，也象全集第二十七卷的材料一样，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所作的巨大工作。最卓越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之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马克思在1852年头几个月内写成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工人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论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原理。通信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创作和发表的经过。马克思在事件发生后，在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立即写了这部著作。从通信中可以看出，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密切注视法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进程和后果。马克思1852年1月20日给恩格斯的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信，以及恩格斯1月22日、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1852年1月23日和30日给魏德迈的信，按其内容来说，都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许多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在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封信里马克思不仅集中地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经验，而且还综合了他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革命结论，阐明了他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无阶级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这一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的观点作了对比，并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509页）。列宁对这封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评述：“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页）

在书信中有相当多的地方谈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写作情况，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1848—1849年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书信表明，马克思很重视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在寄往《纽约每日论坛报》之前，马克思先看过并给以高度的评价。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对经济学说的研究成为马克思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是党的首要的政治任务。恩格斯直截了当的指出，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新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运动新高潮即将来临）开始之前，马克思必须完成他的经济著作。他在1853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应当结束你的《政治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见本卷第230页）

在五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经济学说的各个方面，在积累和分析与自己著作有关的经济资料以及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注意观察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他们分析统计资料，证实了他们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是暂时性的，新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必将在一定条件下对欧洲革命运

动的高涨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见马克思 1852 年 4 月 30 日给魏德迈的信、1855 年 1 月 23 日给拉萨尔的信，以及恩格斯 1852 年 8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和 1852 年 2 月 27 日给魏德迈的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仔细地研究了英国这个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正是首先依据对英国商业和工业状况的分析，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规律性，预见新的经济危机必将来临（见马克思 1853 年 1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很注意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面提到的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魏德迈的信，以及马克思 1853 年 6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就对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观点作了评论。在这些信中，马克思揭露凯里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因为凯里认为，阶级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存在的重要前提，并竭力用这些虚假的论点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凯里为资本主义辩护，竭力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由剥削制度本身造成的社会贫困说成是派生的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例如，“大工业集中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在阐述凯里的观点的矛盾和他的方法论的缺陷时写道：“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见本卷第 270 页）马克思对凯里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们企图证明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可以消灭它的社会弊病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也坚决反对社会科学中的唯意志论，反对经院式的学理主义，反对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例如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

克思指出，不了解社会发展真正推动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真是白费心机，他说，“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见本卷第303页）。

为了更进一步地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过程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注意各国和各民族过去的历史。他们研究历史是因为他们想要从历史根源上弄清当时的许多事件和现象。这对于锻炼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正确立场来对待这些事件并在出版物中全面评价这些事件都是很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的通信反映了他们对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书信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概括性的结论和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譬如马克思在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对他当时研究的古罗马史作了下列结论：“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438页）列宁在他的《〈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一书中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马克思1854年7月27日写信给恩格斯，评论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一书，这封信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依据梯叶里的这部书的资料，考察孕育在封建主义内部的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马克思指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他们一产生就同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对立，这明显地表现为中世纪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的这封信对评定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对梯叶里的评价，也是对承认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

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阶级斗争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整个学派的评价。但是马克思通过对梯叶里的观点的批判，揭露了甚至是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优秀代表们所固有的缺点。马克思指出了梯叶里的功绩，称他是“‘阶级斗争’之父”，同时又揭示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梯叶里和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不能彻底阐明阶级矛盾的物质根源，不能克服关于只是封建社会才有阶级斗争那种狭隘观念，不能弄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和性质。马克思指出：梯叶里错误地把“第三等级”本身描绘成同封建阶级——贵族和僧侣相对立的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在“第三等级”内部，剥削者上层——资产阶级和被剥削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已经成熟，这个矛盾在推翻封建制度后已经公开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写道：“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见本卷第382页）马克思的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对阶级斗争的不同的看法，揭示了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甚至在全盛时期也是矛盾的和前后不一致的。

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指出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作为资产阶级同盟军的农民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作用。他指出：梯叶里“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见本卷第382页）。列宁特别注意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他指出：“法国资产阶级一旦决定同农民并肩前进，就取得了胜利。”（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第7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后是他们的伟大事业的继

承人列宁在创立和论证劳动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一学说时都利用了马克思的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革命变革中的作用,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这些最重要的结论。

由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加强殖民主义扩张,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心已成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牺牲品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恩格斯在1853年5月26日左右和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如何科学地分析圣经和可兰经中关于东方人民的资料,揭示了伊斯兰教的产生以及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征服地建立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为唯物主义地解释东方宗教运动提供了钥匙,他们指出,东方社会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都被宗教斗争所掩盖,而这些冲突是由于生活物质条件的变化,由于从游牧向定居过渡以及通商道路的改变等引起的。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特别注意英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殖民地——印度。根据对印度史和其他东方各国(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关于中世纪东方各国的发展特征的典型性论点。马克思写道:“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见本卷第256页)恩格斯补充和发展了这个原理,他指出,东方土地私有制发展这样缓慢,特别是在封建主义以前的时期,这首先是由于必须进行人工灌溉所造成的,而实行人工灌溉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办到。后一种情况使许多东方国家的土地和灌溉工程最初大部分归国家所有,而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封建国家也总是要关心维护灌溉系统的。恩格斯指出:“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见本卷第263页)

弄清了东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特点,马克思和恩

格斯就能揭示为什么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的东方各国的历史发展比较缓慢。马克思在 1853 年 6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自成为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小天地的小村社与外界隔绝，公共工程集中在专制国家手中，这是印度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所特有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见本卷第 271 页）。大批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封建国家的手里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东方各国的发展。敌人的频繁入侵给水利灌溉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而由于水利灌溉在东方的特殊作用也就使整个生产力遭受巨大的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一切就是那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一度达到过高度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落后的原因，这一切也促使这些国家成为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书信中愤怒地谴责欧洲的首先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东方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通信中的一系列评述和意见，补充了他们揭露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一些著名文章。例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统治的有害后果，这种统治的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见本卷第 263 页）。马克思在评述这种统治时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见本卷第 271 页）

本卷中的书信表明，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象在前一时期一样，仍然是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史。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就他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同马克思和魏德迈交换意见，这些书信反映了他在军事和战争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在这方面的科学计划和写作计划。马克思对负责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写通讯来阐述军事事件的恩格斯的军事知识评价很高，并且经常向“曼彻斯特的陆军部”——马克思对自己的朋友的诙谐的称呼——请教（见本卷第 299 页）。而马克思自己也常常对恩格斯的军事研究

工作给以帮助，特别是为恩格斯的军事题目的论文(例如《欧洲军队》一组文章)收集材料(见本卷第448—449页)。

恩格斯的军事研究是同日益迫近的革命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特别重视1848—1849年革命战争的历史，想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见本卷第588页)但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此，恩格斯的那些评论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批判分析1848—1849年革命军队的军事行动的成功经验及其错误和失策的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见恩格斯1852年7月6日，1854年6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尤其是关于大陆军队可能入侵英国和关于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期伊德施太特会战的评论是很有意义的(见恩格斯1854年5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和1852年1月23日给魏德迈的信)。他对拉萨尔提出在多瑙河战场展开军事行动的计划也有批评意见(见恩格斯1854年3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对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作家——克劳塞维茨、维利森、若米尼、纳皮尔等的评价，对于了解作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评论家的恩格斯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见恩格斯1854年5月9日和6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1854年3月30日恩格斯给《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的信表明，他对军事文献的要求是多么高，他提出要准确地和客观地叙述军事事件、细心地选择和核对所引用的材料来源的可靠性。恩格斯的这一时期书信中关于战争史和军事学术的评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卓越军事理论家的观点的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兴趣还包括语言学，即研究欧洲和亚洲的语言。例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由于研究西班牙历史，他就着

手研究西班牙语，阅读塞万提斯、卡德龙和其他西班牙古典文学作家的原著。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主要是研究斯拉夫语，首先是俄语。他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见本卷第583页）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明了促使他研究斯拉夫语的原因，说明他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出于科学兴趣，而且也是为了革命活动的实际任务的需要（见本卷第37页）。这几年，恩格斯还研究了东方语言，其中有波斯语，在这方面恩格斯表现出卓越的语言学才能。从恩格斯对魏特林空想的“未来语言”所作的讽刺评语中，也可看出恩格斯对待语言学问题的态度。这个评论说明，恩格斯坚决反对把语言学的规律和社会学的规律混淆起来（见本卷第265页）。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来，在反动年代里，他们多么重视时评工作，他们认为政论文章是反映无产阶级对重大政治问题的观点的手段，使社会舆论起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影响。书信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发展当时处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报刊作了巨大的努力。即使在可以公开出版工人刊物的英国和美国，由于大量的财务开支、高额的印花税等等，工人刊物的出版也是有很大困难的。185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支持宪章派革命一翼的领袖厄·琼斯所出版的《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在1852年2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杂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从这个刊物上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见本卷第49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琼斯1852年5月开始出版的《人民报》写文章，并且还促使他们的战友（埃卡留斯、皮佩尔等人）给该报撰稿。许多书信都表明，马克思曾大力帮助琼斯编辑这份报纸。马克思向他提供国外消息专栏的文章，帮他解决财务问题

(见马克思 1852 年 8 月 19 日、9 月 2 日、9 月 23 日和 1853 年 11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德迈打算在纽约出版无产阶级的周刊《革命》给予热情支持。他们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寄往纽约。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论英国的文章就是专门为《革命》周刊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给《革命》周刊撰稿是党的重要任务，并竭力鼓励他们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琼斯、皮佩尔、埃卡留斯、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参加撰稿。燕妮·马克思在 1852 年 2 月 13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见本卷第 490 页)。但是，由于缺乏资金，《革命》周刊未能连续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魏德迈和克路斯打算把寄给《革命》周刊的材料在其他报纸上发表出来，认为及时发表这些材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 1852 年 5 月 10 日左右给克路斯的信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见本卷第 526 页)许多书信反映了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和魏德迈利用 1853—1854 年在纽约出版的工人报纸《改革报》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和魏德迈影响报纸的方针，从伦敦组织通讯稿寄去(见马克思 1853 年 4 月 17 日、6 月 14 日、10 月中、11 月中给克路斯的信)。

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报刊只能对很少一部分读者产生影响。在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报刊。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此外，在那些年代里，撰稿工作是马克思的唯一的收入来源。马克思在 1853 年 6 月 14 日给克路斯的信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自己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立场，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

的最厉害的玩笑”(见本卷第 59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51 年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在 1852—1855 年期间一直继续着。马克思是该报的正式撰稿人，所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该报写的文章都是由马克思署名寄给编辑部的。马克思在他认为是维护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意见，是灵活性与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经常地迫使该报宣传与它的编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思想(见马克思 1853 年 6 月 14 日和 1854 年 5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促进了报纸的声望和威信的提高。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引用他们的文章(见本卷第 269、278—279 页)。恩格斯就克里木战争进程写的、发表时没有署名的军事评论，被广大读者认为是著名军事专家写的(见本卷第 318 页)。该报编辑部不止一次地正式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例如，在 1853 年 4 月 7 日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在 1853 年 4 月 2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过的一篇文章，编辑部尽管表明它不赞同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但又认为，马克思的通讯是当时“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最有教益的来源”之一(见本卷第 239 页)。但是《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的文章仍然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编辑部常常对文章任意增删加以歪曲，并经常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马克思在 1854 年 4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作社论，而我的名字则只摆在一些废物下面……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见本卷第 345—346 页)马克思的抗议毫无结果。《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完全按照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习气行事，残酷剥削它的通讯员。马克思为报纸付出紧张的劳动，得到的却是微

薄的稿酬，并且还要等待几个月才能领到。

1855年，马克思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还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这在他的时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这家报纸同自由派有联系，尽管还有书报检查的刁难，但是在当时德国出版的所有刊物中它的立场还是比较进步的。1855年9月11日马克思在给《新奥得报》编辑埃尔斯纳的信中写道：“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见本卷第628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是同德国读者直接见面的唯一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的创作合作在他们的时评工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政论著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这些书信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撰稿工作中经常给予帮助。这种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承担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同时又把马克思最初用德文为该报写的通讯译成英文。1853年1月，马克思第一次用英文给报刊写文章，而在这以后不久恩格斯就非常赞扬这些文章的文学成就了。恩格斯在1853年6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见本卷第252页）当某些情况（党的工作、科学研究、疾病或家庭的不幸）妨碍马克思的撰稿工作的时候，恩格斯非常关心地接受马克思的请求，经常代他写定期通讯。在给报刊撰稿过程中，两位朋友之间按照个人在当时的直接的科学兴趣的范围形成了特殊的责任分工。一般地说，马克思在这些年代里专门写关于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内外政策、工人运动、殖民地问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事件的文章。恩格斯除了写军事题目的文章，还写了关于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命运、瑞士的状况、泛斯拉夫主义等问题的

文章。有一些通讯实际上往往是两人合写的著作。书信表明，许多文章的提纲，有时是文章的内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配合商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31 日给恩格斯的信。这封信中有关于阿伯丁联合内阁活动的详细材料，后来恩格斯用这些材料写了《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还有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可以说是他们有关文章的部分基础或全部基础（见本卷第 329—33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的许多重要材料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的补充。例如，马克思在许多书信中不仅对英国的经济状况而且对英国的政治状况作了深刻的评述。这都是马克思这几年写的许多通讯的主题。马克思研究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对英国的各主要政党作了评价。他指出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瓦解过程（见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13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0 日和 30 日给克路斯的信），并且还指出，自由贸易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反政府态度是不一贯的，他们害怕工人阶级，并准备同贵族妥协。关于自由贸易派，马克思在 1852 年 2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任何进一步争得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时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见本卷第 26—27 页）马克思在许多书信中指出，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选举权利的英国选举制度是反民主的（见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0 日给克路斯的信）。马克思在抨击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中，通过英国寡头政治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揭露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寡头政体的政策，这两篇抨击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过，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通信中也有反映（见马克思 1855 年 8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 1854 年 4 月 6 日和 6 月 1 日给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特别重视。他们注意观察英

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每一个重要的行动。在他们的书信中，关于1853年下半年大规模开展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关于宪章运动的宣传，以及1855年夏天工人反对英国议会的反人民法案的强烈示威都有生动的描述（见马克思1853年9月30日、1855年6月26日和7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对波拿巴法国的评述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书信深刻地揭露了第二帝国的反人民制度的本质和特点，清楚地勾画出贯穿国家整个经济生活和笼罩所有政府部门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的情景，描绘了政府为了蛊惑性目的实行可疑的社会措施，对一切反政府分子进行粗暴的警察恐怖的情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冒险政策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政体是不稳固的，它必然要崩溃。他们早就看出路易·波拿巴政府的经济政策终究要引起经济混乱，使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后果更加严重。马克思在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见本卷第16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波拿巴政体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恩格斯指出法国农民已对波拿巴感到失望（见本卷第585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法国无产阶级是有能力推翻第二帝国的主要力量。例如，马克思指出，由于巴黎面包价格较低，法国工人大量流入法国首都，“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见本卷第303页）。马克思在1853年3月25日给克路斯的信中提到相当数量的巴黎工人参加著名革命家拉斯拜尔的夫人的葬礼，这次葬礼实际上变成了反对波拿巴的示威，他写道：“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见本卷第580页）。

由于克里木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时评和书信中相

当重视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在 1853 年 11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高兴的是，偶然的机会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见本卷第 30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这个角度分析国际政策问题。他们希望，大国之间在所谓的东方问题上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将超出欧洲各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冲突的范围，将导致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他们认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欧洲革命战争最终将引起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消灭欧洲的反人民的制度并解决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而没有解决的任务。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只有人民革命才能真正地解决东方问题，即解决受土耳其压迫的各民族的命运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批判西方列强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狭隘的自私目的，以及旨在制止战争蔓延和阻碍人民运动发展的战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而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 608 页）

马克思在 1853 年 8 月 10 日的信中揭示列强在东方问题上冲突的原因时，要恩格斯注意：“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见本卷第 226 页）。马克思在另外一封信中指出了在克里木战争中作为同盟国的英法之间的深刻的矛盾。他指出，其中英国首先力求消灭俄国海军力量并从俄罗斯帝国手中夺走克里木、高加索等地，从而在这个地区和海上建立英国的独霸统治。同时，保存俄国在陆地上的实力以对抗其他大陆强国，对英国也是有好处的。“相反，对于法国，从俄国海军力量……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还只是开始。”（见本卷第 396 页）马克思指出，波拿巴

法国的政策取决于它的上层统治集团企图称霸欧洲，使所有与它竞争的强国(包括英国在内)受它操纵，通过对近东的掠夺政策和向邻国扩张领土的办法加强第二帝国的实力。

针对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在东方冲突中暴露出来的掠夺目的，马克思提出了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和民主的纲领，其要点是让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独立，在巴尔干成立各个独立国家。“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见本卷第 226 页)。恩格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西欧外交界提出的关于专制暴虐的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的论点是“陈腐呓语”，是“陈腐的外交谎言”(见本卷第 22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包括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书信表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俄国沙皇制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们把这个制度看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扼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书信中有些材料揭露了沙皇制度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他们指出，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摆脱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欧美的报刊上揭露沙皇制度为了达到侵略目的，企图利用解放运动和这些民族对俄国人民的真诚的好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揭露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本质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俄国专制制度对外政策的工具(见本卷第 416、444、625 页)。

在这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的国内状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例如，1853 年恩格斯坚决反对在流亡的波兰贵族和小贵族集团中酝酿的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脱离俄国并入波兰的计划：“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

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象 1846 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见本卷第 584 页）。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本国的内部革命力量上。恩格斯在指出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对俄国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时写道：“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见本卷第 584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在国外出版的俄国革命书籍，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亚·伊·赫尔岑 1853 年在伦敦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本卷第 269 页）。但是，由于赫尔岑与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资产阶级流亡集团接近，并且发表某些错误的乌托邦思想（通过俄国的农民公社来“革新”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非常警惕。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的通信中有时才对他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

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兴趣促使马克思去研究外交史。他在 1852—1855 年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资产阶级贵族的外交家作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评价。例如，马克思对法国作家兼外交家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一书作了详细的分析，痛斥这个反动分子和阴谋家促使会议通过干涉西班牙的决议（见本卷第 401—406 页）。在另外一封信里，马克思揭露了在七年战争时期英法两国外交的卖国性质（见本卷第 396—398 页）。对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的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的揭露，构成了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性文章的基本内容。在书信中，某些结论也同这篇抨击性文章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揭露帕麦斯顿是“牺牲了波兰”、“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疯狂的反动分子（见本卷第 613 页）。马克思在揭露这个“真正英国大臣”时往往采用某些夸张的说法。因此，决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马克思说的帕麦斯顿是沙皇俄国的

代理人这句话。但是马克思对帕麦斯顿所做的评语却深刻地准确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贵族外交家和沙皇俄国外交都有共同的反革命意向，他们都仇恨革命民主力量。马克思指出，在镇压革命运动时，西方欧洲的政客宁愿依靠沙皇制度。

在书信中还有一些直接的论据驳斥了那种庸俗的论点，即所谓马克思和亲土耳其分子乌尔卡尔特这个著名的英国的反动政论家和外交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嘲笑乌尔卡尔特把苏丹土耳其理想化，认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见本卷第 221—222、324—325、346—347 页）。马克思在 1854 年 6 月 1 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来改造整个西方。”（见本卷第 615 页）马克思在 1853 年曾向克路斯提供材料，让他在美国报刊上揭露乌尔卡尔特的反动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的人民运动极端关注。他们把人民运动首先看作是即将爆发的新的革命的征兆。他们对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就是这样评价的。关于这次起义马克思指出：由奥地利人建立的“掠夺制度”，“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用他演说的全部魅力也从来没有能够达到的”（见本卷第 217 页）。马克思特别关心 1854 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发展。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和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揭示了 1854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同时还分析了西班牙人民从反对 1808—1814 年的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过去的革命运动史（见本卷第 388 页）。

1852—1855 年的书信提供了大量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家方面的实践活动，以及他们在这些年代为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斗争。在反动时期，当大多数革命活动家被迫从欧洲大陆各国流亡到英国或美国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保存和在思想上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批干部所进行的斗争具有特别的意义。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的关怀，对他们的朋友和战友的经常的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们，吸收他们参加革命的时评活动，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向战友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畏缩消极、张皇失措、苟安心理稍有表现，都要给以坚决的斥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流亡美国并在那里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大量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魏德迈和克路斯的通信，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路斯和魏德迈的活动经常给予帮助。在许多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他们提供了实际的建议，详细地阐述了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帮助他们在业已形成的环境下采取正确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普鲁士警察捏造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组织者的斗争，是他们在1852年进行的党的活动的鲜明的一页，这在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1851年5月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活动家被捕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一连好几个月都在竭力使社会舆论注意普鲁士当局的这一专横行为。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设法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报刊用以包围科伦被监禁人的“沉默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官方的报道，同科伦的拥护者保持经常的联系，按时向朋友们报道关于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讯进程。1852年10月至11月，在科伦陪审法庭进行审理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营救党的同志的活动特别紧张。在这两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专门营救科伦案件的被告人。在本卷附录中发表的燕妮·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给克路斯的信(见

本卷第 648—651 页)里,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友们在这些日子里所做的大量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驳斥检查机关对被告人提出的公诉的材料送往科伦。他们还向辩护人寄去各种文件和证件,证实这个案件是别有用心,揭露案件是如何用一整套卑鄙的警察奸细行为、捏造伪证而炮制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战斗性的抨击小册子的创作历史。马克思认为发表和推销这本揭露整个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著作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 1853 年 3 月 25 日给克路斯的信中写道,“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见本卷第 578 页)。

在科伦法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做出判决以后,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在美国筹款以便援助被判罪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及其家属。1852 年 12 月 7 日马克思把他写的关于筹款的呼吁书寄给克路斯,他写道:“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见本卷第 564 页)

在科伦案件以后,在欧洲继续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已经不宜了。1852 年 11 月 19 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11 月 17 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上根据他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解散同盟的决定。但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通过其他形式继续进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队伍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书信特别表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停止活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同各国——英国、德国、美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保持联系,他们帮助当时为数不多的各种工人组织的领导者,协助出版工人的机关刊物。他们认为保持阶级的独立性是工人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见本卷第 290 页),这就是马克思对 1853 年

找他商量问题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克莱因的建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当时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物质前提已经完全成熟（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参加了工联的无产阶级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改组和巩固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扩大它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就可以实现这一任务。书信中的大量材料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帮助琼斯和宪章派的革命的左翼其他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开展宪章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宪章运动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谴责宪章派的另一个首领哈尼转向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当时在宪章运动内部的斗争。他们对琼斯的的活动评价很高，当时琼斯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分子企图使宪章运动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决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见本卷第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琼斯在英国工人中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特别是他在曼彻斯特工人议会（1854年3月）上所表现的首倡精神，对他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品格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他进行批评，因为他在后来由于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改良主义倾向的发展，开始表现了不坚定和动摇。例如，1855年马克思谴责琼斯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关系过分密切，批评他参加了他们的“无谓的喧嚷”的大会，使宪章派的整个事业受到损害。当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琼斯这样写道：“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见本卷第433页）

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反动时期的任务。他认为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准备，从过去的战斗中吸取教训，清除党的队伍中的一时得势的和异己的分子。在谈到为建立政党而斗争的前景时，他相信，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家将从革命青年中得到补充，在新的条件下，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将表现得更加成熟和坚定。恩格斯预言：“……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见本卷第58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谴责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变节者。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50年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实际上变成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附庸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集团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猛烈谴责这个集团的首领维利希，因为他抱着顽固的教条主义者的态度，完全忽视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维利希的冒险主义的革命儿戏给予致命的批判，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危害并且使工人运动的参加者遭到警察的镇压（见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9月3日给克路斯的信）。维利希在报刊上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马克思就写了《高尚意识的骑士》这本讽刺的小册子。

同以往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捍卫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的纯洁性和策略观点的独立性。他们坚决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流亡集团和组织，因为这些集团和组织把政治活动变成了追逐个人名利、进行无谓争吵和阴谋倾轧的活动场所，降低了伟大

的革命事业。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抨击性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严厉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等人。流亡者“已经完全破产”，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没有成果的和喧嚣一时的活动的结局（见本卷第217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反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策略中占优势的阴谋和冒险成分，以及他的不顾意大利劳动人民物质利益的社会纲领的狭隘性。他们尖锐地谴责匈牙利革命者科苏特向波拿巴集团献媚，批评费·皮阿和在英国的其他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无谓的行动（见本卷第143—144、220、367—368、542—543页）。

书信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有价值的传记材料，有助于了解无产阶级领袖的生动形象、他们在这些年代里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无可比拟的友谊的鲜明特点。书信给我们描绘了马克思一家在流亡期间所过的极端困难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写的，他经常感受到一切“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物质上的极度贫乏、非常缺钱、债主逼债。他在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见本卷第300页）正如许多书信所明确表明的，马克思的家庭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无私的援助，就会不止一次地遭到无法维持的危险。马克思的爱子埃德加尔的死，对马克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恩格斯的友谊也帮助马克思度过了这些悲痛的日子。马克思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见本卷第442页）这些书信再现了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英勇形象，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全人类幸福的未来的斗争。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五封信；其中有九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此外，与第一版相比，许多书信更完整了。在本卷第一次发表的文献中，马克思1855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补充了他们的通信的空白。新收入全集的马克思在1852—1853年期间写给克路斯的一组书信是以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书信摘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些书信具有很大意义。这些书信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流亡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所进行的具体领导。收入本卷的马克思1852年8月27日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伊曼特的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斗争。在全集中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1852年9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附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翻译工作的态度。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马克思委托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写的信，以及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中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阐述了许多我们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信的内容。在〈附录〉部分中，有七篇文献是第一次发表的。

第二十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56年至1859年所写的书信。

本卷中的书信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所出现的十年政治反动的最后时期。1859年，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了新的活跃，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日益高涨。

在这段时期，同整个反动时期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无产阶级群众、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为他们解释当前任务和无产阶级战略策略原则的最重要的办法，仍然是写作革命的政论著作。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继续发展他们的革命理论，首先是创立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到这时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对无产阶级特别重要。必须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来武装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革命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等待着革命运动的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它的到来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研究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促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加紧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见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和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还在

1856年秋天，当危机的最初征兆出现的时候，马克思就着手系统地整理和综合他在十五年中所积累的经济资料。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立即着手写作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马克思在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见本卷第219页）马克思在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也证明了他在这段时间异常紧张地从事理论工作：“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2）当前的危机……”（见本卷第226页）

1857—1858年，马克思草拟了他的整个经济著作的初步计划，将它分为六册（见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并且写了大量的有关资本的手稿。这份手稿已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年用原文发表，由编辑部加了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实质上已经为后来的《资本论》拟出了草稿，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手稿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流通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最基本的要点。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开始准备付排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的第一分册，并为这一分册一直工作到年底。这一分册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一分册只不过是他的关于资本的主要学术著作的一个绪论。

马克思1858年1月29日、3月2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表明，马克思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曾屡次同恩格斯交换意见，在某些问题上向他请教，请他寄来有关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的

补充材料等。恩格斯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帮助，是科学共产主义天才创始人的伟大合作的光辉范例之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通信还证明他们对其他知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不一定是准备出版的，其中有一部分过了很久才整理成文。从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由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系列的伟大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恩格斯力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阐明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恩格斯的这些研究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他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问题的初步探讨。

这时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数学。马克思首先把这些研究和他的经济研究结合起来（见马克思1858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这些研究后来获得了独立的性质，并使马克思在七十年代对微分和积分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1856—1859年的通信中有丰富的材料，证明恩格斯对斯拉夫语言、斯拉夫人民的历史和文学进行了研究。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伊戈尔远征记》——古俄罗斯文化的伟大纪念碑（见马克思1856年2月29日、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6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史。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就是在这方面的例证。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军队》这一条目有很高的评价。正如列宁在《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中所说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着重指出了军队的历史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恩格斯对军队历史的叙述完全证实了第一次在这个部门运用的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正确性。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从这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

还研究了一系列其他的军事问题和军事历史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这个时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军事条目中得到了阐述。本卷中的一系列书信，都证明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不仅具有纯理论的性质，而且是和无产阶级领袖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

从发表在本卷中的书信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中怀着革命热情，怀着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坚定信心，等待着革命的新的高涨。在1857—1858年危机的前夕和危机达到顶点时期所写的书信中都贯穿了这一信念：在资本主义矛盾普遍加剧和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变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危机将产生革命的震荡和引起全欧洲的革命危机。

马克思1856年9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外，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见本卷第73页）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在1856年11月17日的信中说，“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更有利的形势（见本卷第82页）。

危机是本卷书信的基本主题之一。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有大量的实际材料谈到了一些国家的危机的经过，书信中还有马克思根据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而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结论。

书信表明马克思在收集有关危机的材料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马克思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经常记录与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危机有关的事实和事件（见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打算在1858年春天和恩格斯合写一本关于危机的小册子，其目的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是为了“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见本卷第226页）。可是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许多书信都证明在收集有关危机的资料方面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帮助。他给马克思提供了事态的详细情报，主要是英国工业区，尤其是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地区的情报。恩格斯利用职务上同工商界的联系，还给马克思寄了有关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危机进程的详细报道（见恩格斯 1857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7 日、9 日、11 日、17 日和 31 日，1858 年 4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 1857 年 12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十分重要，它们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国际事件进程的看法，对欧洲各国内政外交形势的看法。这些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期始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来分析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从欧洲革命利益的观点来研究和估计这些现象。同时他们特别注意英国这个当时在经济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屡次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到这时已经在这个国家成熟了。英国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拥有最大量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居民中占绝大多数，并且英国还有群众性的宪章运动这种革命斗争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书信中分析了 1857—1858 年的危机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在英国可能形成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下述事实具有巨大的意义：世界经济危机破坏英国经济威力的基础本身——工业，这就预示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以及广大群众不满的增长。

同时，马克思指出，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执政党在这段时期相继垮台，英国国内可能发生政治危机。他在 1857 年 3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帕麦斯顿这个辉格党的首脑，国家进步改革的坚决反对者，英国反人民的对外政策的主谋人的上台，可能在选举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带动下掀起反对执政的贵族寡头的

政治统治的宣传鼓动。马克思 1857 年 3 月 31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英国陷入严重的危机…… 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末约翰牛再也不能象 1848 年那样采取高尚的中立立场了。帕姆的胜利是 1848 年 6 月开始的种种事件的最高峰。”（见本卷第 112 页）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亚洲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加强反抗英国殖民者在亚洲大陆日益猖狂的扩张的斗争，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英国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促使国内政治危机的成熟（见马克思 1858 年 1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这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是本卷中的这样一些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信中谈到了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运动是欧洲革命的同盟军。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联系在一起，他们始终密切地注意这个问题。这一时期的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非常注意在英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发生的一些巨大事件。例如印度 1857—1859 年的民族解放起义，1856—1858 年的在中国的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7 年的英国—波斯战争等。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反对殖民地奴役的毫不妥协的战士，是各被压迫民族的热情的捍卫者。无产阶级的领袖把批判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主要锋芒指向英国这个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和当时最凶恶的殖民强盗。他们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愤怒地揭露英国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掠夺方法，揭露英国侵略者侵占他国领土、在那里建立残酷的殖民制度并破坏被奴役的人民的切身利益的方式和手段。

例如，马克思在 1856 年 5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十分有力地揭露了英国对爱尔兰，这个恩格斯称作“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

所采取的殖民政策的方式和方法(见本卷第 55 页)。恩格斯把他 1856 年春天旅行爱尔兰时的印象告诉马克思,他说,由于遭受英国许多世纪的掠夺战争,爱尔兰本地的工业被彻底破坏,再加上五十年代残酷推行的把佃户强行赶出家园的措施,爱尔兰被弄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见本卷第 56 页)。这个国家由于饥饿、“清扫领地”、强迫移民和不断的压迫而显得一片荒芜,宪兵、教士、地主和律师触目皆是。恩格斯写道,“…… 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见本卷第 55 页)。恩格斯以爱尔兰为例在这里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见本卷第 55 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书信中揭露了英国殖民者这时在中亚和远东国家积极进行殖民扩张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例如,马克思在 1857 年 3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嘲笑英国殖民军的假“勇敢”,英国殖民军之所以在波斯和中国的掠夺战争中赢得廉价的“胜利”是靠他们的技术优势。他谴责英国殖民者野蛮炮轰中国广州的和平居民。马克思在 1858 年 10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英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一个卑鄙来源,是向中国私贩鸦片,他着重指出,鸦片成了英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有力地批判了 1858 年的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是英国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强加给中国的。马克思写道,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见本卷第 348 页)。

书信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印度 1857—1859 年的民族解放起义十分关切,他们认为这次起义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真正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就起义期间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起义者的力量和策略、起义的前途以及其他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问题在他们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大量论文

中也详细地谈到了(见马克思 1857 年 7 月 6 日、7 月 14 日、9 月 23 日、10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 1857 年 9 月 24 日、10 月 29 日给马克思的信及其他许多信)。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认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中国太平军的强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加剧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未来欧洲革命的一个因素;由于这些运动的发生英国工业的销售市场缩小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资金受到了牵制(见恩格斯 1857 年 1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 1858 年 1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 1858 年 1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见本卷第 25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对德国非常注意。在德国,1848—1849 年革命未能解决的基本历史任务日益提上了日程,这就是消灭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残余,消除德国的国家分裂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即通过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来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他们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时期都密切注意德国的状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迅速发展,它的工商业活动大大扩大,尤其是生产异常迅速地增长,工业股份企业和银行股份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五十年代特征的投机热潮(它起源于波拿巴法国)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为自己找到了非常适宜的土壤(见马克思 1856 年 9 月 26 日、10 月 30 日、1858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 1857 年 1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普鲁士的对内政策和在未来革命中德国可能出现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交换了意见,把批判的火力对准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揭露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幻想君主立宪,无力对普鲁士君主制度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心想同普

鲁士容克地主联合(见马克思 1856 年 3 月 5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 1858 年 3 月 17 日写信给马克思：“1848 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无论如何是变得更坏了……显然德国的米歇尔在 1848 年的艰巨奋斗之后，还没有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见本卷第 293 页)

相当多的书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的革命后果在波拿巴法国最有出现的可能(见马克思 1857 年 1 月 20 日、12 月 8 日和 25 日，1858 年 3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 1858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波拿巴主义这个依靠军队维持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个时期，他们在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论文中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毫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是：在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看风转舵，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提出虚伪的民主口号，向民族解放运动的献媚讨好，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到五十年代末，波拿巴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的社会蛊惑加反动统治方法的政策，已为欧洲其他国家统治集团所仿照。波拿巴主义竭力招募和利用欧洲民主派中的不坚定分子，分裂欧洲革命运动的营垒；它已成为对未来欧洲革命的严重威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

有关法国的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危机发展的进程中十分注意观察第二帝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他们认为“这个破产的国家”已经普遍腐化了(见本卷第 227 页)。

在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中，有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与第二帝国政府有联系的、在欧洲许多国家有分支机构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交易所的诡计和投机勾当(见马克思 1857 年 4 月 9 日、5 月 8 日和 22 日、7 月 11 日、12 月 8 日和 25 日，1858 年 1 月 7 日

给恩格斯的信)。无产阶级的领袖仔细研究了波拿巴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见恩格斯1857年8月25日和1858年4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指出了法国社会各阶层中逐渐增长的反政府情绪。恩格斯在1858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注意巴黎工人对波拿巴制度不满的事例。恩格斯指出,“随意流放和逮捕,也象工人区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场一样,没有什么效果”(见本卷第290页)。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索恩河岸夏龙的部队所发生的风潮时,详细地分析了作为波拿巴专政支柱的波拿巴军队的状况,并得出结论:“即使在军队里也只有上层的代表才是真正倾向波拿巴的”(见本卷第291页)。1858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所谓“议会反对派”的自由资产者中的反政府情绪也在增长。

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希望相反,1857—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没有引起直接的革命爆发,但是它是欧洲社会政治积极性新的觉醒的前奏。危机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发展,促进了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写信给恩格斯时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见本卷第27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58年下半年的许多书信里谈到了欧洲的普遍的政治活跃的征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这封信对西欧一些国家以及俄国在欧洲日益增强的新的革命高涨的前夕的形势作了深刻的结论。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的信中对恩格斯的《一八五八年的欧洲》一文评价很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95—699页),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存在着社会政治生活活跃的征兆。恩格斯还指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欧洲社会在五十年代所经历的严重的政治昏睡状态

中苏醒过来。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这时也密切注意在俄国开展的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运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支柱。同时他们经常盼望俄国本身发生革命运动，并且密切注视俄国社会中反政府情绪的细微表现。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迎接证明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信号。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见本卷第347页）。马克思还把加强废除农奴制的斗争同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后果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写道，这次战争“毕竟显然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见本卷第347页）。在1858年4月29日的信中以及以上提到的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表示希望，在俄国开展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将为国内的运动奠定基础，而这个运动将根本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并结束沙皇政府的反革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在1858年4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能够挡住俄国传统对外政策的道路。”（见本卷第313页）这一形势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必然会对欧洲的革命运动产生有利的影响，尤其是将调动德国人的革命首创精神（见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

所以，在1858年的下半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欧洲面临的局势是：不是革命就是战争，只能有一种抉择。欧洲的一些反革命政府，首先是法国的波拿巴政府，在1859年开始的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中找到了出路。

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封信中，就这次战争的有关

问题交换了意见。要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1859年战争应采取什么立场，的确也不容易，关于这一点列宁后来指出：“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在内的争取解放的革命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并肩携手等等。”（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8页）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制定明确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策略，这一策略是根据对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的估计，并服从主要的任务——尽力发展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保证以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见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信里揭露了拿破仑第三及其集团的真正目的。他们认为，拿破仑根本不是想解放意大利，而是企图借助于战争中的轻易胜利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获得声望，蛊惑性地利用“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这一口号，从而攫取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是必要的。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各邦政府’，那末显而易见，从一切观点来看，即使为德国的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不保持中立，而象你所正确地说的的那样，要保持爱国的立场。”（见本卷第413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认为，德意志联邦的各邦参加反对法国的战争将会引起与拿破仑第三订有密约的沙皇俄国的干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沙皇俄国的参战将会把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本身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迫使德国的统治阶级公开暴露它的政策的反革命本质，最后造成波拿巴制度的崩溃和欧洲各个反人民政府的垮台，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中欧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将使

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即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的君主制和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共和国的方法来实现国家统一的人占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59年战争的书信，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的极有价值的补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能够比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德国合法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47—299、633—680页）中更直率地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问题上，在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问题上的立场。

收入本卷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热情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以自己固有的全部革命毅力即使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仍不停地为团结无产阶级力量，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需的和主要的条件）而斗争。列宁写道：“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富有田园风味的’……‘极沉闷的’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将临的气息，而使无产阶级觉悟到他们所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页）

1856—1859年是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的困难时期，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中的困难时期。大多数政治流亡者，包括马克思在内，这时都在为生存而斗争。马克思家庭的极端穷困，每天为最必需的东西焦虑，经常要应付“最无聊的生活琐事”，所有这些在这一时期严重地影响马克思的健康和他的工作。此外，由于1858年1月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之后反动派活动的加强，政治流亡者在英国领土上居留的安全又受到威胁。警察对政治流亡者，首先是对马克思加强了监视，对他的通信暗中进行检查（见马克思1858年3月2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58年3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鲜明地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间的友谊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精神支持和无私的物质援助的决定作用。在这段时期恩格斯仍然不得不从事“该死的生意经”，以便使马克思能够继续研究革命的理论。

革命的低潮时期难免不使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遭受损害。他们中有一些人由于坐牢致病（罗兰特·丹尼尔斯）或者由于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格奥尔格·维尔特、康拉德·施拉姆）而牺牲了。另一些人受到长期经济繁荣的影响和政治停滞的侵蚀而脱离了革命斗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时同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接近分裂主义冒险主义集团首领维利希的阿道夫·克路斯断绝了关系（见恩格斯1857年1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他们在许多信中尖锐地嘲笑了他们以前的《新莱茵报》的同事恩斯特·德朗克，此人“打算自己出资开办企业”，象商人那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见恩格斯1856年11月17日、1857年3月11日和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7年3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在他们周围结成了一个由坚定的革命者和同志组成的坚强核心。即使在这个艰苦的时期，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沃尔弗（鲁普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皮佩尔、彼得·伊曼特等人仍然是这两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忠实战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关心的是保持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核心，对他们加以领导和培养，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战友们提出一项任务——利用旷日持久的反动时期加紧政治锻炼，深入钻研理论。“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

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回忆流亡伦敦这些年的生活时是这样描述马克思的（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页）。

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看出，即使在反动统治的艰苦年代马克思也没有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失去联系。1856年2月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代表古斯塔夫·勒维对马克思的访问（马克思在1856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名字在莱茵省工人中继续享有着多么崇高的威信和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些联系交换意见，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在反动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策略的看法。例如，马克思坚决要求莱茵工人（起义计划已在他们中间酝酿成熟），不要举行地方性的、过早的孤立的起义。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工人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因此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见本卷第30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了各国无产阶级一致行动的必要性，号召德国工人无论如何要支持巴黎的无产阶级，如果那里发生起义的话。马克思告诉古斯塔夫·勒维：“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见本卷第30页）

对于德国革命运动的前景，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基础之一的重要的理论原理。马克思指出，要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结成联盟。马克思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本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到了欧洲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认

为英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应起特殊的作用。他们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如通信的材料所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的宪章派能在这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宪章运动已经丧失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继续存在。但是，甚至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希望：拥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报》，并以著名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一部分还有影响的革命的宪章主义者，能够成为在英国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能够领导英国的工人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宪章主义者左派提出了如下的任务：掌握革命的理论（这是宪章派一贯所缺少的），向英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灌输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如马克思在1857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马克思一直劝告宪章主义者要根据已经形成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改变策略，也就是不要挖空心思、白费劲地去寻找种种机会在“沉寂时期”来公开宣传人民宪章，而应该直接在工厂工人群众中加强宣传。马克思1857年11月24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琼斯“首先应当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见本卷第211页）。

但是，从书信中可以看出，在1857—1858年琼斯越来越表现了思想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不坚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密切注视，对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力图独自领导组织（这引起了宪章派中一般成员的不满），思想上对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让步和日益表现出妥协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见马克思1856年4月10日，1857年11月24日、12月22日，1858年1月14日和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58年8月4日和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个时期的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多么耐心地、坚

持不懈地向琼斯解释他的立场的错误，把他引出迷途，维持他作为工人领袖的威信。

马克思在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琼斯的行为以及自己对他的态度作了总的评价：“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先谈到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他仍然走上了试图同激进资产者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会是什么状况。”（见本卷第551页）

由于琼斯政治上的演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关于在五十年代整个英国工人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重要的政治结论。他们认为在工人运动中出现革命倾向的同时出现了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五十年代这表现为英国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十分消极（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和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这种新现象的经济根源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是靠英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空前的发展和繁荣而取得的。恩格斯在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长期的繁荣起了极大的败坏作用”（见本卷第225页）。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这一结论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恩格斯写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见本卷第344—345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后来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明显

表现出来的这两种倾向以后，他们以英国为例“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这段时期内”（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0页）仔细地考察了这两种倾向。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暂时的胜利，是因为英国对工业和殖民地的垄断，这种垄断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用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的上层，即工人贵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机会主义策略的斗争，是他们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一页。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在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在1856年3月5日和7日，1858年6月7日等一些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拉萨尔的这些特点：过分虚荣，自吹自擂，奢侈享乐，专横独断，向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献媚讨好，对工人，尤其是对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拉萨尔和他们曾有过联系，他的行为使他们非常怀疑）则高傲轻慢。恩格斯在1856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他始终是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见本卷第32—33页）。

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就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写的信也很有意义，这些信批判了拉萨尔对农民运动的性质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拉萨尔这个剧本的一些可取之处，它描写了1525年农民战争前夕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利希·冯·胡登领导的小贵族反对大封建主的起义；同时也指出了它的根本性的缺点，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拉萨尔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见本卷第574页）。拉萨尔的这一错误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完全低估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在拉

萨尔看来，农民和资产阶级一起“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这些观点的批判，是同他们指责他对1848—1849年革命失败原因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拉萨尔从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出发，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无产阶级没有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列宁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中特别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拉萨尔剧本的这方面的重要意义（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7页）。

在以上提到的几封书信中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意见。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中反映现实的最深刻的方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59年的书信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们批判拉萨尔对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因为拉萨尔的态度同他对如何统一德国的看法有密切的联系。拉萨尔低估了群众的民主思想，不相信自下而上，即通过调动劳动群众和居民中民主阶层的革命首创精神的方法来统一德国的可能性，实际上他赞同自上而下，即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方案。所以，他要求德意志各邦不要干预战争，以便使拿破仑第三能够打败奥地利——普鲁士在通过王朝来统一德国时候的主要对手。拉萨尔在他1859年春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叙述了他的这些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萨尔的策略对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危害（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度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特别宣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批判拉萨尔的立场（见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9年5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由于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马克思后来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虽然

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批判了拉萨尔的观点。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如何对待1859年战争的问题上同拉萨尔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列宁写道:“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使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拉萨尔就动摇到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9—120页)

在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欧洲的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重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经常进行反对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的斗争。他们的通信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假革命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的“大人物”——卢格、海因岑、赫斯、梅因、路德维希·西蒙、金克尔等人——的政治冒险主义、自我吹嘘和革命空谈(见马克思1856年2月29日、8月1日和9月22日,1858年1月7日、11月2日、24日、29日和1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同时马克思也辛辣地嘲笑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的“革命制造者”——费里克斯·皮阿、塔朗迪埃等人,他们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寻找机会来发动各种喧嚣叫嚷的政治示威,发表空洞的大言不惭的政治小册子等(见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1857年1月20日、1858年8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社会政治生活普遍活跃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同时设法同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论坛的报纸建立联系。因此他们在1859年5月至8月参加了伦敦的德国工人报刊《人民报》的出版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该报撰

稿，他们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对重新展开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涨时期有自己的机关报来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人民报》的创办经过，指出他和恩格斯所以要参加这个报纸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见本卷第418页）。从1859年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人民报》的编辑和负责人。书信揭示了马克思为了把该报变为宣传无产阶级政党观点的讲坛进行了不倦的活动。

在1859年期间马克思还打算利用其他的机会来取得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的论坛。他1859年3月28日写信给拉萨尔说：“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见本卷第569页）

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同邀请他撰稿的维也纳《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进行商谈的原因。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1859年5月16日给弗里德兰德的信（见本卷第580页），提供了有关这次商谈的情况。

书信中还有些材料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7年4月至1859年底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经过。马克思是在1857年春天接到《美国新百科全书》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者查理·德纳的邀请，参与这个进步的美国出版物的撰稿工作的（见马克思1857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在马克思家庭的这个困难时期，对通讯员采取无礼态度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借口危机给它造成了经济困难，把给马克思的稿酬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见马克思1857年3月24日和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给《百科全书》撰稿，首先认为这是补助马克思家庭生活的来源（参看恩格斯1857年4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同时他们也利用《百科全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的条件和百科辞典的有限篇幅所容许的范围内——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他们给《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的内容以及大量引用的材料，他们在信中彼此传递内容丰富的摘录，这就证明他们给这个出版物写文章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由于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文章没有署名，所以书信是确定文章作者的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材料。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主要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军事史和军事技术的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七封信。其中一部分曾用原文发表，其余的都是第一次发表，编者在这些信的末尾都作了说明。

在新收入本卷的信中，马克思在1856年6月21日给他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具有特别意义。这封信揭示了马克思的崇高形象，他的纯洁和伟大的性格，以及他对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封信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精神与日常生活的和谐结合的思想，关于爱情、友谊、忠诚的思想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都是可以同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文学的杰出代表的言论相媲美的。

在本卷中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信还有：1856年8月8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1856年6月21日给埃恩赛德的信，1859年5月16日给弗里德兰德德的信，1859年9月26日和10月8日给

贝·瑟美列的信；此外还有恩格斯1857年9月11日或12日给马克思的信。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燕妮·马克思的一些书信，大部分是受马克思委托写的。其中有五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在《附录》部分中，燕妮·马克思的信描述了在流亡时期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所度过的艰苦生活。这些信是关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补充材料。

第三十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60年至1864年所写的书信。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了一个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跃时期，同时还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涨。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民族统一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逐渐形成；革命风潮也触动了波拿巴法国、奥地利帝国和其他国家。

新到来的革命高涨的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的增长。无产阶级运动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日益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他们的战友所进行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宣传，促进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有助于培养它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精神。

1860—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致力于继续发展自己的学说，特别是经济理论，争取团结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论证革命无产阶级对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迫切任务的态度。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无论是著作还是书信中都到处可见。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和书信，对国际生活的一切重大事件都做出反应，讨论和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路线。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864年的书信证明，象在

前几年一样，马克思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研究经济理论。早在1860年初他就着手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工作。按照马克思的最初的意图，第二分册应该对“资本一般”，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本身进行分析批判。在新的革命高涨到来的条件下，用经济理论知识武装无产阶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尽快完成并出版这本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必须对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给以应有的回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中断了差不多一年半。直到1861年6月初马克思才重新动手写他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

在工作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到1863年7月马克思就完成了这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计约二百个印张。这部手稿由马克思题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但是马克思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这部经济学著作的最初的计划和以分册形式出书的打算。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他决定把自己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见本卷第636页）。可见，这时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按照新的计划即按照在《资本论》中彻底体现出来的计划写作。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本身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部手稿的相当大一部分（第I—V本，以及第XIX—XXIII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稿，而手稿中篇幅更大的另外一部分，总共将近一百一十个印张，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的和唯一保存下来的稿本，按照马克思的新计划，这部分手稿应当成为《资本论》的最后一册。在1861—1863年手稿中还专门叙述了或顺便提到了许多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详细发挥的问题。从马克思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1861—1863年手稿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巨大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评价自

己的作品时写道：“……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见本卷第364页）。

为了寻求那些复杂的经济问题的严密科学答案，马克思在这几年研究并批判地利用了大量专门的经济学文献、官方报告和报刊上的材料。他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那些错误的或纯粹辩护士的理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信有时对斯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某些不正确的原理提出尖锐的但总是公正的批评。同时指出马尔萨斯、罗雪尔等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通信中系统地记录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革命变革道路上的重要标志。因此，1861—1863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使我们不仅更好地了解《资本论》的创作经过，而且更好地了解它的内容。马克思的许多书信，是清楚扼要地阐述这一时期他所解决的最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真正杰作。例如，马克思1862年8月2日和8日给恩格斯的信就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这两封信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根据价值规律阐明并科学地论证了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的理论，同时从理论上分析了绝对地租的起源。列宁在摘录这两封信时特别指出，信中对复杂问题的叙述“通俗、简洁、明确”（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第285页）。马克思1863年7月6日的信也完全是这样。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天才地表述了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所论证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也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信中确定了机器的真正概念，并且扼要地描述了机器的发展历史。

从许多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学理论的时候，经常同恩格斯商讨一切重要的理论问题，非常重视恩格斯的批评意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在两位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创作方面的亲密友谊中锻造出来的。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无比丰富的材料说明他们的科学兴趣是广泛的和多样的。1860—1864年这一时期恩格斯继续深入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明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社会阶级性质，对于揭示作为马克思主义战争学说的不可分离部分的武装斗争规律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在这几年中仍然象过去一样对语言学感兴趣，他重新开始研究塞尔维亚文和俄文。恩格斯继续研究自然科学，阅读了赖尔和赫胥黎在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的著作。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也很重视自然科学。1860年马克思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给予它极高的评价，在以后的几年中还不止一次地重读这一著作（见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和1862年6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给拉萨尔的信）。1864年马克思又重新开始深入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阅读洛德、施旺、施莱登和其他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在这几年当中，马克思下了很多功夫研究数学，特别是微积分。

许多书信证明马克思对于通史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古代史和宗教史感兴趣。马克思研究了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内战，他在1861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热情地评价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把他看作是古代最出色的统帅之一和被奴役群众的杰出的领袖。“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见本卷第159页），马克思就是这样评价自己所喜爱的英雄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法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马克思1861年6月11日和7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以及恩格斯1861年12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都说明他们在深入地研究罗马法和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对罗马法的吸收（袭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1年读了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对拉萨尔在法的历史方面的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同拉萨尔对法的范畴的唯心主义解释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的关系的物质基础，指出法的关系是受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制约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许多书信是专门论述欧洲和美洲一系列国家的重大事件的。他们特别注意的是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德国和意大利都成为统一国家的民族统一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的书信中经常就意大利人民反对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交换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1860年5月加里波第的志愿军（有名的“千人志士”）在西西里登陆，密切注视加里波第向意大利南部的英勇进军，这次进军结果使意大利南部从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高度评价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以及加里波第的军队在为意大利人民利益斗争时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敢精神。他们认为加里波第是英勇果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恩格斯在1860年10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加里波第又一次战胜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时写道：“这个家伙对军队的影响必定是不可思议的。”（见本卷第1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主张用革命的方法统一意大利。他们在书信中揭露了同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的反革命政策。马克思在1860年10月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见本卷第566页）。工人阶级的领袖认为，卡富尔和自由保皇势力硬要通过王朝统一意大利是违背意大利人民利益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对加里波第进军和卡富尔的反人民政策的许多看法，在他们的文章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特别注意德国的政治发展。他们揭露普鲁士的反革命制度，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军阀的反动政策，密切注意德国的活跃的政治生活和国内蓬勃兴起的民主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用革命民主主义的方法统一德国，认为只有全民运动能够使阻碍这一任务实现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他们尖锐地批评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在所谓宪制冲突时所采取的怯懦立场。宪制冲突的原因是，议会下院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需要大大增加军事开支的军队改组提案。议院的自由资产阶级多数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1862年达到了顶点，这时作为政府首脑的俾斯麦不经议会同意就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敢积极反对政府的政策。议会的自由派议员在宪制冲突时只限于说一些反对派空话而已。恩格斯在1863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嘲笑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时写道：“还没有一届议会这样顽固地和不适时宜地坚持这种原则，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在同专制制度和容克奸党的斗争中负有挨揍的义务。”（见本卷第34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指出，反革命力量的阵地因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奸党投降而巩固了，所以俾斯麦后来才能够以普鲁士为霸主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

从发表的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俄国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斗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恩格斯在1860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高兴地指出俄国农民解放运动在增强。他在这封信中说，“在俄国，情况也在变得很复杂”，他所指的就是农民运动的增长。恩格斯认为俄国贵族的立宪运动可能同农民革命运动有联系（见

本卷第9页)。恩格斯在186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指出俄国农民暴动在增强,他说,“俄国和波兰的情况很好”(见本卷第205页)。

在1860年至1864年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谈论的主要题目之一就是美国的事件。共产主义创始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不断增长的对抗进行了长时期的观察,预见到在北美合众国必然要发生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关的深刻的社会动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南部各州连续发生的黑奴起义,是种植场奴隶制危机的明显的表现。尽管这些起义被种植场奴隶主残酷地镇压下去,无产阶级的领袖却把它们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更加顽强和持久的反奴隶制斗争的先声(见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0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书信中评价第一个试图用武力解放黑奴的约翰·布朗所领导的起义的意义时写道:“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见本卷第6—7页)

象对待当时其他进步运动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对待美国的解放奴隶的斗争。他们认为,废除黑奴制的运动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的开展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素。无产阶级领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反奴隶制的斗争必然带有革命战争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的战争能够加速欧洲革命危机的到来,能够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前发生。因此马克思强调美国内战的世界意义,而且认为战争的继续发展从欧洲革命运动的利益来看是很值得欢迎的(见马克思1862年10月29日和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洞察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质，因此能够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几个月就得出了北部和南部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结论。恩格斯在1861年1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描述美国南部出现的局势时写道：“只要北部稍微进行一点游击式的攻击，就足以引起燎原大火。无论如何，奴隶制显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很快完蛋。”（见本卷第141页）

美国内战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聚精会神地注意美国事件的发展。这也是因为马克思在1861年秋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为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而且他这时又开始为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撰稿。从马克思1862年4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在德国传播对美国内战的正确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的通信说明，马克思在写《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仔细研究了美国报刊伪造的南部各州脱离的历史（见马克思1861年7月1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根据对于美国的各种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所谓的“脱离运动”完全是种植场奴隶主的狭隘寡头政治方面的“篡夺”，甚至就在南部的各州也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见本卷第186页）。马克思指出，奴隶主为了使南部的没有土地的“白种贫民”俯首贴耳，也是需要军事专政的（见本卷第188页）。

马克思在1861年7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论述了美国内战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内战的动力问题。马克思认为北部和南部之间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保留下来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他特别重视西北部各州及其自由的自耕农居民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并且得出结论说，这些州的

经济利益就已经使它们成为奴隶制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见本卷第180—181页）。

马克思在1861年5月给莱昂·菲利浦斯的信中，就对交战双方的胜利可能性作了推测，认为在战争开始时，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并且拥有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的南部将占优势。马克思指出：“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见本卷第596页）

恩格斯也指出了北军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为恩格斯是精通军事科学的人，他对于美国事件的军事方面特别感兴趣。他在1861年6月12日和7月3日，1862年5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分析了一些最重要的战役、交战双方的战略和战术，并且对北部和南部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做了准确的评价。恩格斯1862年5月23日和7月30日的信全部成为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几篇关于美国内战进程的文章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军事评论非常重要，他要求恩格斯“每当战事起变化的时候”及时写出评论文章（见本卷第2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信中分析了北部到1862年年中达到特别危险程度的军事失利的原因，尖锐地批评北部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具有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斗争的性质所采取的懦弱和犹豫不决的政策。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关于战争性质和作战方法相互制约的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要求采取相应的革命方法动员群众，才能顺利达到既定的目的。“如果北部不立刻以革命的方式行动，就会遭到一顿痛打”（见本卷第258页），恩格斯在1862年7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是这样评论局势的。马克思认为，让黑人有权加入北军作战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他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由

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见本卷第 272 页)

通信中所阐述的关于不能只从战争的军事方面判断战争前景的原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1862 年夏北部的一系列失败,使恩格斯对于北部是否能胜利发生了怀疑,马克思在回答恩格斯时写道:“我觉得,你有些过分看重事情的军事方面了”(见马克思 1862 年 9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总和,他相信北部终究会采取革命措施,并且会撤销那些来自各边界蓄奴州的反动分子对军队的领导,因为他们力求在同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马克思认为,西北部和新英格兰对于“外交式的作战方法”的坚决反对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爆发的征兆。他毫不怀疑人民将迫使林肯政府采取革命的作战方法。马克思在 1862 年 8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指出,“如果林肯不让步(但他是会让步的),那就会发生革命”(见本卷第 272 页)。

事件进程的本身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林肯政府在 1862 年 9 月就发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实行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这些措施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他在 1862 年 10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南部人对于林肯法案的狂怒证明了这些法案的重要性。”(见本卷第 29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指出北部方面的战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在 1862 年 9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北部资产阶级的作战方法时指出:“北部进行战争的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能采取的方法。”(见本卷第 287 页)恩格斯认为,北部不能很快地转到以革命方法去进行战争的原因是“人民被侮辱了”,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万能的美元”准备同奴隶主签订任何的和约(见恩格斯 1863 年 2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北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阶级性还表现在，战争时期中在统治集团支持下规模空前扩大的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已。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现象是“北方佬在运动形式上的……可厌的方面”，即“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的可厌的方面；而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本性说来，这是很自然的”（见马克思 1862 年 10 月 29 日和 1864 年 9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 292、424 页）。根据战争时期北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经验，恩格斯得出一个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将来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作目的本身，对工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走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手段和过渡阶段（见恩格斯 1862 年 1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1 年至 1864 年期间的通信，是他们 1861—1862 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的论美国内战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信不但论及整个战争时期，有时还对各种活动家和事件进行比较尖锐的政治评论，这些评论，部分由于书报检查条例，部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是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了美国内战的革命前景，他们非常注意这场战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对欧洲各国首先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国内状况的影响。还在战争发生以前，马克思在 1861 年 1 月 16 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就指出，“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见本卷第 574 页）。1861 年底已经发生的不仅笼罩英国而且笼罩欧洲其他国家的“棉荒”就是这一预见的证明。棉花危机同棉纺织业生产过剩危机交织在一起，给英国工人，特别是郎卡郡的工业区及其主要中心曼彻斯特的工人带来最严重的灾难，这些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急剧缩减。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观察英国的危机的发展，同时密切注

意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的征兆。他们高度评价英国工人在美国内战时期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种顽强精神使英国统治阶级为支持南部种植场主而对美国进行干涉的计划归于破产。他们非常重视英国的工人群众大会，认为这种群众大会是无产阶级同民主解放运动团结的表现形式之一（见马克思1863年1月2日和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但是，尽管工人阶级由于危机而陷入困难境地，在英国却没有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这表明改良主义倾向在从宪章运动失败以来就受工联主义思想影响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仍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凄惨地忍受”和革命热情明显衰退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工人被资产阶级腐蚀（见恩格斯1862年11月5日和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1862年11月17日和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欧洲东部——俄国和波兰的运动有很大的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书信专门就1863—1864年起义评价和展望了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本卷中的这些书信很有价值，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1862年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撰稿后，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机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这些书信不仅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同情波兰人民的英勇斗争，而且揭示了波兰问题对当时整个欧洲革命运动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波兰解放运动看作是全欧洲范围的革命因素，因此特别重视波兰事件。他们认为，波兰恢复自由独立对于削弱沙皇在欧洲的反动作用，对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本身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前提。马克思得到关于波兰发生起义的最初消息后，在1863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见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本卷第 322 页)。

1863 年和 1864 年初的通信内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
注视波兰起义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别重视俄国和波兰的农民群众
参加起义。恩格斯在 1863 年 4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以把立
陶宛的运动评定为最重要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个运动超出了波兰
王国的疆界，而且农民也积极参加了运动。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指
出，只有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才能保证起义的成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波兰起义者阵营的力量配置情况
交换了意见，他们一再指出，参加起义的扎莫伊斯基和查尔托雷斯
基这一类右派资产阶级贵族分子的叛卖性。马克思认为这些分子
同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直接联系(见马克思 1863 年 7
月 6 日、8 月 15 日和 9 月 12 日给恩格斯的信)。同时，马克思和恩
格斯非常担心地指出，波兰的民主力量没有成熟，波拿巴主义在一
部分波兰民主主义者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就是证明(见马克思
1863 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 1863 年 4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 1863 年 8 月 15 日给恩格斯的信
中写道：“波兰事件就是被这个布斯特拉巴和他的阴谋对查尔托雷
斯基派造成的影响完全搞坏了。”(见本卷第 365 页)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波兰起义的军事方面也很有兴趣。恩
格斯对年青的波兰流亡者寄予很大的希望，非常熟悉他们的军事
著作。他对在波兰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根据波兰独特的斗争条件进
行军事活动的思想给以肯定的评价。恩格斯密切注视起义的进程，
指出它的军事组织方面的弱点：武器和有经验的指挥员不足，军事
指挥相当软弱，从而使起义者和许多起义的指挥员的优秀力量在
起义的头几个月就遭到毁灭(见恩格斯 1863 年 2 月 17 日、4 月 8 日、
6 月 11 日和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 1863 年 9 月 12 日给恩
格斯的信表明，马克思曾同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拉品斯基上校来往。

并热烈支持关于建立德国军团以援助斗争中的波兰人这一思想。

在起义前夕和在起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波兰事件直接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俄国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关于波兰的命运同俄国的革命运动有最密切的联系的思想，关于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同俄国的革命结合的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

还在起义的头几天，恩格斯就写信给马克思：“波兰人真行。如果他们能支持到3月15日，那整个俄国就要动起来了。”（见本卷第3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许多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当时也期望被1861年的沙皇改革所欺骗的农民起来造反。在后来的信件中，恩格斯非常担忧地指出，农民没有发动起来，而这种发动本来会加速俄国的革命，从而给予波兰解放运动以新的推动。在波兰起义爆发初期，俄国农民运动已经低落，把力量消耗在分散的、自发的“暴动”中。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70页）。由于波兰起义发动过早，因而沙皇政府才能够动员全部反动力量来对付俄国革命运动并阻止其发展。恩格斯在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看来波兰的起义在那里产生了肯定是不利的影响。”（见本卷第35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兰起义对德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有重大的意义。他们指望，波兰起义同俄国的人民革命结合起来，就能使德国首先是普鲁士掀起革命高潮，因为在那里已经发生了尖锐的政治危机。恩格斯在1863年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俾斯麦先生明白，如果波兰和俄国都革命化了，那他就要倒霉。”（见本卷第325页）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普鲁士失去了沙皇政府的支持，那么普鲁士反动派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写道：“普鲁士‘国家’（一种与德国极不相同的造物），没有现今的俄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国而同独立的波兰在一起是不能生存的。”(见本卷第 33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普鲁士君主制对待波兰起义者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在起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就认为支持沙皇政府镇压起义的“普鲁士人的行径很卑劣”(见本卷第 325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国际反动派特别是普鲁士反动派的诡计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在通信中详细地讨论了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关于波兰的号召书》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德国和波兰》，根据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来深入考察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所采取的掠夺政策。马克思在 1863 年 2 月 21 日对恩格斯说道，“这我要用来进攻腐朽的霍亨索伦王室”(见本卷第 329 页)。

有些书信还揭露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立场，他们甚至连普鲁士政府“不断引渡波兰逃亡者”这件事也不敢提(见马克思 1864 年 6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自由派市侩”的背叛是波兰起义失败原因，同时也是德国国内革命前景恶化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沙皇政府对起义的波兰人的残酷迫害。他们在许多书信中还揭穿了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反革命政策，这些政府在沙皇政府镇压波兰起义方面实际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马克思描绘了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对波兰的政策传统的虚伪性，他在 1863 年 3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老狗帕姆丝毫不差地又在重施他 1830—1831 年时期的故技”(见本卷第 332 页，以及马克思 1864 年 6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 1864 年 3 月 29 日给莱昂·菲利浦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列强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政策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63 年波兰起义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只有同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联合起来，才能保证波

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见恩格斯 1863 年 6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波兰起义失败后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 1864 年由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而同丹麦作战所能引起的德国政治形势的加剧寄以一定的希望。恩格斯在 1863 年 11 月 24 日写道:“丹麦事件……只能加速危机。”(见本卷第 370 页)马克思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也期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在德国内部引起冲突”(见本卷第 381 页)。但是,正象波兰问题一样,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又向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屈服,从而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对普鲁士君主制采取坚决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殷切关心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关心在 1861—1867 年墨西哥人民反对西欧列强首先是法国的干涉的斗争。马克思仔细地观察墨西哥的事态,揭穿了法国殖民者想用蛊惑的手段,如 1863 年夏天组织骗人的“全民投票”等来掩盖他们对被征服国家的掠夺活动(见马克思 1863 年 8 月 15 日给恩格斯的信)。他辛辣地嘲笑了波拿巴主义的社会蛊惑方法,这种蛊惑行为在殖民战争的条件下采取了特别荒唐可笑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波拿巴法国的革命危机的前景分析了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的冒险行为。通信中的许多评论和意见,揭示了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的殖民战争同第二帝国的内部政治危机之间的联系。马克思 1863 年 2 月 1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墨西哥的冒险是“没落帝国滑稽剧的十足典型的收场”(见本卷第 322 页)。马克思还在 1864 年 3 月 29 日给莱昂·菲利浦斯的信中指出,拿破仑第三想通过殖民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来巩固他在国内已经动摇的地位,由于在 1863 年春天立法团的选举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他不得不“向外贩卖‘自由’了”(见本卷第 648 页)。马克思在 1863 年 8 月 1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高瞻远瞩地预言，墨西哥远征必将失败，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一定会可耻地崩溃；“我认为，他无疑会因墨西哥的问题招致毁灭”（见本卷第36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864年期间的通信，鲜明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士的实际革命活动，反映了他们为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1847—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后继者——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新的革命高潮才有可能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们加紧活动，准备建立这样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保存下来的坚强的革命家核心，在集聚、教育和团结无产阶级战士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马克思和以往几年一样，同著名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通信。1860年他还帮助魏德迈出版芝加哥的工人报纸（见马克思1860年4月9日给斐·拉萨尔、格·洛美尔、约·菲·贝克尔的信）。马克思竭力维护受统治阶级的警察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861年，他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派人士广泛通信，以便组织释放奥·布朗基出狱的运动。在通信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法国的革命组织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见马克思1861年6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发表了马克思给布朗基的亲密朋友法国政论家路·瓦托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于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作了明确的评论（见本卷第612页）。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给约·瓦·维贝尔的信大大地补充了过去知道的关于马克思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活动的资料。马克思孜孜不倦地宣传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原理，始终不渝地关心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从1862年底起，马克思同德国的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路·库格曼经常通信，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了十多年之久。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

一些书信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由列宁校订并写有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忙于建党，决不是要恢复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比较狭隘的组织形式。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给弗莱里格拉特写道，他所说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见本卷第48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建立一个比较群众性的、同广泛劳动者阶层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党应当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应当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应当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和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个有影响和有威信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正在形成但还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使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派别的影响，保护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对他们的诽谤和陷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写的许多书信反映了他们同卡尔·福格特的斗争。这个庸俗的民主主义者和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恶毒诽谤无产阶级政党。他在1859年12月出版的一本用心险恶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伪造事实和公开撒谎，对马克思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诽谤。他恶意攻击马克思的革命活动，硬说工人阶级的领袖怀有自私的目的；他力图把马克思及其战友说成是一伙与警察有秘密联系的阴谋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格特的言论中看出资产阶级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破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马克思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写道，福格特的攻击意味着“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对全党的坚决打击”（见本卷第23页）。因此，马克思在了解了福格特的小册子的内容以后马上就决定给

予歼灭性的回击。正如马克思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所说的，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见本卷第44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使人们能够逐步了解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创作经过。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非常紧张和非常细心地写作这部著作。为了得到真正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和揭露福格特的材料，马克思写了将近五十封信，分发给他和恩格斯在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或者是能够告诉他一些必要情况的人。为了充分有准备地反对福格特，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书籍和文件，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讨论这部论战著作的写作计划，并且翻阅了恩格斯所拥有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材料。

马克思是在同恩格斯紧密合作下写作抨击福格特的著作的。当时恩格斯正在研究军事学术的理论和历史，应马克思的请求，为他的抨击性著作写了几篇关于某些欧洲地区的战略意义的材料。

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政府竭力阻挠他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家免遭诽谤。马克思在写作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时，为了更广泛地揭露这个诽谤者，还对柏林的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起诉，因为这家报纸在1860年1月的两篇社论中转述了福格特的最无耻的谰言。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控诉被四个审级的司法机关驳回，其借口是在马克思的控诉书中看不到“公众利益”。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司法制度的阶级性质，在许多封信中揭示了他的控诉被柏林的法院驳回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指出，柏林的法院是按照普鲁士政府的指示行动的，这个政府不愿意给马克思提供为无产阶级辩护的讲坛。马克思在1860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普鲁士政府的‘公众利益’……要求尽可能地诽谤我们”（见本卷第52页）。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证明，恩格斯对1860年12月出版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1860年12月5日给马克思写道：“这本书我越读越喜欢。”（见本卷第1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同福格特斗争的书信，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给予歼灭性回击的鲜明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斐·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的批判，在他们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历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六十年代初德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活跃，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已经走上独立政治斗争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的问题就有了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1861—1864年的通信使人们能够了解他们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竭力扮作它的组织者和理论家的时期所采取的态度。

在评价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这个时期的活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活动在一定的阶段上有助于德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恩格斯在1863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注意了拉萨尔的宣传活动的这一方面，他写道：“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重新争取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活动的地盘。”（见本卷第345页）1863年在拉萨尔的直接参加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列宁指出了拉萨尔活动的这一方面，提到拉萨尔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会主义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53页）。

但是，拉萨尔所制定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纲领并没有向工人阶级展示出任何革命的前景，而是在它的队伍中播下了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不断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而达到的幻想。1862年夏天拉萨尔在伦敦和马克思会晤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

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就表现得明显了。马克思坚决谴责拉萨尔的改良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认为，在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下，通过为实施普选权和建立生产协作社的鼓动就能达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扼要地表述了他同拉萨尔分歧的实质。他写道：“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见本卷第272页）

对拉萨尔的作品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拉萨尔的信中占了很大比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这些作品自命不凡十分肤浅，具有“小学生气”（见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和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对间接税所发表的意见时写道：“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历史和理论方面的错误。”（见本卷第3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不指出，拉萨尔在批评资本主义时有许多地方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中剽窃来的，同时他又把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剽窃来的思想加以庸俗化和歪曲，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看到拉萨尔作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来的《工人纲领》以后，就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写道：“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见本卷第320页）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拉萨尔显然认为“他是命中注定要继承我们产业的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批判了拉萨尔在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前夕所写的《公开答复》。他们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社会“处方”，指出拉萨尔肤浅地领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条件。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把“阶级”和“等级”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并把手工业者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这

不是偶然的(见恩格斯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拉萨尔的作品批判性分析得出结论说,拉萨尔的纲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细心观察拉萨尔的政治活动,严厉斥责他的错误策略,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同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得到某些让步。在拉萨尔发表了博得反动报刊喝采的言论之后,恩格斯写道:“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见本卷第351页)。拉萨尔在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尖锐化的条件下只攻击进步党,这对俾斯麦的容克政府是有利的。

恩格斯在1863年11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这一立场,并且写道,拉萨尔应当从《共产党宣言》中“好好学一学,在这种时候应该怎样对待资产阶级”(见本卷第370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不知道拉萨尔和俾斯麦直接有勾结,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行动客观上导致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针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他们提出了对封建反动派进行全民的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到拉萨尔的鼓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认为最好暂时不公开反对他。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批判他的东西,是浪费时间……但是容忍他大吹大擂和不知分寸的做法也不行……因此,毫无办法,只好等待他什么时候怒气爆发。”为了反对拉萨尔的计划,马克思认为必须:

“(1)向公众指出,他怎样抄袭我们的东西,抄袭的是些什么;
(2)我们的观点同他的货色如何不同,不同在哪里。”(见本卷第35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同拉萨尔私人会晤时或是在给他的书

信中总要指出他的观点的错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定拉萨尔不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同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合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后，就同拉萨尔完全断绝了关系。

由于拉萨尔决斗而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9月所写的书信中对拉萨尔的社会政治活动作了总结。恩格斯承认他在政治方面“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所造成的机会主义倾向。恩格斯1864年9月4日给马克思写道：“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见本卷第419页）

由于拉萨尔在工人问题上向民族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面摇摆，他的策略适应容克地主的领导权，他公然向俾斯麦献媚，所以必须提出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的策略来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德国工人中间广泛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著作。根据许多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在德国传播这样一些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等。他们认为完成《资本论》这一著作是尤其重要的事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无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来消除拉萨尔对德国工人的机会主义的影响。在1863—1864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1862年回到德国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保持经常的联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年的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注意德国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政治积极性。他们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经常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道，他们通过自己的指示和建议来帮助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年6月7日和9日的信很有意义，他们在这封信中阐明了他们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所应采取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证明，在长期流亡的岁月里他们并没有同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失掉联系。1864年6月佐林根的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访问马克思(马克思在1864年6月3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件事)令人信服地表明，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一如既往在德国先进工人中间享有巨大的威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关心巩固同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工人的联系，这就为1864年9月建立国际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第一国际奠定了基础。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一封信。这些信大部分在国外刊物上用原文发表过。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给匈牙利的政论家贝·瑟美列、在荷兰的亲戚——菲利浦斯以及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一部分曾在苏联的期刊上发表过。其余的信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打字副本第一次发表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恩格斯1860年4月11日给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0年4月19日给哥特弗利德·欧门的信；马克思的书信中第一次发表的有他在1860年6月1日给爱·费舍的信，1861年11月10日给路·瓦托的信，1862年8月19日给威·什瓦尔茨的信以及1863年12月1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在《附录》部分中还收入了燕妮·马克思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些信，这些信或者是转述我们没有找到的那些马克思的信的内容，或者是按照他的委托而写的；其中有六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

所有这些信大大地充实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资料，它们是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1864年在社会政治、科学和创作方面的活动的珍贵材料。

第三十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收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864年10月至1867年12月所写的书信。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建立和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这个时期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外矛盾的尖锐化,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急剧高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日益加强。

本卷发表的书信表明马克思注意的中心和前几年一样,仍然是深入研究经济理论,并根据1861—1863年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册。当时马克思决定不仅要准备《资本论》的第一册,同时还要加工这部主要著作的其余各部分。他决定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和汉堡出版商迈斯纳已经预先签订了全部《资本论》不超过六十个印张分两卷同时出版合同。

马克思所制定的研究方法,要求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严格科学地阐明这个社会制度的全部客观规律和运动趋势,揭露它所固有的全部矛盾和它的对抗性质,明确指出它必然灭亡的原因和条件。在《资本论》整个理论部分(前三册)的手稿完成前不久,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到达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

不拿去付印。”(见本卷第 135 页)

1865 年底以前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前三册的手稿。随后他准备写第四册,即经济理论史部分。马克思认为这册书的准备工作比较容易,因为 1861—1863 年的经济学手稿已经对这一部分有了阐述,而且所有复杂的理论问题在前三册中已经解决了。

但是,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知道,首先必须以最高的速度准备《资本论》第一册的付印和出版。当时由于过度劳累而被损坏的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也是要求这样做的。

经恩格斯的坚决劝告,马克思于 1866 年 1 月开始为《资本论》第一册的付印进行最后加工。马克思在 1867 年 4 月以前主要是修改原稿,使这本书更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从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证实已经基本解决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十分重视那些最新的事实,特别是关于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斗争的事实。例如,马克思大量地利用了 1866 年和 1867 年初出版的英国官方的蓝皮书和其他资料。马克思仔细地分析新材料,得出了结论:四十年代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改善,相反地,工人阶级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恶化了。因此,马克思坚决要求恩格斯准备再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认为,他的《工作日》一节的叙述只是对恩格斯的这本书的简略的补充(见本卷第 177 页)。

在《资本论》第一册准备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注意到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因而,他请求恩格斯为第一册写专门的附录来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军事制度和战争的实质。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Menschenabschlachtungsindustrie]中得到更为光辉的证实呢?”(见本卷第 236 页)列宁在《1844—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中指出了这封信的理论上

的重要性。但是，恩格斯担负着为国际撰写政论著作的繁重工作和其他事情，不能满足马克思的这个请求，而马克思非常希望他的朋友在《资本论》第一册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

这一时期的书信表明，马克思还经常征求恩格斯对其他问题的意见，仔细考虑他的意见，并在第一册准备工作中采纳了这些意见。例如，马克思把恩格斯在1867年1月29日和3月13日信中提供的有关英国棉纺织业危机情况的材料和工人反对工厂主企图降低工资的斗争的材料，几乎逐字逐句地收入《资本论》，作为该书的注释（见本卷第277—278、282页）。从这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同工人运动的迫切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1866年11月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册已经完成的手稿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出版商迈斯纳。1867年3月27日他完成了手稿的其余部分的付印准备工作，并很快亲自把它送到汉堡。1867年4月13日马克思和迈斯纳会晤时，决定整部《资本论》分三卷出版，其中第一册作为《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合编为《资本论》第二卷，而结尾部分即第四册为第三卷。这个出版计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谈到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读者还可以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找到许多其他有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经过的详细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以及某些章节的内容互相交换了意见。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看了该卷校样，非常坦率地向他提出自己的印象和意见，写明某些章节叙述方面的优缺点，提出在全卷结构和文字方面的许多修改建议。马克思也在许多书信中给朋友解释最困难的地方，告诉他为论证理论原理所必要的细节。伟大学者之间的这种意见交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内容本身和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例如，

在恩格斯 1867 年 6 月 16 日的信和马克思 6 月 22 日和 27 日的回信中有关价值形式的发展的阐述，是研究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分析和货币理论）的重要补充材料。在恩格斯 1867 年 6 月 26 日的信和马克思 6 月 27 日的信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阐述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利润产生的流行观念的批判，也都是研究第一卷的重要补充材料。马克思同年 8 月 24 日的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封信指出了他的经济理论根本不同于以前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在他看来，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最好的地方”（见本卷第 331 页）。

1867 年 8 月 23 日，恩格斯仔细读完了这本书的大部分之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见本卷第 329 页）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恩格斯也有一段卓越的评论：“理论部分很出色，剥夺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也很出色……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概括是非常光辉的，它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见本卷第 340 页）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理论战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切理论而表示由衷的高兴。从恩格斯的所有的评论中，读者可以看出他是杰出的理论家，在创立工人阶级新的、真正科学的和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是马克思的第一助手。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非常重视自己的朋友对第一卷内容的评论，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见本卷第 310 页）。1867 年 8 月 16 日深夜两点钟，马克思刚刚校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就立即给恩格斯写了一封很出色的信，这封信是充满着强烈而高贵的感情的宝贵文献。它清楚地说明了在写作全部《资本论》

和准备第一卷付印工作方面恩格斯给予马克思巨大的和全面的帮助(见本卷第328—329页)。

恩格斯的许多专门阐述经济理论问题的书信,也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他在1865年3月29日给弗·阿·朗格的信中,明确而简练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本特点,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证明了为维护生产力、造福于全体劳动人民而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1867年9月)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经济学中根本的革命变革,后来《资本论》其他各卷的出版是这一变革的继续和完成。第一卷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指出了它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它的灭亡的不可避免性。按照马克思的形象说法,这一卷“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见本卷第542—543页)。这一点已被整个人类历史证实了。

本卷所发表的书信也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欧美各国宣传《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共同采取的初步措施。当时这是相当困难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现了非凡的毅力。为了引起对《资本论》的普遍注意,他们把书直接寄送给同志和熟人,要求评论这本书;他们还通过迈斯纳散发关于该书问世的广告,并准备为各种刊物写书评。

在报刊上宣传第一卷,恩格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他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计划,这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刊物发表似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写的专门评论来引起对《资本论》的注意。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个计划,称它是“最好的作战方法”(见本卷第352页)。恩格斯写了几篇这样的书评,后来经库格曼、济贝尔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帮助,刊登在许多报纸上。

由于无产阶级领袖卓有成效的工作,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学阀

企图封锁《资本论》第一卷的反动的“沉默的阴谋”未能得逞。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传播和宣传《资本论》，目的在于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用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运动。马克思在1867年11月3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最好地表达了这一主要目的：“有一件事情，由您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比由恩格斯或我写更为合适。这就是：他的直接责任是在工人的集会上引起人们对我的书的注意。这件事，如果他不去做，拉萨尔派就会把它抓在手里，就会歪曲一切。”（见本卷第576页）关于这件事，在本卷附录中马克思夫人燕妮1867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里也写得很清楚。党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命运的真正巨大的关怀，从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书信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立即整理阐述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二册。他在1867年8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在8月26日和27日的回信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书信都是理论财富，它们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的作用和实际使用。

本卷发表的大部分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第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所从事的活动。第一国际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极重要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上的有决定意义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展示了国际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在国际活动的初期所起的作用。由于马克思的领导，第一国际才能对工人阶级整个以后的解放斗争起那么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上述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使他能够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后来恩格斯有充分的理由写道：在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诞生的大会的所有参加

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8页）。

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1864年11月29日给莱昂·菲力浦斯的信，详细地描写了1864年9月28日大会的准备和过程，以及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月的工作。从这两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建立国际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要对付那些想给工人运动施加影响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顽强的反抗。由于马克思的直接参加，新组织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

临时委员会批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件，这件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后来取得胜利的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起草这些纲领性的文件时，也曾考虑到，要实现工人阶级各个队伍的国际联合，必须做到对于宗派主义派别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同时也不拒绝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各国的蒲鲁东分子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马克思给恩格斯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见本卷第17页）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共同行动，在刊物上和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创造性的辩论，必然会产生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更具体的纲领。马克思“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1页），使工人从争取局部的和地区的要求的日常斗争中理解到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总任务。例如马克思在把自己拟定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告诉库格曼时写道：“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一点使工

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见本卷第 533 页）

马克思是国际的真正的领袖，是它的灵魂，是总委员会的一切重要文件的作者，这些文件规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肩负了一个组织者和教育者的艰巨的重担。马克思在 1866 年 10 月 13 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实际上他“必须领导整个协会”（见本卷第 535 页）。对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见马克思 1865 年 3 月 13 日、4 月 11 日、12 月 26 日给恩格斯的信）。他按时参加总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作为总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工联的会议，准备各种问题的发言，参加群众集会，进行大量通信，领导 1865 年的伦敦代表会议，领导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 年）的筹备工作。与那些自吹自擂争名逐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相反，马克思从不强调自己在组织中的领导作用。最能说明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领导人的是他在 1865 年 11 月 21 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坚决反对与无产阶级运动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李卜克内西寄给伦敦代表会议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马克思没有宣读，他写道，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见本卷第 490 页）。

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他的朋友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中经常给以有效的援助。恩格斯在 1870 年以前一直住在曼彻斯特，当时还不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他只是在移居伦敦以后才参加了总委员会，并在其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但是，即使在此以前恩格斯也是这个组织的全部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同马克思无论是在通信时或私人会晤时总要讨论一切重大的问题。他还在报刊上捍卫和论证国际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恩格斯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从国际产生以来的领导人

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核心团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这对于国际的成就具有决定的意义。从协会成立那天起，马克思就竭力保障它的总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成分。马克思1865年1月8日左右给海·荣克的信证明，当时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钻进总委员会的企图。

马克思的书信说明了马克思曾在总委员会委员中进行经常的耐心的教育工作，帮助最有觉悟的、最忠诚的工人获得必要的理论知识，克服宗派的偏见，研究马克思主义。总委员会的委员中，德国人格·埃卡留斯、弗·列斯纳、卡·普芬德，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法国人欧·杜邦，英国人罗·肖，瑞士人海·荣克，都是完全拥护马克思的，当马克思不在场时，他们时常受他的委托，出面代表他，坚定地捍卫他的立场。本卷发表的马克思的书信，有许多是寄给他在领导国际时所依靠的一些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的，如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约·菲·贝克尔、约·魏德迈、路·库格曼、塞·德·巴普、齐·迈耶尔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向他们提出建议，表扬他们的成绩，在他们受到挫折时鼓励他们，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见马克思1864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1867年4月30日给齐·迈耶尔的信，恩格斯1867年10月13日和22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与无产阶级群众建立直接联系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在书信中经常强调与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工人以及其他各国工人建立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在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工人们都向马克思寻求意见和帮助。例如，1865年11月马克思收到奥·福格特、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等工人从柏林寄出的一封信，用他的话来说，信中“深思熟虑地和批判地分析德国工人

运动的现状”(见本卷第496页)；马克思长期和他们有书信来往。在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工人群众，反对工联中染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那些机会主义领导人。在法国，工人是反对右翼蒲鲁东分子的斗争中的支柱。

收入本卷的许多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出卖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利益的叛徒采取绝不调和的立场。在许多信中，凡是提到象米凯尔、毕尔格尔斯这些叛徒时都是用了愤怒的词句。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揭露了趋附现存制度并同反动政府合作的那些“现实政治家”的背叛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非常注意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刊物。国际一成立，他们就集中精力在许多国家如德国、英国、瑞士建立协会的出版机构，积极参加当时发行的报纸工作，使它们具有革命倾向。他们关心编辑部和撰稿者的成分，吸引自己的同志来写稿子(见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1865年5月9日和12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在马克思经常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形成了一大批工人政论家，国际思想的宣传家。马克思认为在各种刊物上广泛地刊登国际的文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往往亲自把它们翻译成其他语言。

为了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国际的队伍，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支持许多国家在1865—1867年开展的罢工运动。正象本卷中一些书信所表明的那样，总委员会按照马克思的倡议，注意给罢工工人以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帮助工人为争取限制工作日和制定固定的工资制度，反对剥削女工和童工而斗争。总委员会的这种活动有助于各国工人步调一致地进行阶级斗争，有助于国际的威望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日益增长。胜利的罢工斗争，促使人们克服蒲鲁东主义者的罢工有害论，驳倒拉萨尔派对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作用的低估。

参加共同行动，支持罢工运动，对于欧洲工人说来，这是国际阶级团结的大学城，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学城。

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唤醒某些国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时，遇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各种宗派主义派别和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的激烈抗拒。在国际的代表会议上、在工人出版的刊物上以及总委员会内部所发生的思想斗争，反映了欧洲无产阶级克服早期工人运动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宗派主义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国际中的派别斗争是完全合乎规律的，1864年11月7日他给马克思写道，在他看来，在国际的行列中采取无产阶级立场的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之间的分歧必定会立即表现出来（参看本卷第19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有阐明国际内部派别斗争的丰富材料。这些书信揭示了宗派主义的特点，它的产生原因，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与它作斗争的意义。每个国家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向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在该国所表现的特殊形式作斗争的历史。

对于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群众组织的命运具有特殊意义的，首先是它在英国的地位的巩固。当然，马克思也非常注意这一点。伦敦一些大的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在总委员会中有相当大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信中，对奥哲尔、克里默以及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而其实对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都有明确的评述。马克思早就同工联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了不倦的斗争，竭力使英国工人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马克思的坚决主张，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领导了争取选举法改革的大规模运动，并于1865年春天与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同参加了改革同盟的领导，要求提出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1865年5月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道：“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

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可以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而且有取得成功的一切希望。”（见本卷第 113 页）但是由于工联领袖的妥协，强大的运动被破坏了，结果在 1867 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工人阶级的上层。马克思在 1866 年 8 月 31 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写道：“不论克里默或是奥哲尔，他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见本卷第 526 页）

由于工联领袖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马克思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时期的书信中，有不少地方对爱尔兰问题既从历史和经济的观点，又从它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马克思本来以为，英国无产阶级采取了革命行动，爱尔兰就会摆脱英国的压迫，但到了 1867 年秋天，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在 1867 年 11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见本卷第 381 页）马克思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和对这个国家土地制度进行革命民主的改造是英国无产阶级开展顺利斗争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信中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所谓“清扫”领地，就是用强迫手段把爱尔兰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把耕地变成牧场。马克思给恩格斯写道：“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异族统治，都没有对当地居民采取这种直接的剥夺形式。”（见本卷第 381 页）

马克思 1867 年 11 月 30 日给恩格斯的信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他在这封信中把无产阶级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政策原则加以发挥并具体化了，从而拟定了英国工人在

爱尔兰问题上所应支持的纲领。“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 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 土地革命。英国人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3.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见本卷第405—406页）

从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总委员会所组织的声援爱尔兰人民各次运动的倡议者。他就爱尔兰问题公开发表讲演和作报告，热情捍卫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员的斗争，首先指出：“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见本卷第404页）。

在1867年一系列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者的迫害行为，谴责英国当局企图把芬尼亚社社员的政治行动说成刑事犯罪，谴责法庭审判芬尼亚社社员时使用伪造材料、伪证，以及英国“司法当局”的其他卑鄙行为。

从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阴谋冒险策略（见马克思1867年11月28日和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67年11月29日和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芬尼亚社社员天真地相信，似乎通过恐怖行动就可以解放爱尔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国际主义立场，是很有成效的。恩格斯在1867年11月8日和2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满意地指出：“伦敦的无产者日益公开地拥护芬尼亚社社员，从而第一，拥护暴力运动，第二，拥护反英运动，这一点在这里完全是闻所未闻，确实是好极了。”（见本卷第57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英国的殖民制度。例如，1865年11月因为发生残酷镇压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岛黑人起义的事件，马克思

和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军队在这个岛上的“功绩”。“牙买加事件突出地暴露了‘真正英国人’的卑鄙无耻。”(见本卷第1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德国工人运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新莱茵报》的活动已经为在德国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但是要在那里宣传国际的原则还有很大困难。一方面反动的联合法阻挠国际在德国建立支部，另一方面工人的国际的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也遇到拉萨尔派的反对。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只要拉萨尔主义“在德国还占上风，国际协会在那里就没有地位”(见本卷第73页)。克服拉萨尔主义是进一步提高德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发展德国工人运动的必要条件。

当国际成立的时候，拉萨尔本人已经死了。本卷发表的书信详细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反对拉萨尔的思想继承者、反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开创的机会主义策略所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在谈到拉萨尔突然死亡的一些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政治活动作了总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认为拉萨尔的鼓动获得暂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小市民庸人的自发势力对德国工人阶级有一定的影响(见马克思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斥责拉萨尔爱好虚荣，自吹自擂，“看重瞬息间的成就”(见恩格斯1864年11月24日给魏德迈的信)。他们指出，拉萨尔对工人阶级解放的经济条件一点不懂，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知半解，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庸俗化。在本卷发表的一些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把普选权宣布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万应灵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经验，预见普鲁士反革命势力将利用这一口号进行蛊惑煽动。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坚决地谴责了拉萨尔向俾

斯麦的反动容克政府献媚，指出了拉萨尔无原则地同容克地主勾结起来对付资产阶级。鉴于已揭发的拉萨尔同俾斯麦的谈判材料，恩格斯在1865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见本卷第4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直接勾结的推测，在1928年公布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后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以及其他一些信中指出：拉萨尔对俾斯麦的“骗人的社会措施”散布了种种幻想，鼓吹依靠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而同时又反对争取联合权的斗争，反对建立工会，建立无产阶级的真正组织中心。

为了在拉萨尔主义堡垒内部给拉萨尔主义以打击，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采取措施把在拉萨尔参与下产生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吸引到国际中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意为拉萨尔的继承人约·巴·施韦泽创办的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详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施韦泽的相互关系，他们曾一再要求施韦泽停止向容克政府献媚。以后证实，施韦泽不顾多次警告，继续执行同俾斯麦妥协的政策，并在报纸上灌输和有系统地宣传对拉萨尔的崇拜，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声明同施韦泽断绝关系（见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和30日、2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1865年1月16日和2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在德国资产阶级改革完成时期特别激烈，当时迫切需要使德国工人阶级正确理解他们面临的任務。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中心问题是把德国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问题必须用彻底民主的、革命的方法，即建立一个统一的

民主共和国的方法来解决。马克思在1866年4月6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庸人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更不用说那些小粪甲虫）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和对德国的重新瓜分！”（见本卷第518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对于克服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起了巨大作用，小册子根据德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了工人阶级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详细地讨论了小册子的写作计划和内容，他们分析了以社会蛊惑宣传来掩饰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计划的普鲁士政府的立场，并指出了俾斯麦运用了波拿巴主义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看风转舵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最终支持俾斯麦政策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对派——进步党人的不彻底性和怯懦，并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普遍民主权利的斗争中的任务（见马克思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指出，在工人阶级的策略中，主要的就是不同反动派作任何妥协，揭露资产阶级的贩卖性，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工人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争取用彻底革命的方法统一德国的斗争中又经常给予帮助和支持，所以很大一部分德国工人脱离了拉萨尔派。正象马克思在1866年5月17日给恩格斯所写的那样，他们使得俾斯麦不能欺骗工人跟着他走（参看本卷第22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评价了德国的事件，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策略。他们给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的威·李卜克内西的建议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1867年10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赞扬了李卜克内西反对俾斯麦执行的“铁血”政策的演说（参看本卷第376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评了李卜克内西的某些错误，指出他由于仇恨普鲁士就倾向于美化奥

地利的政策，同意南德意志各小邦的分立。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允许把自己和奥地利的拥护者、南德意志的联邦主义者、教皇至上主义者以及失国君主混同起来的话，那末俾斯麦是没有比这更满意的事了。”（见本卷第399页）恩格斯在1867年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已向李卜克内西提出：“（1）对1866年的事件和结果所持的态度，不应该单纯是否定的也就是完全敌对的态度，而应该是批判性的（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2）对俾斯麦的敌人，同对俾斯麦本人一样，都应该给以严重打击”（见本卷第419—420页）。

本卷中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书信占了不少篇幅，蒲鲁东的学说当时在法国、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和瑞士的部分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很大的。马克思在1866年10月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指出了蒲鲁东给工人运动造成的巨大危害。马克思在揭示蒲鲁东主义传播的原因时指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假批判”，他那漂亮的空话迷惑了“优秀的青年”、大学生以及从事小生产的落后的半手工业工人，使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见本卷第533页）。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见本卷第533页）。马克思对蒲鲁东在民族问题上所抱的虚无主义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1866年6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总委员会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辩论时委员会的一些法国委员，包括拉法格在内，坚持蒲鲁东派的观点，声称民族和民族特性是“陈腐的偏见”。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就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并详述了他是怎样对维护这些有害观点的人进行驳斥的。

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被压

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欧洲的革命改造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特别注意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独立的民主的波兰看作是革命民主派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和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的可靠同盟者。他们认为波兰人民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争取欧洲民主改革斗争的组成部分。恢复民主波兰的要求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有可能揭露本国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恢复民主波兰是一个口号，通过这一口号就能实现国际内部无产阶级各支队伍的统一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总委员会在波兰问题上采取了一贯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总委员会一开始就支持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派，揭露了那些出卖波兰人民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贵族派。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的许多书信中重新分析了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的原因。例如，马克思在1865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甚至一部分波兰贵族根据1863年波兰起义的教训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农民的起义就不可能有波兰的恢复”（见本卷第53页）。恩格斯在1864年11月24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波兰起义的失败原因是普鲁士和法国起了背叛作用，帮助反动的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了波兰人民的起义。

总委员会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和集会来纪念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有意义的日子。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些群众大会的筹备工作（见马克思1865年2月25日、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1865年4月13日给荣克的信）。马克思在一些书信中还谈到总委员会为保护争取波兰独立的战士们所采取的其他行动，谈到他在1864—1865年在这个问题上同激进的政论家彼·福克斯（此人美化了法国对波兰的政策）的辩论（见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一著作(见马克思1866年1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对于论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也在书信中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这组文章,认为这些文章对波兰人发生很大的影响(见马克思1866年5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一些书信证明他为了在比利时建立国际支部(见马克思1865年4月15日和7月25日给封丹的信)和在瑞士建立国际支部作了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利用他和流亡美国的革命运动参加者魏德迈、齐·迈耶尔等人的关系在那里宣传协会的原则和建立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满意地指出它的每一个新成就。马克思在1866年10月给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巴尔的摩工人代表大会,他写道:“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样被提出来了。”(见本卷第533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通信中,他们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进行研究的国际政策问题占有相当的地位。早在国际建立时,他们就号召工人阶级在对外政策问题中坚持与统治阶级的立场相对立的独立的路线。马克思在1865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论战时指出:“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决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见本卷第8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出发,在书信中评价了美国内战结束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前几年他们在时评和通信中对美国内战曾予以很大的注意。恩格斯全神贯注地观察美国的战争进程。他认为,内战即将结束,北部对奴隶制的南部在经济和道德政治上的优势将必然使后者失败和投降(见恩格斯1865年2

月7日、3月3日、4月16日、5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指出了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对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革命化的影响。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北部各州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指出了在战争进程中和战争结束后北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所暴露的反民主的、有时甚至是公开反革命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就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前途交换了意见。1865年6月24日，马克思尖锐地评述了接替林肯的约翰逊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反映了北部大资产阶级企图内战中被击败的南部各州种植场主联合，使美国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取得的许多民主成就受到威胁。约翰逊对南部叛乱分子实行部分大赦，纵容对南部各州“解放了的”黑人采取肆无忌惮的恐怖手段和种族歧视。恩格斯在1865年7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我也愈来愈不喜欢约翰逊的政策。他对黑人的憎恨愈来愈强烈，而对于南部的老贵族却表现得非常软弱。”（见本卷第130—131页）

由于群众的压力和共和党左翼的坚决要求，美国国会才被迫不顾约翰逊的意志，在南部实行战时状态，并采取一系列反对原先的奴隶主的措施（即所谓“重建南部”）。由于约翰逊在1866年秋天的选举中遭到失败，马克思在给弗朗斯瓦·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北部的工人终于清楚地理解到，在黑人的劳动被打上屈辱的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永远不能解放”（见本卷第539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关于工人阶级针对欧洲战争的威胁而采取的策略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这个策略首先同确定战争的性质联系起来。他们坚决谴责统治阶级为了王朝的和反人民的目的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例如，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准备的战争已经迫近的时候，恩格斯在1866年4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虽然每个参与发动

这场战争的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都应当受绞刑，虽然我完全公正地希望这也扩展到奥地利人身上，但是我的主要愿望还是要使普鲁士人受到痛击”（见本卷第 201—202 页）。战争爆发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设法使国际对这场战争采取正确的立场。1866 年的战争使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动机同统一德国和完成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马克思认为对于国际来说赞成保持中立是正确的，并且指出国际无产阶级不支持这场战争的任何参加者。马克思在 1866 年 6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见本卷第 231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坚决反对和平同盟所散布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条件下能够建立自由与和平的和平主义的空话。马克思在 1867 年 9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有道：“你知道，我在总委员会里发言反对与和平空谈家为伍。”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空谈相反，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不懈地进行了争取和平的真正积极的斗争，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外交手腕。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广泛的科学兴趣。他们密切注意自然科学（生物学、农业化学、地质学、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的发展，深入研究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经济，深入研究民族志学和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就最迫切的科学问题交换意见，对各个科学部门中新的假说、发现、新的论著提出自己的评价。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是研究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生平事业的极其宝贵的资料。这些书信再现了他们写作某些著作的经过，描绘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百折不挠、热情奔放的革命家，是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平凡的人。这些书信证明了这两位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九封信，其中有十三封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手稿第一次发表的。在第一次发表的这些书信中，有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五封信（1865年2月6日、1865年2月22日以前、1865年底—1866年初、1866年2月20日、1867年11月29日），马克思给索·哈茨费尔特的三封信（1864年11月26日和28日、1865年4月10日），马克思给保尔·拉法格的两封信（1866年8月13日和12月7日），马克思1865年11月25日左右给塞·德·巴普的信和恩格斯1867年9月23日给劳拉·马克思的信。

新收入全集的马克思的六封信最初曾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过，其中马克思1864年11月29日给莱昂·菲利浦斯的信和1866年3月18日给南尼达·菲利浦斯的信有关于第一国际的重要资料，这两封信具有特殊意义。

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马克思夫人燕妮受马克思的委托写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九封信，在这些信中有关于马克思社会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的补充材料和其他传记资料。这些信中有四封是第一次发表的，四封曾在第一版中发表过，一封曾在《历史文献》杂志1959年第2期上发表。

在《附录》部分中，除了燕妮·马克思的信，第一次发表了席勒协会（恩格斯曾任该协会理事会主席）的两份文件。由恩格斯起草的这两份文件提供了有关恩格斯社会政治活动的补充资料。

为了避免过多地增加注释的条目，本卷及以后各卷一般不再提供参看性的注释。在正文需要重复某一个注释的地方，直接提供该注释的相应的注码。有关第一次发表时不完备的情况都在书信的末尾加以说明。

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68年1月至1870年7月所写的书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特点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加剧，工人运动高涨以及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在波拿巴法国和俾斯麦普鲁士之间军事冲突日益迫近的形势下进行的。1868年在西班牙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法国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第二帝国制度以及其他革命事件，也加剧了国际局势和一些国家国内的紧张形势。

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为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了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既往，以很大的注意力来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策略，为确立国际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斗争，阐明西欧各国和俄国工人革命民主运动发展的途径。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出版后，马克思继续撰写这部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两卷的初稿马克思早在1863—1865年就写好了，但他没能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作好付印准备并很快出版首先是因为他患了重病。这场病的后果和复发使马克思的工作时间大受限制，他的工作有时完全中断了。尽管如此，在1868—1870年他还是为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了大

量工作。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的书信表明他细心地收集了有关《资本论》这两卷的问题的新资料。例如，在1868年3月6日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就谈到，他因为身体不好而无法写作，但是他“吞下了大批统计学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材料’”（见本卷第526页）。马克思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事实进行不断的研究、严格的科学评价和总结，要创立经济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应该提一下马克思1868年10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教条主义时，做了一个极好的方法论的结论：“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见本卷第170页）列宁在《〈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中特别指出上述原理的重要性，并扼要地表述如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第78页）。

1868年4月，马克思又重新开始整理《资本论》的手稿，他决定首先重新修改并扩充已有的第二卷初稿。本卷发表的一系列信件证明，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正着手对资本流通问题进行补充研究。例如，在1868年5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要求回答周转的实际计算方法和预付流动资本量等问题。同年5月16日的信中，马克思又一次指出了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在研究上的困难。在陆续不断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在1868—1870年开始准备付印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手稿，接着，他又写了整个《资本论》第二卷的新的大纲。在这几年内，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的同时，也很注意研究与第三卷有关的问题。收入本卷的许多马克思的书信表明了一个总的趋向，即马克思力求完成《资本

论》第三卷，并使许多理论问题浅显易懂。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这封信扼要而清楚地叙述了《资本论》整个第三卷的结构方案和基本内容，其他一系列涉及这卷各种专门问题的信件也同样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在这几年继续研究他的地租理论，紧张地研究许多国家农业发展和土地关系的新材料。例如，马克思在1868年1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要求给他介绍德国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新书，并回答对“写地租这一章”来说是重要的一系列问题（见本卷第5—6页）。马克思在同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见本卷第54页）

马克思1868年3月14日、25日和186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69年11月9日和19日给马克思的信，尖锐地批判了有关德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的错误观点，以及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地租理论。他们指明了凯里地租理论是毫无根据的，是强词夺理的，同时也揭露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论证了他们关于地租产生的观点，引用了令人信服的例子和事实，来阐明并证实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列宁注意到这个材料的巨大科学价值，他在《摘要》中指出：“对于地租问题很重要”（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俄文版第10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关于地租理论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在英国、爱尔兰、比利时、美国、俄国和其他国家农业发展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讨论，都是对《资本论》第三卷相应篇章极其宝贵的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涉及俄国状况的书信也具有巨大的科学和政治意义。马克思从1868年中期开始，就细心地研究俄国的文献资料。例如，他对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利林费尔德的《土地和

自由》一书发生兴趣，并要求翻译该书论述“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主要章节”（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在1868年1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了谢铎—费罗提关于俄国公社起源的观点（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对俄国状况的兴趣大大增长，是由于他在1869年秋得到瓦·瓦·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正如信中表明的，博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见本卷第421页）。从这时起，马克思开始加紧研究俄语（见本卷第412、694页）。看来，马克思也正是这时候决定基本上用俄国农业和土地关系的资料对自己的地租理论作重大的补充和解说（参看马克思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介绍马克思于七十年代研究的大量俄国文献资料时指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一步研究经济理论的同时，这几年还很注意《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行，他们竭力宣传该书的观点，促使将该书译成其他文字。恩格斯在1868年不仅给一些德国报纸写了关于这一卷的评论，而且还给英国资产阶级杂志《双周评论》写了书评。他同马克思就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商讨。从他们关于这方面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为了广泛传播《资本论》的思想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都提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和批评。这些书信在批判地评价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还简明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些极重要的原理。例如，马克思在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批判了欧·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并表述了他在《资本论》第一

卷中提出的、使他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一切以往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崭新思想(见本卷第11—12页)。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孚赫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1907年,列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指出:“我希望,每个开始研究马克思著作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97页)列宁的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一些谈到《资本论》的内容和方法的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和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力求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运动,认为直接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经济学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马克思在1868年5月23日告诉恩格斯,他向伦敦的德国工人作了关于工资的演讲(见本卷第92页)。恩格斯谈到有必要为工人写一本介绍《资本论》第一卷内容的通俗小册子(见恩格斯1868年9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说‘事情顺利’是指:第一,由于我的书而展开的宣传以及……它在德国工人中间获得的好评”(见本卷第554页)。马克思得到最初试图出《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的消息时感到欣喜。他给予《资本论》第一个法文译者凯累尔大力帮助(见本卷第622—62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很注意哲学问题。马克思在一些书信中批判欧·杜林与弗·阿·朗格轻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列宁说的,对杜林的这种批判,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九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97—98页)。马克思在1868年8月6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对于他的辩证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的区别作了经典性的说明:

“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见本卷第 526 页）1868 年 10 月至 11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了德国制革工人约·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的手稿，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认为，狄慈根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且独立地发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规律。1868 年 10 月 28 日，马克思谈到他看了狄慈根的手稿的直接印象时写道：“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天才的工人之一。”（见本卷第 564 页）

收入本卷的书信也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发展经常表示极大的兴趣。他们对这些领域内最重要的发现进行了研究。从马克思 1868 年 11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维也纳教授格·耶格尔和德国学者恩·海克尔著作中涉及的地球上的生命起源问题很感兴趣（见本卷第 193 页）。恩格斯在 1869 年 3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宇宙热寂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并指出这个假说给僧侣主义留下可乘之隙。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这个假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75—379、617、628—629 页）。

马克思在 1870 年 6 月 27 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朗格的《论工人问题》一书，朗格把达尔文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的生存斗争规律机械地搬运到人类历史中来，实质上，也就把这个规律变成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 1869 年 2 月 15 日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了严厉批判。

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 1870 年 3 月 5 日给保尔·拉法格

和劳拉·拉法格的信，批判了戈宾诺的《论人种的不平等》一书，无情地抨击了所谓“白种”人比“黑种”人优越的种族主义理论。马克思揭露了这些观点的阶级根源，强调指出了它们仇视人类的性质。正是这些观点以后在法西斯德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今仍是资产阶级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精神”来源之一。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妄图从思想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政策辩护的行为，是采取不调和的态度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研究理论问题和科学问题，同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通信的材料清楚地说明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真正领袖，也说明恩格斯对第一国际有过大力帮助。在此期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仍然支持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以及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罢工运动。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派警察，而且调动军队残酷镇压罢工者。国际上的团结一致成为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的极重要因素。曾经派代表到伦敦与总委员会委员商谈的日内瓦建筑工人取得胜利以后，马克思在1868年4月11日写信给恩格斯：“工人派使节到伦敦……这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厂主们信服伦敦的威力和战斗基金会了”（见本卷第59页）。组织对罢工工人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协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声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援助是克服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局限性的重要手段（见本卷第348页）。

马克思由于科学工作繁重和身体不好，不能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但是他直接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为总委员会起草了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个报告，并对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1868年9月10日给总委员会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格·埃卡留斯和弗·列斯纳的信，对总委员会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策略做了具体指示。

马克思对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具体历史形势下无产阶级对待战争问题的立场，也作了重要的指示，并揭露了即将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性质。他写道：“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但是，代表大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宣布反对战争，并揭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内战，它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对整个欧洲来说也是毁灭性的。”（见本卷第 54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把土地、矿井、矿山等等变为公有财产的决议的书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只有先进的工人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才有可能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根本问题列入国际的纲领。这些决议的通过，对整个国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这是社会主义原则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是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的失败。资产阶级报刊惶恐不安地谈论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制问题决议的共产主义性质，并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要求，同无产阶级在农村的同盟者问题，同小农私有制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正是按照这种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在 1869 年 10 月 3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无产阶级对待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问题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见本卷第 360—361 页）。恩格斯在 1869 年 11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并指出，农民并不都是一样的，除了剥削短工和长工的大地主以外，还有佃农、中农和小农。恩格斯确定了无产阶级对待农民各个阶层的不同的态度（见本卷第 362 页）。列宁在《1844—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中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对‘土地问题’是最重要的”（俄文版第 101 页）。恩格斯在 1870 年 2 月初写的《德国农民战争》再版序言中对他的这个思想作了更加详尽的阐

述。列宁在关于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必需的和最重要的前提的学说中，运用了这个思想。这个联盟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中的实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思想的真正的胜利，是这种思想的正确性的证明。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68—1870 年的书信中有关于总委员会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斗争历史的丰富材料；这些书信充实了马克思针对巴枯宁分子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破坏活动所起草的那些著名的总委员会文件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详细地讨论了总委员会关于对待 1868 年底试图钻进国际的巴枯宁分子的策略。恩格斯在 1868 年 12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有自己纲领和章程的特殊的国际性组织接收入协会。他写道，这会成为“国中之国”（见本卷第 220 页）。由此可见，当时国际的领袖已经识破了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控制国际，并使它屈从于自己的影响的阴谋的实质。马克思采纳了恩格斯上述信中的建议，并写进了他所草拟的总委员会的答复——〈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82—38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问题上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斗争。最有意义的是这两封信，马克思 1869 年 3 月 5 日给恩格斯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93—394 页）这封通告信的草稿；还有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19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这封信详细叙述了总委员会同阴谋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的斗争，并对巴枯宁纲领的基本论点作了全面的批判。马克思说明巴枯宁主义是敌视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宗派主义派别，它在理论上

是落后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指出，巴枯宁主义和它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热衷于假革命的蛊惑人心的空话，并指出巴枯宁的学说实质上是反革命的。

马克思认为巴枯宁分子关于废除继承权的处方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巴枯宁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真正联系。“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见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拉法格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到，要求废除继承权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这种要求“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见本卷第661—662页）。

马克思在揭露巴枯宁分子提出的“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的口号的实质时写道：“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见本卷第662页）

马克思揭露了巴枯宁关于无产阶级完全拒绝参加政治斗争的说教是站不住脚的。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见本卷第662页）巴枯宁分子要求放弃政治斗争，是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阻碍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阻碍阶级觉悟的提高和政党的建立，阻碍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巴枯宁分子的观点是在根本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书信阐明了马克思所写的总委员会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465—479页）的产生

经过。这些通告信在揭露巴枯宁主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书信，在本卷占有很大篇幅。六十年代末，由于马克思所领导的总委员会的灵活而巧妙的策略，在德国宣传国际思想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克思从国际建立时起就在国际中担任德国通讯书记职务，他同德国无产阶级有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奠定的革命传统，国际的全部活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他们的拥护者所进行的斗争，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群众中的传播，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扫清了道路。

德国工人为建立自己的政党的斗争，同为解决民族问题和为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统一德国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随着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和1867年北德意志联盟的建立，国家已在普鲁士的统治下通过反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大体上统一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下列任务：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利用新的条件使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同时加强对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主义是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收入本卷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领导德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派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怎样对待拉萨尔派的，怎样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义纲领和策略的。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中谈到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了某种积极作用，指出拉萨尔促进了工人阶级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指出，拉萨尔从一开始就使工人运动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的纲领和同这个纲领紧密联系的机会主义策略，使工人阶级丧失革命的前途，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见本卷第557—558页）。

从给施韦泽的这封信中以及其他许多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在1868—1870年同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弗里茨等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些人力图使工人运动屈服于反动的俾斯麦政策，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散布拉萨尔关于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

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机会主义的分裂策略，指出这种策略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了恶劣影响。马克思坚决谴责施韦泽所组织的造成德国工会分裂的柏林代表大会，谴责施韦泽的反民主的领导方法和组织工会联合会的原则。马克思向施韦泽宣布，他所建立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们对拉萨尔主义者的宗派主义立场的系统批判，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和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消除。马克思非常满意地指出，先进的工人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确信拉萨尔主义的教条是站不住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们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实质上不得不放弃拉萨尔主义的一些论点；例如，马克思在1868年8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谈到这一点（见本卷第134页）。马克思在许多书信中都谈到工人对拉萨尔联合会首领失望了，他们渴望建立统一的德国工人阶级队伍。

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策略针锋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了德国工人的革命活动，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国无产阶级中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他们提建议，指导他们的实际活动，支持他们同拉萨尔派的斗争。李卜克内西虽然正确地理解到，在对反动的普鲁士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人民党合作，可是往往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正因为这样，李

卜克内西的行动有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评，这种批评促使德国工人领导人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方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基本问题上所采取的革命立场，对于在德国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斗争起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1868年7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1868年9月在纽伦堡即将召开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他们已经保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接受我们的纲领”（见本卷第121页），这就是很大的成就。

1869年社会民主工党（它实际上是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胜利，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在理论、策略和组织这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同拉萨尔派的观点和拉萨尔派的实践针锋相对的立场。

社会民主工党在短时期内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力量。恩格斯在1870年4月28日给该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的信中谈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就和党的成长，他写道：“在德国事情进展的迅速是出乎意外的”（见本卷第667页）。

收入本卷的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前夜，是多么注意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868—1870年强大的罢工浪潮和许多政治示威表明了国内革命情绪的增长。马克思在1870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去年6月以来巴黎的激昂情绪在不断增长……工人阶层中的妇女怒不可遏，而你知道，这在巴黎意味着什么。”（见本卷第420页）

法国政府企图用大规模逮捕来扼杀革命运动，挑动人民群众过早地发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及时地识破了拿破仑第三的阴谋诡计，他们认为只有在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时才能推翻帝国（见本卷第195—196、418页）。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国际总委员会作了大量工作，揭露了法国

警察局的挑衅(见本卷第 480—483、485 页)。

马克思对所谓的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冒险行动极为不安。该支部号召暗杀拿破仑第三,因而给法国警察局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家提供了借口(见本卷第 109—110 页)。由于马克思的坚持,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以及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问题通过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52、485 页),声明同这种挑衅行为毫无关系(见本卷第 123—124、480—481、567—569 页)。

残酷的迫害,特别是 1870 年 6 月 22 日到 7 月 5 日在巴黎对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成员进行的第三次审讯,反而更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声誉,并“把是帝国还是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变成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见本卷第 50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来消除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宗派主义影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在第一次发表的 1870 年 4 月 18 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特别提醒法国领导人要防止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19 日给拉法格的信实质上带有党的文件的性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要求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防巴枯宁派在国际内的破坏活动。

马克思与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和保·拉法格经常保持联系并指导他们的活动。保·拉法格于 1868 年秋移居巴黎,六十年代末,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从组织上加强国际的法国支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拉法格的积极参加下,1870 年 4 月建立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并出版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正确法文译本,而在此以前,法国流传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是被蒲鲁东主义精神歪曲了的译文。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见本卷第 65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六十年代末关于法国的所有书信，都充满着对新的革命浪潮的期待，他们十分喜悦地看到“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见本卷第 58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经常关心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和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里对英国改良主义的工联首领作了批判的剖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 1868 年议会选举即 1867 年选举法改革实施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工人候选人的失败是合乎规律的。他们认为，这次挫折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是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内部除了革命倾向以外，还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体现者就是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影响既表现在英国工联主义的右派首领的妥协主义立场上，又表现在他们的沙文主义立场上。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选举失败迫使某些参加总委员会的伦敦工联首领承认马克思批评的正确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必须独立行动，必须反对把工人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庸（见本卷第 192 页）。

许多书信说明了国际工人协会与工联主义报纸《蜂房报》决裂的经过。从 1864 年 11 月 22 日起《蜂房报》成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但实际上它采取妥协主义的立场，在发表协会文件的时候按照改良主义精神故意隐瞒和歪曲文件的内容（见本卷第 373、393、394、474 页）。马克思认为，同《蜂房报》的决裂，在纲领中要求土地国有化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的建立，是英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监护的标志，是能够导致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步骤（见本卷第 360—361 页）。

从马克思的一系列书信中可以看出，在这几年他把英国的革命前途同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人民的解放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在爱

爱尔兰出现了革命形势。爱尔兰问题开始对英国本土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的书信里详细阐述了1869年秋天根据马克思的倡议在总委员会内讨论爱尔兰问题的过程（见本卷第369、372—374、387—388、390—392页）。马克思曾期望讨论继续下去，并由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来阐述英国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观点（见本卷第369、398页）。

然而由于病重，1869—1870年的整个冬季，马克思实际上不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所以未能以这种形式实现原订计划。但马克思的观点在总委员会的其他文件里，例如在《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5—479页）以及给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里，都有反映。在这些书信和文件里，马克思详尽地阐述了他在1867年第一次提出的思想：废除对爱尔兰人民的殖民地奴役，给予爱尔兰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是英国本土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阐明了爱尔兰的解放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意义。他指出，目前英国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所以，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必须“使爱尔兰独立”（见本卷第656页）。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堡垒。土地贵族权力的基础是对爱尔兰农民进行半封建剥削。对爱尔兰进行殖民地奴役，这也是另一个统治阶级即英国资产阶级的利润、经济力量的源泉。爱尔兰工人被迫同意任何一种工资，从而使英国工人降低生活水平。这就引起了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分裂，并在客观上加强了资本家的地位（见本卷第655—656页）。摧毁英国的大地主和金融工业资产阶级在爱尔兰统治的基础，就是给予英国本土上的这两个阶级以最沉重的打击，从而在那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爱尔兰的解放对于

英国工人阶级本身首先是必要的（见本卷第 646、654—656 页）。恩格斯也写道：“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见本卷第 359 页）马克思在 1870 年 3 月 5 日给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扼要地阐述了爱尔兰问题新提法的实质：“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见本卷第 646 页）

马克思坚定地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在没有取消 1801 年的强制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见本卷第 625 页）。列宁指出：“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见《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43 页）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必须进行反对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列宁认为，这一思想是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和策略。他们所提出的给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决权的原理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基础。

通信材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注意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指出它的弱点和优点。他们完全了解，芬尼亚运动领导人对待自己唯一可靠的同盟者——英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立场，不仅是由于不了解事情的真象，而且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首领们“为了维持他们对农民的统治”而处心积虑地制定的策略（见本卷第 39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论证国际的立场，深入地研究了爱尔兰人民的历史。马克思摘录了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爱尔兰的历史材料。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他研究这个时期革命事件得

出的最重要结论(见本卷第398—400页)。恩格斯曾经打算出版一本论述爱尔兰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的专门著作。通信材料反映了恩格斯准备这一著作的经过。但是,1870年夏季爆发的普法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巴黎革命事件,使恩格斯不可能完成他打算写的著作。

马克思是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总委员会通讯书记,他在同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代表通信时,向他们提出的斗争任务是:争取美国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团结,争取在爱尔兰工人、德国工人和讲英语的工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见本卷第658页)。马克思高度评价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他曾为克服美国工人运动中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分散主义而斗争(见本卷第348页)。

本卷发表的书信还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心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俄国革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多年经常的通信,是从马克思写信给尼·丹尼尔逊商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问题而开始的(见本卷第551—55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受到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培养的一些俄国革命青年建立了联系。1870年3月,马克思同意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他多次提到俄国支部在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见本卷第461、665页)。

马克思对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浓厚的兴趣,对俄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城乡最广泛的各劳动阶层将是这个革命的主要参加者(见本卷第646、428页)。马克思在1870年3月5日给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写道,“这是好消息”。马克思深信,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俄国沙皇制度的被推翻,将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末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英国和俄国的革命力量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欧洲社会改造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条件。

收入本卷的书信，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传记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是伟大友谊的动人文献。这些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谦虚，讨厌对个人的赞扬，讨厌自高自大和装腔作势。马克思在1870年2月1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过分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之间，他们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是如何关心，如何友爱；他们在困难时刻曾如何帮助杜邦、列斯纳、洛帕廷和其他许多人（见本卷第504、509—513页）。

在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友和朋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弗·列斯纳、卡·沙佩尔、厄·琼斯等人也有评价。还有新一代的革命家：法国医生和政论家保·拉法格，法国人种学家、英勇的格·弗路朗斯，机智勇敢因而受到马克思称赞的俄国自然科学家和革命家格·洛帕廷，年青的奥·倍倍尔，德国的化学家和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莱马，英国律师、第一国际会员、《资本论》第一卷后来的译者赛·穆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英国地质学家达金斯，德国医生路·库格曼等等，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评和尊敬。这些人都热烈同情工人阶级，并力所能及地参加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说明，他们在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中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具有英勇精神和深刻的人道主义。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的十四封信，其中有七封曾在外国刊物上用原文发表过。另外七封信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手稿第一次发表

的。马克思的这几封信是：1868年10月30日给巴索的信，1868年12月12日给阿舍尔公司的信，1869年2月15日给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1869年6月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69年7月10日给弗·拉法格的信，1870年2月23日给彼·伊曼特的信，1870年3月5日给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第一次发表了恩格斯在1868年写的一篇开玩笑的〈自白〉。本卷还发表了马克思夫人燕妮、他的女儿劳拉与燕妮的几封信。这些信通常都是受马克思的委托而写的。马克思·燕妮给约·菲·贝克尔的信（见本卷第677—680页）是第一次发表的。

本卷中第一次发表的这些书信，包括附录材料在内，对说明马克思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形势等一系列最重要问题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它们补充说明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历史，提供了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1870年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新材料。它们对以前发表的同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的传记资料是重要的补充。

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20日至1874年12月所写的书信。这几年来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的开端。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确定向新时代转变的历史分界线，由于这一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巴黎公社，即“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4页）。在社会和政治冲突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有提高，他们在民族范围内以及国际范围内采取了团结一致的行动；各国工人群众都为保卫巴黎公社而斗争。

巴黎公社的革命化影响，第一国际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学生和战友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规模扩大了，在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中，逐渐克服了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在公社以后，开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成立了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未来的战斗，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缓慢地但始终不断地聚集起来。

七十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工人运动的策略和组织原则继续发展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的著作——《法兰西内战》（1871年）、《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论住宅问题》（1873年）和其他著作——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国家、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关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方面的理论活动在他们的书信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书信揭示了他们的创造性思想的发展和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事件进行分析的辩证方法,也说明了对待工人阶级策略问题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生动地阐述了工人运动和国际政治的所有迫切的现实问题,他们以天才的洞察力确定了已经开始的新时代的基本特点、它的历史内容和基本趋向。

尽管国际总委员会的日常组织工作非常繁忙,但马克思还是继续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经济学说。1870年,他利用大量的新材料,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完整的第二个稿本的准备工作。但是,马克思对这个经过周密加工的稿本也仅仅看作是定稿的基础。以后几年,马克思直接从事《资本论》以下各卷的工作主要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而被中断。

马克思竭力使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各国工人的财富,他非常注意《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出版和把它译成外文的工作。这一版本于1872—1873年在汉堡出版,它同第一版有重大的区别,结构更加完整,有些章节经过仔细的校订,同时对正文和注释作了大量的增补。马克思在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科学意义。

马克思直接参加了俄文版的准备工作,俄文版一般地说来是《资本论》第一种外文译本,他对这个译本给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喜悦写信给该书的俄文译者之一丹尼尔逊说,“翻译得很出色”(见本卷第478页),并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说,从《资本论》在俄国出版那天起的一个半月期间,就售出了将近印数的三分之一。从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以下各卷

的材料时，由于考察地租问题，专门研究了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关系（见本卷第 549、577 页）。

在准备法文版时（1872—1875年），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版是作为经作者赞同的法译本而出版的，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它同德文原文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通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工人报纸上发表《资本论》的单独章节，认为这是宣传革命理论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见本卷第 208 页）。

在这期间，恩格斯开始撰写杰出的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 1873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见本卷第 82 页）。这封信中有《自然辩证法》的构思，他打算对自然科学的成就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在 1873 年下半年和 1874 年全年，恩格斯为这部著作收集材料，并写了这部未来著作的一些片断。

同以前各卷相比，第三十三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来往书信数量不多。因为恩格斯于 1870 年 9 月终于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他们有经常见面的机会，他们持续了几乎二十年的经常不断的通信也就终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书信专门论述了普法战争，这次战争对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对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首先阐明了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定于普法战争在不同阶段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使我们有可能探溯他们是怎样制定工人阶级在战争期间的策略路线的。在他们的书信中最初作出的结论，后来通过国际的宣言、报上的文章，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的书信，成了无产者群众的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担心法国和德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国际的法国组织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能否顶得住统治阶级所掀起的沙文主义的浪潮，能否站在真正的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立场上。他们特别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因为正象马克思 1870 年 7 月 20 日所写的，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就已出现欧洲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它的重心向德国转移的趋向了（见本卷第 5—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战双方谁胜利合适的问题，完全是根据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来考虑的。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当德国方面具有防御性质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作出结论：“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见本卷第 41 页）。根据这种设想，并考虑到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就暴露出来的侵略意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不要让防御战争变成侵略战争。

1870 年 8 月，由于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们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之间在对战争的估计和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的立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委员会委员们请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马克思在答复之前，先征求了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在 1870 年 8 月 15 日的信中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最初阶段的任務，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人可以：（1）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3）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4）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媾和；（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见本卷第 42—43 页）。

马克思在1870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写道：“你的来信和我已考虑好的答复方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没有事先和你商量，我是不愿采取行动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见本卷第4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策略路线，后来在给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提出来了，并作为行动的指南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接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2—284页）。

1870年9月4日在法国建立共和国以后，从德国方面说来，战争带有公开的侵略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确定了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第二阶段的任务，并在许多书信中加以阐述。马克思在揭露统治阶级的侵略计划及其外交家们的活动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意见：“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见本卷第132页）。

马克思竭力使参加国际的工人积极影响其本国政府，不让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实现侵略计划，并迫使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马克思在1870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把这里的一切都开动起来了，以便工人（星期一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迫使其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见本卷第62页）他于9月14日告诉恩格斯说，他已就这个问题向比利时和瑞士以及合众国发出了“详尽的指示”（见本卷第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库格曼、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系统地研究了有关这一阶段的战争的各种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他们揭示了各种类型的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侵略战争的特点，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立场。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光荣地经受住

了严重的政治考验。马克思写道：“在德国，国际协会所属的工人确实激烈地反对了俾斯麦的政策，所以俾斯麦……下令把国际的德国主要代表非法逮捕并囚禁在普鲁士的要塞内。”（见本卷第279页）

在国防政府和俾斯麦签订停战协定以后，马克思立即在1871年2月4日写给库格曼和拉法格的信中揭示了法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真正原因，揭露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叛卖立场，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私利而牺牲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宁肯缔结可耻的和约，也不让劳动群众武装起来。马克思感叹地说：“这就是不仅在巴黎而且在法国各地遭受失败的真正秘密。”（见本卷第180页）他坚信，只有革命群众才能使法国得救，除非法国能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有革命措施和革命毅力”（见本卷第18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第二帝国垮台以后在法国广泛开展的人民斗争。马克思深信，对侵略者进行真正的人民抵抗是坚不可摧的。他嘲笑德国资产阶级代表们胡说什么人民无“权”进行游击战争。马克思指出，真正的霍亨索伦的观念才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彻底消灭，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见本卷第168页）。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很大一部分书信，是直接有关战争的进程的，这些书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贡献。这些书信无论对个别战役以及对军事行动的总进程都有深刻评价。根据对法国和德国武装力量的状况的分析，恩格斯在1870年7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断定第二帝国必然失败。这种判断还基于对第二帝国的整个制度和拿破仑第三的整个内外政策所作的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恩格斯在一些信中非常准确地预测了战事的可能的进程。

恩格斯是精通军事艺术和军事史的专家，是军事理论家，他遵

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紧密结合现存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交战国家的状况，结合各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去考察战争。从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可以看到他的杰出的军事论著《战争短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巴黎公社的书信在本卷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在巴黎革命战斗的日子里写的书信，非常有力地表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善于洞察和估价当时事件的性质、它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政治后果。这些书信不仅评述了巴黎的革命事件，而且创造性地探讨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学说的重大问题。

从巴黎公社诞生的最初日子起，马克思就看出，巴黎公社的真正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根据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经验，回答了1848—1849年革命以后提出来的问题：工人阶级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革命打碎了的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是他最出色的书信之一，对这封信列宁是这么说的：“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1页）。在这封信中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主要结论：“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见本卷第206页）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例子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激发无产阶级群众空前的创造性毅力，充分发挥他们潜在的巨大创造力。他热情赞扬了巴黎工人所表现的勇敢、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巴黎工人在普鲁士的封锁和数量占优势的凡尔赛反

革命匪帮疯狂攻击的非常困难条件下，创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并且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社会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冲天的”巴黎公社社员们的英勇精神和革命创造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由于公社的建立终于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公社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国家的样板，无产阶级应当在旧的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这种国家，并且应当把它用来作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

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认为巴黎公社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和科学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在实践中的实现。马克思自豪地写道，公社“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见本卷第207页）。马克思指出了公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宣告者的意义。他在1871年4月1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见本卷第210—211页）

正因为公社代表了全世界工人的利益，所以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瞒公社社员的任何错误。他在一些书信中批判地研究了公社社员的活动，以便从这种分析中吸取无产阶级为将来革命战斗所必需的教训。但是，马克思在批评公社的错误时，丝毫也没有贬低公社社员事业的伟大，从来也没有认为他们盲目地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库格曼曾经怀疑巴黎工人在没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举行起义是否适当，马克思在写给他的信中驳斥了类似后来机会主义者为了掩饰自己怯懦地放弃革命的行为而散布的说法。马克思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见本卷第210页）

马克思的书信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直接帮助过巴黎公社社员；他通过他所委托的人（其中包括俄国革命家伊·鲁·德米特里

耶娃)与公社领导人保持了联系。马克思在给公社活动家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提出了他认为必须实现的革命行动计划；他把俾斯麦和法夫尔的秘密勾结告诉了公社社员，警告他们防备即将对巴黎的进攻。马克思不久以后写道：“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见本卷第229页）

梯也尔政府和各国统治阶级力图用一道诽谤和谎言的墙壁把公社包围起来，并且恶意歪曲公社的一切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向各国工人解释公社的真正性质是自己的革命职责。他们唤起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对公社的注意，向他们阐明了在巴黎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1871年5月13日写信告诉弗兰克尔和瓦尔兰说：“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见本卷第226页）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广泛利用了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书信的理论宝库，指明这些书信对于在世界工人运动发展的新条件下反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开展了极为有效的活动来援助公社社员，当时这些社员或者为了逃避迫害而在法国隐藏起来，或者流亡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而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书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家庭成员非常注意和关心对于公社社员的援助，往往简直是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巴黎公社是国际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是国际历史新阶段的起点，它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工人协会

中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它促进了国际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在世界各国新组织的产生。同时，公社暴露了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是与工人运动的利益根本相敌对的；对于公社的估价和态度成了判断各种流派及其首领的真正性质的标准。巴黎公社使得在国际中革命派同无政府主义派和改良主义派划清界限成为必不可少的事。

收入本卷的书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发展的新阶段即结束阶段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人不断增多。其中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杰出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约·菲·贝克尔、弗兰克尔、左尔格、波尔特、拉法格、德·巴普、库诺、库格曼、吴亭等许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国革命活动家的联系加强了。现在已经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同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澳大利亚等地的工人运动代表也有书信往来，虽然这些书信至今尚未找到。

书信往来的增加也同1870年10月恩格斯被选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有关。这些书信反映了恩格斯担任总委员会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通讯书记时的活动，并证明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恩格斯的书信展示了他移居伦敦后的生平历史的新篇章。这些书信表现了恩格斯作为工人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卓越才能。

由于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巴黎公社以后工人报刊在反动势力猖獗的环境下所遭受的重重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国际活动家的书信具有特殊意义。在许多场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人书信实际上代替了协会的正式文件。书信的片断常常在支部和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有时并以文章和通讯的形式在工人报纸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是他们在国际内进行宣传工作的一种极重要形式，也是在协会各组织内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真正论战性作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在巴黎公社以后的一项极重要任务是以国际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把公社的教训固定下来，为在国际各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各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1871年9月召开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总结了公社的教训。代表会议指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而这个政党的目的应当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代表会议的决议沉重地打击了当时阻碍革命工人运动发展的无政府主义，打击了英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工联主义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寄往各国的书信中十分注意阐述这些决议的意义，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意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马克思写道：“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见本卷第33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指出了吸引雇农和小农参加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巨大意义，发展了关于区别对待农民的原理（见本卷第244—245、267、429页）。

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为争取工人运动的统一、巩固国际各组织、加强各组织内部的纪律和集中而斗争。在这方面，马克思于1872年3月21日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写给拉法格的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写道，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是获取胜利的极重要条件；“目前，毁坏我们的组织就等于放下武器”。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项保证工人运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极重要组织原则，即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原则（见本卷第435—43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拒绝服从多数

的少数人，就是自己脱离工人运动的行列，脱离工人组织（见本卷第 566—567、584—585 页）。

为了宣传公社的经验教训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不得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其他宗派主义分子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在国际历史的前几个阶段中这些人已在思想上被击溃，但还继续坚持那些被工人运动的实践本身所摒弃的教条。这时他们同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分歧也十分尖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充分地反映了这些斗争。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业无产阶级不甚发展的国家尚有相当影响，他们在巴黎公社以后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 年 11 月）上拒绝承认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从而走上了公开分裂国际的道路。无政府主义理论否认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从思想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给无产阶级运动带来了混乱。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统一来对付反动势力，必须消除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并彻底揭露他们的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这些书信深刻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揭露了那些以假革命的词句掩饰冒险主义策略和破坏行为的宗派主义者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宗派主义是阻挠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它是由于工人阶级个别队伍的思想幼稚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的特点是：教条主义、唯意志论、忽视斗争的实际条件、以空话代替真正的革命活动、用左的词句进行投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宗派给工人阶级所

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些宗派企图在国际工人协会这个群众性工人组织内部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混乱的”和“粗制滥造的”纲领来偷换协会的全面纲领。恩格斯写道：“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恩格斯接着批判巴枯宁的观点说：“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见本卷第390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政府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说教，是完全违背国际关于工人阶级把夺取政权作为社会解放的手段的纲领性原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任何权威”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们在著作里展开这一批判以前，就在书信里先作了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否认权威本身的幌子下，鼓吹绝对的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否认建立革命的国家政权和有纪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库诺等人的信中，嘲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权威主义”，认为它是一派响亮的空话，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给工人阶级不成熟的阶层在理论上带来的危害。收入本卷的一些给拉法格的书信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极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1871年12月30日给拉法格的信，实际上是后来《论权威》（1873年）一文的初稿，列宁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曾广泛地利用了这篇文章。

恩格斯写道：“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

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36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书信是对他们的主要著作的重要补充。

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得到比利时蒲鲁东主义者、英美改良主义者、拉萨尔派和其他无产阶级敌对分子的代表人物的支持。1872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要解决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马克思在1872年7月2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这次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见本卷第503页)。

海牙代表大会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的。国际章程中列入了新的条文,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在各国建立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确定了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同时也规定了工人运动今后的道路是建立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以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还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无政府主义的首领们(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极重要条件。恩格斯在指出这一点的意义时写道: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成就的主要前提之一就是工人运动的组织中清洗“腐败分子”(见本卷第59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工人活动家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他们如何“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某些国家工人运动的书信中对各种事件的分析和结论,是辩证地解决无产阶级队伍所面临的特殊任务的典范,是认真而科学地考虑无产阶级运动的普遍规律和具体发展的特点的典范。这些通信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善于确定主要任务和指出

解决这些任务的方针，善于分析各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并揭示这些事件的政治意义。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美各国正在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的团结和思想上的巩固给予多么巨大的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在1870年夏所做的工人运动中心移向德国的预言。巴黎公社以后，党所领导的德国无产阶级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和书信里经常宣传这个在当时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经验，并竭力使这个经验成为其他国家工人的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代表人物在德国反动派所策划的审判期间所表现的英勇行为引为自豪，并勉励他们，帮助他们经受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从组织上加强社会民主工党，使它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同时还竭力使它的观点保持思想上的纯洁，不受机会主义的影响。从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派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而写的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论住宅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恢复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警告他们要防止同拉萨尔派搞无原则联合的倾向，要防止在纲领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作思想上的妥协和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条路线在他们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一些书信，其中包括恩格斯1873年6月2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都有所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在英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并且认真地考虑了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

出，英国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促使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这个时期愈来愈受工联主义思想的影响（见恩格斯1872年12月30日给赫普纳的信，马克思1874年5月18日给库格曼的信）。因此必须不断加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必须加紧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建立一个能够针对自由派工人政策而贯彻革命路线的群众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英国的工人运动，从而孤立了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吸引了广大无产者群众，特别是未受工联影响的工人来参加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秋建立的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寄予很大希望，按他们的设想，该委员会应当成为未来工人政党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不列颠联合会中竭力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斗争只限于为争议席的斗争的改良派，并揭穿了工人阶级所谓的“公认领袖”，他指出“所有这些人现在或者是已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或者是企求人家来收买”（见本卷第476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这种批判具有很大意义，并且不止一次地引用恩格斯1872年9月21日和10月5日给左尔格的两封信中说明国际英国各组织中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尖锐斗争的片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书信是关于国际在美国的历史的重要史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支持美国支部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同那些力图攫取国际各组织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斗争。他们经常不断地帮助革命分子，这从给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弗·阿·左尔格的一些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国际美国支部领导人把美国工人吸引到协会队伍中来，并且警告他们不要脱离广大群众，不要有宗派主义的关门主义。马克思给施佩耶尔的信中写道：“你们无论如何应当尽力争取工联。”（见本卷第324页）马克思在1871年11月23日给波尔特的信中，指明

了在美国建立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道路：“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见本卷第 337 页）

由于公社的失败和随之而来对国际会员的迫害，在法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人数急剧减少了。残酷的迫害，使工人组织包括国际工人协会一些支部遭到破坏，使工人运动进入暂时的低潮。虽然公社给了蒲鲁东主义以及巴枯宁主义者的宗派主义观点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还要进行从理论上教育工人群众的细致而耐心的工作。一批流亡的公社社员参加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从思想上教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有很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怀备至地帮助法国社会主义者克服小资产阶级观点。同时他们批判了布朗基主义者，因为这些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七十年代的法国的现实条件，散布对工人运动有害的唯意志论。

马克思对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他在 1874 年 8 月给左尔格的信就是证明。马克思写道：“在法国，工会在各大城市都组织起来了，并且相互取得了联系。它们只限于完成纯职业上的任务，不过，也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毫不客气的查封。但是，工人们却从而得到一种组织，这是重新有可能自由地开展运动的时期的起点。”（见本卷第 637—638 页）在七十年代末法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工人党的建立，从而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测。

本卷的内容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运动的帮助。他们同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运动的联系，是在同西班牙和意大利无产阶级一定阶层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

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一斗争的主要重担由恩格斯肩负，因为他是总委员会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

恩格斯同意大利革命者的通信，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典范：既同资产阶级共和派(马志尼主义者)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作斗争，又同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作斗争。恩格斯认为他的基本任务就是同工人群众特别是同这个国家北部工业区的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在那里成立国际支部(见本卷第325页)。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菲埃罗的书信，是在意大利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范例。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探讨了重要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和根据意大利条件组织群众斗争的问题。恩格斯在1871年7月28日的信中对马志尼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批判，指出它是“庸俗的民主”派别之一，它力图给予工人某些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见本卷第268页)。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一些信中首先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观点，证明这些观点是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根本对立的。

恩格斯给德国社会主义者、国际米兰支部创始人泰·库诺的书信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这些书信全面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信条。恩格斯给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帕拉迪诺、博维奥、伯特、巴尔托列里等人的书信，说明了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上的纯洁性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为了反对把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同它的国际任务宗派主义地对立起来，恩格斯发表了一个重要见解：“在工人运动中，真正民族的思想，即符合在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济因素的思想，同时也总是真正国际主义的思想”(见本卷第444页)。

恩格斯对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宣传，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斗争，对于在意大利形

成独立的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187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建立了联系。1871年12月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为了逃避法国警察当局的迫害移居马德里以后，这一联系更加强了。1872年夏天，拉法格揭露了西班牙有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国家特别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书信（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的）不仅明确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而且包含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优秀代表人物的影响，西班牙一批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涌现出来并团结起来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领导下，宣传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并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书信中对他们的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对教育西班牙革命者起了巨大的作用，为西班牙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克服工人阶级所不容许的影响准备了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加强同俄国革命活动家的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高度评价俄国的革命流亡者，把他们看成自己的战友。恩格斯写道：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青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见本卷第488页）。

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的俄国通讯书记，同瑞士的国际俄国支部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依靠支部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帮助支部的成员比较明确地认清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分歧的实质。马克思经常把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歧的实质告诉国际俄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尼·伊·吴亭，同时从吴亭那里获得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的必要消息。

马克思同丹尼尔逊的通信以及恩格斯同拉甫罗夫的通信，很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革命活动家的联系。马克思在当时已经掌握了俄语，这就使他便于了解俄国的学术著作、社会政治著作和俄国的现实，使他能更深刻地研究俄国社会和政治发展问题（见本卷第177—178页）。马克思通过丹尼尔逊把总委员会的文件发往俄国，并取得必要的材料。马克思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对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极为尊重，这时马克思正仔细研究他的著作。马克思从丹尼尔逊那里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的手稿后，曾打算把它发表。他在叙述他对这一著作的印象时写道：“稿子很有意思。”（见本卷第548页）1873年初，马克思告诉丹尼尔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很多著作他都知道（见本卷第560页）。马克思打算发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见本卷第549页），他请丹尼尔逊寄去必要的材料；但是由于缺乏这类材料，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马克思同丹尼尔逊的通信使我们能够回顾《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准备和出版的经过；马克思的书信表明，他多么重视他的主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他多么密切地注视这一工作的进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国革命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格·亚·洛帕廷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们对他评价很高，在他居留伦敦期间经常同他会面。当洛帕廷到西伯利亚去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而遭逮捕时，马克思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对此表示焦虑。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写道，“我们亲爱的‘共同的朋友’的遭遇使我全家焦急不安”，他还说他正在设法援助洛帕廷（见本卷第54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注意它的每一步的进展。他们坚信俄国人民的革命必然胜利，这个革命将要根本改变欧洲和全世界的形势，有助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在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逐渐退出舞台,让位于新的工人联合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73年),以及他们写给战友左尔格、李卜克内西、库格曼等人的信(1873—1874年),都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停止活动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他们仔细研究了1873年秋天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特点和条件,他们的结论是,国际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的运动正在超越自己原有的组织形式——国际工人协会,因此,首先必须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各个国家组织成独立政党。无产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必须立足于各个国家中同广大无产者群众相联系的、在科学共产主义旗帜下前进的社会主义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为创建这样的政党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1873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见本卷第608页)恩格斯也作出了这个结论。他在1874年9月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见本卷第643页)恩格斯坚信,工人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将在更广泛和更坚固的基础上,在各国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得到实现,这一信念在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完全得到了证实。恩格斯写道:新的国际将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见本卷第644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了国际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见本卷第644页)。

列宁也不止一次地指出国际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认为

它是第一次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向资本作斗争的国际大军的组织。列宁写道，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国际的活动，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而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了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国际初步实现了把科学共产主义同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居领导地位的时代的到来做了准备，为工人的国际团结奠定了基础。它建立了牢固的国际联系，这种联系直到国际工人协会停止活动以后还在继续发展和巩固。联结现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以前各个发展阶段的线索开始于第一国际。早在1874年，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就表示过这样的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见本卷第644页）。第一国际的传统、思想和经验已为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继承、发展和丰富。国际工人协会是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荣的历史先驱。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鲜明地反映他们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进行了规模巨大和多方面的斗争。同时，这些书信提供了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之间的伟大友谊和他们同各国革命工人运动杰出活动家的亲密友好联系的极珍贵的传记材料。收入本卷附录中的马克思家属的书信补充了这些资料，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的夫人和女儿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运动。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就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刻来说，是研究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时代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史、工人

运动史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活动的极好史料。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大量书信(六十一封)；其中有二十七封是第一次发表的，十八封最初曾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过，十六封曾在苏联期刊上发表过。全集中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十四封信，以及恩格斯给意大利社会党人卡菲埃罗的信，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书信不仅提供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活动方面的极丰富资料，而且包括了他们在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阐述的一些极重要的论点。马克思给德国民主主义者奥斯渥特的信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法战争时期的立场。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马克思的夫人及女儿燕妮和爱琳娜受马克思委托写的十三封信，李卜克内西受恩格斯委托写的一封信。在《附录》部分中，有四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其余五封第一次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至1880年期间所写的书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属于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这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开始的。当时工人运动进入了慢慢聚集力量、准备和逐步走向社会革命的阶段。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它开创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新阶段。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初次实践经验证明：没有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之上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一些国家建立这样的政党的任务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

七十年代中期，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逐渐退出舞台，让位给工人联合的新形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正在形成。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正在胜利地发展，在法国正在创建。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丹麦、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或者正在诞生，或者正在形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力量进一步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原理，为争取科学共产主义在上述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胜利而斗争。他们为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政策和策略，对各种空想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持续地无情地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所写的书信，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加紧研究革命理论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恩格斯在1876年11月20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特别明确地谈到了这一任务：“马克思和我两个人，应当完成一些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迄今我们看到，任何别的人都不能甚至也不想去写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个平静时期来完成它们。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从而把我们重新投入实际运动当中去；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利用这一短暂时间，在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见本卷第210页）

在这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一定的分工，马克思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恩格斯则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他们两人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通告信》这样一些著作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也作了重大的发展。整个这一多方面的理论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同其他人之间的通信中，都有一定的反映。

这一时期马克思科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问题，主要的是地租理论（尤其是关于俄国土地关系方面的资料）和社会产品的实现的理论。马克思经常收到并详细研究大量论述俄国和美国经济情况的书籍和官方文献。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年……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另一封信中指出，从俄国和美国得到了大批资料，使他能继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而不是将尚未发表的《资本论》手稿最后加工好付印（见本卷第333、347页）。

1875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大量准备工

作。1877年初，他又着手准备《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付印工作。在此以后，马克思为了体现他的新的研究成果，对《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某几章，其中包括理论上非常重要的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那一章原稿进行了加工，重新写了四稿。马克思的这些最后的手稿，在他去世以后，已由恩格斯在准备付印《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第一次出版）时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8—9页）。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及时揭示社会发展的新趋向，首先是揭示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新趋向。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时在欧洲先进工业国家，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和美国），这次危机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末，引起了垄断组织的急剧增长。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它完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他们阐述了关于这个新现象的实质和历史意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马克思在1875年6月18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见本卷第139页）。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揭示了英国新的经济危机的重要特征，阐述了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在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铁路“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见本卷第347页）。

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者之一威·白拉克精辟地阐述

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的意义，这一阐述就是具体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新的经济事实的范例。恩格斯对片面地夸大国家垄断在经济上的相对的进步性提出了警告，他这样提出问题：“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两种意义和两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恩格斯指出，历史上进步的国家垄断，不是那种纯粹出于统治阶级财政和政治考虑而创立的，而仅仅是那种由于迫切的内在的经济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垄断（见本卷第306页）。恩格斯第一次在他的书信中阐述的这些原理，后来又进一步加以发挥，成了他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的读者的财富。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是同《自然辩证法》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有了撰写这部重要著作的打算。正如收入本卷的书信所表明的，1876年夏季以前，恩格斯就差不多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计划，1878年夏季，这一计划已经最后定了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俾斯麦政府这时正在准备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思想斗争在德国非常尖锐，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问题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1876年10月7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意义（见本卷第194页）。

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也很重要，《自然辩证法》中有一段几乎同这封信是一样的。恩格斯在这封信里阐明了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对有机界发展的理论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这一公式是有局限性的，针对这一公式，他提出了自然界的物体和有机体的相互作用的概念。恩格斯指出，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企图把动物界的规律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这是不能容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自然科学的成就，因为自然科学是人统治自然力量的科学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发明归根到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革命的意义。他们对德国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的发明评价很高，后者通过实验制造成功了“人造细胞”，即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的活细胞的模型（见本卷第138、2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政党为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这一时期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实践活动，同他们的理论活动一样，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876年第一国际正式解散。但是，正象本卷的许多书信所证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活动时期同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恰恰相反，这些联系不仅继续保持，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是联系和领导的中心，这个中心联系着各国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队伍。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匈牙利、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有密切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通信，是他们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当然有说明他们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卓越活动极其丰富的材料。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德国。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迅速，并且出现了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特别尖锐的社会矛盾。德国已经创建了第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以及德国问题在本卷占据主要地位，这是很自然的。

在七十年代中期，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875年5月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1878年10月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合并后的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这些事件成了本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主要话题。

本卷有许多书信（其中最重要的是：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马克思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恩格斯10月11日给白拉克的信和恩格斯10月12日给倍倍尔的信）能够完整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两个工人组织合并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统一的工人党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实行合并，这就是说，拉萨尔派必须放弃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教条，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作为合并后的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这样的合并还没有可能，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一致行动的协定。他们对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的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详尽的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斥责爱森纳赫派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向自己的思想敌人拉萨尔派让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合并后的党的纲领草案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党、共产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原理。

后来，恩格斯评价合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时，明确地指出，这个纲领是由拉萨尔主义的词句、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和被歪曲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原理拼凑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是因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还没有经验的工人群众和害怕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的资产者，都把这个纲领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纲领。

尽管合并后的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特别明显地表

现在1877年1月社会民主党人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在思想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合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降低了党的水平。果然，合并后一部分党员不久就在理论上表现了各种摇摆，党的领导人犯了政治错误和策略错误。通信明显地证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为了克服这些错误和缺点给予党许多具体的帮助。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了反对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在1877年11月10日给威·布洛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以他个人和恩格斯的名义表明他们对个人迷信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却恰恰相反）。”（见本卷第286—289页）

同拉萨尔派妥协，大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涌入党内，国内缺乏革命形势，这一切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渗入党内创造了适宜的土壤。为了捍卫党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性质，捍卫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有些人企图用唯心主义关于正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恩格斯写道：“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那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

使命。”(见本卷第404页)

合并后的党在成长过程中,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患了特殊的“幼稚病”,并且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害的影响。必须帮助工人运动治愈这种“幼稚病”,必须帮助健康的党完全摆脱空想主义的影响和残余。

在七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中最危险的是杜林体系。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杜林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庸俗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庸俗经济学和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折衷主义混合物。还在1875年以前,杜林体系就已经在德国爱森纳赫党的部分成员中散布开来。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以后,杜林体系的危险性就变得特别显著了。

甚至党的一些有影响的活动家也有意接受这种新生的“社会主义”学说。在社会民主党人中,约·莫斯特已经成为杜林最狂热的追随者。在党还没有完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就成了实际的威胁。问题涉及到德国工人党的理论原理,涉及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先进队伍的命运。因此必须粉碎杜林假科学的观念,必须发展和传播马克思的学说。

解决这个任务的担子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他创作了一部经典著作,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百科全书——《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该书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这部著作经典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反杜林论》从1876年5月开始构思的整个创作经过,看到在1877—1878年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这部著作的历史和以后的传播情况。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反杜林论》的写作;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作出必须对杜

林进行反击的决定，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第二编第十章），帮助恩格斯搜集材料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第三编第一章）。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一代代的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都学习了这部著作，借助于这部著作掌握了革命的科学的 worldview。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杜林体系进行激烈斗争时，也注意到了威胁着党的另一种危险：围绕着柏林的《未来》杂志和苏黎世的《新社会》杂志，有一批人在散布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两种杂志出版于1877年；前者的出版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捐资入党”的资产者卡·赫希柏格，后者的出版者也是一个混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者弗·维德。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刊物也有改良主义的观点。

许多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断然拒绝为这些杂志撰稿，而且坚决反对有人企图用改良主义理论代替革命理论、用庸俗社会主义观点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倾向。他们严厉批判各种各样的庸俗空想主义企图用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来代替对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科学分析。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书信中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这样一批空想主义者起了一个绰号：“未来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两种危险倾向——极左的倾向（莫斯特）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赫希柏格等人）——的斗争，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之后的时期内变得特别尖锐了。

慑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就，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由国会通过一项查禁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出版物的法令。马克思写道：“颁布非常法是为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表面合法性也剥夺掉……置于非法地位，这就是把反政府的运动宣布为‘违法’，从而使政府不受法律之害……的屡试不爽的手段。”

(见本卷第 76 页)

非常法实行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的斗争条件下没有立即找到正确的道路和适当的方法。党的领导人表现出严重的动摇。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党以巨大的帮助。他们帮助党确定策略和组织形式，以同志式的批评和英明的劝告帮助党克服错误和缺点，并为一些个人和全党安排了物质援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特别是他们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弗·阿·左尔格、约·菲·贝克尔的书信，包含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料，主要是关于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理论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通告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见本卷第 368—3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以约·莫斯特为主要代表的极左倾向的斗争在各方面都是极有教益的。这个曾经是工人后来变成职业作家的莫斯特，在非常法实行之后被迫流亡伦敦，在这里开始出版〈自由〉周报，该周报的主要内容无非是一些最革命的词句。最后，莫斯特滚向了无政府主义并被开除出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同这一派别划清了界限并且对它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他们无情地揭露“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们”，揭露他们不负责任地妄谈用烧和杀进行革命(见本卷第 356—357 页)。恩格斯嘲笑莫斯特及其周报的假革命空谈，在他的一封信中以讥讽的笔调指出：“〈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见本卷第 417 页)。徒有其表的“革命”空谈不管怎样总是要滑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坑的，同这种“革命”空谈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成为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革命原则的标准。现今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支持莫斯特的人并不多。非常法

实行以后，主要危险是以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这些思想家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个“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8月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由赫希柏格创办于苏黎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独特宣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恩格斯于9月初看到了这篇《回顾》后，立即告诉马克思：“赫希柏格直截了当地宣称，德国人犯了错误，他们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什么运动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它应当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等等。”这就是《宣言》的实质。马克思在回信中写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能再浪费时间。要尖锐地和不客气地说出我们对《年鉴》的胡言乱语的意见”（见本卷第102、105页）。

赫希柏格的年鉴出版时，恰好正在进行关于在苏黎世出版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谈判。现在已经清楚，改良主义者曾想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一阴谋，反对整个机会主义，同时也反对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表现的中间的、调和主义的立场。这一斗争的顶点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写给倍倍尔并指定给党的全体领导传阅的一封信，这就是作为历史文献的《通告信》。

本卷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几封信，可以使我们逐步深入考察《通告信》的整个准备过程，并充分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斗争的全貌。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战斗。1877—1879年他们猛烈地反击了机会主义。1879年，他们的坚决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了。工人群众真正的阶级本能，两位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批评、劝告和帮助，纠正了德国党内的状况，使它在非常法实行期间，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条件下，

学会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巩固自己的队伍，整顿党的组织，找到了深入群众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他们同法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马克思 1876—1877 年间同白拉克的通信表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为了宣传巴黎公社的经验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为此他曾设法请人把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译成德文并在德国出版。这本由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在研究了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书，按马克思的评价，是关于公社的第一部真实的、最好的历史著作，因此，它的出版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的意义（见本卷第 188、322 页）。马克思亲自审查和校订了该书的大部分的译文。马克思的许多书信说明他为这本书的翻译操了多少心。利沙加勒在该书德文版中作了法文版中所没有的一些补充，这显然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写出来的；这些补充谈到了公社是国家政权的新形式。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经历了一个反动时期。以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为首的具有君主主义情绪分子企图实行政变并废除共和国。共和派同君主派之间在国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前进报》于 1877 年 7 月 1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打倒共和国！》这里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文章说，对无产阶级说来，这样的共和国是无所谓的。这篇极左文章的作者显然是从前的拉萨尔派首领之一威·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想在一系列文章中消除这次失策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认为，《前进报》对待法国事件过于轻率。的确，这些事件与工人没有直接关系……而对法国的发展毕竟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工人运动下一次高潮到来之

前的目前这个间歇时期正处在资产阶级共和制条件之下……对法国已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争论即将最终结束，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见本卷第260页）这一阐述对于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具有原则意义。

七十年代后半期，法国工人运动继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现的衰落，已被新的高潮所代替。这表现在一系列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茹·盖得的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出版（1877年），以及法国工人党的建立（1879年）。马克思认为，这是法国第一家真正的工人报纸，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见本卷第450、451页）。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准备了条件。这一卷是在三年期间（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马克思详细地校订了法文版的译文，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因此他认为，法文版同德文原版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马克思为法文版编写了名目索引，但是由于书的篇幅所限，没能刊印。从马克思的书信，主要是给《资本论》法文版出版者莫·拉沙特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在反动制度的条件下，在法国出版和传播《资本论》是多么困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法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具有巨大的意义。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给盖得的一封信的片断就是证明，这封信写于1878年底或1879年初，但至今尚未找到。从盖得的回信中看出，马克思是这样写的：“……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见本卷第33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帮助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建立工人党。1880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伦敦参加了讨论法国工人党纲领的会议。纲领的理论性序言是由马克思制定的。这一纲领克服了德国党的哥达纲领中的缺点，于1880

年 11 月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对这次五月会议满意地指出，“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见本卷第 422 页）。

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则不相同。英国的工业垄断是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并使无产阶级上层有可能被收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痛心地质出了这种情况：“由于 1848 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见本卷第 297 页）。对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恩格斯在 1879 年 6 月 17 日给爱·伯恩斯坦的信中作了经典性的评述（见本卷第 352 页）。马克思在许多信中严厉地抨击了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莫特斯赫德、豪威尔、黑尔斯之流。马克思 1880 年 12 月 8 日给海德门的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在信中谈到了英国未来的革命改造可能具有的性质。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革命发展有采取非暴力途径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如果英国工人阶级不学会使用自己的力量，就可能被错过（见本卷第 456 页）。

在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俄国革命运动和俄国社会活动家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经常通信和保持联系的有格·亚·洛帕廷、彼·拉·拉甫罗夫、瓦·尼·斯米尔诺夫、尼·伊·吴亭、尼·弗·丹尼尔逊、马·马·柯瓦列夫斯基、伊·德米特里耶娃、安·维·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敏·卡·哥尔布诺娃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还比较落后的俄国之所以产生很大兴趣并给予认真的注意，归根到底，是由于俄国革命运动对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命运将起的杰出作用，这一

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逐渐明确地认识到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反复不断地谈到关于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他们写道，如果不算德国的话，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就是俄国。这里定将首先开始革命。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战争期间，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俄国革命“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历史转折点”。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这个国家“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见本卷第154—155、275、410、425—426页）。

列宁在他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所写的著名序言中谈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这些意见。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前景所采取的态度概括如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以来始终是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0页）。

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寄予这样的希望，因此他们对于可以加速革命爆发的各种过程和事件都密切注意。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采取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给整个欧洲革命创造必要的前提，沙皇俄国失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将推动俄国本身革命事件的发展，从而加速整个欧洲革命进程的开始。同时，他们肯定地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定将加速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见本卷第296—297页）。尽管沙皇政府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有贪图私利的政治目的，俄国军队的胜利客观上促进了巴尔干各族人民的民族复兴，帮助他们建立了国家主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证明无产阶级领袖竭力给予俄国革命运动各种形式的援助。通信中提供的有关这种具体援助的部分事例有：帮助爱尔兰议员奥克莱里准备在英国议会中发表的关于俄国的高压政策的演说（见本卷第 236—237 页）；批驳对俄国革命文学的诽谤性文章（见本卷第 82 页）；对流亡国外的某些俄国革命者提供援助，以及其他许多事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加强欧洲工人运动和俄国解放运动的国际联系，使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认清它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和全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资本论》俄译本的出版，对于理论上武装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很大意义。这是《资本论》的第一种外文译本。马克思在 1878 年给丹尼尔逊的几封信中指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第二版中必须作的一些修改。1880 年，马克思十分满意地写道，在俄国，“《资本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大的重视”（见本卷第 452 页）。

在七十年代末，恩格斯在展望未来事件的发展时，预见到革命的两种可能的前景：“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见本卷第 408 页）历史即使不是一字不差地按照恩格斯在这里所预见的那样发展，那末无产阶级领袖的预见在许多方面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只要提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破产和以列宁为首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诞生就足够了。以列宁为首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了 1917 年的伟

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开创了共产主义胜利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有极丰富的传记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关他们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的科学和政治活动，而且有关他们的个人生活。

自从恩格斯于1870年迁居伦敦同马克思在一起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是在因必要的治疗和休息而使他们不得不开伦敦这样的较短期间进行的。因此，本卷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在数量上大大少于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四十一封信，其中有二十封曾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过，三封在苏联的期刊上发表过，十八封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副本第一次发表的。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燕妮·马克思、燕妮·龙格和爱琳娜·马克思的九封信。这些信或者是受马克思委托而写的，或者是转述他的某种思想和说明他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在《附录》部分中还收入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给卡·希尔施的九封信的内容摘记，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莉·白恩士逝世的讣告以及马克思和《论坛报》记者的谈话片断。在《附录》部分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发表的。

所有这些文件大大充实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了解。它们对于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1875—1880年的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考虑到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通告信》同他们在这一个时期的全部通信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注意到这些书信在科学上和政治上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为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奥·倍倍尔和威·白拉克之间的通信最完整地提供出来，因此，本卷重新收入了已经收入第十九卷的上述三封信。

第三十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年1月至1883年3月所写的书信。

这几年是从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到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这一世界历史时期的一个小阶段。列宁用下面这段话说明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特点：“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583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也成长了起来。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的状况迫切需要为在各国建立和巩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而斗争。这几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行了反对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内各种反无产阶级势力的斗争，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促进它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传播，继续进一步发展革命理论。

马克思几乎到他生前的最后几天，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问题上。《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出版（1875年）以后，马克思在1881年底开始了该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他原想把正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理论原理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新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但是，恶劣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在他忠实的朋友和亲爱的夫人于1881年逝世以后，使他无法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他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由于同一原因，马克思在生前的最后几年未能把《资本论》最

后几卷的手稿作好付印准备，虽然他为这几卷《资本论》不断地积累了新的资料。

当时马克思还非常注意欧洲各国和美国的 socioeconomic 的发展，在百忙中阅读“一大堆……蓝皮书”（见本卷第 148 页），翻阅美国最新出版的书籍。马克思在给美国活动家的一些书信中指出，当时美国流行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亨利·乔治宣称在保存资产阶级国家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是消除资本主义一切祸害的灵丹妙药。马克思认为他的观点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尝试”（见本卷第 184 页）。在恩格斯写的一系列书信中也有对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关于危机的特点，关于交易所的作用，关于货币流通等等的宝贵论述。

马克思在他生前的最后两年，还对世界史作了很多研究，阅读原始文化史方面的著作，研究原始公社制度的问题。他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做了详细的摘要，其中包括马克思自己对原始公社制度的性质所做的评语和论断（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几年他写了大量的笔记，即我们所知道的《编年大事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5、6、7、8 卷），其中有他自己的许多评语，这些评语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继续密切注意俄国历史问题，研究关于俄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状况等等的材料，写了《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53—477 页）。他花许多时间研究了高等数学。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对德国的土地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就是他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78—538、539—599 页）两部手稿，以及 1882 年发表的论述马尔克（古日耳曼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51—369

页),文章扼要地分析了日耳曼土地所有制以及德国农民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再次论证了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向农业集体生产过渡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条件。恩格斯所以研究德国的土地关系,是因为当时迫切需要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把农业工人和农民吸引到党的方面来的重要性,迫切需要再次强调党正确解决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头等重要意义。

1882年,恩格斯准备出版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第一版的单行本,为了使它成为一本“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43页),他作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在恩格斯的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占很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紧张地从事他早在1873年就已开始的《自然辩证法》这部巨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3—657页)的写作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阶段的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思想领导,他们通过自己的建议和指示帮助无产阶级正确地制定符合它的阶级利益的政策和策略,总结和宣传它的斗争经验,竭力促进现有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制定革命的策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各国社会党人的大量书信中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在逐步进展,革命力量在普遍增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准备发动的战争看作是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危险。恩格斯在1882年12月22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发生欧洲战争将是一种不幸……战争会在长时期内到处煽起沙文主义,因为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已经处于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会变得徒劳无益,前功尽弃;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

同样的情况。”(见本卷第 415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警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要避免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可能发生的错误。在这方面,他们要求社会党人在确定自己对各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时,首先应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他们指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见本卷第 272 页)。

从本卷发表的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时期特别注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法国工人党这两个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活动。

八十年代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困难时期,在这十年中,党的活动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严酷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党经常遭到政府的迫害,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但还是保存和巩固了自己的队伍,重建了自己的组织,建立了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在这些年代党一直坚持出版自己的战斗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制定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路线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劝告和指示起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年代里,德国工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同右派的拥护者在党内散布的“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进行经常的、不懈的和不调和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占多数的右派代表人物,一部分以 1875 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时进到党里来的原拉萨尔派的头目为代表,一部分是在非常法实施的前夕被接受入党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他们反对党的革命策略,宣扬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恩格斯指出,对这个派别“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见本卷第 256 页)。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这几年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伯恩斯坦的信中，以及在给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信中，无情地批判了右翼首领们政治上的怯懦、畏缩、狭隘和动摇。他建议要警觉地注意这些“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有教养者”（由于他们傲视普通工人，所以恩格斯这样讽刺地称呼他们），不让广大工人群众受他们的有害影响，揭露他们在帝国国会中和报刊上的怯懦言论。恩格斯写道，这些首领们“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固定的稿费收入（见本卷第 327 页）。恩格斯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党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只有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才能废除这项法令。

恩格斯在实施非常法的条件下同样要求党的策略具有战斗性：要严厉批评所有那些取悦敌人的人，“不要……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而“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见本卷第 425 页）。

在同党内的庸人作斗争时，恩格斯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大胆地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敢于把普通工人推举为帝国国会议员，更多地吸收工人通讯员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写道，“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见本卷第 255 页）；这些人不是率领群众，而从一开始起就“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见本卷第 270 页）。

恩格斯给德国工人党的活动家的信，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德国劳动群众的革命潜力充满了信心。恩格斯把右翼“领袖先生们”的畏缩同德国无产者所固有的、在斗争中显示出的“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做了对比（见本卷第 444 页）。他一贯告诫党的革命的领导人要坚决反对人为地使工人阶级“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萎靡

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见本卷第 44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非常法实施之后不久就预言：同机会主义分子势必发生冲突，在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同他们划清界线，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他们在 1879 年 9 月 17—18 日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著名的《通告信》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72—190 页、第 34 卷第 368—384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原则上是好事，因为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线并使他们孤立，能保证党的思想的统一和队伍的纯洁。恩格斯在 1882 年 6 月 21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通过分裂我们可以使问题明朗，并且可以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见本卷第 330 页)。但是在非常法的条件下，恩格斯劝告说，没有必要急于实行分裂，不要受那些人为地制造分裂的人的挑拨，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右派可能利用这种分裂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应当遵守革命策略的原则，在这种条件下要有最大限度的忍耐、小心和谨慎。恩格斯坚决斥责了某些党员主张把党变成秘密组织的错误的、冒险主义的倾向；他号召要善于把各种可能采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手段结合起来，并要密切地联系广大群众。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党的革命的领导人保证，如果在党的这个困难时期分裂竟然被挑起的话，他们将给以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恩格斯在上述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右派分子提前迫使党实行分裂，“如果事态发展到同这些先生们冲突起来，并且党的左翼公开反对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会同你们一道走，并且积极地、光明正大地行动起来”(见本卷第 331 页)。

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政治活动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在 1882 年 9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倍倍尔“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恩格

斯对倍倍尔也给了同样高的评价，说他是德国工人党领袖中最有天才的，说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见本卷第 25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思想领导起了巨大作用。他们热烈拥护该报反对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右派议员的机会主义立场所采取的每一个勇敢行动，他们就如何揭露俾斯麦的反动的蛊惑性的政策、揭露他的国家假社会主义和装饰门面的“社会措施”做出指示和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在进进行这样的揭露时要更多地利用普鲁士国有矿山虐待工人的具体材料（见马克思 1882 年 12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 1882 年 12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回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向德国工人党的活动家们说明，俾斯麦的所谓“社会措施”——保护关税、铁路国有化以及其他类似措施，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完全不超出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政策的范围（见本卷第 163—164、316—317 页）。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3 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阐述了他曾设想过但可惜没有实现的详细写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打算揭穿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揭穿当时流行的拉萨尔的有害的、反科学的观点和某些人士谬加于拉萨尔的出类拔萃的理论家的头衔。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22 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我毕竟不得不扫除一种幻想：似乎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以及在其他一切方面）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见本卷第 361 页）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编辑部的每一个不正确步骤，对报纸特别是它的主编伯恩斯坦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及时表明态度。恩格斯在 1882 年 12 月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认为伯恩斯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见本卷第 131 页）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里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不要把重点放在非常法条件下党不能提出来公开争论的那些问题上。恩格斯断然反

对伯恩斯坦筹划的修改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的运动,因为这将加剧党内的纠纷。

本卷中的书信也是关于法国工人党的形成和建立的珍贵史料。在这些书信中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参加法国工人运动方面的丰富材料,阐明了他们在对法国工人党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在使它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这几年法国工人党内围绕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下制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以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为首的马克思派(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其拥护者集聚在《平等报》周围;和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可能派)之间进行的。

恩格斯在书信中向各国社会主义者详细地说明了引起这一斗争的原由,并指出这是重大的原则性斗争。争论的问题是关于斗争的性质和党的政治纲领: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象机会主义者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拥护者也就是更多的选票,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革命的纲领都丢开不管?可能派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见本卷第 380 页)。

在法国工人党两派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完全站在盖得派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写的书信充满了对盖得派的深切同情,认为他们是真诚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尖锐的党内斗争进行得最炽烈的时候,恩格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中写道:“当然我们完全同情盖得和他的朋友”(见本卷第 249 页)。

为了同法国机会主义者进行更有效的斗争,为了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恩格斯设法在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党马克

思主义领导之间建立经常的工作联系。他在1882年10月30日给保·拉法格的信和1882年11月2—3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坚决要求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定期交换两党的机关报——《平等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他还建议拉法格同德国工人党的活动家建立更密切的个人接触，以便向他们提供有关法国工人党的确切的消息。同时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许多信中也系统地对法国的党内斗争作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他警告该报编辑部，对关于盖得派政策的“马隆的陈词滥调”不要抱过分轻信的态度，谴责编辑部支持可能派政策和策略的倾向，坚决反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伪造法国工人党历史的文章以及类似的材料（见恩格斯1882年11月2—3日、11月28日给伯恩施坦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建议和指示全力支持盖得派，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盖得及其拥护者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在策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恩格斯在一些信里指出，这些错误使他和马克思暂时不能公开出面支持盖得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严厉而公正地批评盖得和拉法格缺乏应有的沉着和耐性，批评他们在与自己的政敌论战时没有深思熟虑，往往还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等等（见恩格斯1881年8月25日给倍倍尔的信、1881年8月27日给考茨基的信、1882年2月10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以及1882年9月2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

盖得派所表现的学理主义倾向、效法“学者先知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以及滥用马克思一向称之为“夸夸其谈”的极端革命的词句的倾向，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斥责（见马克思1882年12月1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0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到盖得派时写道，“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

由于法国工人党的队伍在 1882 年 9 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派同可能派在组织上彻底划清界限已经时机成熟并且是必需的了。本卷发表的恩格斯 1882 年 11 月 23 日给马克思的信、1882 年 10 月 20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1882 年 10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详细地说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恩格斯指出，无论他或马克思，都从来没有看不清可能派头目的政治面目，“从来没有幻想”在盖得的马克思派同马隆和布鲁斯的“冒牌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还有一些书信对可能派头目及其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认为他们是一伙老奸巨猾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信中指出，这些人在反对党内的马克思派的时候，对自己的政敌不惜采用阴谋诡计、无耻欺骗、撒谎和诽谤这样一些很不光彩的手段，直到诉诸法国落后工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借口盖得派是“德国人亦即普鲁士人”的马克思的拥护者而诽谤他们背叛祖国。

恩格斯在批判分裂后建立的可能派政党的时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点。这些论点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宝贵贡献。

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实质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取消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放弃了 1880 年党的哈佛尔代表大会所赞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恩格斯写道：“真是闻所未闻：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这样的党，根据它的含含糊糊的绪论……势必得出结论，每一个小组都可以制造它自己的纲领！”（见本卷第 402 页）因此，恩格斯把可能派政党称作“所谓的”党。他写道，它“……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见本卷第 370 页）。

这帮人，照恩格斯的说法，“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见本卷第403页）。可能派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其中包括具有改良主义情绪的不问政治的工团（工会）等等，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这一事实，恩格斯指出，既然他们对入党人的资格采取无原则的态度，那末实际上这个党必然是“一个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见本卷第401页）。

恩格斯驳斥了那种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团结一致的说教，认为工人政党只有在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中，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他指出，虽然可能派在分裂后获得了暂时的多数，但是他们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虚弱的。恩格斯写道：“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见本卷第40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帮助无产阶级政党同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而且向它们指明了达到无产阶级队伍真正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的工人状况和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评价。显然，英国在八十年代开始逐渐丧失过去的工业垄断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在八十年代也完成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最紧张的殖民掠夺，保证了英国的殖民垄断，使英国资本主义获得了神话般的超额利润。这种殖民垄断就是造成这一阶段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加强、革命派力量薄弱以及在英国没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书信中对英国工人的特权阶层及其改良主义领袖——这些人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已经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的妥协情绪给予了应有的批判。恩格斯在谈到工人中的这一类人时写道：“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

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一批工人选民的工人领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见本卷第403页）。恩格斯1882年2月10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1882年6月20日给左尔格的信以及其他的信，谈到了恩格斯1881年为工联报纸《劳动旗帜报》撰稿的事；这些信说明恩格斯打算越过改良主义领袖而直接向英国工人群众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号召他们在英国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1882年初，无产阶级的领袖指出，在英国产业工人中已经出现了某些活跃的迹象，还指出这种情况在激进的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国的许多书信，对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包括对后来的英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海德门，作了批判性的评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这些活动家的“善良的愿望”，但是指出了他们完全脱离群众，指出了他们的宗派主义策略，认为这是他们在当时毫无政治影响的原因之一。恩格斯写道：“谁也不跟这些小人物走，他们只是相互支持。他们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宗派和一帮非宗派的摇摆不定的一般民主派。”（见本卷第3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英国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所作的批评在政治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1883年1月9日给他的女儿爱琳娜的信中有关于这方面的生动材料。马克思在谈到前宪章主义者、恩格斯称之为“即使不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个半共产主义者”的激进派议员约瑟夫·考恩（见恩格斯1881年3月12日给伯恩斯坦的信）关于埃及问题的演说时指出，在殖民地问题上，甚至这个“最好的”议员也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谴责了海德门这类以英国工人运动领袖自居的活动家追求议会名利和热衷于沽名钓誉，同时指出了他们理论上的幼稚和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的倾向。能够

说明这一点的是下面几封揭示马克思和海德门相互关系的信：马克思 1881 年 12 月 15 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 1882 年 3 月 31 日给海德门的信，特别是马克思 1881 年 7 月 2 日给海德门的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海德门决裂的决定性原因是，海德门企图把从《资本论》中剽窃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塞进他所领导的半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而这个联盟的目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同《资本论》的科学发现“毫无共同之处”（见本卷第 195 页）。

马克思 1882 年 1 月 5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 1881 年 2 月 24 日给燕妮·龙格的信和恩格斯 1882 年 5 月 3 日、6 月 26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揭露了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政策的殖民主义实质。一方面英国自由党人为了削弱爱尔兰佃农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于 1881 年通过了所谓爱尔兰土地法，稍微限制了英国大地主的为所欲为，但另一方面，在此以前他们在爱尔兰实行戒严，把军队密布在爱尔兰各地，并在爱尔兰停止宪法保障。马克思认为 1881 年土地法案是“纯粹欺骗”，他表示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要求，从而使爱尔兰人有可能自己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见本卷第 174—175、180—181 页）。

本卷发表的一系列书信，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东南亚和非洲各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处境的深切关怀。1882 年初，马克思在阿尔及尔治疗期间所写的一些书信中，痛斥了对这个法属殖民地当地居民进行殖民压迫的制度和实际做法。马克思愤怒地谈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审判时实行残酷的刑讯，甚至成批地处死无辜的人。马克思指出，欧洲殖民主义者通常总是认为他们自己在“劣等种族”中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则表现出无耻的傲慢、自大和残忍。马克思非常热情地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赞扬他们虽然遭受了长期压迫，却能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和对自由的渴望。

然而，马克思预言，这个国家被奴役的各族人民“没有革命运动”，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见本卷第 30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所写的书信中，对由于 1882 年英国武装侵占埃及而发生的埃及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马克思愤怒地写道：“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见本卷第 421 页）

马克思在 1881 年 2 月 19 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了遭受不列颠殖民者残酷掠夺的印度居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有一些重要的观点。恩格斯在这里分析了享有特权的英国工人对待殖民政策的立场，指出了统治阶级用来收买宗主国工人阶级上层的殖民地超额利润的作用。恩格斯写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见本卷第 353 页）恩格斯在阐述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如何对待从资产阶级世界接过来的殖民地国家的观点时，首先向无产阶级提出一项任务——尽快地引导这些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使它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恩格斯写道：“……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它“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见本卷第 353 页）。恩格斯预言印度、阿尔及利亚、埃及以及其他国家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原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在欧洲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不可避免地、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给俄国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波·拉甫罗夫、列·加特曼、尼·丹尼尔逊、维拉·查苏利奇的书信，具有

重大的科学和政治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拉甫罗夫的请求，于1882年初为普列汉诺夫主持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写了序言（见本卷第252、295页）。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当时许多俄国革命者所关心的俄国农民公社的命运。俄国自由派认为必须消灭农民公社才能在俄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民粹派幻想不经过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通过公社就能使俄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相反地，马克思把俄国农民公社的历史作用同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支持的俄国人民革命的前景结合起来。他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俄国的公社只有在“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被肃清，换句话说，即俄国的专制制度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的条件下，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见本卷第160页）。马克思在1882年12月14日给自己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沙皇俄国境内迅速传播表示十分满意。他写道：“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见本卷第407页）马克思在1881年4月11日给燕妮·龙格的信中，对俄国的革命民粹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见本卷第173页）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提出一个思想，即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而正是在俄国，欧洲革命的先锋队应当“出击”了。马克思期待俄国很快就发生革命，建议自己的战友们与可能成为未来俄国革命中心的彼得堡保持和加强联系。在1882年4月13—1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建议拉法格不要中断他为一个俄国杂志撰稿的工作，他写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失掉彼得堡这样的点，它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见本卷第300页）

马克思从俄文读完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一文后，在1881年2月19日给他的信中指明了俄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农业对于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对土壤施加矿物质肥料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重病，他的夫人和长女的去世，完全耗尽了他的精力。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了。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逝世给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们的电报和书信中，怀着非常爱戴的心情颂扬马克思是天才的理论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恩格斯在1883年3月14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见本卷第456、457页）在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整个国际工人阶级遭受的这一重大损失表示深切悲痛的同时，恩格斯号召战友们英勇奋斗，并表示他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伟大学说的最后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

恩格斯在他伟大的朋友逝世后，光荣地继续完成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的使命，担负起教育和领导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全部重任和宏伟工作。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二封信。其中十七封信曾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过，两封信曾在苏联的期刊上发表过，十三封信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第一次发表的。所有这些书信大大地充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史料，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的宝贵思想。

第三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收集了恩格斯在1883年4月至1887年12月这一时期所写的书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在经济上，愈来愈明显地看到一些现象，预告资本主义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即将来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在加剧，经济危机具有异常尖锐和持久的特征；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是在危机和持久萧条中度过的。由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德、美两国工业的增长，英国逐渐丧失它的工业优势 and 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但英国仍然是最大的殖民强国，并继续夺取新的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大国的竞争加剧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它们的殖民扩张和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军事集团和军事同盟开始形成，军事冲突的威胁在增长；国际局势愈来愈紧张了。

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里继续积聚力量，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搏斗。在许多国家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广泛的、更多的工人阶层参加阶级斗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愈来愈深入到先进无产者当中，彻底取代马克思以前的种种过时的社会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潮已经破产，愈来愈不能左右工人运动了。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如果不在各个国家建立并从组织上巩固独立的政党，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建立这种政党的过程，

在前一时期就已开始，到八十年代仍在继续。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承担了原先由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共同担负的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复杂而大量的任务。本卷发表的书信，鲜明地反映了恩格斯在1883年到1887年的多方面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

恩格斯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继续并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著述。这首先是为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更多的新版本做准备，使该卷得到传播。早在1883年，恩格斯就完成了马克思所开始的该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精心细致的工作（见恩格斯1883年6月29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宣传有极重大的意义。他密切注意该书在各国的传播，他设法使《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并亲自进行校订，他欣然同意把该卷译成波兰文。同时，他还十分注意用其他方式宣传和普及《资本论》的思想。例如恩格斯有一些书信评价了加·杰维尔在法国对《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通俗解释。恩格斯指出，加·杰维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见本卷第98页）。在这些书信中（例如1883年10月3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解释和宣传《资本论》，不容许把该书内容庸俗化和简单化。在1886年8月13日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强调在美国宣传《资本论》必须考虑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见本卷第494页）。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资产阶级诽谤家和伪造者的侵害这一方面，恩格斯的要求十分严格。1884年8月11日他给保尔·拉法格的信就是一个范例。拉法格写过一篇文章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反对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勒卢阿-博利约。恩格斯在分析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批评了拉法格所犯的立论不精确的

毛病，并给作者提出了友好的忠告。恩格斯强调，在同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作思想斗争时，态度必须极其严肃，要使批判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要针锋相对地给他们摆出以渊博的学识为依据的真正科学的观点。恩格斯写道：“如果您出了差错，全党都要遭受损失。”（见本卷第 199 页）恩格斯教导自己的战友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作斗争时，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

恩格斯组织积极的斗争反对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就是这种空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利益，是“俾斯麦名利社会主义者的福音”（见本卷第 151 页）。这一斗争对德国工人运动有特殊意义，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怀有机会主义情绪的活动家也受到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给伯恩斯坦和给考茨基的书信对洛贝尔图斯的主要著作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批判性的评价，揭示了他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和真正的阶级性，揭穿了洛贝尔图斯本人及其崇拜者所制造的谎言，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这位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就内容来说，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同他给《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和《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版所写的序言（1885 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两篇序言给予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以毁灭性的打击。恩格斯的书信补充了这两篇序言的内容，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同他的先驱者的理论以及同洛贝尔图斯的观点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在 1884 年 6 月 26 日和 9 月 20 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对考茨基评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书的文章，总的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又批评了考茨基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的错误理解，批评他不会运用辩证法。例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对抽象的作用的看法是截然对立的，而考茨基对这一点并不理解（见本卷第 209—210 页）。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书信，有很大一部分详尽地反映了他为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而整理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的工作。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这些手稿对于保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最终胜利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的书信，充满了对马克思的深切崇敬和怀念，充分表达了他渴望尽快使马克思的整个著作成为工人阶级财富的心情。恩格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到1885年时就发表了《资本论》第二卷。这项紧张的、极其复杂而浩繁的工作，是他为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创建的真正的科学上的功勋。

从有关《资本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恩格斯编辑马克思手稿的工作态度。恩格斯慎重地对待亡友的每一个字，他给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让读者原原本本地看到马克思自己的文本（见本卷第97页）。恩格斯极其熟悉马克思在跟他亲密交往中所探讨的经济学问题，并且具有运用辩证法的高超本领，因而能胜任这项任务。恩格斯仔细地保存了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他只是“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做了最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4、9页）。

评述《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内容和科学意义的书信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恩格斯在1884年6月2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第二卷时说：“……这是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人们从中将会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见本卷第168页）恩格斯在1885年4月2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意义作了评价，他写道：“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见本卷第288页）类似的评价在恩格斯的其他许多书信中也经常见到。这些评价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资本论》的内容和逻辑，理解《资本论》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的深远意义。

许多书信还证明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作了研究。他多次指出了工业周期方面，特别是经济危机的特征方面出现的新因素。恩格斯对八十年代末英、法、德、美在世界市场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加剧的见解，也有重大的意义。在给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一系列信件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在完成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普法战争胜利之后的经济发展的特点。恩格斯指出，在八十年代，德国和其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强化了。他还指出，“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是这个政策的“最新形式”（见本卷第62页）。整个说来，恩格斯这个时期的书信，对正确理解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很重要的。

从本卷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一些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的写作过程。

恩格斯认为，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承担的义务，因为马克思曾打算利用美国进步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来写类似的著作。从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不只是看作是历史研究，而且看作是一部有助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和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著作。

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美国工人运动》等等，是他在这些年代作为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的新版本和译本的序言而写的。在整理《资本论》的同时，恩格斯很注意这种出新版本和译本的准备工作。恩格斯的这项活动在许多书信中有充分的反映。这个时期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译文译自法文原本，并经恩格斯校订，还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再版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出了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德文第三版，出了三版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德文版，出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版，等等。恩格斯校订了《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本和英译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译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译本以及其他许多译本。许多书信表明，恩格斯在选择这种或那种著作去再版或翻译时，是根据工人运动的迫切要求，根据同形形色色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潮和理论作斗争的需要，是认真地考虑到这个或那个国家工人运动所达到的水平的。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利用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非常拥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再版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和演说、再版有关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特别是1848—49年的革命的史料的倡议。恩格斯在1885年6月16日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指出，用革命传统教育工人阶级，将有助于肃清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依然存在的拉萨尔主义余毒。恩格斯在建议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写道：“如果重印《共产党人案件》，也是有益的。一方面，它将再次向老拉萨尔派证明，在伟大的斐迪南之前德国已经做过些什么，此外还证明，普鲁士人当时的行动已经为现时在反社会党人法实行期间的所做所为作出了榜样。”（见本卷第329页）从许多书信中（1883年4月30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83年6月24日给劳·拉法格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曾打算亲自写一部马克思的传记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他认为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许多书信中，有一些思想和看法对于研究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协会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1883年6月24日给劳·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见本卷第44页）他用马

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来反驳英美社会主义者的错误的、有害的宗派主义策略。他写道：“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共同章程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国际所容纳的范围这样广泛，它才成为它当时的样子，即成为逐步溶解和吸收……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见本卷第 584 页）鉴于在八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对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还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特别指出，同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作有力的斗争对于今后工人运动的前途是很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废除一切国家，恩格斯指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因为“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的唯一机构”（见本卷第 10 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书信涉及到各种理论问题，范围很广，有许多问题在他这一时期内所写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反映。特别是由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具体事件或迫切需要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恩格斯都是具体地、历史地从一般理论上给以解答，他所阐述的思想至今仍有很大意义。列宁在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时指出，主要是在这些书信里可以“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见《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45 页）。

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尖锐地批评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自称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只会背熟现成的公式，并且不根据具体条件，企图教条主义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套用这些公式。他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见本卷第 584 页）他坚决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解释成为一堆适用于一切场合的不变的公式和原理。他在 1886 年 1 月 27 日给英国社会主义者爱·皮斯的信中写道，“我所在的党

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见本卷第 419 页）。恩格斯在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一些信中分析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弱点的原因时强调指出，它由于不考虑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具体条件；不考虑环境的特点和工人运动达到的水平，宗派主义地企图把理论原理强加于工人阶级，结果脱离了群众。他在 1887 年 9 月 16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只有通过适合各该国家和特定情况的道路…… 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见本卷第 681 页）同时恩格斯指出考虑群众自己的历史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认为这是制定解放斗争的正确方法和手段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的那些研究无产阶级对待民主变革的态度的书信，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恩格斯对任何企图超越不可避免的革命阶段的做法提出了警告。他指出，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对无产阶级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彻底的形式”（见本卷第 131 页），在民主共和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明显。恩格斯指出，正是这种共和国是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因为它为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到革命的社会主义方面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奠定必要的基础（见 1883 年 8 月 27 日和 1884 年 3 月 24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1884 年 6 月 6 日和 12 月 11 日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批评了认为随时都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那种错误的教条主义观点。他强调指出，革命是客观条件（使革命可能胜利的客观条件）成熟的漫长过程的结果，没有革命的形势，革命是不可思议的。他写道，革命“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见本卷第 56 页）。此外，恩格斯还指出，把士兵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争取军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前提。他在 1884 年 11 月 18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反对

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见本卷第 241 页）

在给倍倍尔的一系列书信中，恩格斯阐述了必须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深刻思想，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他谈到了在农业工人和小农这一劳动居民中最受压迫和最闭塞的部分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见本卷第 416 页）。他写道，“应该把这一火种投到农业短工中去”（见本卷第 254 页）。

恩格斯还谈到了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以后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基本途径，就是发展合作社型的经济，这种经济是在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已变为国家所有的大庄园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小农私有者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见本卷第 416 页），同时他还指出，合作社的活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由无产阶级国家加以调节，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见本卷第 416 页）。恩格斯的这些卓越思想，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这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某些原理无疑是相近似的。

恩格斯在一些书信里谈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企图根据空想的观念和美好的愿望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他在 1886 年 1 月 27 日给皮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 and 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见本卷第 419—420 页）

恩格斯在本卷的几乎所有的书信中都程度不同地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恩格斯把与各国社会主义者通信看作是极重要的手段，他借助这一手段来影响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帮助他们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解释科学共产主义复杂的理论问题，纠正他们

的错误。

恩格斯的注意中心仍然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它是当时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理所当然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居于先锋的地位，恩格斯称它为“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见本卷第39页）。从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约·菲·贝克尔、施留特尔、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其他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德国工人反对非常法的斗争是多么关心，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是多么高兴，他对该党领导人的一切革命活动的帮助是多么巨大。恩格斯深信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深信他们的革命潜力，深信他们会取得最终胜利。他写道：“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当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见本卷第230页）

在这几年，德国工人运动是在复杂的条件下发展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给社会民主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党人早在这一非常法推行的最初几年中，就克服了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动摇性，制订了把合法斗争方法和非法斗争方法正确结合起来的策略。党大大巩固了自己在群众中的阵地，其表现之一是党在选举中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它反对非常法的有效斗争、它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给予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恩格斯热情赞扬英勇的德国工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其他各国无产者的典范。他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倍倍尔评价很高。他在1884年10月15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写道：“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见本卷第218页）

德国在统一以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为工人阶级迅速革命化造成了良好的条件，恩格斯根据德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特点指出，

只要实行正确的策略，革命的社会主义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德国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恩格斯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是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些人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见本卷第 215 页）。他们在非常法所造成的复杂环境下，占据了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的多数。同这一斗争有关的问题，在恩格斯给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书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机会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恩格斯认为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在德国经济中还有资本主义以前关系的残余）更加强了这种影响。恩格斯在 1885 年 6 月 15 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写道：“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见本卷第 325 页）

恩格斯积极支持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书信中有大量事实材料证明恩格斯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革命派的其他领导人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蛊惑宣传，他的具体的、内容丰富的意见，对于把机会主义者排除出党的领导有很大帮助。

恩格斯的涉及党的统一问题的书信，具有很大意义。恩格斯担心，在推行非常法的情况下同机会主义者实行组织上的决裂，会引起党的分裂，因而削弱党的力量。他认为，当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群众还不相信有必要实行决裂而改良主义派还没有孤立的时候，加紧实行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是不合适的。他写道：“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 的行动…… 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见本卷第 157—158 页）

恩格斯很关心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

人报》。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他经常注意该报的内容，指导编辑部的活动，帮助编辑部改正错误。恩格斯的书信，不止一次地被利用作为编辑部文章的基础，从而成了德国广大工人群众的财产。正是由于恩格斯的帮助和领导，该报成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掌握的最好的机关刊物之一。当该报尖锐地批评了帝国国会党团多数在给轮船公司以津贴的问题上的妥协立场，因而引起这一机会主义集团和该报编辑部之间的严重冲突时，恩格斯坚决站在编辑部一边，并全力帮助他们击败机会主义者。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恩格斯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警告不要过分热衷于议会活动，他只把议会活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之一。在1887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得票总数增加了，但却失去了一些席位，当时恩格斯指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这么多人……不相信‘议会活动’了”（见本卷第618页）。

在恩格斯的书信中，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这些书信绝大部分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可以看出，恩格斯给法国工人党多么大的帮助。恩格斯支持工人党（盖得派）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恩格斯在很多书信中深刻地分析了法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他认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从1789年到1850年，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首先得到尖锐的表述，而且译成了实践的语言”（见本卷第369页）。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典型的形式发展着，这造成了开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良好条件。同时，恩格斯指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打上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烙印；这次失败给法国无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是工人长期在政治方面受资产阶级左派激进党支配的原因之一。恩格斯认为，法国工人运动的严重缺

点是它的理论水平很低，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很少懂得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着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十分高兴地看到八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他认为，1886年上半年德卡兹维耳的矿工罢工、在众议院中脱离了激进派的独立的工人党团的组成，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他在1886年2月15日给倍倍尔的信中、1886年2月25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1886年3月1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以及其他许多信中，热烈赞扬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就这次罢工而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认为他们是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领袖的榜样。恩格斯赞成工人党所采取的策略，即通过孤立机会主义集团和把群众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代表周围来逐步克服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见本卷第453页）。恩格斯也对法国工人党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警告，特别是警告党的领导人不要低估了布朗热将军的沙文主义蛊惑宣传的危险性。同时，他支持他们反对战争威胁的积极斗争。

在给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法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实质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后来的事变证实了恩格斯的看法，即在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日益高涨的时刻，激进派必然会被迫抛弃自己的假社会主义纲领，而同公开的反动政党妥协。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也十分注意。在八十年代，英国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1883年4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自从国际停止存在以来，在这里，除了充当资产阶级即激进派的尾巴和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提出一些微小目的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见本卷第19页）

恩格斯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不善于在工人中间组织社会主义宣传，因教条主义地理解社会主义

理论而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他还揭露联盟领袖们身上同改良主义倾向并存的另外一种倾向，即热衷于假革命的词句，不考虑工人运动的真正要求以及工人运动的现有水平而提出冒险主义的蛊惑性口号。他在1886年8月1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革命狂叫……在英国，在群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纯粹是胡闹，它会把无产阶级吓跑”（见本卷第455页）。

恩格斯不遗余力地协助在英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传播马克思的著作，认为这是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恩格斯同一批力求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奠定基础而把英国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一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厄·贝·巴克斯、威·莫利斯等人）退出社会民主联盟，建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持赞许的态度。当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中占优势的时候，他就支持同盟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全力帮助爱·马克思-艾威林在伦敦东头的无产者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认为这是“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纲领的英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634页）的先决条件之一。同时，当一部分工人事前不做准备工作就试图建立这种政党的时候，恩格斯又指出这种尝试是不会有结果的。他写道，“在实际上还没有可组织的对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进行组织工作，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见本卷第659页）。

在八十年代中期，恩格斯特别注意美国的工人运动。他给左尔格、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等人的信表明，他是非常重视当时美国开展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运动的，认为这是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现实前提。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汹涌澎湃、罢工示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坚决斗争，就是对那些认为强调美国资本主义特殊性的辩护士们的谰言的批驳，他们当时妄图

证明这个国家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也没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何基础。美国工人强有力的发动，他们对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的渴望，说明这一类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886年6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说，“美国……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他们“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见本卷第481、482页）。

恩格斯在许多信中指出了美国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强调在美国尤其有必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看来，这是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在美国工人处在“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见本卷第478页）的情况下，严重阻碍阶级觉悟提高的工联主义观点对工人的影响特别危险。

同时，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某些当时居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因为他们脱离美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不愿意在美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采取了忽视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特点而硬套抽象理论公式的有害做法。由于采取这一立场，党虽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但仍然是个不大的组织，在本地的美国工人中没有基础。恩格斯写道：“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见本卷第576页）恩格斯坚决反对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的论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主义的做法，提出了用科学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美国工人的规划。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并且把这一工作同他们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美国建立以彻底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为基础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恩格斯多次指出：只有在争取工人当前迫切

利益的斗争进程中，才能培养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不可避免的错误和挫折只会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这一过程。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写信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说：社会主义者“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见本卷第576页）。

从恩格斯如何对待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例子可以看出，他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极其有害的现象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脱离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对劳动人民的迫切利益采取宗派主义的漠视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归结为一堆僵死的公式和教条。

恩格斯给俄国政治活动家——尼·弗·丹尼尔逊、彼·拉·拉甫罗夫、维·伊·查苏利奇和其他人的书信在本卷中占很大的篇幅。这些书信表明，恩格斯多么密切地注视俄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多么仔细地研究俄国的经济状况，多么殷切地期待俄国革命的到来。恩格斯深信，俄国的人民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专制制度可能在极短的历史期间被推翻。他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见本卷第301页）他曾多次表示深信，欧洲反动势力主要力量之一沙皇专制制度的被消灭将会给世界政治局势以巨大的影响，并且将会给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在1887年3月21日给劳·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俄国末日的开始……也将会是欧洲末日的开始。”（见本卷第620页）虽然俄国革命的发生比恩格斯所希望的要晚得多，但是他对俄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国际意义的评价却完全得到了证实。

恩格斯高度评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他深为尊

敬地谈到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见本卷第171页）。他认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无比重要，全力促进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译成俄文，热情支持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活动。他在1884年3月6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哲学的贫困》俄文译本出版的日子，不论对我或对马克思的女儿们来说，都将是一个节日。”（见本卷第121页）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和俄国的革命家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当中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的团体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这是未来革命成功的保证。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劳动解放社”时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见本卷第301页）。恩格斯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给了高度的评价，他读的是这些著作的原文本，他以极大的兴趣和深厚的同情注视俄国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

本卷发表的书信表明，恩格斯的国际联系继续不断地扩大。在和他通信的人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施留特尔、马洪、马尔提涅蒂、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等等）；此外，恩格斯还承担了马克思过去所承担的那部分通信联系。恩格斯把保持和扩大这些联系当作是自己对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责任。他在1883年4月3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见本卷第20页）恩格斯全力促进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国际团结；他认为恢复原来形式的国际是不合适的，他赞成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经常向自己的通信者们报道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状

况，对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切表现都给予有力的支持。

鉴于八十年代中期欧洲列强在巴尔干的角逐引起的国际局势的紧张，以及德国的沙文主义侵略政策和法国某些集团的复仇情绪，恩格斯在书信中常常谈到对外政策问题。恩格斯揭露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的秘密外交把戏，分析力量对比，对军事冲突的可能前景做出估计，从而帮助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制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策略。他在给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左尔格等人的信中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应该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制度和战争危险。恩格斯以非凡的洞察力阐述了未来战争的规模和可能的结果。他在1887年9月16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这次战争又定会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劳民伤财（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士兵对垒）”（见本卷第682页）。

同时，恩格斯始终坚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预见，如果战争爆发，归根到底将导致剥削制度的覆灭。他在1885年11月17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它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是阶级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包括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见本卷第381—382页）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恩格斯的这一卓越的预见是多么正确。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恩格斯在八十年代中期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新的现象、新的历史规律，当时要预计到这些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这一预见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恩格斯认为已经过时的“局部”战争（见本卷第614页），确实不过是走向恩格斯所预言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道路上的若干阶段而已；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和灾难，而且也造成了地球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资本主义以无可弥补的打击，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恩格斯毫不怀疑未来的战争将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创造有利的前提，然而他从不认为革命的成功要直接依赖战争。相反，他认为战争对工人是巨大的不幸，因为战争需要他们作出前所未闻的牺牲，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使工人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他在1886年9月13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战争……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见本卷第514—515页）。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说过，无产阶级关心的是以最少的牺牲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他从来不排除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他在1887年3月19日给施留特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斗争是一种围攻战，只要战壕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情况就很好。现在我们已经接近第二道防线，到那里以后我们就可以安置破坏炮队，迫使敌方的大炮沉默下去；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世界大战使被围攻者得到暂时的解围），我们就能确定时机在城堡外的斜堤上安置围攻炮队，打开缺口，发起冲锋。在此以前，缓慢而镇静地继续做好包围工作，是避免过早的攻击和不必要的牺牲的最可靠保证。”（见本卷第618页）

恩格斯的书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平无比珍贵的史料。恩格斯以无限敬仰的心情怀念着马克思，他令人感动地、亲切地关心马克思的家属，愤怒地揭露对马克思及其亲属的一切诽谤。恩格斯象慈父般地关照马克思的女儿们，经常给予她们物质上的帮助。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去世以后，我就有义务要象他自己那样关怀他的孩子们，要尽我的一切力量使他们不受欺负。”（见本卷第593页）

恩格斯非常关心弗·列斯纳、约·菲·贝克尔、乔·哈尼、弗·阿·左尔格这些革命运动的老战士。恩格斯和他们保持经常的书信往来（可惜，他给哈尼的大量书信，我们没有找到），商量各

种各样的问题，把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告诉他们，经常给其中许多人以物质援助。同时，他也乐于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接触，帮助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出主意，给他们解答各种理论问题，阅读他们的作品，甚至常常看他们的手稿。一页页的书信展现出恩格斯栩栩如生、具有非凡魅力的形象。这是一位满怀激情的革命家，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地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战士，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深信无疑的卓越思想家，关心人的、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充满无穷活力和乐观精神的人。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恩格斯的一百零二封信。其中有七十二封信曾在国外的刊物上用原文发表过；三封信曾在苏联的期刊上发表过；二十七封信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副本第一次发表的。

第三十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收集了恩格斯1888年至1890年所写的书信。

这几年的特点是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临近的征兆：垄断的发展，殖民主义扩张的加剧，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和敌对国家集团的形成。同时工人运动在这几年也取得巨大的成绩，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参加了罢工运动。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各国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奥匈帝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等许多国家，前几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正在巩固。英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某种向社会主义的转折。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在进行有效的活动。在反对资本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工人运动各种队伍要求统一行动的愿望日益强烈。

这个时期，恩格斯继续从事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各方面的活动。列宁写道：“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须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0页）

恩格斯的书信反映了他为进一步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进行的紧张活动，反映了他为纯洁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反无产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作的斗争。

本卷中许多书信都表明恩格斯为了准备《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付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恩格斯为这项“刻不容缓”（见本卷第94页）的工作付出了全部精力。恩格斯认为第三卷的理论内容的意义特别重大，他在1889年7月4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见本卷第236页）。第三卷不仅要完成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而且给予那些攻击《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以毁灭性的打击，“象炸弹一样炸毁这些家伙”（见本卷第94页）。

第三卷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手稿的某些章节只是粗略的草稿，因此，“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的调动就不能发表”（见本卷第374页）。恩格斯细心地研究了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作了许多补充，新写了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4—91页）。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即第四版也非常重视。他重新核对以前的几版，作了必要的修改，写了序言。由于恩格斯的努力，这一版成为定型版。全世界重印和翻译《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根据德文第四版，即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

为了使马克思的手稿遗产成为工人的财富而不致成为“天书”（见本卷第236页），恩格斯极力从德国社会党人中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他吸收考茨基参加《剩余价值理论》的工作，并教他辨认马克思的难以辨认的笔迹。

恩格斯密切注视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反应，不断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企图败坏马克思学说的声誉。恩

格斯写道：“现在任何一个浅薄的微不足道的家伙，都想替自己吹嘘，而攻击我们的作者。”（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日益庸俗化，它已经滚到反科学的立场。他揭露了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一些时髦理论当作“最新的”科学发现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继承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后裔们害怕从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那些理论前提中必然得出的各种危险结论，“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见本卷第104页）。

这几年恩格斯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新版本，还准备把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90年，恩格斯着手准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四版的工作，他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文献，特别是摩尔根和柯瓦列夫斯基的最新著作（见本卷第408、447—448页）。在这个时期，他还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工作花了许多精力，增加了新的注释，写了新的序言。恩格斯专门为新版本写的一些序言具有独立的意义。在这些序言中，恩格斯分析了前一个版本出版以来的工人运动的发展，阐述了新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在重大问题上给各个无产阶级政党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方向。

恩格斯也没有放弃他自己的新的科学写作计划。许多书信反映了他加工未完成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情况。恩格斯打算在这部著作中进行“对俾斯麦全部政策的批判”（见本卷第17页）。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也涉及到他在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写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有关的问题（见本卷第329、370—372页）。

恩格斯对理论问题的见解具有重大的意义。他1890年6月

5日给鲍·恩斯特的信、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21日给奥·伯尼克的信以及1890年9月21—22日给约·布洛赫的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发表这些意见的直接原因是有人企图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坚决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他指出，应当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见本卷第410、432页）。

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十分重要。他反对把共产主义制度理解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认为，共产主义也象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将不断地发展，经常地变化和改革。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就在资本主义内部成熟起来。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决定意义的特点是“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见本卷第443页）。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他写道，“分配方式……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并应当“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见本卷第432页）。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1890年8月21日给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了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改造农业的途径。他认为，最重要的步骤是大地产社会化和集体耕种土地。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关于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关于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用社会主义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思想，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给伯尼克的这封信，补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

恩格斯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反对用所谓经济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只是经济因素的作用）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生产归根

到底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但绝不否认思想、政治机构、法律制度以及上层建筑的其他形式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他在189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信中说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意义，阐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写道，当政治权力阻碍经济发展时，就“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见本卷第487页）。他认为上层建筑在社会的革命改造时期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在研究上层建筑的各种成分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时，也分析了艺术创作。他在1888年4月初写给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见解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大作家的创作，有时不管他的政治信念如何，都含有对剥削者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客观上对未来理想的确认。恩格斯坚持这样一种思想：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方法不能用说教、作者训诫和公式主义来代替。他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见本卷第41页）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某些原理。他指出，不仅必须真实地描写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而且必须用艺术形式表现“工人阶级对……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表现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恩格斯的理论工作是同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着的。恩格斯经常向他的许多通信者说明当时发生的事变的实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正确的策略。他在书信中揭示了当代的各种现象和各国（德国、法国、俄国）历史发展特点之间的联系（见1889年9月15日给卡·考茨基的信、1889年12月4日给维·阿德勒的信、1890年4月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对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各资产阶级政党作了评述（见1890年1月23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89年10月

8日和29日以及1890年2月26日给劳·拉法格的信)。

恩格斯在给德国、法国、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党领导人的书信中，进一步发展了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完全独立自主，是胜利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基本条件。“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见本卷第321页）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进步政党采取共同行动是容许的，在“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的条件下甚至是适宜的（见本卷第322页）。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善于依靠群众的经验，善于在宣传中利用这种经验，才能进行有成效的活动。

关于党内生活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开展批评的必要性、关于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关于从思想上纯洁党的队伍的意义，恩格斯的意见具有深远的意义（见1890年8月10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1889年12月18日给格·特利尔的信，1890年2月8日和8月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认为，群众性的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而制定统一纲领的方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党内对重要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在人人必须遵守党纪的范围内进行辩论。

1888年至1890年的书信表明，恩格斯是国际工人运动在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领导者。他完全有权利说他是“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见本卷第41页）。恩格斯一方面把国际工人运动引向共同的目标，同时又教导每个国家的工人根据具体条件制定自己的策略。

恩格斯认为，八十年代末工人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团结。从

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坚持不懈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各国社会主义者，竭力使他们之间达到充分了解。他主张各无产阶级党加强联系，互通情报和交换刊物，在机关报上互相撰稿，党与党之间互相给以物质支援，在国际政策问题上团结一致。恩格斯在1888年1月4日给罗马尼亚社会活动家若·纳杰日杰的信中写道：“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见本卷第4页）

长期以来，恩格斯认为成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为时尚早。他认为，建立这种新组织的先决条件，是每个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巩固。但是恩格斯看到，工人有联合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有可能被正在准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利用，于是他就积极参加为第二国际奠定基础的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放下自己的一切工作，甚至《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投身于召开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的斗争。关于恩格斯的这段生平后来列宁写道：“恩格斯（他当时已经六十八岁了）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2页）

恩格斯尽一切努力保证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不让机会主义者（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改良主义首领）占居新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地位。恩格斯的原则性、坚定性以及他所表现的灵活性，使许多困难得到克服，使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得到纠正。他要求法国工人党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更灵活些，同时却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对待机会主义思潮方面放弃调和倾向。恩格斯几乎每天都写信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以及威·李卜克内西，教导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要考虑其他党的利益和意见采取共同行动（见1889年3月21日、23日、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89年4月4日、5日、17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

这些书信的内容表明，恩格斯对代表大会的整个筹备过程的领导多么具体。他坚持印发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他审定了通知书，译成德文并协助散发。他同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通信，审定揭露可能派及其英国同盟者的阴谋的小册子。恩格斯不放过每一件小事：在安排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分配代表名额等方面，他都向拉法格提出具体建议。恩格斯的努力取得了成效。1889年7月17日恩格斯告诉弗·阿·左尔格：“我们的代表大会正在开会。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见本卷第241页）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它通过了科学共产主义精神的决议（其中特别重要的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节日）。代表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

代表大会以后，恩格斯继续为各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而努力。恩格斯1889年11月20日给法国工人党领导人之一茹尔·盖得的信清楚地表明，他竭力主张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互相支援。

恩格斯积极筹备第二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为召开这次大会制定正确的策略，保证使机会主义者受到孤立，使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取得胜利（见1890年9月15日、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10月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90年12月25日给列·弗兰克尔的信）。

恩格斯认为，这一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坚决反对当时已形成敌对集团的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恩格斯有许多书信分析了国际关系，阐述了某一国家对外政策同国内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恩格斯认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人可能被卷入全欧战争，他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的利益出发，强烈反对侵略战争，因为它将给人民群众带来牺牲和破坏

并在政治领域中导致反动统治的暂时加强。恩格斯指出，未来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极大，所以工人阶级特别关心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工人运动的目标。但是，不管未来战争的灾难多么大，主张战争的人也不能用战争来阻止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政权。

本卷中有相当数量的书信说明了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态度。象前几年一样，德国工人阶级当时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前列。虽然有反社会党人法，工人运动仍在胜利地发展壮大。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德国统治阶级要保留反社会党人法越来越困难。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由于在非常法期间的斗争，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更加成熟，阶级觉悟更高，能够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抗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

恩格斯满意地指出，在德国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了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有了增长。恩格斯在1889年5月16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故乡的矿工罢工……是十分重大的事件……从此以后，全德国的矿工都属于我们的了，这可是一支力量。”（见本卷第202页）

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具体指示和意见，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执行正确的政策，并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制定相应的策略。

工人阶级的国会代表（倍倍尔、辛格尔等）反对反动集团力图延长非常法有效期的演说，得到恩格斯的热烈赞扬（见1888年2月7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88年2月23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1888年2月25日给劳·拉法格的信）。恩格斯把1890年非常法的废除看作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

恩格斯高度评价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2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早在选举以前，恩格斯就满怀信心地预告了

这个胜利(见1890年2月17日给奥·倍倍尔的信)。恩格斯在信中谈到选举结果时为德国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对它不断增长的力量充满了信心。他在1890年4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的确很惊人……人们看到,德国资产者和容克不能构成整个德国民族。经过十年压迫和现在仍遭受这种压迫的工人取得的辉煌胜利,产生了比凯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会战更加强烈的影响。全世界都知道,正是我们推翻了俾斯麦。”(见本卷第380—381页)

恩格斯在书信中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斗争,如何正确利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为党提供的各种新的机会。在选举以后,他又警告他们不要过早放下武器,不能高枕无忧。他在1890年3月9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这只是开始,他们还面临着更艰巨的战斗”(见本卷第362页)。恩格斯分析了德国各地区投票的结果,向党提出要在农业工人中,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农业工人中加强鼓动工作。“我们能够在三年内把农业工人争取过来,那时我们将拥有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见本卷第362页)

在给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恩格斯要求他们在制定策略和确定斗争方法时,仔细考虑情况的变化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恩格斯认为,党的任务是加强革命的坚毅性和纪律,集聚力量,做群众工作,对最近几年大量补充到党里来的人进行教育(见1890年2月26日给劳·拉法格的信,1890年3月7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4月12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应当在胜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给我们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妨碍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因此,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见本卷第362

页) 恩格斯赞成 1890 年党在德国组织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策略路线。应该避开当局的挑衅, 不给新的警察迫害提供借口。恩格斯在 1890 年 5 月 9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你们把事情安排得不致发生任何冲突, 这完全正确。”(见本卷第 398 页) 但是后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把由于非常法延长的威胁而采取的 1890 年组织五一节活动上的谨慎策略奉为一种总则, 恩格斯便把它作为机会主义予以批驳。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使恩格斯感到高兴, 同时他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也毫不留情, 为了克服拉萨尔派及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影响, 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批判那些“庸俗分子”用机会主义思想污染了党。

恩格斯也严厉地驳斥了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由加入党的知识分子组成)在策略问题上的左倾行为。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清楚地表述了他对这个派别所持的否定态度, 把反对党的路线的那种叫嚷讽刺地称为“大学生骚动”(见 1890 年 5 月 9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 1890 年 8 月 9 日和 27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1890 年 10 月 27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青年派”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立场, 恩格斯对此给予坚决的回击, 并揭露他们行动纲领的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实质, 揭露他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庸俗化了(《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80—82 页)。

恩格斯认为, 对反对派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 使群众相信党的策略和原则是正确的。他提醒党的领导不要没有根据地对党员采取严厉措施。“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者, 要表明你们那里充满着批评的自由, 如果非开除不可, 那只有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明

显的行为)，才能开除。”（见本卷第 441 页）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恩格斯大力协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党进行组织整顿。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在下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 1890 年 10 月在哈雷举行）筹备期间公布讨论的党章草案，他在 1890 年 8 月 10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对这一草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有些条文破坏了建党的民主原则。恩格斯认为，在章程中规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处于控制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地位，是不能接受的，而这个党团里机会主义分子的力量还很强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发展，特别是在恩格斯逝世后，表明了恩格斯是多么深刻而正确地看出机会主义的加强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危险。

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在恩格斯这个时期的通信中占有很大的地位。这几年恩格斯同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十分频繁的通信证明，法国工人党的领袖在争取使党变成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及从思想和组织上巩固党的队伍的斗争中，得到恩格斯的大量的、经常不断的帮助。

恩格斯认为，党与群众的联系十分重要，工人党必须认真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他在 1888 年 2 月 7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社会主义者报》的消失，意味着你们党从巴黎地平线上的消失。”（见本卷第 18 页）

恩格斯支持工人党的革命派对法国工人运动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斗争。同时他也指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斗争中的错误和失策，指出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和策略不够灵活。

恩格斯帮助工人党领导人对布朗热运动采取正确立场，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他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阐述了布朗热主义的沙文主义性质和反动本质，并且指出，

应当估计到布朗热运动可能造成个人权力制度的确立、君主制的复辟、复仇主义的增强和欧洲战争的威胁。恩格斯要求工人党采取明确的立场，彻底揭露布朗热运动的反动实质，揭露它的社会和政治的蛊惑性（见1889年3月25日和11月16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他尖锐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对布朗热派采取不能容许的妥协态度，认为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他在1888年12月4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不能不承认，你们对布朗热主义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你们在法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声誉。你们由于仇恨激进派而同布朗热派勾勾搭搭，向他们献殷勤，其实你们很容易攻击这一派也攻击那一派，这里丝毫不能模棱两可，你们对这两个党派的独立立场也不容有任何怀疑。”（见本卷第114页，并见1888年7月15日给劳·拉法格的信）恩格斯认为，工人党领导人打算在1889年普选中同布朗热分子联合提名，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恩格斯象过去一样十分注意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实际上他也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指出英国工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已逐渐有所认识，同时也揭示了英国社会主义组织软弱的原因。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采取极右的立场，它的纲领和策略受到了恩格斯的坚决批驳。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了费边派的资产阶级本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方法来实行社会主义”（见本卷第351页）。

恩格斯象前几年一样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领导这些“无兵之将”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犯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错误（见1888年5月2日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1889年12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在恩格斯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关于开展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和吸引新的工人阶层参加斗争的材料。当时旧工

联的熟练工人，即“工人贵族”中改良主义倾向、行会情绪占上风，而在罢工进程中产生的、由以前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非熟练工人组成的新工联，具有明显的战斗性。恩格斯在1889年12月9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现在令人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老头们仍然相信‘和谐一致’，而青年们却在嘲笑一切说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人。”（见本卷第320页）恩格斯对英国无产者的罢工斗争是十分热情的。

恩格斯认为吸引工人参加罢工斗争是克服改良主义的一种方法。他指出，加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本能地向往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积极的社会主义鼓动者来领导他们的运动（见1889年12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89年12月9日给康·施米特的信）。在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斗争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姆·曼和其他罢工组织者起了杰出的作用。恩格斯尤其高度评价了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活动。在英国男女工人中她享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她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恩格斯非常兴奋地描写了1890年5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大会。“当我从那辆当讲坛用的旧货车下来的时候，四十年来第一次又清晰地听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似乎高了好几吋。”（见本卷第401—402页）恩格斯指出这次群众大会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恩格斯谈到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必须建立英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党，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见1888年2月23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1890年1月23日给奥·倍倍尔的信）。恩格斯指出，只有这种政党才能起到真正在政治上领导群众的作用。它使“老朽的工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沽名钓誉者、钻营

家和文学家”不能因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政治上不成熟和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而利用运动来从中渔利(见本卷第 400 页)。

这几年恩格斯也很关心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恩格斯认为,象在英国一样,建立独立的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是顺利开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尖锐地批评北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硬要在思想和实践上领导美国工人运动(见 1889 年 1 月 11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恩格斯的意见是,为了运动的利益,就要把这个“纯粹的德国宗派”,把“德国党移植到外国土地上的支系……具有拉萨尔派特征的……支系”(见本卷第 347 页),赶出政治舞台。恩格斯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他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对美国工人的影响日益加强,“因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这里的工人“只是靠实践清除旧的传统观念的废物”。他说,“一旦超越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而迈出了第一步,运动就会……迅速向前推进”(见本卷第 348—349 页)。恩格斯在给弗·阿·左尔格和其他美国的通信者的许多书信里指出,运动的前途掌握在美国无产阶级自己手里。“一旦群众都动起来,就会把这一切都整顿好的。”(1888 年 2 月 22 日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

恩格斯非常关心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为同俄国沙皇制度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重要任务。他在本卷发表的一些书信中,把沙皇专制制度描述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见本卷第 5 页),并揭露了它的对外侵略政策。同时,恩格斯还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出沙皇制度已开始崩溃,并预言俄国革命运动的浪潮将日益高涨,从而将消除沙皇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动影响。恩格斯在 1890 年 4 月 3 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自从俄国本身有了革命运动以来,曾经是无敌的俄国

外交界就再也不能得到任何成功了。而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外交界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见本卷第372页）

恩格斯认为正在成熟的俄国革命是一个伟大事件，它将为欧洲工人阶级开辟极其有利的前景。他写道：“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见本卷第6页）恩格斯关切地注视俄国年青的革命力量，为它们的胜利而高兴。恩格斯同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持经常联系和友好关系，努力加强他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首先是由于恩格斯的倡议，俄国社会主义者才参加了建立第二国际的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他还经常关心他们的内部事务。

恩格斯认为，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在1890年4月17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必须过渡到新的斗争形式，抛弃闭关自守的小团体、半密谋性组织这些旧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已经阻碍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民粹派观点的著作表示赞同。恩格斯早就看出，民粹派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变种。为了使群众能接受革命的科学世界观的思想，必须向群众说明这种思想的反科学性质。恩格斯也注意到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活动的右倾演变：出现了实质上放弃同沙皇专制制度斗争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恩格斯同意维·伊·查苏利奇的意见，他写道，“必须同各地的民粹派作斗争”（见本卷第370页）。

在这封信里，恩格斯还谈到另一个不仅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他以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为例指出了革命政党应当怎样对待疆界划分和民族自决问题。关于俄国西部

地区，他写道，“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完全象亚尔萨斯人应当自己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一样”（见本卷第371页）。

本卷收集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恩格斯的伟大的个人品德。尽管恩格斯已达高龄，仍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和极大的劳动能力，忘我地完成自己的党员义务。这些书信表明，他心地善良、性格开朗，无私地关怀朋友、马克思的女儿、老战友、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普通成员。恩格斯不但有这些高尚品德，并且有高度的原则性，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毫不妥协，奋不顾身地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恩格斯不止一次谈到他多么珍视各国工人的信任。“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见本卷第340页）恩格斯在七十寿辰时收到许多贺信，由于他对马克思非常尊敬，他本人也十分谦逊，在答复贺信时首先强调的是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功绩。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恩格斯的九十八封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1956年在法国用原文发表的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只有几封信曾用俄文在苏联的历史杂志上发表过。恩格斯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的信也是从来没有用俄文发表过的。本卷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信共有七十三封。其中二十封完全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照相复制品第一次刊印的。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保·拉法格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这封信部分地转述了我们没有找到的恩格斯的书信的内容。

第三十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收集了恩格斯在1891年1月至1892年12月所写的书信。

这些书信清楚地展示了恩格斯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争取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团结的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这些书信反映了这两年工人运动的成就，分析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评论了各个政党和政治活动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恩格斯这两年科学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整理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首先是《资本论》第三卷。1891—1892年期间，恩格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整理第三卷第五篇的最后几章。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朋友和战友所做的这件工作确实是艰巨的。从1892年底起，恩格斯开始准备《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在完成第三卷以后，他还打算着手整理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见1892年12月24日给卡·考茨基的信）。

恩格斯在这两年十分注意宣传和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使它遭受任何歪曲和庸俗化。他密切地注意对《资本论》各卷的反映，驳斥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企图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庸俗的教条冒充为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要求，对资产阶级的伪造者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家”的批判应该是原则性的，这种批判应熟悉业务和有高度的理论水平（见本卷第一次发

表的 1891 年 3 月 6 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1891 年 6 月 13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

除了整理《资本论》的手稿，恩格斯还用了很大的精力准备马克思其他著作的新版本和他本人的著作各种文本的新版本，并为它们写了新的序言和导言。从 1891 年 6 月 29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曾打算出版马克思全集，认为这是他的义务(见本卷第 120 页)。

收入本卷的书信表明，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时，周密地分析了个别国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的变化。他发现了这样一些新的趋势：例如垄断组织增长，资本越来越集中，经济周期缩短，经济危机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夺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而斗争，统治阶级进一步“向右转”，有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公开镇压工人运动。恩格斯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垄断组织的政治影响日益加强，投机倒把(特别是倒卖土地)、舞弊诈骗等行为大肆猖獗。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还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过程，指出了这一过程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点。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还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一些问题。

恩格斯 1891 年 3 月 24 日给麦·奥本海姆的信，1892 年 6 月 18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892 年 9 月 28 日给弗·梅林的信以及其他人的信，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关于生产发展对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关于群众能动自觉活动的作用等重要原理。例如恩格斯在说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写道：“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

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见本卷第 364—365 页）

恩格斯 1891 年 7 月 1 日和 11 月 1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十分重要。这两封信对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作了评价。恩格斯指出，对黑格尔的著作应该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古典学派的模仿者们对黑格尔体系的解说是片面的；他们认为黑格尔体系只是纯粹的抽象，矛盾百出，谬论连篇。他们最怕的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方面即辩证法必然得出的那些革命的结论。同时恩格斯还提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有缺陷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观点作了评价，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评论一个哲学家，不应该“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而应该“根据他活动中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见本卷第 123 页）。恩格斯再一次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承继者（见本卷第 14 页和第 15 页之间的插图）。

恩格斯怀着巨大的喜悦欢迎弗·梅林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恩格斯对《莱辛传奇》评价很高。他在 1892 年 3 月 16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令人鼓舞的是…… - 唯物史观…… 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见本卷第 310 页）恩格斯认为，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和现实意义在于它反对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同时，恩格斯在 1892 年 9 月 28 日给弗·梅林的信中还指出了他这本书的一些缺点。

书信也反映了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逐步有计划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破坏旧的生产方式以后，没有阶级的新社会才能建立起来。恩格斯写道：“到那时，首先需要的将是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

么的。”(见本卷第 59 页)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 1891 年 7 月 1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科学地探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复杂的。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不要急于求成,匆忙作出结论。

恩格斯在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时,预见无产阶级革命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 1891 年 10 月 24—26 日和 11 月 9—10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这两封信规定了无产阶级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了培养各个知识领域的专门人材的巨大意义。恩格斯认为,必须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加入社会民主党。

恩格斯非常关心自然科学、化学和军事科学的发展。他同著名的学者有紧密的联系。在许多书信中,在为他的朋友大化学家卡·肖莱马所写的悼文中,恩格斯指出,肖莱马之所以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就,首先是由于他在科学上是一个革命者,由于他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恩格斯维护科学界的新的进步思潮,同时又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科学界特有的行会习气。他谴责一派学者对不同意本派观点的其他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保持缄默,力图垄断科学。他写道,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没有论争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见本卷第 88 页)。

恩格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素质,他把他的全部理论工作同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收入本卷的书信反映了恩格斯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紧张活动。恩格斯的大量通信对他来说,是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传授革命经验并给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活动以积极影响的主要手段。恩格斯帮助这些政党和组织制定纲领和策略,向它们说明各种政治事件的意义,规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具体任务。

因此,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各社会主义政党为思想和组织上

巩固而斗争的问题，克服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在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书信中占首要地位。这些书信中有大量材料反映恩格斯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分子和“左”倾宗派主义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一贯坚持原则，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的阶级政策，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和党的纪律的重要的革命原则。同时，他还指出，党的观点统一和党的纪律应该建立在党员的高度觉悟和积极性的基础上，建立在每个党员参加制定党的统一政策和策略的基础上。恩格斯主张广泛发扬党内民主，自由交换意见，“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见本卷第 517 页）、在严格遵守党的道德的条件下进行批评。

恩格斯多次指出，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坚决批驳对理论进行教条的死板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活的行动理论，而不是“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见本卷第 93—94 页）。恩格斯说，一个理论上站得住的思想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那也毫无用处”（见本卷第 74 页）。

恩格斯教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它们在科学地总结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来制定策略和政策。恩格斯认为，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见本卷第 439 页）。“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经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见本卷

第 442 页)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也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策略问题做了探讨。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推举工人候选人并为他们竞选，让社会主义者学会利用议会讲坛，这都有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逐步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恩格斯写道：“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见本卷第 513 页）

从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1892 年 10 月 14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和其他一些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要求社会主义者议员认真对待议会活动，认真完成自己的议员职责。恩格斯建议保尔·拉法格经常到议会去，并积极参加议会辩论，他写道：“选民是想要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议员的议会活动情况的。假如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话，那么不仅有丢失这个议员席位的危险，而且要取得另外一个席位也不那么容易。”（见本卷第 493 页）社会主义者应该利用议会讲坛不仅揭露统治阶级的政策，而且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提出与政府法令针锋相对的议案和要求，争取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实际让步。恩格斯经常向社会主义者指出，必须把议会活动与议会外活动结合起来，必须加强党同工人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促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一致行动与团结，主张各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并对它们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使它们了解工人运动的国际任务与民族任务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斗争，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本卷书信的整个内容。

这些书信表明，恩格斯始终主张扩大与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国际联系。他要求各社会主义政党互通情报，积极为报刊

写稿等等。恩格斯认为，提供的情报力求全面、客观，这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为该报关于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有时不很准确；他在给奥·倍倍尔、保·拉法格和工人运动其他活动家的信中，还探讨了为各国社会主义报纸挑选合适的国外通讯员等问题。

恩格斯竭力主张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接触，认为这是加强兄弟般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他的一些书信中，从本卷附录里的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本人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倡议人。他认为兄弟党的代表参加别的国家的代表大会和示威游行有很大意义（见本卷第 504—505 页）。

恩格斯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政党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大力促使它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发展。他积极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例如，1891年6月28日给保·拉法格的信、7月12日、20日和8月17日给劳·拉法格的信、8月9—11日给左尔格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信，都说明恩格斯在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这些书信中指示怎样纠正代表大会准备工作中的错误，如何保证使马克思派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使机会主义者——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改良派领袖不能召开他们的分裂大会。由于恩格斯积极的活动，由于他的原则性和极大的克制，终于召开了统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

恩格斯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是满意的，认为这些决议是马克思主义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大原则性、策略性的胜利（见1891年9月2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91年9月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信）。

恩格斯对于 1893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书信反映了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再度分裂国际工人运动并使它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在获悉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决定拒绝出席苏黎世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单独召开它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后，在 1892 年 9 月 11 日给劳·拉法格的信和 1892 年 9 月 11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详细计划来抵制这个决定的实现。他坚决要求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不仅以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而且要以工会的名义对英国工联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向英国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向他们表明，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想置身于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之下，这些人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世界制度”（见本卷第 453 页）。

恩格斯这一次的努力也卓有成效。西班牙、法国以及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的工人，拒绝了工联改良派领袖的邀请，改良派领袖想召开的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许多国家开展了起来。

在恩格斯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中，为帮助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九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尖锐化的情况下，各国无产者的行动一致与兄弟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恩格斯焦虑地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和法国复仇主义的增长、年青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各种军事政治联盟的形成，造成了发生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建立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并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粉碎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见 1891 年 11 月 9—10 日给倍倍尔的信和 1892 年 10 月

中、10月24日给沙·博尼埃的信)。恩格斯号召各社会主义政党大力捍卫和平事业,为裁减军备而斗争,揭露军国主义者——各种军事同盟的组织者,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恩格斯在许多信中向社会主义者说明,维护欧洲和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他预见未来的战争将带来大规模的破坏和惨重后果,并着重指出,反动派将利用军事冲突向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进攻。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26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根据我们事业的进展情况,我们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作。”“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见本卷第187页)恩格斯在1892年1月6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重述了同样的思想。

恩格斯引导各国社会主义者反对侵略政策和掠夺战争,同时也预见发生另一种类型的战争即反对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根据恩格斯的教导,社会主义者对这种进步性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应当站到遭受侵犯的民族方面,并给以援助。

恩格斯估计在九十年代初可能发生这种类型的战争,如果沙皇俄国和法国进攻德国,而德国不得不起来保卫本国独立的话;恩格斯有一些书信也是对他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重要补充,他在这些书信中制定了工人阶级在这种冲突真正发生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策略。

恩格斯教导社会主义者,在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时,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首先要考虑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革命运动发展的程度。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3日和24—26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0月2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信中就发挥了这些思想。

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各国革命者支持德国社会党人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德国社会党人应当积极参加自卫战争，用革命的方法进行自卫战争并保证通过革命的途径摆脱战争。他在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人们应当了解，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见本卷第157页）。

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全面地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对外政策问题、战争性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的态度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列宁又进一步研究了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完全赞同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91年的策略问题的观点，认为在沙皇俄国与法国进犯德国的情况下，他们应当积极地参加民族自卫战争（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9页）。同时，列宁揭露了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企图引证恩格斯的话来为自己1914年背叛工人阶级事业，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去的行径进行辩解。列宁写道，“这一切引证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8页）。列宁反对把1891年与1914年的历史条件等同看待。他指出：“1891年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不可能是这样。（顺便提一下，当时也不存在革命的俄国；这一点很重要。）”（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

斯大林在《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这篇有名的文章中对恩格斯观点的批判，背离了列宁的论点。斯大林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与列宁的解释相对立，认为恩格斯1891年

9月29日—10月1日给倍倍尔的信以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理论根据。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同在前几年一样，非常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他在一些书信中自豪地指出，德国工人运动以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是当代工人运动的一支战斗队”（见本卷第518页）。同时，恩格斯也经常提到这个处在世界革命运动先锋队地位的党的义务。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他在书信中提出的实际劝告和善意的、有时甚至尖锐的批评，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使它能够根据斗争条件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九十年代初，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形势。党面临着一系列有关策略、组织、制定新党纲的问题。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指出了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手段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加强在工会和合作社等工人组织中的宣传鼓动阵地的重要性。同时恩格斯认为，选择哪种斗争方法、途径与方式，取决于具体条件、阶级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恩格斯说，当德国反动集团在非常法废除以后又力图恢复这项法令、并且等待时机“动刀枪”（见本卷第90页）的时候，德国社会党人不应当给人家提供进行挑衅的借口，使整个运动遭受打击。恩格斯在1891年1月31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们还远远不能经受住一场公开的斗争，我们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义务，不是使自己遭受失败，而是时机一到，在首次大战役中获得胜利。我要使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考虑。”（见本卷第19页）

恩格斯在1892年10月7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分析了策略问题，论述了党对待和平斗争方法和非和平斗争方法的态度这个

总问题。恩格斯强调指出，对党来说，最好是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恩格斯驳斥了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需要采用暴力、而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革命性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他写道，“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见本卷第490页）。同时，他在一些书信中也指出，必须准备在统治阶级采用暴力时，用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非和平方式代替和平方式。

在军阀君主制度下的德国，“普鲁士的官僚、军人和容克”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见本卷第263页），恩格斯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根本不存在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预料德国必然要发生激烈的革命战斗，并号召党准备战斗。

恩格斯密切注视德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德国的罢工运动，他认为罢工是培养无产者团结精神和阶级觉悟的好课堂。恩格斯在书信中号召党的领导者更加注意在党的刊物上报道罢工的进程。他写道，“自发的罢工，——这在目前，正是新的广大工人群众靠拢我们的通常的途径”（见本卷第89页）。恩格斯在1892年5月28日给奥·济格尔的信中，指出深入研究工人状况对于正确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书信中也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活动。他热烈地赞扬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威·李卜克内西在国会所作的保卫广大群众利益的战斗性演说。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围绕着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尖锐的思想斗争，书信也反映了恩格斯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恩格斯在1891年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这场斗争中的重大事件。恩格斯着手出版这份手稿，是为了打击党内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它的根源之一仍然是拉萨尔主义），帮助克服对拉萨尔的个人迷信，避免在当时制定的新纲领中重犯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预料，他必须克服

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定程度的反抗。但是他相信党员群众的支持，相信党的力量，相信党在思想上是成熟的。这个信心得到完全的证实。他满意地写道，马克思的著作在党内“很受欢迎”，也得到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赞赏（见本卷第28、31—32、52页）。

在1891年5月1—2日给奥·倍倍尔的一封内容丰富的信中，在给弗·阿·左尔格、卡·考茨基、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一些信中，恩格斯说明了发表马克思这部著作对于各社会主义政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巨大意义，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领导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错误立场。恩格斯也对拉萨尔的活动进行了总的评价，指出了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两重性。

恩格斯直接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制定新的、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他仔细研究了他收到的由党的执行委员会起草的纲领草案，特别严厉批评了草案的政治要求部分，因为它回避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恩格斯说，正是这个部分使他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见本卷第119—120页）。恩格斯也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纲领论述部分提出了批评意见（见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91年9月28日和10月14日给卡·考茨基的信）。恩格斯对理论部分的建议，在制定提交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讨论的最后草案时，在很大程度上被采纳了。

本卷发表的书信表明，恩格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1891年10月14—21日）的工作是满意的，他密切注意大会的工作，几乎每天得到奥·倍倍尔的报告。代表大会谴责了“青年派”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的分裂活动，以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格·福

尔马尔的机会主义沙文主义的演说，恩格斯对此表示欢迎。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评价了代表大会的结果，他写道：“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见本卷第179、180页）恩格斯以此说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来代替包含拉萨尔主义信条的、错误的哥达纲领。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见本卷第179—180、182页），纲领中没有提到引导德国工人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个重要的政治要求，纲领的措词也是模糊的，这都说明党的领导人对理论问题首先是对国家问题，缺少应有的明确认识，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对待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倾向还没有完全克服。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些缺点，后来使机会主义者能够利用来为其修正主义目的服务。

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以后继续尽力支持党的领导者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他不止一次劝告他们不要为战胜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巨大的胜利所迷惑，建议他们要密切注意福尔马尔——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个“我们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见本卷第198页）。

恩格斯在1892年7月23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9月4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坚决谴责这个机会主义者的首领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的新言论，驳斥他的关于国家具有超阶级性、在这种国家范围内逐渐引入“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的空想主义思想。恩格斯写道，这种由资产阶级容克国家实行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变为财政措施”（见本卷第444页）。恩格斯认为必须与机会主义者决裂，他向奥·倍倍尔提出与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具体策略。书信表明，恩格斯也同样绝不容忍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的态度。例如，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采取调和的态度就受到恩格斯的批评（见1892年8月20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9月4日给卡·考茨基的信）。

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斗争，提出一系列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深远意义的有关党内生活的重要原则意见：应该讨论理论问题以便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可以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展开批评，因为这是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克服党内分歧的手段之一。恩格斯指出：“我觉得，党……对自己过去的活动进行批判，从而学会更好地工作，这是绝对必要的。”（见本卷第 510 页）党主动进行批评，说明它的队伍的坚强。这可以作为对敌人的诽谤的答复：“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见本卷第 21、36、474 页）

恩格斯在 1891—1892 年所写的书信中，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占有很大篇幅；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主要是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里。在这些大部分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书信里，恩格斯分析了法国国内状况，指出政治反动的加强，复仇情绪的增长，由于巴拿马丑闻的揭发和资产阶级党派的腐败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危机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工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积极争取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抵制反动派的进攻，揭露统治阶级败坏共和国声誉的反动的国内外政策。恩格斯赞扬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的尖锐的揭露文章以及保·拉法格在全国的旅行和他在工人各种集会上的演说。

恩格斯在书信中指出了法国工人政治积极性的提高，罢工斗争的激化，工会运动的活跃。他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保证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行动的一致，把有革命倾向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孤立机会主义首领。恩格斯在 1891 年 1 月 31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特别赞扬党对待阿列曼派的策略，他写道：“签订一个实际合作的协议，放弃在目前合并的任何尝试……”

这是你们在目前的处境下最好的对策”(见本卷第19—20页)。恩格斯说,马克思当年建议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对拉萨尔派采取的正是这种策略(见本卷第20、74页)。1891年保·拉法格被选入众议院,恩格斯写道,“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的确是共同行动的”(见本卷第207页)。恩格斯认为这个事实证明马克思的指示是正确有效的。恩格斯在1891年10月31日给保·拉法格的信和1892年3月14日给劳·拉法格的信里,也警告法国工人党的领导者不要仓卒行事,尤其是不要按保·拉法格的意图建立社会主义者和以米勒兰为首的部分激进派的统一的议会派别。恩格斯指出,这种联合会使马克思主义者丧失独立立场,做出原则性的让步。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主张提防米勒兰是极有远见的。

在本卷发表的书信中,恩格斯也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了分析。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工人中有了进一步的传播,主要由非熟练工人组成并具有战斗的无产阶级精神的新工联的影响也在增长。恩格斯指出,英国无产阶级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工人贵族阶层,因此自由资产阶级和推行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与合作政策的改良主义组织才具有显著的影响。

恩格斯认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最重要的任务,他希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加强争取群众的斗争,建议他们围绕着一具体要求,例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把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团结起来。

许多书信谈到了伦敦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准备和经过。恩格斯认为庆祝五一的活动是争取群众,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者方面来的重要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新工联的领导人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曾努力争取其他一切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社会民主联盟等)参加示威游行,以使用革命精神来

教育受这些组织影响的工人。

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在书信中占有很大篇幅。恩格斯用社会民主联盟（它的领导犯了许多改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的例子说明，一个政党或组织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并摒弃一切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它就只能成为一个宗派，而绝不能成为别的东西”（见本卷第 419 页）。

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谈到了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问题。在给弗·阿·左尔格和海·施留特尔的信中，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它在思想和组织上比欧洲工人运动薄弱，它受到很多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恩格斯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被攫取高利润的资本家所收买的美国本地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移民受到残酷剥削，资产阶级在新来的工人中煽起民族纠纷（见 1891 年 10 月 24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92 年 9 月 30 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信）。同时恩格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来工人运动的进展。恩格斯在 1892 年 12 月 31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见本卷第 561 页）

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一些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批评他们对争取那些受改良主义首领影响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工人中传播缓慢的原因之一。

书信表明恩格斯同奥匈帝国（维·阿德勒）、意大利（菲·屠拉梯、帕·马尔提涅蒂）、波兰（斯·门德尔森）等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也有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帮助他们在本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本卷的材料证明，恩格斯仍象以前一样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对俄国革命运动，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继续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彼·拉·拉甫罗夫保持密切联系，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常常见面。他对俄国经济学家尼·阿·卡布鲁柯夫和尼·亚·卡雷舍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对德·伊·门得列也夫的经济著作表示称赞。

恩格斯特别仔细地阅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新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向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推荐(见本卷第147、236页)。

本卷中恩格斯给尼·弗·丹尼尔逊的几封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几封信分析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的经济状况，批判了民粹派关于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关于农民公社是俄国将来发展的基础的观点。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以及九十年代的著作中，认为俄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俄国最终走上这种变革的道路是在克里木战争和废除农奴制以后。恩格斯在1892年3月15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农民公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将进一步瓦解。他写道：“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见本卷第306页)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于农民公社必将灭亡的预见开始得到证实。

恩格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和其他国家相同的现象，但是由于俄国强大的封建主义残余和大量小农经济的存在，这个过程必将更加激烈，广大农民群众将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恩格斯在揭明1891年的饥荒的原因时写道，这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这是俄国整个发展过程的必然后果，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过渡到现代工业的结果”，“这一改革必将危及农业

公社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见本卷第 363 页）。

恩格斯把俄国经济的发展看作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前提。对俄国的深入研究，使恩格斯愈益确信，“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见本卷第 364 页）。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潜在的革命能力。他确信，在俄国必将发生“伟大的变革”，正在酝酿着一场反对沙皇制度的深刻的人民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对其他一切国家都会发生巨大影响，大大地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他在 1891 年 9 月 2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892 年 3 月 8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92 年 6 月 18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信中都阐述了这种思想。

恩格斯预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将使社会发展的要求同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深化，而且将使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固有的对抗表现出来。恩格斯在 1892 年 9 月 22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见本卷第 468 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恩格斯的九十一封信。其中四封信最初曾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八十四封信是用俄文第一次发表的，三封信过去发表时有删节，本卷发表的是全文。在新收入的书信中，有二十封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照相复制品第一次刊印的，其中包括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波兰社会主义者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和斯·门德尔森、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安·拉布里奥拉等人的信。

新收入的书信大部分是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这些信 1959 年在法国用原文发表过。以前没有用俄文发表的

书信中，还有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的信，1891年4月24日给匈牙利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列奥·弗兰克尔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书信。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第一次发表了威·梭恩和爱·马克思-艾威林给赛·裴帕斯的信，爱·马克思-艾威林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这些信与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信的内容相关。

所有这些新发表的文件对科研工作与编写传记都有很大价值，对工人阶级的这位伟大战士与导师的传记材料是一个宝贵的补充。

第三十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发表了恩格斯一生的最后两年半即1893年1月至1895年7月所写的书信。

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继续顺利地发展。战斗的无产阶级日益广阔的阶层逐渐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时大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页）

恩格斯仍然和以前一样，密切注视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本卷发表的书信证明恩格斯的国际联系更加扩大，他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胜利，从思想和组织上巩固了当时以定期召开国际性代表大会的形式而存在的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

恩格斯继续同他的老战友们和老朋友们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这几年他也同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如格·瓦·普列汉诺夫、安·拉布里奥拉、菲·屠拉梯以及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同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有书信来往。

恩格斯的书信使我们能够详尽地了解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各个方面。

恩格斯仍然认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

他继续进行《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付印准备工作。从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的基本著作成为整个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财富做了很多工作。恩格斯不仅要整理手稿，而且还要写好作者打算写的某些极重要的章节。列宁指出，恩格斯不但是《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者，而且实际上是合著者。同时恩格斯还要尽可能地保持马克思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他在1895年3月11日写道：“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努力地去进行独立思考。”（见本卷第406页）

近十年的劳动于1894年结束。同年12月第三卷出版了。这对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第一次以完整的学说的形式出现应该归功于恩格斯。资产阶级评论家们的所有谎言终于被揭穿了，他们硬说，马克思晚年在创作上碰了壁，甚至说他根本就没写成第三卷。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阐述并解释了《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困难的问题，如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平均利润的形成，生产价格等。例如，1895年3月12日和4月6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95年3月11日给威·桑巴特的信都是很有意义的。恩格斯指出，企图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找出某种矛盾完全是枉费心机。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对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原理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分析批判。恩格斯的这些书信是他写《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6—1028页）的基础。

恩格斯这几年除了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和解释其内容，还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1893年）。他设法使《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意大利文，就第二卷和第三卷译成法文的问题进行

了商谈。他也希望第三卷能早日译成俄文。

恩格斯本来还打算整理付印并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他在1895年3月28日给劳·拉法格的信中谈了这件事，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健康情况的恶化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恩格斯密切注意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把这些工作同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他在书信里经常分析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例如，他在1893年1月2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明确评述了交易所作用的变化，规定了工人阶级对交易所的态度。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所提出的原则，是他在1895年专门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关于在新条件下的交易所的作用这一增补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8—1030页）。这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鲜明范例。

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也指出了十九世纪末经济发展的特点：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尖锐化，德国和美国工业的迅速增长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垄断地位，军国主义倾向和殖民扩张都加剧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扩大了，保护关税政策和税收不断增加，等等，以后的发展证明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先兆。恩格斯批评了某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他们不懂，国家垄断粮食进口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并不能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反而有利于政府机构的上层人物进行更大的营私舞弊（见本卷第371—372页）。

恩格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重要问题的书信，也是很有意义的。恩格斯一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反对那些企图直接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人。他在1893年7月14日给弗·梅林的信中写道：“这些先生常常故

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见本卷第96页)恩格斯指出,把原因和结果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是违反辩证法的,绝不能忽略它们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这封信以前被误认为是寄给海·施塔尔根堡的)中阐明了唯物主义对必然和偶然的相互关系的理解的实质,他指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是由于社会发展已成熟的客观需要所造成的。

恩格斯还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方面,这往往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书信可以使人深入了解他的创作活动,熟悉他的某些著作的写作经过,了解他的科学工作计划。例如,由于必须反击一系列机会主义言论并帮助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恩格斯在1894年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许多书信都反映了恩格斯为这篇著作花了许多精力。恩格斯的最后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在革命危机增长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情绪加剧的情况下,恩格斯认为研究和总结过去的革命经验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写了这篇导言。他在1895年2月26日给保·拉法格的信里写道:“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见本卷第389页)

恩格斯在九十年代还对历史进行研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古代史的问题;1894年他写了《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正如他所说的,这篇文章是多年研究的成果(见本卷第264—265页)。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分析了他的文章《从柏

拉图到再洗礼派》，他认为必须研究十五至十六世纪城市居民的最低阶层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他还责备作者没有充分揭示十五世纪末德国的这些运动的经济根源。

恩格斯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他继续抽出很多时间从事马克思的著作以及他本人的著作的再版工作，并使这些著作译成各种文字。他特别重视使用过去没用过的文字出版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他对《共产党宣言》译成捷克文表示满意。他在1894年11月23日给阿尔明尼亚社会主义者约·涅·阿塔贝强茨的信中写道：“您把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成您的祖国语言阿尔明尼亚文，不久前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我十分感激。”（见本卷第310页）从恩格斯给劳·拉法格、菲·屠拉梯、维·阿德勒等人的信中可看出，恩格斯往往是亲自校订译文或者审阅译文手稿。

恩格斯仍旧非常关心培养能从事理论活动的青年社会主义者的问题。他乐于向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兴趣的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人物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复杂问题（见1895年3月12日和4月6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93年2月7日给弗·施穆伊洛夫的信）。

恩格斯要求社会主义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要有非常负责的工作态度。他写道，“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见本卷第12页）。他怀着极为愤懑的心情谈到有些人曲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和通信中的某些地方……做出极其矛盾的解释”（见本卷第75页），他们“为了维护一度采取的立场，竟不惜歪曲别人的思想和使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见本卷312页）。

本卷中有许多书信论述了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论述了如何

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政党、克服那些不利于争取工人阶级站到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来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和倾向的问题。书信中有恩格斯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分子斗争的大量资料，还有恩格斯的关于这一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思想。

新国际的建立给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如关于建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问题，关于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正确结合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它们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在1893年6月20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里写道：“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见本卷第84页）恩格斯坚决反对某些党、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有时无理提出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贪求。他认为，一个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不取决于它的活动家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它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客观作用。恩格斯并不否认某些党在斗争的某一阶段可能是运动中的先锋，但他指出，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决不是一个党的事。他在1893年6月27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见本卷第87页）

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已经达到了工人阶级独立的民族队伍能够共同采取实际行动的水平，他指出，这种行动只能是所有参加者通过事先协商而自愿合作的结果。他在1894年1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任何一次国际行动都必须就其实质和形式事先进行协商。我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公开提出倡议，然后要别的国家跟着它走，这种作法是不能容忍的。”（见本卷第185—186页）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离开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任务来解决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就会犯大错误。他劝社会主义者牢记：他们的每一步骤对于他们别国的阶级兄弟也有意义，他们必须考虑这一点。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里都发挥了这一思想：在现今的条件下，一个党的活动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党。他在1893年10月1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一个国家所获得的成功，反过来会对所有其他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见本卷第139页）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规定自己的策略和彼此间的关系。

恩格斯认为，利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通过个别党的代表之间的直接接触来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欧洲大陆上两支最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必须进行经常的接触。恩格斯认为这是两国统治集团实现其沙文主义意图的巨大障碍，这在欧洲大国已形成两个军事集团的条件下尤为重要。他在1893年10月1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会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德国党和你们法国党之间的紧密联盟不致中断”（见本卷第143页）。恩格斯积极参与筹备第二国际的头几次代表大会。可是，他仅出席了1893年8月的苏黎世代表大会。这件事在许多信里都有所反映（1893年8月21日给劳·拉法格的信，1893年10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代表大会的结果评价很高。

恩格斯在很多书信中提到了同某些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宗派主义倾向和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真理和原理的总和，这是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坚决斥

责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不考虑，工人运动不可能始终都是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惯用公式发展的。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里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的方式与欧洲大陆的典型方式就有许多不同之处。正如恩格斯再三指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懂得这一点，因而使党脱离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群众。他指出，工人运动不管它的发展道路多么复杂，终究必然要使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而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等这个过程地完成而应该全力加速这个过程。

恩格斯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政党说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还是不够的。这本身还不能带来胜利，如果它在实际活动中不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话。他认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他说，这两个组织都是“把马克思的发展学说变成死板教条的党派，这些教条，工人不是根据他们自身的阶级感情得来，而是必须当作信条不加思考地囫圇吞下”（见本卷第 236—237 页）。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确定具体任务时采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危险的。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政党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见本卷第 47 页）。他屡次指出，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活动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达到同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恩格斯坚决反对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企图在不仅有社会主义组织出席而且有许多工会组织出席的第二国际 1896 年例行代表大会前夕事先召开的、“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派主义路线的表现。恩格斯在 1894 年 8 月 9 日和 14 日

之间给帕·伊格列西亚斯的信，8月14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8月16日给菲·屠拉梯的信，8月2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都向他们说明：社会民主联盟的决定是错误的，并且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妨碍把那些尚未参加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工人吸收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在1894年8月16日给菲·屠拉梯的信中写道，“这只能引起参加代表大会的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们的愤慨，而且是正当的愤慨。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组织仅仅由于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这一事实，已被吸收到……社会主义怀抱里”（见本卷第278页）。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同改良主义分子，同某些社会主义领袖们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他事先警告他的学生们不要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能实现某些社会主义措施抱幻想。恩格斯在1894年3月6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象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 and 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见本卷第209页）恩格斯在1895年1月1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真面目，指出了统治阶级是怎样用间接限制的办法把劳动人民形式上的权利化为乌有的。

1894年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组织的领袖格·福尔马尔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言论引起了恩格斯极大的担心。恩格斯认为这些言论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活动”的标志（见本卷第314页）。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也发挥了不正确的、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法国工人党1894年9月南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纲领的某些原则相吻合。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书信向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在1894年9月下半月给劳·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南特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

和保护农民的以至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主和佃农的所有制，——这一点超出了法国以外的人们所能容忍的极限。”（见本卷第286页）恩格斯指出，福尔马尔建议保护剥削雇农的大农的利益，这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见本卷第295页）。同时他认为，必须向劳动农民——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宣传社会主义（见本卷第363页）。

恩格斯在书信中也涉及了议会策略问题。他指出，在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为了达到一定的实际目标而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恩格斯认为这几年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开展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有很大的意义（见本卷第138、289页）。这一斗争不仅是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政治活动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的手段，而且也是提高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积极性和吸引他们参加解放斗争的手段。他满意地写道：“没有工人代表的议会在欧洲很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217页）

恩格斯还在许多书信中论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欧洲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恩格斯在1893年6月20日给劳·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一个政党这样持续不断地一往直前，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见过。”（见本卷第84页）从他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理·费舍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大量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一直很了解党的全部活动，经常向它的领袖们提出建议，纠正他们的错误。他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评价很高，而且不止一次地表示坚信，党内的革命派依靠它的普通党员，能够克服福尔马尔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见本卷第318—319页）。

从许多书信中，例如1894年11月2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11月24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12月4日和12日给弗·阿·

左尔格的信，12月14日给维·阿德勒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大力支持党内以奥·倍倍尔为首的革命派，并尖锐地批评包括威·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某些领袖的调和主义倾向。恩格斯认为，对存在的意见分歧采取回避态度只会对机会主义者有利，他坚决主张展开公开讨论，这样就可以揭露福尔马尔机会主义观点的实质。他坚决反对“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见本卷第315页），他批评李卜克内西为了所谓的团结而掩盖意见分歧。恩格斯认为，巴伐利亚的机会主义者带着自己预先制定的纲领出席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1894年），粗暴地破坏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和党的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恩格斯在这几年对法国工人运动给予很大的注意。他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茹·盖得等人的信中指出，在国内还存在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条件下，工人党应该成为团结其他组织的核心。在他看来，党的议会党团应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他在1893年4月14日给茹·盖得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做到把这样一支不大的紧密团结的队伍送进波旁王宫，这支队伍要……使所有分散无组织的分子在自己周围团结起来。”（见本卷第65页）恩格斯认为，在议会中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作时，党不应该放弃组织上的独立性。

对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其中包括不久前加入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是十分慎重的。他担心小资产阶级分子会在联合的议会党团里占上风，并告诫工人党领导人不要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向法国社会主义者提出警告，“……你们不要忽略：这里有资产阶级分子，你们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同他们发生冲突”（见本卷第262页）。恩格斯认为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并且建议逐渐实现这一点，尽量

减少当时不可避免的思想方面的损失，力求保持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警告要提防降低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的危险。恩格斯认为，坚强的团结只有在有成效的实际斗争过程中才能实现。他在1895年1月2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党的进步本身首先将使党内传统的内讧缓和下来，而后再消除它。”（见本卷第371页）

恩格斯有很多书信谈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同前几年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的群众性的政党。他指出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弱点：他们不善于和不愿意在工人群众中，在工联这个英国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中进行日常的、细致的、平凡的工作；他们不善于利用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自发的、本能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据恩格斯观察，越来越明显了。恩格斯认为，妨碍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展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有强烈的思想影响，许多有组织的工人对运动的任务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此外还缺乏真正革命的领袖。他痛心地说道：“……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全国性的自觉行动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见本卷第293页）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作了尖锐准确的评述。他认为费边社是一个机会主义组织，它宣扬的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而是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资产阶级（见本卷第8页）。

恩格斯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够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他在1893年3月18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独立工党由于诞生最晚，它的顽固偏见较少，它的队伍中有着优秀分子……所以总的看来，它最真实地反映着目前运动的状况。”（见本卷第54页）然而后来党走上了机会主

义道路，辜负了恩格斯对它的期望。

美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在本卷的书信中也有反映。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脱离基本的美国工人群众运动的现象，同时也分析了在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意识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缓慢的客观原因。他在1893年12月2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列举了这些原因：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因此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欧洲好得多；各国大量移民使资产阶级能够在无产阶级各派之间挑起冲突；最后，两党制的存在使统治阶级能够压制第三个大政党的发展。因此，恩格斯写道，“美国的情况的确也给工人政党的不断发展带来十分巨大和特殊的困难”（见本卷第170页）。

这几年恩格斯一直同俄国革命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本卷的材料说明，恩格斯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建立了最密切的友好关系。他热情地对待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帮助他们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俄文译本，随时满足他们的各种请求。在他看来，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是俄国社会主义者新一代的化身，这新一代已同民粹派思想彻底决裂并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他们不同于“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一代（见本卷第394页）。

恩格斯给尼·弗·丹尼尔逊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他在这些书信中批评了把农民公社看作是俄国将来经济发展的基础的那些民粹派的观点。恩格斯令人信服地指出，俄国的经济已完全走上使公社解体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他还指出，所谓俄国经济发展有特殊的道路这种民粹派的理论，已成为纯粹的幻想。他认为，由于俄国存在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农业多半是小农性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伴随着异常尖锐

的社会冲突并将给劳动群众带来巨大的苦难。恩格斯认为这是加速俄国革命形势成熟的原因之一。恩格斯在1893年10月17日和1895年1月9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别·司徒卢威，后者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并企图把马克思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拥护者。

列宁在同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斗争时所提出的思想，和恩格斯的所有这些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恩格斯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俄国必然发生社会革命。他在1895年2月8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说革命的魔鬼已抓住了什么人的衣领的话，那就是尼古拉二世。”（见本卷第383页）他在1894年11月12日给劳·拉法格的信中谈到尼古拉二世这个“看样子只能作为那些互相倾轧的人们手中玩具的人的王位将是不稳的。这对于最终消灭俄国的专制制度是很需要的”（见本卷第299页）。

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书信在本卷中也占有不少篇幅。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三国同盟和法俄联盟这两个大国集团之间爆发欧洲战争的威胁日益增长，他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制定一条对外政策问题的总路线，以对抗统治阶级的侵略意图。他指出，在欧洲大陆最大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情况下，不大的局部战争必然要成为全欧搏斗的前奏。他在1893年2月9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而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见本卷第27页）。

恩格斯预见，未来的战争就其规模和破坏力来讲，将超过以前所有的战争。他在1895年1月2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由于1870年开始在武器方面以及后来在战略方面进行的彻底革命，当许多无法估价的因素被卷入，而一切事先的估计都是

建立在想象的数字之上时，战争的结局是绝对无法知道的。”（见本卷第 372 页）

恩格斯认为，反对战争威胁是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断然否定革命的工人阶级会在一场全欧战争中得到好处。他在 1893 年 1 月 18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见本卷第 10 页）从 1893 年 2 月 24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必须在 1893 年初发表一组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文章，帮助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国会即将举行的关于军事法草案的讨论中确定自己的立场。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出并论述了裁减军备和普遍裁军纲领是保证普遍和平的手段。从 1894 年 1 月 3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当法国社会主义者准备提出用民军代替常备军的法案时，恩格斯给予他们多么大的帮助（见本卷第 185—187 页）。

恩格斯在分析主要的欧洲国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时得出了结论：革命危机的因素在增长。他在 1895 年 1 月 16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整个欧洲的形势日益接近危机。”（见本卷第 367 页）他特别注意说明统治阶级内部腐败和矛盾的各种事实：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意大利政府官员头面人物的贪污受贿，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现象可能在短期内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他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在确定自己的全部活动时，应该以这种前景为出发点（见 1893 年 10 月 11 日和 1894 年 12 月 22 日给维·阿德勒的信，1893 年 10 月 12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94 年 12 月 18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几封书信中谈到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他指出，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这次战争必然要导

致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制度的崩溃，并将有力地推动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恩格斯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没有停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斗争。他密切注视这一斗争的胜负，经常帮助他的朋友和战友，帮助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俄国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们。

恩格斯十分关心社会主义的报刊。他阅读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各种著名的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还经常给《前进》、《工人报》、《社会主义者报》、《社会评论》、《新时代》写稿。

恩格斯描述他在欧洲大陆的旅行以及他参加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情况的书信很有意思（见1893年8月16日给海·恩格斯的信，8月21日和31日、9月18日和30日给劳·拉法格的信，10月3日给尤·倍倍尔的信，10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这些书信不仅鲜明地描述了二十年来大陆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也深刻地分析了个别国家工人运动的特点。这些书信充满了对工人阶级最后胜利、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和希望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恩格斯认为历史的主要动力和真正创造者是群众。他在1893年10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群众是很出色的，大都胜过领导人，至少是胜过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有了这些人，什么都能够办得到”（见本卷第129页）。在其他许多书信里恩格斯也表述了这一思想：“最重要的是阶级的自觉和自信。”（见本卷第31页）

本卷的书信也有传记方面的意义。这些书信说明恩格斯不仅是一位战士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心怀宽广、谦虚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随时准备帮助自己的战友。从书信和本卷公布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如何以父亲般的关怀对待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在保存和发表自己的伟大朋友的著作遗产方面他付出了多少

精力。

虽然恩格斯已达高龄而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仍然还有不少写作计划。他在给友人和战友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打算在最近期间出版斐·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并加上自己的注释，还打算根本改写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等等。他还想尽快地着手写马克思的传记，首先是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1842—1852年)和国际时期的那几章(见本卷第329页)。

恩格斯已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的全集，准备首先出版1842—1852年期间的作品。

然而重病使他未能实现所有这些计划。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了。国际工人运动遭到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列宁写道：“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上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恩格斯的八十五封信，以及三封信的片断。这些书信大部分是写给保尔和劳拉·拉法格的，这些信1959年在法国用原文发表过。只有少数几封信用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以前没有用俄文发表的书信中有：恩格斯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菲·屠拉梯，帕·马尔提涅蒂和阿·拉布里奥拉的信，给波兰社会主义者约德科-纳尔凯维奇和恩捷约夫斯基的信，还有给其他国家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信。全卷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书信共六十九封。其中二十一封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照相复制品第一次发表的。本卷还全文发表了以前各种版本上摘录发表的七封信。

本卷中还有1852—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三封信，这些书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最近才收到的，过去出版的各卷都

未收入。这些书信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给柏林出版者弗·敦克尔的。其中有六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

在本卷的《附录》部分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恩格斯的遗嘱，以及维·查苏利奇 1895 年 1 月 1 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的片断、恩格斯生命最后时日委托别人代写的几封信和一些其他材料。

* * *

第三十九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三卷书信(第27—39卷)中的最后一卷,这些书信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重要部分。这些卷共收入书信近四千封,其中六百多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这六百多封中又有四百多封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近二百封是第一次发表的。其余的书信曾用俄文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这次发表的绝大部分书信,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手稿和照相复制品翻译的。有一百零七个文献作为附录发表。这里有马克思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委托写的信,以及揭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社会政治活动的某些文件。第二十七卷至第三十九卷是现已发表的 1842—1895 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遗产中最完整的版本。为了便于使用这些卷次,在本卷卷末附有名目索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528,000字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7002·23 定价2.10元

内部发行

内部发行

书号 17002·23

定价 2.10 元